

治国录

The Leading
of a Nation: Mao Zedong and
Post-1949 China

陈冠任◎编著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2

中共党史出版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治国录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毛泽东是一位非常文雅有礼的人。他非常平静、安详、谨慎、达观。

——法国前国民议会议长埃德加·富尔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他是八亿人民的心脏和发动机。

——德国政治家施特劳斯

他以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他的伟大国家的历史，而且也改变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

——希腊前总理卡拉曼利斯

The Leading
of a Nation: Mao Zedong and
Post-1949 China

ISBN 978-7-5098-2430-6



定价:198.00元 (全四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治国录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2

The Leading
of a Nation: Mao Zedong and
Post-1949 China

陈冠任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中，中国的变化以及这个极大的国家的伟大的进步最主要的是要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

——挪威前首相努尔德利

22.“各国友好桥梁的建设者——毛泽东主席”

无论是国共内战还是朝鲜战争，毛泽东都说美国等大国是“纸老虎”，大有睥睨天下之威，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霸气。恃强凌弱或以大欺小，是国际关系中通行的“法则”，弱肉强食，宛如“丛林中的竞争”。毛泽东身上有一种令西方大国害怕的霸气，却不是恃强凌弱的霸王，也不是崇尚“丛林法则”的森林之王。越是弱小的国家、弱小的民族，他越是尊重它们，越是与之搞和谐，且还要和它们一起谋发展。

邻国缅甸与新中国建交后，尼泊尔、不丹等弱小国家并没如当初美国断言的那样被中国兼并，也没受到任何威胁。尽管没有建交，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新中国没有要对他们“动手”的意思，相反，待之“远亲不如近邻”。

日久见人心。1956年秋终于成为中国与邻国的“交往季”。

9月25日，毛泽东亲自以国家主席名义给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发出祝贺中尼协定签订电报的复电。去年8月1日，中国与尼泊尔王国建交。在复电中，毛泽东的语气非常客气，称呼马亨德拉为“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陛下”，内容也十分谦虚：“值此中尼协定签订之际，诚挚祝贺，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这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的协定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发展。”在结尾，他还没忘加上一句“祝国

王陛下健康”的话语。

毛泽东对人家没有“大国的强势”，相反，比对其他人更加客气、谦虚，十分尊重人家。

29日，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应邀来到北京。毛泽东亲自设宴欢迎，致辞说：尼泊尔同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间有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座山不仅连接着中国和尼泊尔，而且也连接着中国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近邻。致辞后，他举杯祝尼泊尔国王陛下的身体健康，祝尼泊尔王国首相阿查里雅阁下和他的夫人以及同他一道来中国访问的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在座的印度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国团结一致，祝尼中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最近签订的协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领袖如此尊重小国的领袖和人民。

9月30日，中国另一近邻——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也来到了北京访问。

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也是带领印尼人获取独立的领导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印尼人民举行争取民族独立的八月革命。8月7日，苏加诺和荷兰殖民当局签署《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次日当选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1949年12月，他就任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次年8月，再度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并任总统。当苏加诺来北京访问时，毛泽东准备亲自接待这位邻居领袖和嘉宾。

这日，卫士们早早就开始布置勤政殿，准备毛泽东与苏加诺的会见。他们刚布置好，毛泽东便走进来了，巡视一遍，停在一台摆放的外国收音机前，皱起眉头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摆外国的？摆一台中国的‘东方红’不是更好吗？”

说完，他穿着自己那双很合自个儿心意的棕色皮鞋准备走开。这时罗瑞卿走过来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皮鞋吧？”

“为什么？”毛泽东望着他问道。

“按照国外惯例……”

“为什么要按照外国惯例呢？”毛泽东显出一副严肃而又不以为然的神色，轻蹙一下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

他要穿着这双棕色自觉合脚的皮鞋亲自去机场迎接苏加诺总统。

按照国际惯例，迎接外国首脑来访，都是实行对等原则。所谓对等原则，即是级别对等、相当，对方是总统，就由国家主席出面接待；对方是首相，就由总理接待；对方是部长，就由部长级别的人员接待。但一些大国也不这么做，对于小国、弱国，则降低级别接待：若对方是总统，则由总理去接待；若对方是总理、首相，则由副总理或部长接待；对方是部长，则由副部长甚至司长接待。毛泽东对来自弱小国家的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没有降格接待，而是亲自接待、会见。对同样是小国的总统苏加诺，他还是没有像西方国家首脑那样降格接待显示自己的“伟大”。不仅如此，他还要亲自去机场迎接，更是国与国外交上少有的礼遇了。

毛泽东如此对待苏加诺，一是对待邻国真诚以待，消除弱小邻国对于中国的戒备之心；二是对印尼人民的英雄苏加诺的尊重；三是努力拓展中国外交舞台，对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友好往来。在历史上，印尼和中国一样，备受外国侵略和列强欺压，两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有着极其相似的遭遇和经历。两国人民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苏加诺领导印尼人民为结束殖民统治，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团结进行了不屈下挠的斗争，最终使得被殖民主义者统治 350 年之久的印尼人民获得自

由，被称为“印尼独立之父”。他建立印尼共和国后，主张亚非民族加强团结，反对侵略和干涉，是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1955年万隆会议上，他发表著名演说：“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震动了世界。他一向也珍视印中友好关系，曾力排众议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多次派出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访问，邀请周恩来、宋庆龄、陈毅等人去印尼。但他本人一直没见过毛泽东。这次他出访欧亚六国，把最后一站选定为中国，去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则礼尚往来，亲自去机场迎接。

下午2时，苏加诺总统的专机降落在西苑机场。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在此等候。苏加诺身穿印尼三军最高统帅礼服，头戴黑色民族礼帽，迈出舱门。停机坪上鲜花如海，人潮涌动，欢呼声、锣鼓声响彻云霄。他向人群挥动致意，然后走下舷梯，向迎面而来的毛泽东走去。

两位领导人热烈握手，互致问候。随即，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检阅三军仪仗队。身着鲜艳服装的女青年不时把一束束饱含两国友好情意的鲜花送到苏加诺面前。他走上讲台，激动地说：“我非常感谢各位的欢迎，不仅以我个人的名义，而且以8200万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大家对我的尊敬，实际上也就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敬。没有人民，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印度尼西亚独立的赐予者，独立是人民斗争得来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父亲，我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儿子。各位对我的尊重，我将全部转达给印尼人民。”

机场上的欢迎群众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激动地走上前去，与他一起并肩走向欢迎群众。人们更加欢声雷动，高呼：“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和平万岁！”“默地卡（独立）！朋加诺（加诺兄弟）！”

在工作人员疏导下，毛泽东、苏加诺等人走出人群，登上敞篷汽车，缓缓驶出机场，其他汽车紧随其后，犹如一条长龙浩浩荡荡往中南海而去。此时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 20 公里的道路两旁，数十万人夹道欢迎。毛泽东、苏加诺乘坐的汽车驶到哪里，鲜花就撒向哪里，欢呼声就响到哪里。在鲜花的簇拥下，汽车驶进了中南海勤政殿。

毛泽东请苏加诺下榻在勤政殿。这是一种极高的外交礼遇。苏加诺一行稍事休息后，下午 6 时，正式与毛泽东会见。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万隆会议是一次极好的会议。一年多来，整个世界都有很大变化。你感觉到这一点没有？”

毛泽东一贯不怕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苏加诺访美时在其国会讲坛上发表演说，曾严厉谴责现代世界殖民主义罪行。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许。因此，他首先就谈起了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万隆会议。

“是的，的确如此。”苏加诺亦有同感，肯定地说，“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万隆会议。”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是代表了整个亚洲。”毛泽东对他的胆识表示赞赏。

苏加诺自信地说：“我也认为我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泽东补充说，接着问道：“美国的招待还好吧？”

“美国人民还是相当热烈。但美国政要多数就不高兴。我说的话，他们不喜欢听。”苏加诺说，“我在美国不论走到哪，都有记者问，印尼对中国加入联合国是什么态度？我的回答是坚决的：中国必须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如果没有代表六亿人民的中国参加，就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中国本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被美国等西方大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人就准备参加联合国。1950年1月，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就着手部署参加联合国的事情。1月7日晚，他亲拟致联合国电报，并写信给国内的刘少奇、周恩来：“兹拟就周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十会员国政府（不给南斯拉夫）的声明电，请照此发去为盼。”

次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转安全理事会会员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厄瓜多尔、印度、古巴、埃及、挪威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随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此电，并将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

1月13日，毛泽东又就向联合国派代表等问题与刘少奇电商，并提出几个问题：

(1) 同意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让美国将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

(2) 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经合署留沪物资。所谓的美经合署留沪物资，就是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存放在上海准备用于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物资。

(3) 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问题，请你于外交部及中财委提出办

法后酌定。

(4) 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今晚来谈话, 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紧张, 苏联支持我国声明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 美、英等多数国反对开除, 故我们有进一步表示的必要, 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我同意他的建议, 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 待恩来到此商决。

但不到一个星期, 1月18日下午, 毛泽东再次与刘少奇电商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之事:

(1) 今日下午4时半与周恩来通电话(他已到斯维德洛夫斯克), 觉得章汉夫(外交部副部长)资望方面尚且不够, 可做副手, 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张闻天)担任为适宜。现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电报, 如中央同意即请于明19日发出并公开发表。

(2) 据周恩来说, 高岗、李富春都认为洛甫可充任外交代表, 但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表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 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 请他谅解, 至动身去联合国的时间另电通知。

(3) 政府委员会完成任命手续可待将来第六次会议为之。如你认为有必要, 可于明19日邀集政席(府)各副主席及各党派主要负责人一谈。

(4) 因周恩来即到莫斯科, 照会用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名义。

(5) 此照会和上次照会一样, 发出电报后分送在京苏捷波英法荷等国外交人员。

(6) 新华社发布新闻时, 须介绍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委员, 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

毛泽东对联合国代表考虑十分周到, 还要求在新闻中介绍张闻

天身份，目的就是要告诉外界新中国政府是极其重视这个代表的。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1月19日，李克农发表致联合国电文：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

1950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1）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2）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此电文正式发出时，署名改为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1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个电文。

谁知毛泽东等人加入联合国这个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的热情却遭到冷遇。由于美国等势力的干扰，联合国组织竟然排斥新中国，并于6月组织“联合国军”干涉朝鲜半岛内政，与中国人

民志愿军干上了。以后，中国政府一直被联合国排除其外，许多国家打抱不平。随着朝鲜战争步入尾声，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否加入联合国一直是国际上普遍关心的热点。尤其是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希望中国早日参加联合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但由于美国等敌对国家一再阻挠，事情还是一波三折。

此刻苏加诺提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话语，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道：“你认为我们加入联合国，是早点好，还是迟点好？”

“越早，对联合国越好。”苏加诺不假思索地回答，态度简单明了。

毛泽东却回答说：“早参加，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苏加诺说：“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帝国主义会更猖狂。中国参加以后，就可以遏制他们控制联合国的企图。”

毛泽东告诉说：“我们迟一点加入联合国，主要是台湾问题。六亿人民的代表没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联合国内只能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有两个。”

然后，他拿出了自己惯有的硬气说：“如果联合国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毛泽东有着“不为己甚”的宽容，为何这事偏偏要和在孤岛的蒋介石过不去，较着劲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岂不是更好？其实，这并非与蒋介石过不去，而是此事关系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联合国是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加入的国际组织。若台湾作为一方在里面，大陆一方也作为一方参加，一个联合国内就有“两个中国”。毛泽东一贯维护国家统一，不同意将中国一分为二。富有远见的他因此认为台湾必须退出联合国，中国才参加。他坚持“如果联合国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着避免以后形成“两个中国”的局面。

基于这样的原则，他宁愿不参加曾经致力去参加的联合国，也不在这方面让步。

接着，毛泽东坦诚地对苏加诺说：“现在我们是大国，不是强国，人家看不起我们，又何必急呢？我们做工作，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半个欧洲。对待美国要有两条，一条是坚决斗争，一条是不要着急。解除禁运问题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有的无非是苹果、花生、猪鬃、大豆。我们可以等11年，到那时，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禁运解除了，进入联合国了，美国人来中国一看会后悔的。主动权始终在我们手里，在朋友们手里。”

他的精辟分析让苏加诺深感钦佩，尽管他说“等11年”就可以“进入联合国”，此刻谁也没在意这个预言。鉴于中国还不是强国，仍是弱国的事实，他所言“主动权始终在我们手里，在朋友们手里”多少让人觉得有点“阿Q味道”。事实真会如他所言那样吗？

时间才是最好的证明，一切只能在以后用事实来验证了。

接着，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和他踞有的台湾的前途说：“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通向华盛顿，另一条通向北京。根据国际局势来看，第一条路走不通，终有一天，美国会出卖台湾，他们将被最亲密的朋友所抛弃。我们要同他们恢复友好合作，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回呢？”

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苏加诺体会到毛泽东深邃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斗争策略，颇有同感地说：“主席的话很有道理，很实在，也很好理解。”

毛泽东与人谈话，很有自己的风格，不像世界上一些政治家，侃侃而谈，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是让对方云里雾里，摸不着边际，就是大玩三十六计，让对方觉得玄机重重，害怕再交下去。他说话很实在，又风趣幽默，并且很有见地，富有智慧，常常给人“与君一席

话，胜读十年书”之感。苏加诺遍游六国，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与之一交谈，不仅十分投机而且很敬佩毛泽东。说到高兴处，他好几次忍不住站起来，和毛泽东热情握手。一次，他握住毛泽东的手忍不住说：“这是一双东方巨人的手啊！”——此握手的情景，被在场的一名记者拍摄了下来，相片公诸于世。

两人越谈，心越接近，加深了解和彼此的友谊。了解中国文化的苏加诺三次称赞毛泽东是“孔夫子的得意门生”。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邀请客人共进晚餐——参加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0月1日，毛泽东又邀请苏加诺总统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阅兵，并观看北京50万人国庆大游行。

2日晚上，毛泽东举行盛大国宴，招待来访的苏加诺总统。

在宴会上，他发表欢迎苏加诺总统的热情讲话。他首先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加诺总统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苏加诺总统给我们带来了8200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接着，他赞扬印尼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认为这无论对印尼人民，还是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尼在国际事务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致辞中，毛泽东还以惯有的反帝态度说：“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它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历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友谊，更加加强了。我深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最后，他提议大家举杯：“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和平，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为苏加诺总统的健康，干杯！”

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讲话。

10月5日是印尼建军11周年的纪念日子。苏加诺总统在北京举行庆祝宴会。毛泽东应邀参加，并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全文如下：

总统阁下，朋友们，同志们：

在印度尼西亚建军十一周年这个重要的节日，我首先要向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祝贺英勇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在争取实现印度尼西亚人民理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什么是印度尼西亚人的理想呢？苏加诺总统在最近对我们所作的几次重要的演说中，已经说得很明白，那就是：独立的理想、和平的理想、新世界的理想。这些也正是中国人民的理想。为了争取实现这些理想，中国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而且永远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忠实的战友。

总统阁下，六天来，你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对你的欢迎和敬爱。你的访问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明天，你就要离开北京，不久以后，你就要离开中国。虽然我们又将要相隔几千公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将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建议：

为我们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苏加诺阁下的健康，干杯！

毛泽东很少喝酒，这回却两次为印尼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提议干杯，对邻国情真意切，友好之情不同一般。而他对客人的盛情还不止这些。

当晚，毛泽东通宵达旦工作了一夜。第二日清晨，他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出丰泽园，深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转身便向勤政殿望去。原来，下榻在此的苏加诺总统马上就要离开北京，去外地参观。在北京期间，他参观游览了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会谈，就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现在他要离开北京，毛泽东像好客盛意的东道主，尽管大清早还是决定亲自去西苑机场送行。在院子里，他伸手看了看表，然后转身回屋，换了件衣服。

随即，苏加诺总统也准备好了，众人坐车去西苑机场。

在机场，毛泽东与苏加诺总统热烈握手话别。一万多群众来到了机场欢送。苏加诺高声宣布说：“我已邀请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毛泽东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然后转过头对毛说：“我希望不久就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等待着你。”

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送别苏加诺后，毛泽东返回中南海。警卫车在前，他坐的汽车跟在后面。眼看警卫车跑在前面去了，天色还早，路上行人正匆匆开始上班。毛泽东突然吩咐同车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和卫士长李银桥说：“快7点钟了，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苏加诺总统离开北京后，继续在中国各地进行参观，先后去了辽宁、吉林、江苏、上海、浙江、广东、云南等省市，足迹几乎遍布半个中国。15日，他下榻在昆明，由衷地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个友好

的民族，好客的民族，努力工作的民族，辛勤劳动的民族，团结一致的民族，热爱独立的民族和充满建设精神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结为一个整体的六亿人民，她将永远屹立在世界上，总有一天，全世界都要承认她。”

有意思的是，他这个话语以后完全得到证实。

在离开中国前，苏加诺向毛泽东发出了感谢信，并重申邀请他访问印尼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始终没能踏上那块千岛之国。以后，倒是苏加诺又两次来华，同老朋友会面。两人的真挚情谊奠定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苏加诺访华 16 天，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跟随他访华的阿卜杜加尼外长评价这次访华时说：“苏加诺是一个工程师，他没有去建筑钢铁的桥梁。而在中国，我们找到了另一个各国友好桥梁的建设者——毛泽东主席。”而与熟悉印尼人民的周恩来则说：“毛主席和苏加诺的会见，把 6 亿中国人民和 8200 万印尼人民之间的友谊桥梁越过高山，越过大洋联结起来，这座人民的友谊桥是推不倒的，万古长存的。”

23.“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说：“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然

而，共和国前进的道路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在毛泽东等人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却总不免要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和曲折。

1956年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国际局势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

这次中央会议为什么要讨论国际局势？

1956年春开始，国际风云变幻剧烈，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激变，引起世界多国局势动荡，也波及到中国，国内也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动荡是由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引发的。

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24日下午，大会宣布闭幕。谁知午夜11时30分，已离开住处的代表突然被紧急召回，再次参加“已经闭幕”的大会。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大量惊人的事实揭露已去世的前任苏共领袖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痛批斯大林生前种种“问题”。

秘密报告的主旨是揭批斯大林的错误。报告虽然是秘密作的，但会议再次“闭幕”后没多久，内容就被公开于世，并且犹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全世界引发强大冲击波。长期受苏联影响的东欧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首先受到冲击。

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受邀列席苏共二十大，还没来得及回国，于3月12日猝然去世，波兰国内随即出现类似苏联“清算前任”的社会大动荡。

6月上旬，波兹南市采盖尔斯基工厂工人要求退还过去三年不应征收的税款，并提出工资改革等要求，但是遭到政府拒绝，于是一万多名工人罢工，并走上街头，冲击监狱，攻击法院、公安厅，很快就演变为流血冲突。此后，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各地罢工和游行示威此

起起伏。赫鲁晓夫亲自干涉波兰党内政，又引起波苏冲突。

与此同时，匈牙利也出现政局波动。

7月，执政的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拉科西·马加什由于赫鲁晓夫干涉内政而被解除职务，由格罗·艾尔诺接替。10月23日清晨，几千名大学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示威游行，随后十万市民参加，要求纠正以前的国家错误，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并要求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格罗发表广播演说，指责民众示威游行，进一步激化国内矛盾，当晚发生暴乱，动乱逐渐波及全国。赫鲁晓夫不得不派遣苏军进入布达佩斯，暴乱才得以结束。

但是，历时13天的动乱给匈牙利人民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

波匈事件的出现即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巨大震动。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受国际环境的波动，个别地方也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简单采取打压的“铁腕手段”，也没有置之不理“凉拌”，而是认为国内一度出现矛盾增加的情况必须正确地处理。

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

波匈事件虽由苏共二十大引发，但其根源是两国内部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中国国内出现一些问题，除受国际波动影响外，也与个别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人民群众不满不无关系。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执政党必须更加注意处理社会矛盾，去关注人民的工作和生活，力争人民满意。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刘少奇就目前时局作了形势报告，介绍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谈了我党对此采取的政策和应吸取的教训，提出

应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周恩来就国民经济问题作了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经验的教训，批评了1956年出现的冒进倾向，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适当压缩基本建设，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毛泽东在小组会议上作了发言。

11月15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总结性发言，一共讲了四个问题，即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他首先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随即讲到经济工作的进与退：“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接着，肯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后强调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经济工作要稳妥可靠，要抓财政，抓计划，抓粮食，抓猪肉，抓鸡蛋，抓蔬菜；“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要勤俭建国，要反对铺张浪费，要提倡艰苦朴素、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引发当前诸多问题的国际形势。

对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首先把自己的结论公之于众：“对于国际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接着以惯有的豪气说：“几个帝国主义算什么呢？再加上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话锋一转：“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

对于这些问题应该如何看？他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

是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

当谈到中苏关系时，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做法说：“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这也就是毛泽东思考国外风云变幻得出的结论：要重视经济工作，要重视群众的生活；要依靠群众，要走群众路线。在这样思路之下，他谈起了“大小民主”问题——即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首先，他有针对性地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随即表明自己对此的看法：“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毛泽东对民主进行具体阐述，“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他列举党领导下注入土改斗地主、“三反”“五反”反腐

败等等几次“大民主”后说：“现在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告诉大家说：“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

他继续说：“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作为当政者，许多人治国最害怕群众造反，怕人上街游行，毛泽东不仅不惧怕，并且公开宣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甚至提出“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第一说是好事”——这是何等的胸襟！只有一心为民、一心无私的人才会这样说，才敢这样说！毛泽东说这样的话，就是向党内官僚主义作风开炮，也是对个别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发出严厉警告。

随后，他举出一个典型事例说：“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

毛泽东举出问题后，便教导大家如何去正确处理这类事情说：“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指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好好说清楚”。

“这样的事情不少。”他继续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在党的最高会议上，毛泽东没为官僚主义干部护短，反而站在群众立场上，维护群众的利益，支持他们“打石头，打锄头”以表达自己对官僚主义的不满，生动形象，并且还表态“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说这样的话，完全是毛泽东一贯“群众利益至上”的思想体现。

说到这，毛泽东意犹未尽地说：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100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这些情况出现，他认为是一种矛盾的总爆发，于是总结说：“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接着，他直指造成矛盾的根源——党内的官僚主义：“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的这番话不仅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不高兴，反而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谈起了不同的人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的态度问题，之后，肯定地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

接着，他说：“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最后，他介绍了明年的整风工作，肯定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要求“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这次总结讲话，毛泽东谈了四个方面，最终以“大小民主”问题为落脚点，严厉地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而其生动形象的批评，着力点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过过嘴皮子瘾，而为了去破解如何解

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难题。针对人民内部出现的诸多矛盾，他认为主要是干部，是干部们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因此，只有对干部们进行整风，除掉官僚主义，人民利益才有保障，我们党才不会发生诸如波兰、匈牙利类似的事件，才能不被“拉下马”。^①

他的这番讲话非常精辟，准确地抓住了诸多矛盾的症结和关键，可谓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箴言式的方法论集锦。

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也是保证执政顺利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对这个执政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并没作了这次讲话就打住，他努力使全党干部努力掌握这个方法论，革除身上的官僚主义。为此，他和党中央继续推进这项工作。

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审阅时，特地加上了一段话语：“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在此，他强调了团结的目的和方法。

古今中外，统治者对于人民游行示威畏之如虎，多是采用军警镇压的办法。毛泽东不赞同这样的做法，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要去团结人，是为了“得到新的团结”。这是治国的大智慧。当年蒋介石对游行示威进行血腥镇压，结果问题没解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问题最终越闹越大，不可收拾，野火烧成熊熊大火，葬送了蒋家王朝。这样的教训还很多，但统治者大多还是醉心这样简单的扑火方式。为此，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329页。

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①

过一个月后，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列出12个小题目，提出如何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和处理办法，特别指出说：“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不怪下面，那么该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1）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2）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②

①《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年版，第57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毛泽东认为群众“决不无故闹事”，而最终要让他们不闹事不上街，“必须克服官僚主义”，这才是“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的办法，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别的途径，唯一的法宝就是“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否则是难“做好”“我们的工作”。唯其克服官僚主义，才能处理好各种矛盾，群众不会闹事。闹事了，一要利用闹事作为“改善工作”的“特殊手段”；二不仅要教育群众，更要教育干部；三要“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因为症结是官僚主义，毛泽东提出的处理办法是和善的，自我检讨式的，并且是主动积极的，是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压或躲避的。事实上，他提出的这些处理方法，可以说是最恰当和最有效的解决矛盾和问题之道，道理很深刻但不算是很复杂，但古今中外多数“领袖们”想不到，也做不到。毛泽东这样的“处理法”，源自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源自于他正确的治国智慧。

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为了不让出现的问题使得群众上街游行，他在大会小会讲，在党代会上讲，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然而，这样“反腐”，强调又强调，大喊大叫，只打雷不下雨，或者赚足吆喝后悄悄偃旗息鼓，这样的伎俩在中外“领袖”们中并不少见，蒋介石当年上海打虎就是如此。然而，毛泽东不是蒋介石，反官僚主义十分果决，“吆喝”之后就要落实到行动上——开展整风运动，落实到行动后还要进行检查。4月19日，他亲自发出《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其中语气之严厉极其罕见，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央

1957年4月19日

毛泽东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那样细细列出诸多问题,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汇报,进行认真的检查落实,并且特别指出有些人过去的“国民党作风”,不准“骗人”;

如果“骗人”，则是“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他这样“苛刻”，如此严厉，完全是出自于维护党的宗旨，出自于对人民利益的真心维护。而从治国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之道，是对民权真理的深刻领悟，而最根本的是，出自于他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1956年各项工作表现了巨大的进步。工业生产的总产值增长的速度约为25%，这是过去四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机器制造业在上年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产值增长将达到51%以上。在五年计划规定的46种主要产品中，有20多种产品的产量达到了五年计划的最高指标。因为某些地区遭受了台风、水灾、旱灾等严重灾害，农业生产受到相当的损失，但是，由于全国农业合作化胜利的影响和增产高潮的推动，主要农作物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的产量仍然有所增加，粮食产量比1955年增加了200多亿斤。基本建设比1955年提高64%左右，相当于1953和1954两年工作量的总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重点工程，特别是156项工程，绝大部分可以如期完成。1956年成为国民经济趋于全面高涨的一年。生产和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所有这些，都为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24.是“放”不是“收”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一个矮小、不成熟的民族，不可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一直很重视文化和文艺工作。

1957年春，他和党中央大抓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工作外，还重点抓了文化建设和知识分子建设等问题。

其实，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十分重视的。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亲自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经过努力，培养了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文艺大军。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两支文艺队伍胜利会师，开启了新中国民族的大众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于文化建设更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中央人民政府组建时，机构设置多仿照苏联模式，在文化管理上，有人认为苏联设了电影部、文化局，我们也要如此。但毛泽东否定了这个方案，改为设文化部、电影局，把“老大哥”模式颠倒了，有人因此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

事实上，毛泽东的思想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后来也证明是对的。1956年4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感叹地说：“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土改和“一五”建设及三大改造等运动推进，中国崭新的文化和文艺建设快速前进。但当社会、经济各方面迅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时，文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毛泽东便及时把它提上了议事日程。

文化事关一个民族能否强大和是否成熟，它如何去建设，如何去发展？

1956年2月1日，中央宣传部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参观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谈起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

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认为讲了一些“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请示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一下。毛泽东看到报告后，没去“打棍子”，认为是学术问题，有不同意见不应去禁止谈论自由，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阅，并退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办：“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就是与自己的意见相悖，毛泽东也能“容”，并且他还要求他人去“容”——这就是他对文化发展和建设的原则，即学术就是学术，要有自由，可以去争论，如果搞禁止，如果像历代统治者那样设文字狱，进行封锁，学术和文化就只有一条路：死亡。他对于文化和学术的思想完全是开放的。

很快，他的这种“容”和“放”思想就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文化政策。

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27日，在讨论报告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发言时说：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苏共对文艺干涉最多，中国关于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有过争论，到昆曲旧戏《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对此，毛泽东不断插话，引得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发言十分踊跃，各抒己见。

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

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第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这句话浓缩一下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个字。“百家争鸣”本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这些学派和流派即所谓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即是当时诸子百家因为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而进行争论，打口水战，打笔墨战。而正是这个时期激烈争鸣的文化思想奠定了随后整个封建文化的基础，对我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吸取了我国历史上的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把握文化建设规律而提炼出来的。

有趣的是，这八个字如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一样，在完整地提出之前，毛泽东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过“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两个口号。这一次，他正式地完整地将两者结合，且作为一个文化建设的方针，实质上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多层和多样格局，不是一“花”一“家”，而是要有不同的学派、不同的

思想，它们通过争鸣、讨论，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五彩缤纷”，以促进文化建设和发展。而这个方针所倡导的，不是去打压，也不是去封锁，而是以一种开放和宽容的文化心态去对待文化及其建设工作。

对于这个方针，在会上，毛泽东接着又作了说明：“‘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文化和学术争鸣，最终以真理取胜，这正是文化艺术的作用和本质，也是文化工作的精髓。真理自然不是轻易就能获取，有时候要经过争鸣、辩论，而文化建设本身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酿造一种文化引导人们去追求真善美，甚至以宣传和传达的手段指引人们去达到真理性认识。毛泽东以最通俗的话语道出了文化建设的目的。

经过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系列讨论，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基本上形成，并且获得多数人的认可。

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

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們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这个方针正式形成后，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召开的科学界和文艺界代表会议上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他指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针，是提倡在文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

6月7日，陆定一把自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一封信。信中说：因为200个科学家集中北京起草科学规划，李富春提议向他们讲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刘少奇指

定陆定一去讲。讲稿起草后，中宣部讨论了两次，后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了修改。5月26日在2000人的会上作了报告，会后收到来信70封。根据这些意见又加修改，成为现在的稿子。同时送上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来信五件。关于俞平伯的一段，袁水拍、何其芳提了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将这段删去。但因为这一段的影响是好的，所以仍旧保留。

袁水拍时任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何其芳时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6月8日，毛泽东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批示：“退陆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随后还附言：“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何其芳等同志商量一下。”

6月13日，陆定一这篇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方针发表后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对此，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下册）评价说：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9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第三次草稿上写下了两段批语，这两段话是：“在增强国防力量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以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应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58%左右，提高到60%—70%左右。”为了发展文化，减少国防经费和行政开支来做，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创举。但毛泽东却做了，可见对于文化建设是何其重视。

但是，人们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真正理解和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当晚，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文章。他随即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同志。”决定在北京即将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讨论。

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日，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他首先指出形势的变化：“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接着，他分析我国占据文化阵地的知识分子状况，说我国大约有5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但他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2）有少数人，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3）最大部分的人，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为此，共产党人要和他们合作，给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而知识分子也要克服看问题、写文章“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的片面性。

针对这种怕犯片面性，他说：“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随后，毛泽东从宣传工作是“放”还是“收”两个方面来具体讲述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非常通俗地讲清楚了为什么要“放”的道理，也讲了该如何“放”，即“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要说服，以理服人。这无疑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正确办法。

随即，他还告诉大家说：“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

为什么要用“放”这个方针？

“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毛泽东说，“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

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接着他就谈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他告诉大家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放”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放”，毛泽东最后说：“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

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允许批评，放开来让大家批评，在批评中进行，这自然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正确之途。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审阅了《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如将指示稿中“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句，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最后，写上“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他签字之后，乘坐专列去天津，次日去山东济南，开始了南下视察工作。

毛泽东亲自倡导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是一个主动的促进者。他这样说，在实际工作中会不会这样做，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呢？

3月19日，毛泽东到达南京，出席江苏省的党员干部会议。在讲话中，他再次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放还是收？说还是压？”进行阐述，说干部们“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还谈及《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并且提出“会不会乱？会不会被批倒？毒素怎么办？”等问题，具体说明文艺和科学工作要“放”、如何“放”以去进行争鸣。

第二日，按照这个提纲，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又进行了讲解。在报告中，他充满信心地指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4月4日，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南屏召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

上海四省一市领导干部会议，专门听取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的有关思想动态汇报。在汇报中，有人谈起了范瑞娟的文章和由此引起的一场风波。

原来，1957年初，中国新闻社约请上海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写一篇文章，因文章预备在香港《大公报》刊载，考虑读者对象，所以规定主题是谈谈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借此向港澳和海外读者介绍新中国戏曲演员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面貌。

范瑞娟很快就把稿子写出来了，并起了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标题——《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但在发表时，《大公报》根据文章的内容和报纸的读者对象，把标题改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文章发表后，对港澳和海外读者了解新中国戏剧工作者的现状有很大帮助。

3月24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没想到的是，就这个“丈夫”、“蜜月”的标题引起一场赫然风波。一些人对于又是“丈夫”又是“蜜月”的说法，很不满意，写信到报社，批评说党报不适宜刊登这样太生活化的文章，应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甚至还有人上纲上线，扣上大帽子，说是资产阶级情调。这时举国上下正在大搞社会主义建设，“资产阶级”帽子戴在头上确实有些吓人。结果，不仅报社受到指责，作者范瑞娟本人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毛泽东对范瑞娟并不陌生。她曾三次到北京演出，毛泽东看过她的戏，还当面称赞她表演有进步。听到这篇文章引发风波时，毛泽东当即插话问道：“这篇文章是黄色的？”

随即，他头一仰，说：“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

这时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正在热映，上海、杭州的报纸每天都有大幅的预告，毛泽东看了报纸广告，才这样说。不过，此

刻他的幽默话语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必须要百花齐放，为人民群众提供多种多样的文化和艺术作品，而不是千篇一律一个模式的东西，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

接着，他对众人说：“党委要给报纸一个方向，让他们按方向自己去办。搞方向就是领导，但不要干涉过多，毛病总是有的。报上登《我的丈夫》，究竟有什么错，难道不是丈夫？你600万人的上海，200封信有什么不得了？还有500多万人没有来信嘛，可见是正确的。”

在短短几日中，毛泽东连续四天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作了四场报告，对如何处理当前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艺术问题开展争鸣进行动员，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些转化。而他倡导“百花齐放”，在上海先放了一朵“生活花”。

毛泽东的支持，不仅解脱了范瑞娟和丈夫陈伯鸿心头的压力，也使刊发文章的《解放日报》从种种责难中得到了解脱。一场由“丈夫”和“蜜月”引发的风波就此结束了。

然而，毛泽东的“促进工作”还在继续。

4月13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文章说，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第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我国的社会制度起了根本的变化。第二，经济制度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中。第三，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其他工作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它们应当而且也必然会有高度的发展。在这个大变动的时期里，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建设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当符合于社会主义的

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看后，非常赞赏，认为文章说的非常好。在这个社会大变动中，文化建设不能落后，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为文化建设方针，可以使文化建设在经济建设、技术创造、经济事业、思想建设等各个方面及时发挥积极作用。他亲自批示给胡乔木：“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再过了不久，4月30日，他又看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立即批示秘书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为此，他亲笔写了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不仅刊登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还用上了他重拟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标题“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为副题。

毛泽东尽力推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他的倡导下，这个方针后来成为学术、艺术、文化乃至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政策。后来有人说：“尽管它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但它为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存在格局，设计了一个最大可能的发展空间。”

这个方针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方向，一起完整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艺事业伴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快步发展，最终带来了文化事业的繁荣，百家争鸣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

25. 女共青团员给毛泽东点烟,是“摆照”吗?

在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各项事业都以蓬勃生机展现世人面前,好像进入了人生的青少年时期,到处是光明的希望,到处充满无限的活力。

谁是中国最有生气的力量?

谁是国家的未来?

毛泽东认为不是各项事业的“领头人”——干部,也不是那些久经考验、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而是青年一代。他认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因此,他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十分关心、爱护青年们。青年工作也伴随着他的关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7年5月15日下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体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幕。2时许,1473名代表怀着激动的心情,肩负着全国2300万青年团员的重托,走进礼堂,等待着大会召开。

每次青年团的大会,毛泽东都亲自出席开幕式。这次大会,他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全部参加。3时整,当毛泽东等人健步走上主席台时,会场上欢声四起,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在热烈的气氛中,大会宣布开幕。随后,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祝词,各民主党派代表也纷纷致祝贺辞。

1473名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从山东半岛来的徐建春是第一次参加团代会,却是第二次到北京。1952年,她曾作为先进青年代表参

加了国庆三周年观礼。

和所有的代表一样，徐建春不是什么高级干部子弟，不过是一位最普通不过的农家女，她两次来北京，完全靠的是她在青年中的“先进性”。

徐建春是掖县过西区后吕村人。1950年底，她高小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次年1月，就加入村里成立的第一个互助组。组里几户老贫农、雇农见她读过书，有点文化，便推选她当了互助组组长。而此时徐建春不过是个16岁的小女孩。与在家务农相比，她更希望有机会去继续上学。她的愿望很快就得到实现，当年夏天考取济南公安干校。正在她准备离开家乡那一天，互助组组员们拉住她的手，殷切地说：“你留下来领着大伙儿一块搞互助组吧。”

看着乡亲们的目光，再看看自己和他们一起耕耘过的土地，庄稼已经丰收在望了。徐建春一股难舍之情油然而生，毅然决定不去上学了，说：“留下来，跟大伙儿一块干农业。”

小小年纪的她不像同龄的孩子，很有思想，干农业，走与父辈们不同的路，响应党的号召，带领互助组率先实施按劳计分和男女同工同酬，并且还进行农业技术改良。有了她的带领，大伙儿热情很大，干劲也足，当年互助组农作物产量明显超过单干时的水平。结果，“小领头羊”徐建春也被评选为掖县农业劳动模范。

对于这样的青年典型，党、团组织没有忽视对她的培养和鼓励。1952年9月12日，徐建春出席共青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会上，她不仅被团省委授予模范团员，当选为团省委候补委员，并且成为参加国庆三周年观礼的山东省代表。

9月28日，她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并且还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

9月30日晚饭前，国庆观礼的代表和劳动模范被大面包车接去

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毛泽东主席为国庆三周年举行的宴会。这真让徐建春激动万分：自己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黄毛丫头，凭着读了几天书，有点文化，就被村民们推举为互助组组长，而带着大伙干了不过一年多，就获得如此多的荣誉，现在还要去见毛主席！她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然而，这一切确实都是真的。

以往只有大官大僚和有钱人才能出入的中南海，现在全是来自田间、车间的农民、工人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劳模，徐建春随大家一起来到了怀仁堂宴会大厅。

约7点钟左右，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宴会大厅。代表们不约而同站了起来，掌声如雷，久久不能平息。徐建春的心激动得简直要跳出来了，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她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来自安徽的龙冬花。

在宴会上，毛泽东作了简短的致词。然后，举杯向全体到会者说：“为了各位的健康，干杯！”

徐建春和众人激动得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哪里干得了杯，只是拼命地鼓掌，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她本人一次又一次地擦去欢喜的泪水，喊着：“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微笑着，频频地向大家挥手致意，不断地说：“请大家吃饭，请大家吃饭。”

过了很久，大厅里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代表开始吃饭。毛泽东就坐在徐建春对面那张桌子边上。她看着这位高大伟岸、气宇轩昂的伟人，看着他和蔼可亲、幽默风趣地同身边的观礼代表亲切交谈，哪里还有心思吃饭。后来，她回忆此时的心情说：“只觉得做一名新中国的青年无上荣耀，同时也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直到宴会结束，她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下去。

这一夜，徐建春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扎根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切。

10月1日，徐建春同观礼团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再次见到了心中的偶像——毛泽东。

回到家乡后，她把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一一讲述给父老乡亲们听，把乡亲们一个个羡慕得要死。

其实，徐建春就是他们的代表。她的荣誉，就是上级对互助组工作的肯定。一花引得百花开。到1952年底，后吕村的互助组发展到三十多个。次年3月，全村互助组合并，成立初级农业社，小丫头徐建春又被推选为社长。1955年10月，掖县西由乡8个初级农业社组成高级农业社，她又当选为高级社社长。1956年，她荣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光荣称号。这次她又上了北京。

不过，这一次，徐建春是以共青团代表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并且还是大会主席团成员。

当毛泽东等人一出现在政协礼堂，全场就沸腾了，掌声如山洪般爆发，欢呼声震撼着屋顶。毛泽东慈祥地微笑着，向代表们不停地招手致意。

3时零5分，大会在国歌声中开幕。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廖承志致开幕词。随后，党中央和中国民盟、民建的代表相继向大会致词祝贺。实业家出身的民主建国会副主任胡子昂是我国民族工商业者的代表。他在祝词中报告说：“我国的资本家的子弟在党、团的培养教育下，不肯承继家庭剥削所得的产业，不愿再当资本家了。”

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批人的心声。在新中国青年一代中，除徐建春、龙冬花等这样新农民青年外，还有工厂的新青年工人，学校的新知识分子青年，甚至还有很多从原来的剥削家庭走出来的新青年

们，他们一起组成新中国青年这个庞大的最有生机和活力的群体。而后一部分青年的转变，则更体现出新中国对于青年一代人生观和人生道路的强力指引。

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吸工人血汗起家，过着优越的生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三大改造把剥削群体越来越削弱，社会主义成分越来越重。在这场改造运动中，许许多多的资本家后代在党的各项政策的教育和指引下，思想和观念发生巨大转变，不愿继承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家产，纷纷穿上劳动服装，与工人、农民一起进行生产和劳动，力求成为新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一伙人，一群人，这么做，很快就成为了众多青年们的自觉行为，演绎成为青年运动在新中国的新潮流。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打碎了人吃人的旧社会，也把旧人改造成新的劳动者，这个贡献则是空前绝后的。而这个变化，在老一辈资本家或剥削者中发生，在青年中更是如此猛烈。这个变化，是从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的。当时刚刚觉醒的工商界人士中不少资本家把自己子女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胡子昂就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参军，两个女儿都去了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的正义事业献出年轻人的力量后，资本家的子女们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投身风起云涌的祖国建设事业。在党的教育之下，他们不愿再搞剥削，再去吸别人的血汗，而是立志成为一代新青年，去当工人、当技术员、当农民、当教师、当司机……去努力成为共和国的新一代建设者。而他们的行为获得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这一次胡子昂作为民主人士在致辞中特地提出“资本家的子弟”的转变，就是希望更多的青年实现自己的人生转变，投身时代的大潮。最后，他在致辞中号召全国的工商界的青年子女：“努力清除

资产阶级的影响划清思想界线，背叛出身的家庭，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听到他的话，高兴地笑了，并带头鼓起掌来。

剥削者放弃了剥削，青年人成为劳动者，这无疑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社会改造，对于青年人个体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觉悟和精神升华，不为小我，为大家，这是中国青年运动飞跃性的进步。而毛泽东就是他们的引路导师。

大会中间有个休息时间。休息时，毛泽东决定接见主席团的代表们。

秘书处立即通知主席团成员。徐建春等人来到了休息室，迫不及待地焦急地望着休息室入口，盼望早点见到毛泽东。没过多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健步走来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宣布说：“现在是年青一代和老共青团员会见。”

老团员与新团员会见，这话很有意义，也很风趣。休息室响起一片掌声和问候声。徐建春和几个女青年捷足先登，立即向毛泽东簇拥过去，围住他就说：“毛主席您好！”争相和他老人家握手。

“你们好！”毛泽东也和这些女孩子们一一握手，并且问她们道：“你们都是哪里的呀？”

“我是四川的。”

“我是新疆的。”

“噢，四川的，新疆的……”毛泽东瞧瞧这个，看看那个，笑着重复着。

这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走过来说：“主席，代表们想和老共青团员们照个相。”

“老共青团员？”毛泽东故意问，接着风趣地回答说，“我也是呀！”

众人忍不住笑起来了。

大家立即高兴地环绕着他站好。毛泽东慈祥地看看左边的布依族代表韩发敏，又看看右边的彝族代表杨阿洛。摄影师的镁光灯一个接一个闪过，将他们一同摄入镜头之中。这一瞬间变成了每个人终生都难忘的永恒记忆。

照完相了，毛泽东朝一个长沙发走过去。

苏州的刺绣工人顾文霞立即跑过去，腼腆地将自己的作品——在伦敦进行国际展出时的照片——递过去说：“毛主席，送给您一张照片。”

“照片？”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接过来，看看照片，又看看她，笑着说：“谢谢你。”

然后，他还是笑着，在沙发上坐下来。

其他团员立即围过去，有的伏在沙发背上，有的坐在一旁，紧紧地簇拥着他。广西团省委的干部荆缙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一张紫红色的长沙发坐下后，广西的刘明仁和欧阳云莲紧挨着坐在他的左侧，右边是山东的徐建春等。我看到沙发后面还有空隙，就沿着墙边挤到毛主席的左后侧站好。我真高兴，离他老人家这么近。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幸福，真是手足无措。”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如此。

徐建春和女青年们紧挨着毛泽东坐着，人人觉得心中的幸福难以形容。这时毛泽东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来，问大家：“你们大家吸烟么？”

“不吸。”众人异口同声回答。

“你们不吸，我也不吸了。”毛泽东说。

“您吸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毛泽东拿着烟，习惯性地在茶几上磕了几下。就在这时，在一旁边的徐建春机灵地拿起放在茶几上的火柴盒，划着火给他点烟。因

为太紧张，怕点不着烟，或烧着他，她点烟的手直哆嗦，不自觉地用另一只手托着点烟的手。这幸福的一瞬间被在旁边的记者当即“抓拍”下来。

徐建春给毛泽东点着烟以后，毛泽东握住她的手问道：“你是哪里的？”

徐建春说：“是山东的。”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又风趣地说：“这些天有些咳嗽，吸烟也算我是和细菌作斗争。”

这个“烟论”又逗得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和蔼、幽默，共青团员们也不拘谨，与他自由地交谈起来。突然，有人提议说：“主席，您能不能给我们代表讲两句话？”

“两句？”毛泽东话锋一转，风趣地说：“我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八句了么？”

大家又哄堂大笑。

毛泽东回到年轻人之中，没有架子，更没倚老卖老，反而好像也变成了一名快乐的青年人，风趣幽默，妙语生花。然而，他更像一位慈爱的父亲，一直看着大家，笑着，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亲。每个人讲话，他都认真地听着，每个人的问题，他都笑着回答。大家团团地围着他，就像儿女们簇拥父亲，开心的笑声在休息室里一阵阵荡漾。

毛泽东是青年们崇敬、热爱的领袖。这种崇敬、热爱之情，不是那种可以赐给青年们权位、金钱而得来的“尊敬”，而是领袖爱护青年，关心青年，指引青年而使得青年从内心迸发出的一种热爱领袖的情怀，是一种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理想的交融，是对自己人生导师的敬爱。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大家又回到了礼堂，继续开会。

青年人永远吸引着毛泽东。5月25日下午，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出现。他接见全体代表，并且发表讲话。他热情地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最后，他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这次会议中毛泽东对胡子昂的鼓掌，会刊刊登了这事，它公开后激励更多的剥削家庭出身的青年人告别剥削，自觉去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对于广大青年来说，他热情鼓励青年们的话语成为许多青年一生行为的箴言，激励他们迎着新中国的灿烂阳光快速成长。他亲切会见青年们的动人情景，成为青年代表们永远难忘的一幕。

在毛泽东去世若干年后，徐建春还深情地说：“在我这一生中，最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多次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我曾亲眼目睹过他老人家的伟人风采，亲耳聆听过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并亲手为他老人家点燃过香烟……这一幕幕往事，如今能在世上寻找到一些印迹的，只有一些当时摄入镜头的老照片了，所以我一直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着这些记载着我荣幸和荣耀的照片。尽管随着时光的流逝，珍藏中的照片已经开始泛黄，但铭刻于心的记忆却永远不会褪色……在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主席的谆谆教诲和人格魅力始终在激励我、鼓舞我、鞭策我，让我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是否对得起人民的信任，是否对得起党的培养，是否对得起毛主席的关怀。现在，我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经常翻看那些陈旧的照片，让记忆暂时回到

过去，享受一下那份曾经拥有过的荣耀和自豪。照片上留住的只是瞬间的情景，但在我的记忆中，那瞬间是永恒的。”

这就是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们的真挚情怀。一个人的伟大，不是他有权有势时候人们都说他好，也不是他活着时慷公家之慨给予某些人多少钱财人家说他好；而是他没有给过人权势、钱财或其他好处，在他远去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后，还让人们深情怀念。而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巨人。

正如毛泽东所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两面的。有人爱，就有人恨。若干年之后有人竟然杜撰徐建春为毛泽东点烟，是《中国青年报》指派采访摄影记者洪克精心策划的一场“摆照”，是“做局”：“为此，他们甚至一起商量了许久”，机会一来，“洪克使了个眼色，坐在主席身旁的徐建春立即心领神会，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火柴，在大家的笑声中，为毛主席点了烟。毛主席他老人家也非常高兴，把头伸了过来。”^①杜撰者还故意模糊徐建春的身份，说她是“女知青”。该文说：“无意间透露出照片的‘组织’方式：在画面上，毛主席位于最显著的中央，青年们在四周。青年们人数虽多，但视线都集中在中间；青年们虽是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族，但脸上却充满了笑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当时代表们如何围在毛泽东身边，是不是“做局”，除徐建春的回忆外，另一当事人荆缙云的回忆是：开幕时“广西代表团就坐在会场的左前方，离主席台很近，大家都目不转睛看着毛主席，生怕这个幸福的时刻过得太快了。这时，大会工作人员来找我，说大会中

^①《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晋永权著，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间休息时，要组织一个活动，因为广西快要成立自治区了，特地叫我们派三个代表去参加。我就近同团省委的几个常委商量，决定由田东县团县委书记欧阳云莲、博白县三滩区的团委书记刘明仁、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农村团支部书记吴老芬参加，并由我带他们前去。我们很快地出了会场，绕过前厅，到达主席团休息室。”

这样，才有除徐建春外，还有少数民族青年围在毛泽东的身边。

众人聚坐在一起与一个中心人物说话，难道把目光瞥向另处？这样拙劣的杜撰文章，只能说作者没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或者是真正的“做局”，正如网友们所说：“将自己疯狂的作秀欲望强加于他人。”

毛泽东等人亲自参加青年团大会，既是对青年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对青年们的人生道路如何走的正确引导。他们的鼓舞和激励，对于集结包括青年在内的各族人民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并积极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各种准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结束之后，代表们带着党中央的关怀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带领广大青年们投身火热的建设工作，在大建设中挥扬着自己青春梦想……

毛泽东和青年心连心。在领袖们的关心、爱护和引导下，青年一代们的每一场青春，都和勃勃生机的“青春中国”一样，充满了兴奋感，充满了五彩的梦幻，也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它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汇聚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旗帜下。

26.“不能只仿，要走独立设计制造的道路”

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研究全世界范围从古到今至今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1000人，编就、排列了一个类似现在福布斯财富榜一样的“历史影响力排行榜”——“历史上最有影响一百人”。毛泽东排行第20位。他的说明是：“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确实，毛泽东之于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在政治上、文化上，之于经济乃至科技在工业化中的运用，也是至深至远的。甚至，他的思想和做法，影响和决定了中国在全球的地位。

这就是毛泽东之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前瞻性的智慧展现。

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以前几个世纪的总和。这是为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力量使得资本主义爆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

这就是技术和机器的力量。而毛泽东对于机器生产和技术的重视，由来已久，是推动中国机器化的第一人，可以说是“火车头”。

在旧中国，农村是牛耕火种，没有机械化；城镇所谓的工厂其实就是手工作坊，不过是用铁锤、剪子敲敲打打，蒋介石连最需要的大炮都造不出，更别奢谈自动化的什么机器。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工业的制造几乎是零，没有工厂能制造出汽车、机床、手表、马达……

这些东西全部是用锡矿、粮食、猪鬃和其他土特产去与人家交换，所谓工业，与现代化毫不沾边，几乎什么都没有。毛泽东后来说：“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面对一穷二白，毛泽东比华盛顿的高明，就是不等不靠，也不说后人比我们更有智慧而专等后人去“发展”，而是决定自己去造机器，去发展现代工业。为此，他和党中央确定“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的规划，要发展重工业，并且先生产能生产机器的“生产资料”——即造机器的机器，以此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机器化的起步。

1956年，毛泽东在发展国民经济的“二五”计划建议第三次草稿上批示：“在增强国防力量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以加速国家的工业化。”他明确提出了国家建设的下一步目标是“国家的工业化”。

所谓工业化就是运用技术的机器化。为此，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1950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30%。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25%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

6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在中南海瀛台专门举办了一场汇报展览，宣传“一五”计划机械工业的成就和对以后发展的展望。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民用机械、电信、船舶。展览规模不小，分综合、通用机械、机床、重型机械、电机、汽车和仪器仪表等部分。在工作之余，毛泽东多次跑过去观看，前后看了七八次。他每次看两个小时，看得非常仔

细，问得非常详细。他于机械工业兴趣非同小可，其期望殷殷可见一斑。

由于对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感受深切，毛泽东发展工业的心情是十分急迫的。

1957年3月，他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循循告诫大家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懂得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工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过去用手去做粮食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

他强调技术和机器，并不是空吆喝，而且对它们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并且认为机械里头有一个“工作母机”。一次，他与工业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时，明确地说：“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一个工作母机，无非是车、铣、磨、刨、钻之类，这些东西根本的。”

他的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很准确。对此，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从专业角度解释说：“他所谓的工作母机，就是机床工具。”

机床是将金属毛坯加工成机器零件的机器，是生产各类机械的基础性机器，也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又称为“工具机”，习惯上简称机床。毛泽东没有很专业的词汇，对机床的理解也可以说还十分朴素，而若没有对机器工业的深刻思考，没有去作深入的了解，又如何能说出“工作母机”？

许多领袖习惯于发号召，并且往往是发完号召后就忘记掉了，只说不做，光说不练。而这不是毛泽东的风格。有了对现代工业的关切和决心，他就要付之于行动。

为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最基础性的工作做起，第一步便是抓能制造机器的“工作母机”——机床。

7月8日上午，时针刚过11点，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陪同下，毛泽东来到了上海机床厂视察。

上海机床厂的名字很美，其实前身不过是几个国民党官僚当官之余办起的一个副业——私人赚钱牟利的小厂。原先，它只能修配一些生产简单的农机具。上海解放时，它被没收为公有，成为国有企业。经过几年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它已成为一个专业制造精密磨床的现代化工厂，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重点骨干企业。新中国第一台磨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1954年该厂制造的373平面磨床和3160外圆磨床送去莱比锡展览会和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上展览过，同年该厂还试制成功国产第一只叶片泵。新中国第一代掌握磨床制造技术的工人和技术队伍，也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如今，它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型工厂之一。

几辆小汽车来到厂部前面的中央大道，就缓缓停下来了。毛泽东一下车，厂长艾丁和党委书记方杰就迎上来。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行了介绍。毛泽东微笑着，和他们握手，亲切地问道：“你们什么年龄、原来学什么的？”

方杰恭敬地回答：“我自己34岁，艾丁比我大两岁，都是由地方转业的，原先对工业并不熟悉。”

毛泽东勉励他们说：“只要认真学习，会懂的，会熟悉的，会精通的。”

他话音才落，厂部办公楼上的几个职工惊喜地发现了他们。几乎是一瞬间，有人就振臂呼喊：“毛主席万岁！”这一声高呼，宛如春雷响起，立即在厂区四下回响。毛泽东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像电波一

般迅速传遍厂区各个角落。职工们欣喜若狂地跑出来，群情沸腾了。毛泽东环视四周，频频向职工们招手示意，问好。

方杰见人太多，赶紧说：“请主席到厂部会议室去。”

毛泽东进去后，兴致很好，一面看着挂在墙上显示工厂发展变化的产品图片，一面听着艾丁厂长的情况汇报。

艾丁说：“解放七年来，我们先后仿制了31个品种，4000多台磨床，供应了全国70多个城市1041家工厂的建设需要……”

“国家需要这样的工厂。希望更好工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高兴地说，接着又举了举手，意味深长地说：“要有自己设计制造的产品。”

在一旁边的柯庆施对艾丁等人进一步解释说：“主席要求工厂更上一层楼，丢掉拐杖，学会自己走路。”

他的话正是毛泽东的“意思”：要自己走路，要有自己的东西，要自己能够制造产品，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毛泽东点了点头。艾丁继续汇报下去。

当他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还是到厂里去看看吧。”

众人立即起身离开会议室，艾丁说：“就去液压、大件、装配三个车间看吧。”

在液压车间，毛泽东仔细观看了液压筒的加工过程。艾丁介绍说：“这是机床的心脏部分，加工长度一米六，精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五分之一，光洁度达到九级。完工后的油压筒内壁清晰光滑如镜如玉。在这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正在对仿制的液压操纵箱的设计制造大胆进行革新，改进后的液压操纵箱提高了性能，减少了零部件十分之一，缩小了体积，重量也减轻了很多，苏联专家认为，这是非常成功的改革，要求把图纸带回国作为纪念。”

毛泽东再靠近，仔细地看了，再点头，脸上挂着微笑。

此时车间里有不少的女工在操作机床，他走近她们，和她们亲切地握手，并且对众人说：“妇女解放了，也能够开机器，男同志做的事，女同志也能做。”

“妇女成为机器制造工人，是解放后才有的事。”方杰说，“厂里的女工，约占第一线生产工人 20%，成了生产中的骨干力量。”

接着，众人簇拥着毛泽东走进了大件车间。这里的工人们立即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艾丁介绍说：“他们正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推广劳动模范盛利、朱大仙同志创造的多种先进刀具高速切削法，使车工效率普遍提高 60.5%到 120%，月月超额完成了计划。”

毛泽东没有说话，而是精心地看着。突然，他发现车间里精心操作各式机床的，大部分是青年工人，露出了欣喜的眼神，说道：“青年人不少啊。”

“青工占全厂人员半数以上。”方杰回答。

接着，他向毛泽东介绍说：“为了实现从修配到制造精密机床的转轨，我们突出的抓了职工的文化技术、政治思想的学习，办起从小学、中学、中专到大学预备班的各种班级，和专业技术培训班，在校学生占职工总数的 40%左右，边工作边学习，进步较快。我们还选拔了 30 多名优秀工人到技术部门，在实践中加速培养提高，有的担任了设计师，摸索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还有不少具有一定文化技术理论知识的老工人，和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充实到厂级和科室、车间领导岗位。”

毛泽东高兴地赞赏说：“这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要很好培养。”然后，他一再嘱咐方杰和艾丁：“要全面关心职工的政治思想、文化技术的进步。工厂既要出产品，还要培育人才。”

这是高明的方法，只强调生产，不重视人才就无所谓创新和发展，新工厂还是旧“榨油机”、“吸血机”，生产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没

有进步可言。

参观完大件车间，毛泽东等人进入了装配车间。毛泽东一进门，就看到了高高悬挂的“安全生产、保证质量”的横幅标语，用手指了指，点头表示很赞同。是啊，没有安全，又如何能搞好生产？工厂不抓安全生产，机器于工人们来说是“伤人机”、“吃人机”，这样的生产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工厂又何谈对人民高度负责呢！他的点头就是对厂里重视安全生产的嘉许。

车间里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正在总装的精密磨床。毛泽东放慢了脚步，饶有兴趣地边观察边询问。艾丁汇报说：“这些磨床每月有二三十个新老品种投入试制和批量生产，都是由有经验的工人师傅装配的，遇到技术上困难问题，就同科室的技术人员，共同研讨调整克服，他们合作得很好，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你们有什么体会？”毛泽东问道。

“我们取得了多品种轮番生产的管理经验，提高了设计能力和制造装配技术，大大缩短了由仿制过渡到自行设计制造的时间。”艾丁回答。

毛泽东听后，用手中拿着的黑色折扇连连指着突出在机床下方“上海机床厂制造”几个醒目字体，语气深重地说：“不能只仿，要走独立设计制造的道路。”

“今年开始，我们自行设计制造了国内第一台磨床，由仿制与创造结合，上了个新台阶。”艾丁表态说，“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努力。”

“要创造。”毛泽东再次强调说，“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为我所用！”

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似乎话犹未尽，继续叮嘱说：“我们不能只搞仿造，仿造人家，自己就没有发展。要革新。穷则思变，变就是革新。技术上也是这样。只靠买，解决不了问题，只去仿，跟在人家的屁

股后边，也没多大出息。”

艾丁和方杰激动地点着头。

毛泽东还说：“革新，创造，不是不行。往前走一步，多动动脑筋，多去探索，就海阔天空。职工中有巨大的创造力，要依靠工人阶级办厂，自力更生搞建设。”

他不仅强调要革新，要创造，还指出了如何进行这项工作的办法——依靠职工的创造力，要依靠工人阶级办厂，要自力更生。以往，人们办厂，靠的是“精英”，花大钱请来“精英”搞设计、买“创造”；中国自己没这样的人才，就不惜请外国人，结果花了大价钱，不是啥设计不出来，就是设计出来了专利却让人家拿走了，吃足了亏。毛泽东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去自力更生，这到底是不是不懂经济，不懂工业的瞎闹呢？

在一些人看来，外国人就是啥都比中国人强，“精英”就比工人聪明，凡事仰仗外国人的鼻息，干事情没“精英”就不行。事实上是否就一定是这样呢？在英国实现机器化的工业革命中，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把人力机械转化成动力机械，法拉第发明了第一台发电机和电动机，从此机械能和电能就可以互相转化；焦耳定律不但宣告了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第二类永动也不可能，而且预示了热机的工作原理。这些都是在人类历史上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最伟大的“自主创新”。然而，完成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全是草根，瓦特是工匠的儿子，法拉第是铁匠的儿子，焦耳是农夫的儿子。他们不是大学教授，不是大科学家，也不是接受了数理化完备教育的博士。而正是他们的草根优势，自小生活在生产实践第一线，并且他们勤奋好学，能自觉接受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最终成为了搞革新、搞发明创造的能工巧匠。而他们三人与别的技术革新者的不同之处，且令人惊讶的是，虽是平民出身，作为发明家却都有自己进行科学实验的实验室！

这在当时英国是少见和少有的。当今中国的工厂也为草根的职工们提供革新、研究的环境和条件，鼓励他们相互切磋，搞“自主创新”。毛泽东说：“领导者是刘备，群众是诸葛亮，刘备离不开诸葛亮”；“中国人民中间，实际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他的“依靠工人阶级办厂”的思路，虽然没有强调“精英”或者一定要外国人，其实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工业发明智慧。

而在过去，旧中国那些所谓“懂工业”的人专靠洋技术、洋专家和大“精英”，折腾几十年上百年也没把中国搞上来，白白把金银送给了人家，折腾得自家是“一穷二白烂摊子”一个，所谓的工业还是锤子、铁锤和铁匠铺。毛泽东靠工人阶级，靠自力更生，虽然选择了一条比较艰难的路子，却是只要努力，就行得通的路子。对照英国工业革命的几大发明创造，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完全与自然辩证法历史不谋而合。

毛泽东的话语言简意赅，对已在工业战线工作多年的艾丁和方杰来说如同醍醐灌顶，启发很大。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独立设计制造的道路，依靠工人阶级把工厂办好，为国争光。

毛泽东等人视察了三个主要车间后，一行人走向中央大道。这时，不少职工情不自禁地跟在他们的后面，跳跃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此起彼落，欢呼声久久在空中回响震荡。谁都不愿失去见到毛泽东的机会，簇拥在他身边。毛泽东毫无倦意，顶烈日冒高温，向他们挥手致意。

人潮似海。毛泽东说：“是不是还到其他车间去看看？”

但时针已指向11点50分了，随同人员说：“时间不早了，职工们快下班了。”并招呼着把车开过来，毛泽东只好作罢。

艾丁和方杰说：“请主席再作指示。”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都是专家，有那么多年轻人，能把工厂办得更好。”

此话对大家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并且寄予了他对大家十分殷切的希望。

在陪同人员的催促招呼下，他挥手再次向大伙示意告辞。在欢呼和掌声中，车子启动了，慢慢驶离厂区，直到消失。但工厂的群众还停立在中央大道，久久不愿离去，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议论纷纷。

次日，全厂职工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寄去致敬信，表示要遵照他的教导，在党的领导下，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并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毛泽东的教导成为上海机床厂发展的指针。以后，尽管前进道路上有风浪、有曲折，有险阻，但他关于依靠工人阶级，注重培养年轻的新生力量，去革新去创造，走自力更生、独立设计制造道路的教导，始终成为上海机床厂办好工厂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就在这一年，该厂试制成功 M7120 卧轴矩台平面磨床，从此我国磨床制造业走上自行设计、制造的道路。

而这个成就的取得，不是洋专家的功劳，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厂里那些“土瓦特”、“小焦耳”、“土法拉第”，是他们靠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技术革新之路。在全国工业战线上，也正是这些来自最基层的“能工巧匠”们在工作中脱颖而出，成为各行各业“改造世界”的土发明家。领跑新中国技术革命的，不是那些处在书斋里研究天地之奥妙的专家，也不是“旧中国的精英们”，而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土专家、小青年们。

随着诸如“工作母机”之类基础性的机械工业的大力发展，我国工业逐渐向着机器化生产跃进。18—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发生在人口不到 800 万、GDP 只仅全世界 6% 的英国，而这一次，在毛泽东等人

的领导下，占据世界人口近30%、GDP占全世界25%的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开始迈出大步，而这个步伐远远超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工业化步伐，在短短时间之内，中国就成功地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面对这些成绩，后来有网友说：“世界上有谁能像新中国在内部那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外部遭遇那样令人无法想象的来自国际反华势力的控制、干涉、封锁下，创造出中国机床工业的壮举，创造出中国工业化的壮举？只有毛泽东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魄力，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意志，有这样的毅力，他难道不是中国最大的实业家？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他同时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伟大导师，他更是现在和未来中国实业家的伟大导师！”

确实，新中国做什么都是白手起家，而毛泽东是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火车头”，在他的领导和牵引之下，中国各项事业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其建设和发展成就喜人，最终他的发展思想和建筑起来的工业体系为中国下个世纪的腾飞铸下了坚实和强大的基础。

27. 首倡交警纠正违章先敬礼

中国的变化是全面的。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顾彼失此，不是抓了经济就丢了文化，抓了文化就丢了经济，更不是事后到处“抢救”，左右补“窟窿”。毛泽东之于国家建设和发展还是战争年代的大思维，考虑十分周全，因此由他引发中国的变化也是

全面的、系统性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趣的是，他本人也事事躬亲，无论事情大小，都促使这这些变化，倡导他所提倡的。

1957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主管交通警察工作的副局长吕展参加了公安部访苏代表团。从苏联回国时，他带回了一张苏联的交通宣传画。画面上，几个儿童在马路上玩耍，一名端庄秀丽的女民警面向他们，行举手礼，告诫孩子们不要在马路上玩耍。他为什么带回这样一张画呢？

因为他认为这幅宣传画给初始的人民交警工作很有启示，苏联人的做法值得我们来学习和借鉴。不久，在公安局一次大会上，他针对个别交通民警在纠正违章时，以管人者自居、训斥群众的现象，特地谈起了这幅宣传画，并且深有感触地说：“交通秩序要好，在市里的交通民警责任很大。如何对待群众，我们交通民警不是军阀，也不是旧警察。现在搞社会主义了，不能是新生活旧样子。维护城市交通，我们能不能向苏联民警学习，纠正交通违章时先敬礼？”

纠正交通违章先敬礼，确实是人民交警对待群众的好作风。他的这个倡议当即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随后，纠正违章先敬礼的做法在全市交通民警中进行推广。

经过各级干部大力倡导，纠正违章先敬礼的做法在交通民警中迅速兴起，并且立即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解放前，北平警察欺压百姓是出了名的坏，市民对敲诈勒索的警察恨之入骨，谓之“黑皮狗”（旧警察穿黑色警服）。鉴于旧警察的坏作风、坏形象，为了倡导新的警风，1950年12月，公安部通知各地人民政府将警察改称为“人民警察”，简称“民警”。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在内的全国各地公安局发动全体干部和民警，开展反对旧警作风、批判特权思想教育，警风从此完全变了样。但个别交通民警还是以管人者自居，有时训斥群众，态度不好。北京民警纠正违章先敬礼的做法，不仅是一个崭新

的举动，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一改以前对市民不友好的态度，不少群众纷纷写信给市人民政府，赞扬首都民警的礼貌之举。

纠正违章先敬礼之举，对于加强交通民警的队伍建设，尤其是改善警民关系起了很好的效果。

此事竟然很快传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一贯对于交通民警很关心。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在中南海派了一个交警班，留驻在东花厅一侧平房内，执行中南海的交通警卫公务。中南海本是皇家园林，建筑别致，风景如画。这些普通民警与人民领袖住在一起，真是激动万分。毛泽东住在东花厅，经常来往东花厅至瀛台之间，住在这里的交通民警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就是第一年，天气渐渐冷落的时候，一天，毛泽东突然走到三名交通民警身边，笑着说：“你们好啊！”

三位民警见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时不知所措。班长张继志连忙回复道：“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慈祥地又问：“你们生活怎样？天冷了衣服穿得暖吗？”

“我们穿着棉衣很好，我们工作在您的身边，感到很幸福。”张继志又答道。

毛泽东摸了摸他们穿的棉衣，微笑地点点头，漫步回到东花厅。

毛泽东的关怀像春风一样温暖了交警们的心。

不久，斯大林给毛泽东送来一大捆地毯，还有国际象棋。几名交警见状，帮助卸车，将地毯抬进丰泽园的客厅。毛泽东发现了他们，特意迎出来，向他们道谢。

毛泽东之于身边工作的民警们，没有高人一等，没有架子，更没有不可亲近的“领袖风范”，如父亲待之，待之如客人。这在首都数万民警中传为一个个幸福的佳话。

这次毛泽东知道了交通民警的做法后，高兴地把公安部部长罗

瑞卿叫来，肯定了纠正违章先敬礼的做法。并且，他对罗瑞卿说：“公安人员、人民警察是人民的勤务员，老百姓违反交通规则，警察敬礼纠正，好！这是西瓜，不是芝麻。”

罗瑞卿也打心底里认为这是一件好事。随后，公安部将毛泽东赞扬北京交通民警纠正违章先敬礼“是西瓜，不是芝麻”的指示，传达到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的干部、民警听到毛泽东的赞扬，非常高兴。可不少人对毛泽东说的“这是西瓜，不是芝麻”不理解。吕展解释说：“毛主席说我们纠正违章敬礼是西瓜，不是芝麻，就是说这是西瓜一样的大事，不是芝麻一样的小事情，就是要求我们把它当成大事来抓，为此我们必须有一套贯彻落实毛泽东指示的措施。”

毛泽东的表扬和指示，对市局的干部们鼓舞很大。

几日后，北京市局交通管理处专门召开全市干警大会，对纠正违章先敬礼的做法进行规范和布置，号召大家认真执行好毛泽东的指示，当好人民的警卫员和勤务员。在大会上，交通管理处处长李非大声地说：“全体干警一方面要管好首都的交通，减少交通事故，少死人，保障首都交通安全与畅通；一方面对待群众要有礼貌，工作态度一定要好。”

随后，全市交通民警掀起努力钻研各项业务、主动改进服务态度的热潮。警风进一步好转。但是，交通管理处不是就此止步，组织部分交通民警进行座谈总结，在此基础上，选编了一些业务口号，如：“三多两防礼貌周，50公尺跟着走，眼与口必须跟着手，上下岗不空走，喊话莫乱吼。”

由于口号简短易记，北京市的民警作风和服务态度成为全国之首，堪称文明服务的典型。罗瑞卿很高兴。随后，公安部把他们的做法在全国推广。不久，民警纠正违章先敬礼列入了公安干警语言举

止规范，并贯彻执行延续至今。

交通警察一直是世界各国人们诟病的公务人群。而在中国，人民交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警风，“有困难找民警”成为毛泽东时代人们遇到难题时的第一念头。

这堪称世界一绝。

28. 关注亿万百姓穿衣的大问题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就接过了亿万中国人吃饭穿衣的大事。在毛泽东的心中，最关心有两件事，一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一是老百姓的穿衣问题。

而温饱问题一直是人口大国——中国的大问题。在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或哪个朝代解决了全国人的吃饭问题，能不让人们饿肚子。不让人民饿肚子，是毛泽东最着力的大事，因此，他对农业倾注心血，在一定的時候甚至比对工业更下决心，花的心思更多，抓的更多。为什么？民以食为天。吃饭难题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逐渐好转。到1956年时，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达到了38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了101公斤，^①即每人每日由1.145斤提高到近1.698斤，每餐由

^①数据见《中国粮食生产60年变迁：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唐敏著，《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8月。

0.381 斤上升到 0.566 斤。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一五时期农业发展确实是比较快，从 1952 年至 1956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4.5%。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不饿肚子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才开始着力推进国家的工业化。1957 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 62.3%，轻工业占 18.6%，重工业占 19.1%，全年与 1949 年相比较，农业产值下降了 22.2 个百分点，轻工业产值上升了 7.6 个百分点，重工业产值上升了 14.6 个百分点。^① 这也就是说，中国产业结构正开始发生着由农业国向工业国方向的新转变。

在这个崭新的转变过程中，毛泽东并不是后来有人所说的“过分强调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而恰恰是相反。在吃饭之外，他一直十分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的穿衣问题。

穿衣，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个奢侈的问题。衣不遮体是旧中国多数人的写照。在当初解放军胜利进军解放各地的时候，沿途看到不少穷人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这不是他们怕解放军，而是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只能是谁出门谁穿，一人穿了，其他人便无法出门。这样的事例，在杨得志等许多解放军将领回忆录中均有记载。除解决吃饭难题外，毛泽东致力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要解决人民的穿衣难题。当每人每餐有半斤多的粮食（当然，实际上这只是人均占有数，因为出口、工业等其他用途，不可能全部分配到每个人名下吃掉），饿肚子问题有望得到解决的时候，在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时候，毛泽东立即把着力点放在了解决人们穿衣难题上面。

^①《中国经济 50 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赵德馨著，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要解决这个难题，办法一是兴办纺织厂，二是多种织布用的棉花。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亲自与著名的“面纱大王”、上海滩实业家荣宗敬的后代荣毅仁交朋友，促使他献出上海中新纺织厂等家族工厂。由于胜利完成三大改造，许多私营纺织厂都成功实现国有化。在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各地兴办一大批纺织厂，为解决穿衣问题而努力。有纺织厂，必须有织布用的原料——棉花。为此，毛泽东十分关心棉花生产。

1957年金秋，又是一年一度的收获季节。就像一位当家的老婆婆，毛泽东在中南海坐不住了。9月3日，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飞驰着进入华北平原，毛泽东开始了新一轮视察工作。

在火车上，他眺望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只见遍地果实累累，十分喜人，非常高兴。为了核实增产增收的情况，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火车时不时地停住，他还下车实地察看，再请来沿途省、地、县负责人到火车上座谈。

他一路视察，且行且看，一直到达了邯郸。

这是毛泽东熟悉的一个地方。

邯郸，除它在历史上是赵国古都外，毛泽东对这里感兴趣，更在于它是华北的棉花生产地区。早在1955年秋，毛泽东听说河北省有些地区善于种植棉花，长势又很好，就很高兴地询问这里的“情况”，对邯郸的棉花种植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他乘坐列车去南方，路过邯郸地区时，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停车，我们去看看棉田吧。”

他为什么要去看棉田？因为棉花是织布用的材料，能解决老百姓穿衣的大事。人民群众的吃穿，一直是他最牵挂和下最大决心要着力解决的。此时多数农家是自给自足解决，自己在家纺纱，自己织布，再自己以染色用的植物用大锅煮着棉纱染色，这样既浪费劳力，生产出来的布料也不美观。毛泽东和党中央要通过机器织布来解决

全国人的穿衣问题，因此，要织大量的布，棉花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

毛泽东下车后，健步走进了漫无边际的棉田。广阔的棉田里，棉花枝叶茂盛，果实累累，长势喜人。他满脸都是笑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嗨，你们看，这大片棉田又划分成了许多地块哩！”

原来这是当地合作社给“棉花姑娘”们划分的责任田。她们在棉花的种植、管理直到收获、产量等方面展开生产竞赛。姑娘们整天奋战在棉田里，获得了一个美丽的绰号，叫做“棉花姑娘”。天道酬勤。经过辛勤的劳动，棉花姑娘们把棉花培育得茁壮喜人，一株株粗壮，绿油油的。

此时棉花姑娘们正在齐腰深的棉田里劳动。突然一位姑娘抬头，惊喜异常地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

大家一看，果然是他！并且，毛泽东带着一行人正朝她们这边边看边走过来了。于是，姑娘们呼喊着一拥而上，顾不上手上的泥土，高兴地跳着脚，和毛泽东紧紧地握手。此时，秋阳高照着，一位细心的姑娘立即给毛泽东戴上自己的遮阳草帽，然后大家争着请他去看自己的责任田。毛泽东高兴地答应：“好，好啊！”微笑着挪动脚步，跟随着棉花姑娘们往前走去，一边察看棉花，一边听她们滔滔不绝地解说。毛泽东问她们道：“干长衣，湿长皮。这句话对不对？”

“干长衣，湿长皮”是一句农谚，意思是棉花吐絮期地干燥则衣份好，地湿润则只长皮，衣份少。毛泽东连这样的农谚都知道，可见他并非门外汉。

“对啊！棉花吐絮期，地干衣份就好！”

姑娘们好像话说不完，争着回答。而毛泽东呢，也是很高兴的样子。当他看到一片棉田，棉株都高过人了，枝叶茂盛，随风摇摆时，说：“让人喜爱呀！”

随行的工作人员也忍不住纷纷赞叹不已说：“没见过这么壮实的棉花株！”

毛泽东看着姑娘们的热情，笑着说：“稻耖三遍谷满仓，棉锄七遍白如霜。生地茄子熟地棉。这些话到底对不对？种棉花也要讲科学！”

他没种过棉花，却懂得这么多种棉的农事谚语，可见他对棉花生产是有过研究的，但没有忘记告诉姑娘去讲求科学，以科学的态度去种棉、务农。看完这块棉田后，接着，他又看了另一块棉田。这一块田的棉株比前一块的明显矮了许多，但枝杆长得挺拔粗壮，怒指四方，风吹来叶动枝杆却不摇，茂盛姿态大有当年张翼德傲立当阳桥的威武雄姿。毛泽东看着，听着姑娘们叽叽喳喳的讲说，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移步来到两种棉花前进行仔细观察，又数了数几棵棉花上结的棉桃，进行比较，然后问姑娘们道：“高的好还是矮的好？”

管理高株责任田的棉花姑娘立刻回答：“高的好！”并且让大家看：“哪一片棉花都没有俺种的棉花长得高！”

但也有姑娘说：“矮的粗壮，矮的好。”

还有人说：“两种都好。”

大家争论不休。有人提出说：“请毛主席评一评。”

于是，大家自动地围成一团，来听毛泽东讲话。他首先称赞大家管理的棉田很好，又指着那块矮的棉田说：“那一片棉花长得矮，可是又粗又壮，特别是棉桃结得多；当然高株的棉花生长也很茂盛，可是结的棉桃比矮的少。你们数数看，哪一棵矮的都比高的结的棉桃多，应该挑选良种，争取高产，对不对？”

姑娘们都被这个道理说服了，齐声回答说：“毛主席说的对，我们就按照毛主席说的办。”

在姑娘们的簇拥下，毛泽东来到了田边一个用苇席搭起来休息用的小凉棚。一位姑娘递上自己防暑喝的绿豆汤，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喝了起来。趁着这档儿，有的姑娘趁机跑回家，拿来了自家产的大花生和红枣，请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吃，有的还争着给毛泽东报告种植棉花的情况。忽然，村支部书记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高兴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真想不到毛主席会到这里来看我们种的棉花！”

“有一句农谚说，要发家，种棉花。我们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就要多种棉花，种好棉花，要增产！”毛泽东说完，又问道：“村里的生产怎么样？”

村支书汇报了全村的生产和群众的生产干劲，并且向毛泽东保证说：“明年一定要增产！”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指出说：“大平原的农业生产要关心水利和施肥，还有改造盐碱地等问题；大家种的棉花很好，个个都是种棉能手，还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农业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接着，他鼓励棉花姑娘们：“要很好的研究和提高植棉技术，努力增加生产。”

然后，他准备回去了。

在姑娘们依依不舍送别下，毛泽东回到了专列，又继续南下了。

有趣的是，他此一去，时隔两年后列车再次经过大棉区时，他依然记得这个地方，对身边人员说：“停下车，去看看。”

他要去看什么呢？是要看看两年来这里的农民的棉花种植是什么样儿了，棉花姑娘们对棉花的种植管理有了哪些进展，情况如何。

而上次他视察棉地，对邯郸地区的棉农鼓舞很大。正如村支书承诺“一定要增产”那样，他们已争取了两个丰收年。

毛泽东等人下车后，这里面貌已是大变，遍地棉花生长茂盛，棉桃累累，长得像水蜜桃一样，并且已开始吐絮。绿叶、白棉，十分鲜

艳。遍地不见野草。每棵棉花都像盆栽的鲜花，较两年前的管理更胜一筹了。毛泽东边走边说：“我给他们当了判官，当年提的意见是否合理呢？”

原来他还惦记自己当年矮株比高株好的“判决”，恐怕意见不准确，群众盲目执行“矮株好”的意见，耽误农活，害了生产呢。当他再次来看棉花时，老农和棉花姑娘们在棉田里劳动着。他们突然看见毛泽东一行人来了，都惊喜若狂，纷纷跑过来鼓掌欢迎。

毛泽东开始察看棉田。几个老农高兴地仰面看着他，只是使劲地鼓掌，张着嘴笑，就是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拉着其中一人的手，低头问他的植棉经历，然后对他说：“请你说说这几年种植棉花有什么变化。”

“现在种的棉花都是矮株多桃的优良品种，产量很高，如今也不怕干旱了，连年都是丰收。”老农告诉说，“现在连棉花杆子都有人收购了，棉花全身都是宝。”

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说：“好。”

时值天旱无雨，可是棉花的墒情很好。细心的毛泽东又查问起水利和施肥情况。棉农们指着被棉丛遮住的机井说：“主席，我们已经用机井抽水浇地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头。

这时一个小姑娘拉着他的衣角说：“种棉花可真好，年年都丰收，俺爹俺娘老高兴，还给俺做了新衣服。”说完，她还天真地问道：“毛主席你高兴吗？”

小姑娘的样子和话语逗得众人都笑起来。毛泽东也笑了，低头看着她回答说：“我高兴啊！”接着又大声说：“你们种棉花的技术提高了，还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年年都能够争取到丰收，可见人能胜天，与天斗争其乐无穷嘛，谁能不高兴呢！”

他的话说得人们喜笑颜开。

接着，毛泽东鼓励说：“你们还要总结经验，提高种棉技术，争取再提高产量，我看，你们的爹娘还会给你们买新鞋子呢！”

棉农和棉花姑娘们畅快地大笑起来，谁都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希望。

毛泽东和棉农们、乡亲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在棉田里，他边走边看，足足两个多小时，顶着灼人的烈日，站在闷热的棉地里，上衣都被汗水湿透了。

棉花姑娘们发现了，大家劝说他去田间临时休息的小窝棚。毛泽东走出棉田，来到小窝棚，坐在一条窄板凳上，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拉家常，作调查。

棉花的织布解决穿衣问题的，毛泽东对于人民群众的冷暖大事——吃饭穿衣一直挂在心上。视察棉田后，他又去看了纺织厂，勉励那里的干部和工人们多织布，多生产。

在短短几年中，毛泽东多次来到河北邯郸。他对这里的关注，实在太多了。若干年之后，有人琢磨他为何对这个地方“如此钟情”？

其实，毛泽东对邯郸的关注，对邯郸的眷顾，并不是出于什么“祖先情结”。他对邯郸的感情，不是源自“自己的小家情结”，而是因为这里能生产棉花，棉花可以织布，也不是想利用职权去垄断布匹为自己谋取利益，可以解决人们穿衣的难题。这是他希望中国的“爹娘还会给孩子们买新鞋子”的情怀，是对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们能穿衣、不挨冻而所做的努力。

毛泽东对于邯郸的关注，不过是推动解决中国人温饱问题的一个行为而已，是促进城乡发展的一个实例而已，类似的行为和事例还很多很多。

29.“将来长江上修上20个、30个桥，黄河上也修 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

人民衣食无忧，国强民富，一直是毛泽东心中孜孜以求的不息梦想。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有句话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有人理解这位道家始祖此言的意思，认为说的是，治理大国要像炒很嫩的小鲜菜一样，不能老翻过来、翻过去，即不能来回折腾；也有御用文人巧妙引之用来夸张、吹捧能施舍他们名利的政治家们“高超过人”的治国本领——治理大国就像炒小菜一样娴熟、得心应手得不得了。毛泽东“治大国”，似乎没有这样那样的“神功”。他更像韶山冲一位勤勤恳恳的乡村农家当家人——一心想把自家弄得比人家富裕，让家人不愁吃穿，生活幸福、快乐，为此，他早出晚归，拼命劳作，算计持家，讲究节俭，而又不失勃勃野心，有了结余，每一年都要搞建设，添盖茅舍、猪圈、农具，或者添置一些家具。为了让中国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家尽快富裕强盛起来，他是那么勤勤恳恳，那么一心一意，是一位把理想、步骤和行动完美结合起来的“致富实干家”，而他又是那么的淳朴实在，不偷不抢，不骗不讹，也不巧取豪夺或者欺负弱小，只知用勤劳的双手去耕耘，流汗水去劳作。

在治国上，如果说有的人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而毛泽东则不然。他是典型的“持家式庄稼汉”，日日早出晚归，并且年年有计划，岁岁搞建设，勤勤恳恳，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而心中那个富裕之梦

永没止境。

毛泽东这次南下，沿途看了棉花，看了工厂，最后到达了湖北武汉。在这里，他又谋划新的建设。

1957年9月6日傍晚，从汉口方向突然驶出了二十几辆小轿车，沿龟山山腰公路一直往前开，直到汉阳桥头堡旁的武汉长江大桥前，才徐徐停稳。随即，毛泽东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从小轿车里走了出来。

此时武汉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和政治部主任杜景云已等候在桥头，立即迎上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没有太多的寒暄，便神采奕奕地往前走，慢慢行走在飞跨长江的公路大桥上。

这是他第三次来工地视察了。

这座长江大桥是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亲自决策兴建的，是目前湖北乃至全国的一项“大工程”。

为何毛泽东要在长江上建大桥？原因颇多。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它从雪峰皑皑的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绵延东西几千里，汇百川，聚千溪，劈三峡，剪断江汉、苏皖几大平原，最后注入浩淼的东海，沿途灌溉180万多平方公里的沃野。但是，水利也是水害。这条大河也隔断了中国南北交通。千百年来，长江之上连一座像样的连接南北的桥梁都没有，广袤的江汉大地被滚滚的大江之水分隔为北国和江南，交通受阻，不仅号称“武汉三镇”的汉口、汉阳和武昌因此而隔江相望，就是南来北往的车辆、行人也只能靠轮渡和木船过江。每逢长江刮风起浪，或者出现浓雾天气，摆渡的轮船、木船就不得不停航，就是平常摆渡，水上也常有失事，甚至淹死人。为此，有人形容长江说：“白浪如山哪可渡，狂风愁煞峭帆人。”

要解决“愁煞”难题，只有去架桥通路。

因此，在长江上建一座大桥，是许多人多年的愿望。然而，无论是大清皇帝还是历届两广总督，都是听若罔闻，听任各地没桥没路，任百姓愁死，一概不管。北洋军阀政府时曾有修桥之议，1913年，工程人员第一次进行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测量工作。到了蒋介石统治时期，也曾几次喧嚷着要修桥，工程人员又进行了三次测量工作，而蒋介石只在自己老家建了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钱塘江中正大桥”（即如今的钱塘江大桥），而他最津津乐道的“辛亥首义”的英雄城市——武汉——连修筑一座连接三镇的“桥”，几十年来也不过只是人们的梦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关注长江渡江难的问题。1950年初，虽然刚刚建国，毛泽东就开始在战争废墟上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安排。按照他的指示，铁道部一面在武汉建立轮渡工程，维持和扩大南北运输，一面研究有关资料，准备着手修建长江大桥。为此，铁道部派出大批精兵强将，到长江边上进行勘测、钻探，准备修建大桥的初步工作。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主持讨论武汉长江大桥桥址方案，并建议将桥址选择在龟山、蛇山一线。然后，铁道部致函湖北省委、省政府及武汉市委、市政府征求当地对建桥的具体意见。

在大江上修建大桥，是千万荆楚人多年的梦想。7月，武汉市市长吴德峰专门召集各方代表共同商讨此事。与会人员达到83人之多。众人为这个宏伟的建桥计划而激动，讨论十分的认真、热烈，提出的意见也不少。其中，有人提出一个新顾虑说：“建桥方案好是好，但是不是破坏了黄鹤楼古迹？”

“古代黄鹤楼屡毁屡建，现在所谓的黄鹤楼不过是晚清所建的奥略楼，建筑简陋，历史、艺术价值无足称道。”有人说，“我们不如躬

逢盛世，借建桥良机，在其侧选址重建，恢复古黄鹤楼的雄姿。”

吴德峰市长也非常赞同：“毛主席说过，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重建黄鹤楼，是一个好主意！”

滚滚长江的岸边修建一座古楼和一座江上大桥，一古一今，雄伟壮观，相得益彰，确实是超越前人的好主意，也正展现出毛泽东所言我们共产党人“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气魄。大家不仅同意了龟山、蛇山线方案，而且还决定在岸边建造黄鹤楼，重建古楼。

铁道部接到湖北方面的赞同意见后，将桥址方案意见正式上报中央人民政府审批。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甚至为全世界瞩目。但在建国之初，国家财政十分艰难，这个耗资巨大的项目无疑要影响其他事业，但毛泽东等人还是拿出了大气魄决心干。事情还是不如人愿。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修建大桥的事情终于被迫搁置下来了。

1953年朝鲜战争快结束了，毛泽东再次考虑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之事。春节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武汉。2月18日，连日大雪的武汉三镇迎来了第一个晴天，太阳照耀着这座初醒的城市。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中南局负责人陪同下，沿着盘山小道，登上了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

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钻探，作了四个比较线，召开了三次有国内桥梁专家、教授和有关单位参加的设计会议，终于完成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此时大桥虽然桥址已选定在龟山蛇山之间，初步设计尚未经过鉴定，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正在准备组建。而毛泽东却急不可待地来视察“工地”了。

他凭栏伫立，隔江相望的武汉三镇和被长江阻隔的京汉铁路和

粤汉铁路尽收眼底，大江中间，几只地质勘探船一字形排开，船上的人们在忙碌着。望着滚滚的长江，他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在武汉修建横跨长江的大桥，已成为我们进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课题之一。”一位领导同志报告说。

毛泽东望着对岸的龟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过了好久才说：“建桥是千百年来两岸人民梦寐以求的大事！要尽快动工！”

说罢，他就迈开脚步，走了。

为什么他不说别的就走了？因为在他心中此事已不容讨论，并且刻不容缓，必须马上就应动工！

当毛泽东的汽车到达武昌蛇山时，武汉市委办公室打电话给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毛泽东到了蛇山，可能要问起大桥桥址情况，赶快赶去，准备汇报。”

电话来得十分突然。其实，毛泽东去视察长江，市委事先也不知道，临时通知的。而工程局刚接到江面上勘测队报告：“蛇山上‘孔明灯’附近围聚了很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彭敏等人接到市委办公室的电话，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即坐着工作船，赶去武昌江岸。到了那里，他们只见人如潮涌。警察不准船只上岸。毛泽东已在罗瑞卿和警卫人员的卫护下离去了，人们还拥挤在原地，一堆一伙的。那些有幸见到毛泽东的人激动地讲述着见到他的经过、印象和感受，脸上满是兴奋。

毛泽东这次视察，因为在黄鹤楼被人发觉而不得不“撤离”，时间很短。但他回去后，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就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报告》。

在毛泽东视察武汉长江大桥桥址十个月后，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滕代远《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报告》，通过了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并且批准了大桥的初步设计、工程概算和竣工

期限,其中,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上层为公路,双向四车道,两侧有人行道;下层为复线铁路,全长 1670 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正桥由三联九孔跨径各为 128 米的连续梁组成,共长 1155.5 米。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桥梁工程。1954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社论。社论说: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方针,是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但同时也必须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以完成日益增长的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运输任务,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目前,我国正着手在中南地区建设新的钢铁企业,不久还将在中南地区建设新的拖拉机工厂、汽车制造厂,扩建一些有色金属矿,一个空前未有的运输任务已经摆在长江渡口上,如果不修建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如果继续用轮渡和木划来衔接南北运输,如果继续让长江的风浪和迷雾打断航行,就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运输要求,这些新的工业的建设就会遇到不少困难,将来建设成功后的正常生产也会遭到很大困难。因此,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是十分适时的,而且现有的湘桂路、浙赣路和将来要在南方新建的贯串湖南、贵州、四川与贯串江西、福建的铁路,都可直接或间接通过武汉长江大桥和北方各铁路干线连结起来,使我们祖国辽阔广大的土地在运输上大大缩短了距离,这就会进一步促进全国范围内的物资交流。同时,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也使武汉三镇将连结为一。

最后,社论发出号召:“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把千万人的理想变成

现实的时代，是一个千万人民创造奇迹的时代。武汉长江大桥的工程即使有万种困难，我们的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它。苏联专家更会帮助我们解决各种技术上的困难。我们相信：南北交通被长江隔断的历史很快就要结束，架设在武汉三镇上的长江大桥将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毛泽东亲自视察长江大桥工程，决然推动大桥建设，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出号召，极大鼓舞了建桥工人的热情。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万里长江的第一桥，尽管难度很大，工程浩巨，但大家日夜奋战，工作热火朝天，大桥从无到有，迅速地在江面上延伸着。建设者们以自己的汗水充分展现出“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在大桥延伸的同时，毛泽东十分关心它的建设进程。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才到达武汉，还在专列上，随行的罗瑞卿就通知王任重说：“主席要去武汉长江大桥工地视察。”

这急得王任重立即通知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毛主席要见你。”

当他们来到火车的三等车厢时，毛泽东穿了一件旧衬衣走过来了，随便地坐在彭敏等人对面。王任重介绍彭敏后，毛泽东便问道：“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以前在铁道兵团，抗美援朝时负伤，转业到铁路部门。抗日战争时在山西新军当过团长。”

“唔，看不出你还是个武人。”毛泽东又问道，“你学过修桥？”

“我是个学生，学过一点，解放战争时期抢修过几座桥，现在再学习吧。”彭敏告诉说。

“是的，建设和打仗不一样，要从头学起……也和打仗一样，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打仗，好好学。”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

谈话不多，没说几句，毛泽东就急不可待地说：“去看看建设工

地吧。”

此时大桥施工进入了高潮。江心的桥墩渐渐露出水面，江上的作业比以前更加繁忙。众人随即乘车来到了汉口的江汉码头。

彭敏问道：“是岸上看还是水上看？”

毛泽东说：“水上看。”

随同毛泽东一起视察的，除湖北当地省、市、军区负责人外，还有一位年迈的老年人。毛泽东特地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李烛尘先生，红色资本家。”

然后，众人一起乘坐“武康”号轮船，经汉阳晴川阁从2、3号桥墩间穿过，驶到鹦鹉洲附近的江面后，又折回下行，再从3、4号桥墩间穿出，沿途进行视察。此时长江大桥的水中桥墩已全部建成，并从汉阳岸开始，钢梁正向江中延伸。轮船在江里来回转一圈，花了近一个小时。

众人回到后甲板上，彭敏继续向毛泽东汇报，主要介绍准备上送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大桥施工情况书面报告的内容。他没说多久，毛泽东说：“外面太嘈杂，到小仓房里去谈。”

于是，起身往小仓房去。

小仓房地方小，只有毛泽东、王任重、杨尚昆和彭敏几人坐在里面。彭敏继续说：“修建大桥，中苏技术人员共同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尚无先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这个新的方法代替了气压沉箱基础，解决了气压沉箱所不能解决的深水施工的困难，不仅缩短了工期，降低了造价，而且能够全部在水面上施工，劳动条件也大大改善，工人在气压沉箱中工作，危险和病害大大减少了。以后的深水基础工程，可以照这么去做，可以说开辟了新的道路。”

毛泽东接话说：“困难中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

他从工人一个技术创造中提炼出了一句哲理性的话语。这是他

惯有的独特的个人方式：从别人说话的表象中及时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一个现象中及时抽象出一个哲理。接着，他询问了有关管柱钻孔法的具体内容及其在武汉长江大桥试验以至实现的经过和基本建设体制。随后，他指出彭敏汇报中的一个问题：“你们的‘新方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的提法不妥。”

接着，他解释说：“假若美国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了30年还未采用这种方法。”

“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可能苏联的基本建设管理体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设计和施工从中央各部起完全分立的制度，阻碍了新技术的发展。”彭敏说，“像长江大桥的基础设计，如果采用气压沉箱法，在苏联只需很短时间设计出来；如果采用新方法，则需要做很多试验。因此，设计部门就不愿意采用新方法。施工部门也同样是这样。如果采用新方法，要增添新设备，又没有定额；工作搞不好，就拿不到超额奖，所以也不愿意。如1949年，苏联修建阿斯特提罕伏尔加河桥时，原设计采用气压沉箱，经西林（武汉长江大桥苏联专家组组长）建议，改用深桩基础，事实证明又快又省。但工程进行一半时，西林被调往中国，接替施工的负责人将剩下的一半工程又改用气压沉箱法。30年来，深桩基础在苏联推广很慢。”

毛泽东则从苏联的体制谈起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颇有针对性地说：“劳动方法从历史上看，石器时代是使用石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在劳动方法上已大进了一步。在劳动方法上，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比我们的劳动方法还进步。从社会制度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而劳动方法只有科学不科学，不好分哪些方法是资本主义，哪些是社会主义。”

王任重插话说：“是的，劳动方法和社会制度不能混为一谈。”

毛泽东纠正了彭敏的理论错误。

当彭敏汇报到工程建设是用我们自己制造的震动打桩机的时候，毛泽东插话说：“是啊，不能说苏联没有的，我们就一定做不出来。个别的东西，我们也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说罢，他又问道：“参加修建钱塘江桥的老工程师现在还有谁？多大年纪了？在哪里工作？”

钱塘江大桥就是当年蒋介石修建的钱塘中正大桥。彭敏回答说：“还有茅以升、罗英。”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记了他们的名字。

在一旁的杨尚昆问道：“什么叫复盖层？”

彭敏正要回答，没料到毛泽东却先给他解释了开了：“就是岩面上的沙层，彭局长是不是？”

彭敏说：“是。”

谈了技术，毛泽东关切的是人，继续询问道：“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

彭敏详细地做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道：“为什么铁路 1957 年 10 月通车，公路要到年底？”

彭敏告诉说：“铁路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轨就可以通车；公路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等一段时间铺路面。”

“长江上还要修哪几个桥？”毛泽东问。

有人回答后，毛泽东抬起头说：“将来长江上修上 20 个、30 个桥，黄河也修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

他又问了总投资要多少，要用多少钢材。彭敏说：“数量不少，仅钢梁就需 2.4 万多吨，还有钢筋等其他用料，要 3 万多吨，其中要进口一部分。”

“为什么要进口？鞍钢不能生产吗？”毛泽东问。

“大桥桥梁需用厚的、宽的钢板，我们的炼钢炉，还铸不出那样的钢锭，也没有那么大的轧钢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将来我们也会有的。”

他一面听汇报，一面翻阅着材料，还不时地插话、提问、发表意见。这次汇报虽然是在闷热的小仓房内进行，前后却长达三个半小时之久。

这次视察后，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在第三次畅游长江后，他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诗词后半阙重点写长江大桥，气势宏大，“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形象地写出了建设大桥的意义。毛泽东在诗词中用半阙来写一项建设工程，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可见他对长江大桥的关爱。

然而，他看罢长江大桥后才过一年多，这次来到武汉，又要视察大桥。

而这时大桥建设已接近完工，即将通车了。上层公路路面的混凝土版已经铺通，正做柏油路面。为请示竣工、验收及准备通车等事项，工程局局长彭敏已去北京了。大桥工程局由副局长杨在田和政治部主任杜景云负责陪同毛泽东。

毛泽东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缓缓地漫步在崭新的大桥上，一面鸟瞰历历在目的武汉三镇，一面细心询问大桥工程情况，谈笑风生。

杨在田告诉说：“武汉长江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 1670 米，正桥长 1156 米，8 墩 9 孔。每孔跨度为 128 米。”

这个数字大概毛泽东已知道，此刻最关心的是修桥成本问题，问道：“修这个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

杨在田说：“一共用了 5 万吨钢，1.3 亿资金。”

一贯讲究节约的毛泽东却破例变得大方地说：“不算多。”

他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向上游指着江中问道：“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

“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王任重告诉他。

“啊！那看不到鹦鹉洲了，黄鹤楼呢？”他又关切地问道。

“黄鹤楼因修大桥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王任重说。

毛泽东说：“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

走到大桥中间，他停在漆着灰色、黑色、天蓝色三种不同颜色的栏杆旁，觉得奇怪，问身边的人道：“怎么还漆三种不同颜色？这是让谁看的呀？”

“我们想征求群众意见，看漆哪种颜色好。”杜景云回答。

毛泽东笑了笑，很高兴，并且称赞说：“好啊，你们搞建设还走群众路线！”说罢，转过身对王任重说：“你是湖北的主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

王任重笑着说：“我还没想好呢！”

毛泽东说：“我赞成灰色，灰色和江水比较协调些。”接着又问杨在田：“你们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有1.3万人。”

“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

“24个。”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现在可以修吗？”毛泽东问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可以修。”杨在田回答。

“可以修了吗？”毛泽东紧跟着又重复地问了一句。

“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杨在田再次肯定地回答。

毛泽东似乎放心了，没有说话，迈开大步往前走了。

众人陪着他不停地向前走着，谈论着。然而，毛泽东意犹未尽，看了又看，仔细地询问着大桥建设的每一个细节。渐渐，夜幕降临，毛泽东等人还在大桥上徜徉。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灯火。毛泽东走到栏杆旁边，看着灯火辉煌的汉口说：“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

“这时候水面到桥面有好高？”他又问道。

“有40公尺高。”杨在田回答。

“40公尺高游泳时可以当跳板。”有人插上一句。

“当跳板太高了。”王任重说。

“不行，跳下去要插到岩层上了。”毛泽东却立即想到了群众的安全问题。而这句颇带幽默性的话语让大家忍俊不禁，“哈哈”地大笑起来。

初夏的武汉气温已经很高。从汉阳引桥一直走到武昌桥头，毛泽东早已是一身汗了。他参观大桥的兴趣还是很高。到了武昌桥头

堡的凉亭处，他问道：“从这里可以下去吗？”

“梯子上的电灯还没有安好。”

大家见毛泽东似乎有些累了，劝他在这里停下。

“好！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就在这时，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泽东。他接过来，笑着说：“这是给我的呀？你们还有吗！”接着又节俭地说：“你们多不多，不够就留着自己用。”

杨在田告诉说：“这本书里有一封信，是全体职工给主席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然后，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他题词。他认真地说：“这可要好好想想。”

“主席，你就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写上吧。”王任重提议。因为这是毛泽东当时有感而发写在诗词中的两句话。

毛泽东却很较真，还是坚持说：“我考虑考虑再写。”然后，和杨在田等人握手告别。

陪同毛泽东参观的人们，都以快慰的心情看着他们离开建设工地，远去了。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亲笔题词——大概是他还是想尊重王任重的建议抑或觉得这两句话比其他任何话语更恰当吧。

在毛泽东视察后过了一个月零九日，1957年10月15日，世人瞩目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宏伟的大桥不仅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也将长期断隔的京广铁路连接起来，使得长江南北的铁路运输从此通畅。经历钱塘江中正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两桥设计和建设的工程师茅以升感慨万千地说：“毛主席没在自己家乡建大桥，这座长江大桥却使得大半个中国的人们受益！”

确实，武汉长江大桥仅仅在通车头5年，通过的运输量就达

8000 多万吨，缩短火车运输时间 2400 万车小时，节约的货运费超过整个工程造价。如此宏伟壮观的武汉长江大桥完全应验毛泽东诗词中“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话。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创造了桥梁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座大桥是我国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桥梁、第一座公铁两用桥，基本上是靠自身实力建造的桥梁（中途苏联专家撤出）。

不仅如此，它留给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全人类，都是一个建设史上的奇迹。大桥建成后，经历近 80 次撞击及至少 4 次罕见的特大洪水侵袭，至今桥墩没有下沉，钢梁没有弯曲，百万颗铆钉也没有松动变形。在它通车 50 周年纪念时，国内外桥梁专家检查后宣称：“武汉长江大桥还可以使用 100 年。”这样的工程质量是世上罕见的。而由于兴建于艰苦年代，设计者们没有电脑等先进设备，上万张图纸全部是靠手绘的，完全是“纯手工作品”；在建设中，工人们用手工铆合了 100 多万颗铆钉，纯粹是“体力活儿”。虽然条件极为简陋，而他们造出的大桥质量却是顶呱呱的，第一流。这样的不仅让后来那些豆腐渣工程“建造师”们汗颜，而且它的美观也至今令人惊叹。一位网友自己的博客里说：“最喜欢大桥护栏上的铁艺花雕个个都十分精美，有凤凰、有葡萄、有菠萝等等，个个都是艺术精品。除此之外，大桥的桥头堡也十分肃穆，让人看着很踏实放心。已经不记得多少次从桥上步行或者骑车而过了，每次乘车过桥，心中也充满了自豪与骄傲。武汉长江大桥，武汉最美的建筑，武汉最美的地方……”

时间远去，大桥依旧在。当年大桥建设的决策者——毛泽东视察大桥时说过“将来长江上修上 20 个、30 个桥，黄河也修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的预言，也一一奇迹般地成为了现实，长江、黄河上先后修建了多条超级大桥。在长江上面，长江上 18 米以上宽的大桥就有 18 座，如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安徽铜陵长江大桥、安庆长江

大桥等。长江及其正源流金沙江、通天河、沱沱河上的大桥达 105 座（含隧道）。单单在武汉，从长江上游到下游的长江大桥，依次有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长江四桥）、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长江三桥）、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长江八桥）、武汉长江大桥（即 1957 年通车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二桥、武汉二七长江大桥（长江七桥）、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长江六桥）、武汉阳逻长江大桥（长江五桥）、武汉长江隧道（万里长江第一隧），共五座公路长江大桥、两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和一座长江隧道，并正在建设一座过江通道。滚滚而下的长江长龙不再成为阻隔南北的天堑。黄河上修建的大桥有：兰新铁路黄河大桥、郑州黄河大桥、潼关黄河铁路大桥、连地黄河铁路大桥、叶盛黄河公路桥、洛阳黄河公路大桥、济南黄河公路大桥、长东黄河铁路大桥、中宁黄河公路大桥、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等等近几十座。

长江、黄河不再是中国南北的阻隔，实现了毛泽东“到处都能走”的预言。

本章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毛泽东文集》(第五至第八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3.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4.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5. 《毛泽东》,斯图尔特·施拉姆著,红旗出版社 1987 年版。
6. 《西方学者谈毛泽东》,郑忠超主编,新世纪出版社 1993 年版。
7. 《缅怀毛泽东》(上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8. 《文人毛泽东》,陈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9. 《毛泽东在河南》,林英海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0.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1. 《毛泽东与河北》(上下),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12. 《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李家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13.《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武原主编，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14.《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1 年版。

15.《毛泽东在江苏》，中共江苏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16.《毛泽东与南阳》，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17.《毛泽东与青年》，冯文彬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18.《毛泽东与中国农业》，郭书田主编，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

19.《毛泽东与首都人民在一起》，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20.《毛泽东在湖北》，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21.《毛泽东与十大将》，李智舜编著，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22.《毛泽东轶事》，董志英编，昆仑出版社 1989 年版。

23.《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赵志超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24.《毛泽东与武汉》，《毛泽东与武汉》编委会编，武汉出版社 1993 年版。

25.《毛泽东的红色卫队》，华宸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

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27.《侯波与徐肖冰：瞬间与永恒》，钟桂松著，大象出版社 2007 年版。

28.《怀念罗瑞卿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29.《板门店谈判》，柴成文著，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

30.《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中央公安部编印，1953 年版。

31.《我的父亲胡萍》，胡耀萍著，载《老照片》第 76 辑。

治国录

毛泽东与 1949 年后的中国

第三章 大干快上

毛泽东主席是个众口传颂的人物，每个人不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都会为他的勇气和毅力而深深感动。

——荷兰议会前二院议长冯德林

1.毛泽东访苏,掀起“毛泽东风暴”

有人说:人类对于自身发展的思考,一直没有中断过。“国家发展”,是一个政权建立后,现代化赋予人类社会和那些领袖们的永久课题,使得人们对于它有着多元的思考,也极大拓展了思维的疆界。但是,国家发展到底该如何具体发展,建设如何才能搞得更好?众领袖们却越来越多地陷入了困局。

因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十分复杂,工程十分浩大,它该如何计划和部署,如何去谋划和布局,如何执行和落实……都不是一般人或者一下子就能轻而易举想得清楚或者找得到最佳的途径的。所以,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有的甚至倒退。领导人的能力决定着建设和发展成败和好坏。

对于国家如何快速发展,毛泽东一直孜孜以求,并且不断努力探寻着“快速发展路”,脑子里绷紧着“多”发展、“快”发展的弦儿。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中国要赶上那些先进国家,不是一朝一夕能成,而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1957年底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又被中国与外国相比的贫穷落

后面貌敲了一记警钟。

早在10月4日，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此举被视为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力量。当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国内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建设时，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新的变化。两年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极大的思想混乱，甚至引发波匈事件，到现在终于平静下来了。这次发射了人造卫星，苏共中央又决定举行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盛邀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

这些年来，由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中国搞霸权沙文主义，毛泽东对他不太感兴趣。开始的时候，他不准备去参加这次会议。一天，他和周恩来同坐在一辆汽车上。周恩来说：“赫鲁晓夫来电报了，约请主席去莫斯科。”

毛泽东听了，对这“走亲戚”没兴趣，便没作声。周恩来劝说道：“你是党魁么，还得去。”

接着，他告诉毛泽东说：“南斯拉夫的铁托主席也要到莫斯科参加会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南斯拉夫都遭受过法西斯的侵略，后来又都独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两国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南斯拉夫虽是社会主义阵营，但作为南共领导人，铁托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自主行事，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也不愿意受人干涉。于是，一度有人说一个地球上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道出多年来藏在心里的秘密，说斯大林不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认为他是“半个铁托”。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和铁托都反对他的大国沙文主义，对赫鲁晓夫“不太

感冒”。当听说铁托也去参加莫斯科会议，毛泽东于是说：“嗯，那就去吧。”

就这样，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第二次出访苏联。

毛泽东到达苏联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在机场迎接。苏方举行欢迎仪式后，他陪同毛泽东乘车进莫斯科城内，路上告诉说：“铁托不来了。他说腰疼。”

毛泽东停顿一下，说：“他是政治腰疼。”

进入莫斯科城后，毛泽东下榻在克里姆林宫过去沙皇住过的房间。

在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全世界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和64个（实际68个，4个没公开）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云集莫斯科，主要是借机讨论当前和今后国际形势、各国党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会议中，各代表团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党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和重大理论问题。会议开始后，中苏两党在《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中关于和平过渡、对社会民主党估价等问题上发生较大分歧，争执起来了，久久谈不拢。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在杨尚昆、李银桥等人陪同下，去莫斯科郊外回拜苏共领导人，单独与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等人谈话，进行沟通。一席话，毛泽东就解决了双方的分歧，没有卖国卖党，还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来到了异国，毛泽东十分关心在这里生活学习的中国青年学生们。

11月17日下午，在代表团成员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胡乔木等人陪同下，毛泽东去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

为了聆听毛泽东的教诲，几千名中国留学生早早聚集在莫斯科大学礼堂等候。当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走进礼堂时，台下顿时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长达十分钟之久。

毛泽东看到台下欢腾的青年学生们，也非常兴奋，不停地挥手向台下致意，并且高声喊着：“同学们好！”

“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身体好吗？”台上传来了同学们的衷心问候。毛泽东笑着说：“还可以。”

大家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又问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湖北人？”

台下人群中有人回答：“有。”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游过你们的长江。”

“有没有湖南人啊？”他大声地问。

“有。”

毛泽东告诉说：“我游过你们的湘江。”

“有没有广东人啊？”他再问道。

“有。”

毛泽东又告诉说：“我游过你们的珠江。”

在热烈的掌声和一问一答中，毛泽东开始了讲话。在扩音器前面，他首先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为什么呢？你们看，我们都老成这样了。”

同学们大笑。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是老了，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长处。有经验。换句话说，就是有实际知识。好比太阳，我们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而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发达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台下的学生们热烈鼓掌。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

历史上一个转折点。现在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你们知道吗？”

学生们一起大声回答：“知道。”

接着，他谈起了当前的形势，先问同学们：“我们现在正在开一个会，你们知道吗？”

“知道！”

留学生们都知道毛泽东来莫斯科，是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大会。

“我来过苏联两次，第一次来不高兴。”毛泽东笑着告诉说，“现在苏联的同志愿意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开得很好。生动活泼，和我第一次来时很不一样。现在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这就是列宁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64 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派代表来莫斯科开会，这是一个崭新的转折点。你们身上都有个头，社会主义阵营也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有苏联的同志说，社会主义阵营应该以中国为首。我不同意。中国在政治上是个大国，经济上还是小国。我们的钢产量还不如比利时。当然我们的敌人也有个头，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如果没有头，力量就会被削弱。世界的风向就会变。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说的……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接着，他继续对同学们说：“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有个中间地带。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有 27 亿人。社会主义阵营近 10 亿，资本主义阵营近 4 亿。剩下还有多少呢？”

同学们答：“约 13 亿！”

“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子就算出来啦！”

大家都大笑。毛泽东风趣地说：“帝国主义有 4 亿人，他们中也有我们的人，那儿会发生‘地震’，同样，我们阵营里也有他们的人。

我们两个阵营里都有对方的人。”

他继续说道：“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纯而又纯的东西。有一首歌唱得好，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将一块泥，捏一个你，捏一个我，忽然喜欢啊，将他一起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和，重捏一个你，重塑一个我。那其间，我的身子里有你，你的身子里有我。这首歌讲的是爱情，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里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毛泽东的话语通俗、幽默、生动，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他接着说：“最近几天，我们在开会。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开得很好，解决了很多问题。南斯拉夫声明，参加这个会有困难。好嘛，不参加就不参加。决定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你们同意吗？（答：同意）今天是礼拜天，明天会议继续进行。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但个别历史阶段也有它自己的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苏联的两个卫星上了天，和正在进行的莫斯科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也同样是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一个转折点。”

为了引导学生们用辩证法来看问题，毛泽东又问台下的学生们：“你们有尾巴吗？”

同学们一时没理解他的意思，对这个颇带荒诞的问题笑着回答：“没有。”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人都进化了，摸起来没有尾巴了，但是无形的还有，右派就有。右派就是把尾巴翘得太高了。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所以必须切切实实长

期锻炼才行，千万别骄傲，别把尾巴竖起来。”

这时一个男生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很响。毛泽东笑了，像是对着他说似的：“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了得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

“世界是你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同学们高兴、无比振奋的呢！礼堂里的掌声震耳欲聋，一阵接着一阵。毛泽东再次大声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虽然莫斯科寒气逼人，但中国留学生的心，却像火一样热。同学们被毛泽东风趣、热烈的话语所激动、激励。每个人都荡漾在幸福和喜悦之中。毛泽东的这句话后来传遍全国，成为年轻人朗诵的名言。当时间跨入 2011 年时，还有人在网上评论这句话时诙谐地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愚则国愚。毛主席当年这富有哲理博大精深的论断，距今岁月久远，依然光辉灿烂。再过几百几千年，他的这句哲人宏论还是会振聋发聩，催促年轻人去奋勇前进。”

毛泽东和同学们互动，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就不经意间过去了，毛泽东毫无倦意，兴致勃勃。同学们也多么多么希望他能多待一会。当工作人员催促毛泽东说：“时间到了，还有其他事情，走吧。”有人忍不住大声地说出了大家的心愿：“毛主席，请您不要走，要坐下歇歇。”

毛泽东含笑点头说：“好，听你们的，再坐一会儿！”

随即，他坐下来，和同学们交谈起来。

再坐了一会，他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可以走了吗？”

会场顿时又欢腾起来。毛泽东再一次走到讲台前沿，从左边走到右边，向同学们挥手告别，并且大声说：“最后，送给大家三句话，

第一句：青年人要勇敢，也要谦虚；第二句：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句：和苏联的同志要亲密相处。”

“祝毛主席健康！”“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和掌声再次此起彼伏。在欢呼声中，毛泽东等人离开了大礼堂。

毛泽东从大礼堂出来后，没有立即打道回府，而是去了苏联学生宿舍参观。随后，他来到了中国研究生王惠菁的宿舍。进屋后，他先看了看书桌上放着什么书，发现床铺上放着一张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感到很惊奇，问道：“你们这里能看到中国报纸？”

王惠菁等同学们齐声回答：“是的。”并告诉说：“从北京来的报纸最快的只要两三天。”

毛泽东一面听一面点头微笑。

他和同学们在一起，其乐融融，交谈、询问，直到晚9点多钟，才离开莫斯科大学。

毛泽东登上汽车时，平静的列宁山上响起了一片“毛主席，再见！”的声音，他向大家挥手致意。

会议正处在紧张阶段，还有繁重工作等待着毛泽东去做。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又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一贯狂妄的赫鲁晓夫不得不依靠宽宏、智慧、正直的毛泽东去团结多数人。为此，毛泽东多数在大会上讲话。14日，他在大会上讲了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16日，他在大会上从宣言的签订讲了各国党之间要“协商”解决彼此的分歧等问题。

11月18日，在64个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继14日16日后再次发表长篇讲话，主要是谈目前的形势和各国党之间的团结问题。

在会议之初，11月6日，赫鲁晓夫因为苏联成功发射了卫星而得意洋洋，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15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在莫斯科期间，毛泽

东更加感受到中国与外国的差距，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但这没有让他消沉，反而激起了他与生俱来的不甘落后、改变贫穷而急起直追的思想。这次发言中，他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也谈起了中国。他说道：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 520 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 1000 万到 1500 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 2000 万到 2500 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 3500 万到 4000 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 3000 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 4000 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苏联老大哥要超过美国，中国兄弟也要超过英国！这个设想确实振奋人心，与会的各国共

产党、工人党代表听了，大受鼓舞，不禁欢呼起来。

中国代表团也是倍感振奋和激动。

回到住处后，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席秘书陈伯达：“老夫子，主席为何在全世界前立了军令状，要在十五年后赶超英国？”

“他为何这么说？”陈伯达先反问他。然后，他才告诉李银桥说：“一则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一一列举了苏联在十五年内工业品年产量可以达到的水平，宣布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二则这些年我国的钢产量的增加也是十分惊人的。”

旁边有人说：“在国民党 22 年中，一年只有几万吨钢。新中国的钢铁发展极快，1956 年达到 400 多万吨，1957 年突破 500 万吨。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陈伯达解释说：“美国是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席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

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后来评价说：“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毛泽东克服了赫鲁晓夫在会议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自己的魅力、处事方式和各国党应有的相处原则促成各国代表团在本来有着许多分歧的基础上获取了共识，使大会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从而达到了圆满的结局。

这就是毛泽东——在国际上也是一位不乏个人威望的领袖性人

物。

在访苏期间，毛泽东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深邃的思想、幽默的表达，在中国留学生中掀起了一股风暴，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也掀起了一股风暴。他的话语、他的思想、他善于团结人的行事方式、他善于协调每个人达到一致的工作作风，都成为众人谈论的话题，“毛泽东热”首先在异国的首都莫斯科出现。

然而，毛泽东却立即远离了这个热潮。

会议一结束，11月21日，他就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专机，回到了北京，并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莫斯科会议的诸情况。

12月2日，刘少奇在全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祝贺词中，抢先把毛泽东“赶超英国”的设想公之于众。于是，一场动员全国人民向贫穷、落后开战的全面跃进运动开始步步拉开。1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和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社论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前进的事业历来就是促进派，历来就要求一切前进事业按照需要和可能多多地发展，更快地发展。我们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而给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又集中力量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我国尽可能迅速地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很明显，这不但对于我国本身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维护全世界的和平，都有极大的意义。其次，还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

义物质基础，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建设的步子就必须迈得比较快、比较大，就必须采取勤俭建国的方针，采取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除此以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

如果我们努力的结果，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那么，我们就可以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丰收再丰收，跃进再跃进》社论。社论指出，1957年“在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光荣的先行者：分布在十四个省市的六十九个县、市提前十年或十一年达到或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其中有四个县在1956年达到，1957年因受灾未达到）；其中有八个县市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千斤以上。至于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乡、社，就更多了。据十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二万五千八百零六个农业社。棉花产量超过纲要最高指标（亩产一百斤皮棉）的已经有五个县、市。”发出号召：“我们不可坐待老天爷的恩赐，而应该努力改造自然，限制自然，利用自然……每个地区，都要用革命的精神，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开展农业生产建设运动。是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了，不要再迟疑了，拿出全副力量向前跃进！”

为了集中精力大搞建设，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

础”，在 1957 年最后一日，毛泽东签署了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全部志愿军将在 1958 年底以前撤完，分三批撤，每批各撤三分之一。第一批在 1958 年 3 月至 4 月撤回；第二批在 7 月至 9 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撤回。

1958 年是实施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元旦之日，《人民日报》以鲜红的“迈开英雄的步伐踏进 1958 年”大字下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社论宣布：

在全民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 1957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1957 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工农业生产继续有了很大的增长。工业方面，1957 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指标的 17.3% 左右，比 1952 年增长了 132.5%；钢产量达到了 524 万吨，生铁 590 万吨，煤 12800 万吨，发电量 190 亿度，棉纱 461 万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有 450 个限额以上的工厂建成，其中包括苏联援助的 156 项中的 57 项。我国现在已经拥有能够制造飞机、汽车、蒸汽机车、远洋货轮、新式机床、发电、冶金和矿山设备等近代工业企业。农业方面，1957 年虽然遭受不小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仍比 1956 年增产，达到 3700 亿斤，比 1952 年增加了 610 多亿斤；棉花达到 3280 万担，比 1952 年增加了 670 多万担。其他如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努力，由于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已经胜利地超额完成了。

社论再次强调了“多、快、好、省”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对此毛泽东极为赞赏。1月28日，他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大有希望的民族。”随即，发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求富求强，一直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这次毛泽东出访再次感受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他和党中央决定要带领全国人民去奋力追赶世界先进国家，实现国家的富强。

中国开始了新的追赶。

而这个追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他在1949年把那个分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使之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之一——他不是在超级大国的帮助下，而是在不顾这些大国的反对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中国的大地由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荒芜了，他迅速治愈了这些创伤，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都要快。他使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和廉洁的政府，这个政府全心全意地执行他为重建和复兴国家制订的蓝图。”^①

这是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后来在《改变世界的人》中评价毛泽东时说的一段话。

^①《加拿大报纸说：毛主席改变了世界和二十世纪面貌》，引自1976年9月14日《参考消息》。

2.“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

1958 年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

由于底子薄，新中国的各项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相对于外国尤其是先进国家，还很贫穷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然而，经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有一个奋斗、努力的过程。在这个创造幸福的较为漫长的过程中，毛泽东是领头羊。

领袖如何引导群众，是国家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面对贫穷、落后，毛泽东不是用神、佛的那一套教人们去忍受、去回避现实，相反，而是提出奋斗的目标，亲自带领人们通过自己的双手，用劳动去创造美好的未来，用奋斗实现自己的富裕之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在他眼中，解放人是一场革命，摆脱贫穷和落后也是一场革命。

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急起直追，毛泽东并没有盲目地蛮干。他认为要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必须要勤俭持国，必须要讲究工作方法，必须要进行学习，其中最主要的是必须要进行技术革命，以新方法、新技术来实现强国的目标。为了使全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讲究工作方法和新技术革命上来，他顾不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疲倦，就赶去浙江杭州，准备召开一个工作会议。

1958 年元旦，《光明日报》刊载王佩琨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

过英国》一文。文章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并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水泥、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毛泽东批示：“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新年伊始，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地区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3日、4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着重讲述了如何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问题，一共谈了17个问题。他还对中国发展进行了展望，画出了路线图说：“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1月4日，杭州工作会议结束。

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准备去广州再赴广西南宁，召开一个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中央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部署新一年的工作。

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上午，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全体干部职工正在杭州市内参加一个会议。在会议期间，所长楼宇光突然接到省委紧急通知：“中央领导要到农科所视察双轮双铧犁。”

这位“中央领导”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农科所看双轮双铧犁呢？

在杭州会议上，他多次讲了科学和技术问题，强调要用科学技术去催动工农业生产，才能实现经济建设的跃进式发展。在农业中，他特别强调了要推广先进的农具技术，并且认为省、自治区、直属市应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甚至提出他们要“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种田耕地，都是肩挑手提背拉，纯人力（畜力都很少），劳动强度大，十分辛苦不说，还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改善农民劳动条件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一直倡导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早在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就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思想在1949年进城前后，他两次提及。3月，在迎接解放战争胜利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说：“占国民经济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

1950年春，他首次赴苏联访问回国途中，在东北进行了短暂的参观。这次参观中，他不吃大餐，也不要东北三宝，出人意料的是，命高岗送改良农具和苏联马拉农具各一套到北京。农具运送到北京，政务院主持在中南海游泳池院内举办了一场与军械展览同时举行的新式农具展览。展览主要为中央各部门领导和正在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政协委员而办，时间长达月余，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和董必武等千余人前去观看。毛泽东闻讯，高兴地说：“看看新式农具和军械展览，是于大家有好处的。”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一些地方土匪横行，基层政权尚未巩固；经济千疮百孔，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毛泽东竟关心起农具展览，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许多事情往往小中见大。联系到毛泽东早已成形的农业战略思想，事情就不足为奇了。

建国之初，毛泽东把推广新式农具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第一

步是十分实际的，符合国情。因为我国农业十分落后，用毛泽东的话说“同古代近似”。旧中国留下的农机工业十分简陋，且微不足道。据国民党政府1948年的《中华年鉴》记载，当时全国月产各种农机具1805部，抽水机1495部，柴油机和煤气机各39部和9部（1871马力）。^①为此，他曾要求一机部部长黄敬认真调查全国的农业机械化问题，给中央写报告。但是，土改后，刚刚获土地的农民思想上还不具备机械化的基础，与此同时，国家工业也无能力向广大农民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

然而，毛泽东对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提高一直很重视，转而强调比较实际和可行的农具改革。双轮双铧犁是目前国内正在推广的一种新式农具，但由于设计存在不适应水田的缺点，在南方各地很难推广。浙江省农场农具管理局和浙江省农科所经过研究对原设计进行了三处重要改进，试用效果良好。为此，周恩来专门来农科所对双轮双铧犁的改进工作、改进后的性能功效和推广使用等情况进行实地察看。毛泽东听过周恩来的汇报，决定也去实地进行考察。

在离开杭州城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突然说：“到农科所去看看双轮双铧犁。”

当楼宇光急急赶回农科所后，两辆黑色轿车很快就驶进了院子。他急忙跑出办公室，下楼迎接。

车门敞开，一位身材魁梧、穿着银灰色大衣的首长走了下车。毛主席？！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定神一看，果真是毛主席啊！兴奋极了，立即快步迎上前去。

^①《毛泽东与中国农业》，郭书田主编，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毛泽东轻车简从，只有两辆车，区区几个人。简单问候了一下，毛泽东就往实验大楼走去。走廊里，他发现放着的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立即弯下腰仔细察看，问道：“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双轮双铧犁？”

“是的。”楼宇光回答。

“改进的犁臂是不是已经装上了？”毛泽东对新农具早已有所了解。

楼宇光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了有关双轮双铧犁的情况。

参观完这部双轮双铧犁，毛泽东才走进会客室，脱下帽子，和蔼地要楼宇光一同坐下来谈谈所里的情况。楼宇光作了简要的汇报。此时的农科所规模不大，重点是研究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也做一些高产杂粮和经济作物的研究工作，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四个系和一个园艺组。而毛泽东呢，对他说的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很感兴趣，对许多作物十分熟悉，细细地询问、了解。这反出乎楼宇光的意外：他知道的真多。由于有点紧张，他一时忘记介绍油料作物的研究情况，毛泽东问道：“还有花生、芝麻、油菜等油料作物你们是否研究？”

楼宇光立即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

楼宇光说：“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

“要做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毛泽东叮嘱说。

楼宇光回答：“好的。”

毛泽东笑着又问旁边一位省委负责人：“他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

那位负责人也笑着回答：“赞成。”

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他又问楼宇光：“你是学什么的？”

“我学的是土壤农化。”

毛泽东高兴了，兴致勃勃地说：“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

楼宇光谈了各种元素的比重后，毛泽东和他谈到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及日光、水份与农作物的关系，最后说：“你能不能借我一本关于土壤方面的书？”

楼宇光为他对农业科学的浓厚兴趣和好学精神而感动，立即从办公室取来一本威廉斯著的《土壤学》和另一本关于土壤科学方面的书，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高兴地收下了两本书。而他借书，并不是拿着做做摆设，或者做个假样子，并不去看了。两个月后，在成都会议上，他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农业科学，并且说：“搞农业的要首先学习威廉斯的《土壤学》，你在那本书里可以弄清为什么会增产。土壤学是农业的基本科学，好像医生的解剖学一样重要。你不学土壤学就没有资格当农业部长。”受到此话的启发，四川省委专门印刷了《土壤学》一书，发给各地、县委书记学习。而很少人知道，毛泽东的这番话语，就是看了楼宇光的借书后的体会。

毛泽东拿着两本书，离开会客室，带领众人来到了大楼前面看试验田。

此时在试验田东边，一群人正准备用双轮双铧犁为毛泽东等人作耕地演示。工人张有根正在用心反复调整着调节杆，又吆喝着前面两条耕牛，唯恐出什么差错。毛泽东径直走到他的面前，带着微笑问道：“你会耕地吗？”

“我会耕地。”

“好哇！你就耕吧。”

张有根牵动一下牛绳，两条耕牛拉着双轮双铧犁开始耕地。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察看双轮双铧犁翻过的深灰色土壤。张有根耕到了地边，毛泽东问道：“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力吧？”

“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纵。”

“我行吗？”毛泽东转过脸来对大家说。

毛泽东要亲自试一试这新式犁了。张有根和另一位工人吕其千立即调转犁头，重新将犁插入土中。毛泽东随口问站在旁边的楼宇光道：“你行吗？”

楼宇光没有说话，而脸却红了。因为他没耕过地。

毛泽东走近双轮双铧犁，开始扶犁耕地。周围的人都惊讶万分，谁也没料到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竟然会扶犁耕田！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毛泽东驾驭双轮双铧犁开始前行，非常熟练，操作着犁往前走，一直犁到地头，才放下农具，然后说：“比旧式木犁省力，容易操作。”

农科所所长不会用犁，而国家主席毛泽东却会。在全世界，农民出身的国家级别的大领袖不少，而会犁田的，恐怕没几位。毛泽东犁田的风范激起了在场所有的人的深深敬意。毛泽东发现不少人脸有惊讶之色，笑着说：“我小时候在家里就耕田。”

接着，他交代大伙儿说：“要多做农具的研究改良工作。”

省农场农具管理局副局长李安邦立即向他呈送了有关双轮双铧犁的试验资料。这时候，毛泽东要走了。他同在场的干部和职工们热情握手。张有根和吕其千见他要握手，正为手上有泥巴而为难，毛泽东却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谢谢。”

视察之后，毛泽东离开农科所，赶去了机场，去广东了。

他的视察对浙江省农业科研工作和农机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半个月后，浙江省委作出了一系列决定，省农科所以厅（局）建制归省政府直接领导，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兼任所长，并选派党委书记组建所党委；抽调十余名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加强所机关及系一级领导力量。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浙江省以省工业厅机械公司设计科17名技术人员为基础，再从正在农村锻炼的浙江大学部分青年教师中选调精干力量，组建了技术力量雄厚的农机系。全所发展到7个系、1个组。1960年2月，该所进一步扩建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科技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在这次参观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双轮双铧犁后，4月，毛泽东参观了广东省农具改革推广评比展览会。会上展出好几部不同的手扶拖拉机。他一一抚摸，了解其功能。当看到改良的犁耙、双轮双铧犁时，他赞扬群众的首创精神。接着，他又去观看水泵抽水和龙骨水车（脚踏和手摇）操作表演，由于看得太专注，连脚上的鞋子弄湿进水，都不顾了。此情此景，多少年之后，还被随行的人们含泪谈起。

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全国省委书记会议上说：各级党委要摸清情况，全省全区有多少农机具需要改良，多少农具需要装上滚珠轴承，订个规划，哪个先改，哪个后改，什么时候完成，要有个具体安排。

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新中国大地上掀起一个有声有势的推广新式农具的高潮，并且持续十多年之久，先后涌现的新式农具包括各种步犁、双轮双铧犁、解放式水车，摇臂收割机和脚踏打稻机，等等，推广各种新式农具数以十万计，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作用，也为农民使用机械种田耕地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起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然而，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不仅推动一个省乃至全国的农具

改革,而且在要求要多作农具研究改良工作时倡导全国推进农业机械化,为此,他专门指示第一机械部部长黄敬调研全国农业机械化问题。黄敬写了报告,获得了他的赞扬。1958年,毛泽东亲自批准洛阳拖拉机厂的发展计划,指出:各种拖拉机样式、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地形,并且一定要能综合利用;其成本要尽可能降低。在中国大力改良农具的同时,毛泽东用他的巨人般的大手拉开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序幕。

其实,毛泽东对新式农具的重视和关注,只是在推进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举措。1月6日,他从广州乘坐飞机直接到达南宁,住进明园饭店5号楼,参加在此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在杭州会议上强调的党委工作方法进行了补充和进一步完善。随后,他把会议上所讲述的内容与杭州会议的思想一共总结出六十条工作方法,对各级党委列出一个六十条工作“操作规程”——《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在这个“工作规程”中,毛泽东对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列出了14项内容,即:(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在此基础上,再分别对如何抓工业、农业提出了具体的内容,其中,工业工作有14项,即:(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农业工作也有14项,为:(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早改水等),(7)病虫

害，(8) 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 精耕细作，(10) 畜牧，(11) 副业，(12) 绿化，(13) 除四害，(14) 治疾病讲卫生。在此之后，便是具体的工作方法。

但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或是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正式通过时毛泽东加上了“草案”二字)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提出并始终强调“技术革命”，要求从1958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诸如在工业、农业各14项内容中，他列出的“新产品试制”、“新技术”、“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考虑“产品质量”、“成本”和“资源综合利用”、“设计和施工”和农业工作的“水利”、“肥料”、“土壤”、“种子”、“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与“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等等，均属于技术范畴的东西。在具体工作方法上，他也是重点要求，强调又强调技术因素和技术革命。如讲述处理生产关系的工作方法后，他在第18条方法就提出了“普遍推广试验田”。第18的位置(前17条多是工作任务、内容等规定)是在很前面的，可以说是列在最前面的工作方法之一。并且，他指出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随后，他在第20、第21、第22条等工作方法中还是讲技术问题。如第20条，他强调说：“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

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在第21条“不断革命”中，他时不我待地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7月1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接着，他在第22条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首次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处理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工作方法，“红”为政治，“专”为技术，把技术上的“专”与政治上的“红”并列起来。

之后，毛泽东还提出了“进行学习”的工作方法。然而，他破例把“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放在诸学习之前，然后再列出要去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历史和法学”、“文学”、“文法和逻辑”，还建

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去学一种外文，并争取在五年到十年内达到中等程度，他还要求外来干部学本地话，少数民族干部学汉语。这些学习，既是自我提高，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但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中还是强调了“技术”：“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

在“六十条”中，毛泽东强调了“不断革命”（即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思想，特别提出今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他把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革命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可见他于技术工作的重视和用心良苦。

这是一个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们的“工作规程”，洋洋洒洒六十条之多，多数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工作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那个“关于规章制度”部分是由刘少奇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刘起草的），都是真知灼见。而毛泽东最强调“技术革命”，要求各级党委和干部推进技术革命，要懂技术、懂自然科学，要学技术、学自然科学，这说明他去推动国家建设，要搞生产跃进，并不是要求人们去一味蛮干，而是要重视和运用技术，要讲求科学。

毛泽东强调技术革命，同时指出：“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经过试验，获取经验和教训，才去进行工作，这是工作方法。

3.发起冬泳运动

1958年元月7日下午，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覃应机来到了毛泽东下榻的明园饭店5号楼，看望他。

覃应机是瑞金时期的老红军，与毛泽东是老相识。毛泽东见着他很亲热，询问了他的工作情况后，兴致勃勃地说：“到你们南宁的邕江游泳去。”

这时正是寒冷阴雨，天气比较冷，南宁街头的人们都穿上了毛衣，邕江河水冰凉刺骨。毛泽东又患着感冒。覃应机劝他道：“主席患感冒，最好今天不要去了。”

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不要紧，以毒攻毒嘛！”

覃应机在战争年代负责过党中央的警卫工作，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知道说了就一定要做，于是立即安排其他人说：“毛主席要去游泳，快做准备。”

毛泽东说走就走。覃应机陪同他乘上车，一行人就往邕江岸边的六角亭去。下车后，毛泽东等人沿着江边的坎坷小道，走到了水上游泳场。

两点多钟时，梁亚华等几名青年运动员在南宁市水上游泳池练习，忽然接到紧急任务：“陪同首长冬泳。”连忙乘坐205号小汽艇赶去，进行泳前准备。不到20分钟，毛泽东等人就来了。

毛泽东微笑着，向迎候在游泳场的人们挥手致意，健步登上205号小汽艇更衣。随后，他站在驶向江心的小汽艇仓外，浏览邕江两岸

的景色。这时，运动员们划着板艇到江心迎接他。毛泽东登上板艇，用毛巾蘸着冰冷的江水擦了一下身体，然后双脚浸到江水里。随行人员问道：“主席，冷不冷？”

毛泽东说：“下决心就不冷。”

接着，他嘱咐船上的人说：“看好时间。”扶着板艇边沿下了水，便在江里挥臂畅游起来。于是，众人一个个跟着他跃入了江中。

江水冰寒彻骨，江面寒风飕飕。毛泽东却精神抖擞，红光满面，没有半点寒意。他一会侧游，一会踩水，一会蛙泳，一会潜游，有时还仰卧水面，泰然自若，任水漂流，甚至还一边游泳一边和周围的人们交谈，关心地询问着南宁市的情况。他见覃应机靠过来了，关切地问道：“你们经常来游泳吗？”

“过去我们游的人不多。这么冷的天气在江里游泳，我还是第一次。”覃应机回答。

毛泽东又说：“游泳可以锻炼身体。”

覃应机说：“现在主席带了头，今后我们一定要多游。”

众人紧随在毛泽东周围，一边游泳，一边聆听他的教导，忘记了寒冷。毛泽东畅游方酣，在水中宛如一条蛟龙。但医生担心天寒水冷，影响他的健康，诚恳地说：“毛主席，已经游了20分钟啦！”

毛泽东带着笑说：“再游10分钟吧！”

就这样，毛泽东在寒冷的江水中游了30多分钟，一直游到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了1000多米。经过大家再三劝说，才上了船。

在船上，毛泽东精神抖擞，满面红光，半点寒意也没有，笑着问：“今天水温多少？”

他身边一个运动员答道：“17度半。”

江面上寒风飕飕，有人问道：“您感觉冷吗？”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

冷。”

这时天上云已散，太阳出来了。毛泽东坐在船上晒了一会儿太阳，进船仓穿好衣服，徒步走上了江岸。江边街道一位青少年认出了他，和伙伴们惊喜地拥上前来，幸福地望着他。毛泽东微笑着向他们挥手致意，然后上车回住处了。

毛泽东游了邕江，像当初在武汉游长江一样意犹未尽。1月10日下午两点多钟，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覃应机、省公安厅厅长钟枫、南宁市副市长梁正以及游泳教练梁毅等人陪同下，再一次畅游了邕江。

这次毛泽东等人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小汽艇护卫。陪游的人员也不多，只有十几人。寒风呼呼，刮个不停。毛泽东游得很快，众人一会儿就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当艇上的人员请他上艇休息时，毛泽东看见岸边有不少群众，便继续向着津头渡口游去。

到了津头渡口，他才上岸。

然后，他披上毛巾浴衣，满面笑容地朝着有群众的地方走去。当他走到广西军区303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时，几个在此治疗和休养的伤病员发现了他，激动地连声高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医院三四十个伤病员和穿着白衣的军医战士闻声涌出来。

他们围绕在毛泽东身旁欢呼跳跃。一个靠毛泽东最近的高个子伤病员大声说：“我们要遵守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排队，排队！”

“唰”地一声，伤病员和军医们立即整齐地排成了一列长队，站在毛泽东身旁，使劲地鼓掌欢呼。毛泽东微笑着，立即迈步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

就在这刹那间，附近所有的人都被惊动了，刚下班的工人也赶

来了，附近在田间劳动的农民也赶来了，过渡的群众也赶来了，跟着高喊口号，欢呼声、口号声回响在邕江上空。

毛泽东频频挥手，向大家致意，然后，走向迎接他的汽车。

当他坐着汽车离去很久，人们仍停立在大树下，热烈地谈论着见到毛泽东的情景。

确实，毛泽东在南宁街头出现，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市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他两次冒着严寒畅游邕江，锻炼身体，使南宁市的干部群众大受鼓舞，很快广西各地广泛开展起一场冬泳活动。而毛泽东冬泳邕江的喜讯，传遍全国各地后，其他各地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少年纷纷以他为榜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畏严寒，踊跃参加冬泳，掀起群众性的锻炼身体的热潮。从此，冬泳成为一项群众性的体育锻炼项目。

毛泽东年过花甲，不顾严寒游泳，两次冬泳邕江，可以说是一个创举，而他两次游泳竟然开创全国性的群众冬泳活动，更是群众性体育运动史的一个奇迹。每年冬季，成千上万的人或来到毛泽东冬泳的地方，或到江河大海里游泳。1974年，南宁市人民在邕江桥头毛泽东首次下水的地方建亭以示纪念，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为该亭题词“冬泳亭”。

如果说后来中国涌现了不少如容国团、中国女排、邓亚萍、刘翔、姚明等体育明星，那么毛泽东则是新中国最早的体育明星，并且他掀起的体育巨浪比任何巨星都浩大，影响都长久。

后来，加拿大《新闻报》在《毛是内在的动力》为题的社论中说：“毛不是仅仅把革命带给中国的人，他还对中国实行了改革，使它朝气蓬勃。因为对他来说，革命不是一种有止境的行动，而是一个要不断更新以保持其目的的有机过程，基本上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改变

他的人民的思想和意识。”^①

这种改变，自然也包括中国人民树立体育锻炼和健康的思想和意识。它与其他新的思想和意识一起，使得中国人展现出从来未有过的朝气蓬勃的景象。

4. 关注开发新动力和能源

1958年1月11日晚，中央工作会议在南宁明园饭店5号楼正式举行。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和部分中央领导人与黑龙江、北京、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市书记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预算及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还研究了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问题。

一个国家跃进式的发展，除了农业外，还需要各个部门的支持。毛泽东要搞农具革新和农业机械化，这就要开发农业动力资源，将它们运用到生产劳动中去，才能让机械动力逐步替代人力和畜力。

^①《加拿大报纸说：毛主席改变了世界和二十世纪面貌》，载1976年9月14日《参考消息》。

国家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巨大的能源支持。动力有许多分类,分别应用于不同的地方,诸如农业机械等移动作业以机械动力为主,而大多数制造型的工业,采取的则是固定作业,动力以水动力、电力为主。毛泽东等人对于国家动力发展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战略。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毛泽东等人决定要优先发展工业,动力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动力问题早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考虑范围。

早在1月3日,他看到元旦出版的《光明日报》刊载王佩琨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其中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并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水泥、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毛泽东很高兴,但又带着遗憾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旁边批示:“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毛泽东的遗憾正是出自于他关注着工农业发展所需动力问题的战略考虑。

中国的动力是贫乏的,不仅以动力为能源工作的机器极其匮乏,而且动力源本身也不足,是“动力贫穷户”。我国是世界上利用水力最早的国家。早在公元前206年,即西汉初期,就开始利用水力磨面、舂米、提水灌溉。但在近代,一切都落后了。我国兴建的第一座水电站,是云南昆明石龙坝水电站,1910年动工、1912年建成发电,装机不过区区480千瓦。新中国成立时,1949年我国只有原油12万吨,原煤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千瓦时,有人说:“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工业要落后100余年!”由于能源不足,全国工业总产值也不过区区140亿元。

毛泽东一贯重视电力和水利工作。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就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见解，可谓是超前的。

1935年，他随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时，曾握着一位当地老表的手深情地说：“等革命成功了，给你们一家送来小太阳。”他说的“小太阳”就是电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能源尤其是电力给予了极大关注。1951年3月，新中国在建国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开工建设了第一座水电站——福建古田溪一级水电站，装机 2×6000 千瓦。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农村用电的需要，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设置了小水电的专管机构。1955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水利会议提出积极试办小型水电站的号召。1956年1月，毛泽东在制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明确提出：“凡是能够发电的水利建设，应当尽可能同时进行中小型水电建设，结合国家在大型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增加农村用电。”全国水利会议就试办小水电提出：发电为照明和生产服务都很重要，应根据条件和群众需要，通盘考虑，有计划地进行。1956年在四川重庆、福建永春、山西洪洞举办了三处小水电训练，学习有关政策和水工、水机、电气技术，水机以木质水轮机的选型、制作、运行、维修等主要内容，为全国培训了第一批建设小水电的力量。从此，我国小水电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发展起来。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不包括水动力站在内，1957年底，全国建成农村小水电562处、发电量为2.02万千瓦，主要分布在四川、山西、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河北、湖南等省区，甚至在贵州布依族、侗族、苗族，广西壮族，青海回族、藏族，新疆维吾尔族，内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建起了几座到十几座小水电站。

但是，由于基础差，底子薄，二五计划确定重点抓工业建设，而

这些小水电远远不够应对二五建设的巨大电力需要。

在南宁会议期间，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

一天，毛泽东看见窗外有一座高出屋顶的烟囱，便问道：“这是什么工厂呀？”

陪同的覃应机回答说：“是砖瓦厂。”

毛泽东不禁笑起来，风趣地说：“你们广西还算有一家工厂嘛！”

这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虽然是一个说笑，却道出了广西的实情——国民党统治广西几十年，几乎没留下什么工业，除如砖瓦厂这样屈指可数的几家小厂外，其余的“工厂”，不过是数量少得可怜的手工作坊。广西虽然地处西南边陲，比较落后，但毛泽东很关心广西的建设，对广西的发展十分关注。1956年5月，他在广州视察时，在珠江口一条大船上专门听取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的广西工作汇报。当省委农村部部长贺亦然汇报广西实现农业合作化后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力开荒种粮，全省已开垦荒地多少多少亩时，毛泽东插话说：“你们不要把精力放在开荒上，要把现有的好田好地种好，你们不要把荒地都开完，得留一点给子孙去开嘛！”

毛泽东的话很切合广西人少地多的实际情况。

韦国清等人从广州回来后，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把精力放在种好现有的好田好地上，决定去改善水利灌溉条件，加工加肥，注意消灭病虫害。当年下半年全省虽然发生罕见大旱灾，但粮食仍然获得丰收。1957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大兴水利必须依靠群众》社论，其中还表扬说：“广西省来宾县解放后八年以来，兴修农田水利共扩大灌溉面积25.5万亩，其中13万亩是在1956年的水利建设高潮中兴修的。”

广西农业有了较好的发展，但这次毛泽东来到南宁，广西落后

的工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他的关注。在这次玩笑后，他和周恩来专门听取广西省委负责人刘建勋、韦国清、覃应机等人的汇报。在座谈中，毛泽东说：“广西原来经济基础差，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胜利完成，今后要继续办好农业，工业也要争取后来居上。”

对于广西的发展，他又认为必须立足于本地，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周恩来和广西省委经过商量后，提出在广西上西津水电站、柳州钢铁厂、柳州化肥厂三个重点建设项目。毛泽东立即指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马上去办。

当李富春把规划送到毛泽东那里时，很快就得到批准。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给广西安排了一批包括钢铁、电力、有色金属、化工、机械、精密仪表、水泥、制糖、水利等建设项目，基本建设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 2.2 倍。其中，小水电建设是重点中的重点。

这次南宁会议不仅仅是解决广西的发展问题，而是研究整个二五计划建设诸工作和部署。会议研究了电力工作，确定了“水主火辅”的发展方针，即全国电力发展以水力发电为主，火力发电为辅。此中，毛泽东等人敏锐地选择了“清洁能源”——水力发电来解决工业所需要的动力问题。

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谈到长江三峡工程。

长江三峡工程就是拦江筑坝，修建利用水利进行调节旱涝和发电的工程。三峡之梦，始于孙中山，夭折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描述了对三峡资源的利用开发，营造了中国人的第一个三峡梦。1940 年代，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开始了三峡大坝的勘察建设计划，终因战局动荡不得不最后终止。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溃败，又一个时代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再次点燃了中国人对于三峡的梦想。

1953年，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长江时，就谈起三峡工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长江的问题。谈完后，其他都走了，毛泽东叫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上楼，到他住处。他先谈了谈三峡，接着就问林一山说：“你看啊，你能不能找一个，找一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助你修三峡，修三峡大坝好不好啊。”

李先念在旁边说：“这个大坝长我都想干。”

随后，有关部门对三峡的勘测及设计准备工作全面铺开。三年后，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长办拿出了初步设计，这是一个200米高程的大坝，它的总装机容量达到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00亿度。

但是，兴建三峡工程也有争论，形成支持和反对两派。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修三峡工程，持保留态度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

林李之争始于1956年。当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传遍中国后，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两万字长文，主张尽快修建三峡工程，说唯此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并且建议蓄水高程为235米。

18日凌晨，毛泽东还在办公。一点多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卫士们请他去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了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的炸弹扔我脚底下，扔我脚底下它都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他继续阅看文件，并且思考如何解决工农业发展所必需的能源问题，并且再次发出了一份点将令——明日约见解放

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余秋里。

1月19日，在南宁与会的余秋里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下午到毛泽东办公室开会，秘书特别嘱咐说：“要早一点到，毛主席要谈话。”

余秋里接到通知后，心想：“主席和我谈什么呢？是不是前几日开会说的事情？”

几日前，周恩来见到他，把他叫到一边说：“秋里同志，我们准备让你和李聚奎同志对调一下，请你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余秋里毫无思想准备，稍加考虑后说：“总理，这个任务我可承受不了啊！”

周恩来说：“你考虑考虑，主席还要找你谈话。”

余秋里猜的没错，毛泽东找他谈话就是这事儿。

当日下午，他准时来到毛泽东住的小红楼。坐下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说：“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部当部长，我们都赞成，总理和你谈过了吧？”

“总理和我谈过了。我考虑，我从来没有搞过工业，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余秋里说，“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

毛泽东没直接回答他，反而问他：“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余秋里说：“43岁。”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43岁，儿童团嘛！”

余秋里听着他幽默风趣的谈话，不禁笑了起来。接着，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

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说到这，他稍微停了停，接着又说：“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打仗、搞经济建设都是如此。”

余秋里默默地听着。毛泽东转而又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不愿脱军装啊？”

余秋里赶紧说：“不是。”

“部长以上干部调动，是中央决定，不是转业。”毛泽东笑着说，“你如果转业，要发一笔财呢！李聚奎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

谈话之间，参加会议的人陆续来到了。余秋里赶紧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一定按着你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

“好！就这么定了。你如果缺干部，可以指名要，军以上干部你愿意选谁就选谁。”毛泽东说。

就这样，余秋里就去石油工业部当部长了，受毛泽东之托，抓专为“移动作业”的继起提供动力的能源工作。

在南宁期间，毛泽东大抓了国家发展和建设所需要的动力工作。后来，广西的水电事业十分喜人。短短几年时间，一直落后、贫穷的广西面貌就大为改变，工农业生产有了足够的动力，甚至电居然多到都用不完。1992年秋，覃应机回忆当时情况说：“电站建起来后，电用不完，就号召大家用电做饭、烧开水。”这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啊！

此时南宁会议已到尾声，毛泽东即将离开南宁回北京去。然而，他两次邕江冬泳、在江边散步的消息在南宁传开后，干部群众纷纷希望能见到他。广西省委顺应民意，认为群众的这些要求完全可以

理解。省委负责人刘建勋和韦国清便向毛泽东请示能不能抽空见见他们。毛泽东表示说：“可以同群众见面。”

他约定会见群众的时间定于1月22日下午三点半。省委确定届时在南宁市内的人民公园进行。

这日是南宁会议的最后一天。原定群众队伍下午两点半进场，三点前就位，接见从三点半开始。谁知当群众队伍陆续进场时，老天爷忽然下起了小雨，不久雨点越来越密。毛泽东住的5号楼外马路就是进场队伍通过的道路，过路的人声、脚步声都能听到。毛泽东甚感不安，对刘建勋和韦国清说：“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刘建勋说：“那就通知群众提前到公园去吧。”

指挥部下达通知，接见时间由下午三点半提前到两点钟。于是，后面未进场的队伍跑步前进，快速进场。两点钟还差十几分钟，指挥部得到公园指挥点报告：“群众已全部进场，队伍也已按位置摆好。”

两点整，毛泽东冒雨出现在人民公园。他向排列在路旁的干部和群众健步走过来了。顿时，整个公园沸腾了。人们看到毛泽东面带微笑，和蔼可亲，身体那样健康，禁不住一个劲地鼓掌，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雨已经下得很大。但为了多看一看毛泽东，许多人不管冷雨和热泪流满脸颊，顾不得擦一擦。广西民族学院侗族学员吴英花和壮族学员韦武跑出队伍，代表各族群众向毛泽东敬献鲜花。

毛泽东接过鲜花后，亲切地问吴英花：“你在哪里读书？是哪个民族的？”

吴英花激动地说：“侗族，在广西民族学院读书。全靠您老人家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我这个旧社会给地主当丫头的侗家女儿，才能上大学！”

毛泽东听后，谦虚地笑了。

然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由刘建勋、韦国清陪同，其他中央、各省市领导同志由省委其他负责人陪同，开始从公园古炮台、公园山顶、纪念碑广场逐个地点去接见南宁市群众。雨越下越大，尽管工作人员为毛泽东打着伞，但他的脸上和风衣上仍滴满了水珠，而他仍然毫不在意，继续迎着欢呼的群众从一个地方走去另一个地方。

当他健步走过望山坡，来到烈士纪念碑下的广场时，广场上的解放军指战员、铁路工人、学生和文艺工作者手舞花束、彩带，欢呼声、掌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他看见纪念碑下的台阶上站着一排排浑身淋湿的少先队员，疼爱地抚摸着站在最前面的颜景堂和另一位少先队员的头和肩膀，关切地问道：“冷不冷呀？”

小颜含着满眶幸福的泪水，激动地说：“毛主席。见到您老人家，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冷了！”

寒风冷雨袭人，人们的衣衫、头发被雨水淋湿。但谁也不在意，对领袖的热爱之情早把寒意驱除，欢呼声响彻公园上空，“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毛泽东则向各族群众挥手致意。

整个接见历时约一个半小时。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对刘建勋和韦国清说：“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雨了，叫他们先回去吧！”

刘建勋和韦国清连忙说：“主席先走，主席先走！”推让了好久，他才乘车离去。

这次毛泽东在人民公园接见各族群众达到四万人之多，是毛泽东在外地接见群众规模最大的一次。

南宁会议当日闭幕。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乘坐我空军健儿驾驶的飞机离开了南宁。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没有把工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动力问题的举措束之高阁，而是紧抓不舍，继续进行落实。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电力部与水利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任命傅作义为水利电力部部长。

在人大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作了《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其中强调：“今后电力工业建设，应当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以水电为主、火电为辅的长期建设方针。”

3月23日，周恩来根据与有关部委领导及中苏专家100多人在三峡实地考察情况，在成都会议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经过讨论，25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4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

20世纪60年代，湖北省几次向毛泽东请报上马三峡工程，他回答说：“武汉头上顶一盆水有什么好吗？”由于时机不成熟，尽管主建派多次催促上马，但他直到去世，都没贸然“出手”。

4月下旬，水利电力部向中央政治局报送关于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1）加快电力工业发展速度，十年赶上英国。（2）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全国电气化。（3）放手发动群众，全民办电。（4）水电和火电的比重。（5）电力网建设。（6）设备供应问题。（7）投资问题。25日，毛泽东看到这个计划，很高兴，批示道：“此件写得很好。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

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除了已经写了较好报告的几个部以外，希望各部仿照几个好的报告写一个或长或短的报告给我和政治局各同志。如有好文章，可写上万把字。要条理清楚，政治统帅，思想明确，文字生动。”

5. 支援农业，最先提出“军转民用”

在毛泽东时代，为了甩掉国家贫穷落后的帽子，人民忘我地劳动，辛勤工作，亿万群众不辞劳苦，不知疲倦地日夜劳作。有人说：“人们谈到，中国人民废寝忘食的工作、学习和为人民服务。必须记住，这样的人民正是毛泽东所造就的。”

这话多多少少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造就这样的人民的呢？

那就是他制定一个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后，就像辛勤耕耘的农夫一样不辞劳苦，年复一年地苦干实干，带领人民群众一起奋斗。也就是说，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他都以身作则，自己率先垂范。

而毛泽东的“老农精神”，不是为带头而带头的“虚作”，而是如同老农身上日出而作的劳动习惯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自然而然的，习惯性的。这在战争年代是如此，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1958年2月12日，已是腊月二十四，农历春节就要来到了。忙碌了一年的毛泽东仍然没有休息。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闭幕（2月1日至2月11日在北京举行），他就乘坐专机，由北京直飞辽

宁省会——沈阳。

他为何去东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

“《六十条》里有一条”，即《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六条：“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毛泽东从不是只严格要求别人，而自己凌驾各规定之上，而是凡事自己带头，以身作则，为人们率先垂范。不过，他这次去东北，主要是视察和了解工农业。

下午5时零8分，毛泽东乘坐的专机抵达沈阳。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等干部在东塔机场迎接。寒暄之后，黄欧东告诉毛泽东：“省委的安排是先到宾馆休息用餐，视察活动从第二天开始。”

毛泽东仰头看了看天色，含笑问道：“附近不是有个航空兵工厂吗？”

“是有一个，”黄欧东回答说，“是个飞机发动机厂。”

他没料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居然对沈阳军工设施的位置如此熟悉，在他惊讶之余，毛泽东说：“那好，我们就去看看。”

毛泽东没有去休息。众人上车后，车队径直向国营410厂方向开去。

这个国营410厂，又叫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我国第一个现代化航空喷气发动机制造厂，有职工3600余人。在短短几年中，新中国在过去造不出汽车的基础上却能制造尖端的飞机发动机了，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厂党委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中央首长来厂视察的电话。党委成员立刻中断会议，准备分头进行安排。谁知安排还没开始，转眼之间，毛泽东一行已驱车抵达了办公大楼前。

总工程师程华明第一个走出办公大楼，只见一个亲切熟悉的身影在轿车里向他招手。当他快步走到车前时，车门已经打开，坐在车里的毛泽东挪了一下身子，说：“坐进来。”

程华明便坐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我要到你们总装车间去看看。”

“欢迎主席视察啊！”程华明由于太激动、太紧张，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只觉得那双大手很温暖，很温暖。

毛泽东的汽车按照程华明的指示直接开往总装车间。

路上，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他的姓名、原籍、工作经历。当他得知这位30多岁的青年人竟是这座现代化大工厂的总工程师时，幽默地称赞说：“你的权力很大哟，相当于总理嘛。”

下车后，众人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总装车间。毛泽东由程华明等人陪同着，顺着总装流水线，边参观边和干部、工人交谈。他仔细地询问每件产品的性能、材料来源，对飞机发动机的构造尤感兴趣，为了弄清一个细节，有时他竟然一连问几次。除询问飞机制造的情况外，他还询问工厂的企业管理情况。程华明一一作了回答。

“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职员，是不是多了些？”毛泽东一面扳着指头计算，一面自言自语。

程华明立即告诉说：“现在厂部和车间都有一批干部下放到基层劳动。”

很快，一行人走到了车间“光荣榜”前。程华明便把车间干部的下放名单指给毛泽东看，并指着不远处告诉说：“这一位正在操作的工人，就是下放干部。”

毛泽东立刻走过去，和这位“工人”握手，并对他下放劳动表示敬意。接着，他向在场的各级负责干部们提高声音说：“你们一定要把干部参加劳动当作一件大事，坚持抓下去。”

走到车间尽头时，毛泽东一眼看到车间里张贴的“反浪费”墙报。在杭州会议提出的工作方法中，他就提出了反对浪费一条，并且说：“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此刻，他看见了墙报，问程华明道：“你们这里也有浪费吗？”

“有。”程华明历数墙报上列举的浪费现象，一宗宗，一件件，其中也包括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停工的现象。毛泽东仔细地听着，思考着。最后，他敏锐地指出说：“依我看，你们最大的浪费是开工不足。”

这话让程华明很是惊讶：他看问题真准啊！开工不足，确实是长期困扰这座现代化军工厂的一个要害问题。因为一定型号的军用飞机发动机的需求有限，在新产品没有试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前，工厂的生产能力往往过剩，剩余的生产能力怎么办？厂党委多次开会讨论过，也曾设想生产部分民用产品，如供农村使用的柴油机等等，但那样会不会影响国防工业的发展、会不会有人指责“不务正业”？因此一直难以下决心。此刻毛泽东却抓住了根本，尖锐地提出开工不足“是最大的浪费”，程华明立即把厂党委想利用剩余生产能力生产农用柴油机的设想说出来，想听一听毛泽东的意见。

其实，这个思想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思想完全一致。他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生产农业机械是个方向。”给工厂的生产指出了方向。

毛泽东对这个新式现代化工厂很感兴趣，在厂房里到处看，仔细问，与工人谈话，视察到很晚，才顶着带雪的夜色回住处去。

第二日，他又视察沈阳的另一家航空军工业骨干企业——国营112厂，再去了沈阳小型开关厂、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抚顺煤矿的

西露天矿。在 20 几个小时内，他一连视察了沈阳、抚顺两市四家工厂、一座矿山和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了广泛接触。

毛泽东这次到辽宁的视察是短暂的，第三日便去了吉林长春。然而，他在国营 410 厂提出“军转民用”的问题，为该厂解决过剩产能，去支援农业指明了方向。就在这一年，全厂不但完成了计划规定的试制军用发动机任务，而且生产了 100 台农用柴油机支援农业生产，在军品生产和民品生产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崭新的第一步。该厂自行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台喷气航空发动机喷发一号，装配在歼教—1 飞机上，于 10 月 1 日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若干年之后，辽宁人还深情地说：“毛主席在辽宁留下了宝贵的意见，给我们带来了热切的期望。”

6.“没有毛泽东高瞻远瞩，21 世纪中国汽车 的繁荣就很难说”

中国人有着美丽的汽车梦想，盼星星、盼月亮，一直盼望能开着自己制造的汽车。如果说 21 世纪中国家庭汽车的普及，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生活的幸福指数的话，那么这个幸福的开创，离不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国现代化的祭奠人——毛泽东。

1958 年 2 月 13 日中午，沈阳北陵机场再次收到长春发来“晴，少云，能见度好”的气象报告，指挥塔向停在跑道上的一架苏式小型飞机发出可以按时起飞的信号。

13时30分，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伊尔—14型4202号专机像一只银鹰腾空而起，斜刺飞向云霄。仅过十几分钟，飞机就到达了吉林省会长春上空。

毛泽东把目光投向窗外，俯视着长春。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长春。八年前，他曾到过这里。那是1950年2月，他访苏归来，在长春曾作过短暂停留。这次他来长春，多少带有看看或者检查当年所安排的工作的性质。

14时整，专机打开舱门。毛泽东与前来机场欢迎的吉林省党、政、军负责人一一握手寒暄。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请毛泽东去一号宾馆先休息一会，他婉言谢绝了，还是和到达沈阳一样不肯歇息，对吴德说：“还是先去看望汽车工人吧！”

于是，车队直接向第一汽车制造厂驶去。

这个第一汽车制造厂就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建起来的。

在大清慈禧太后时，中国人就开始坐汽车。辛亥革命时，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邀请美国汽车发明者和制造大佬老福特来中国造汽车，因为让位于袁世凯，此事就成南柯一梦了。蒋介石主政民国，忙于固权争夺天下，对制造汽车想都没想过，那些大官僚和大资本家乐得花大价钱到国外购车享受，无心自己造车。由于没有制造能力，中国被西方人戏称为“万国汽车展览馆”和“汽车修理所”。1936年开始，蒋介石似乎如梦初醒，叫嚷着“要造汽车”，可直到1949年逃离大陆时也没造出一个轮子。蒋氏父子二人在成都上飞机最后离开大陆，还是坐着美国汽车去机场的。

毛泽东的第一辆座驾是抗战时期爱国华侨陈嘉庚赠送的，他最后给了医院做救护车。后来，中共中央是坐美式吉普由西柏坡进北平的。但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发展中国人自己

的汽车制造业。

1950年初，他在访苏期间参观斯大林汽车厂。当他在高大的厂房里看着一辆辆驶下装配线的汽车时，对随行卫士李家骥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

随后，在与斯大林会谈时，他在155个苏联援建项目上加了一个项目——请苏联援建中国一个汽车厂。经过商定，苏联同意援建中国一个年产三万辆中型卡车的汽车制造厂。

8月，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设想。同年，重工业部派工作组赴北京、石家庄、太原、湖南等地进行选址调查，并派人去莫斯科，与苏方洽谈建厂的具体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设计方案由苏方于1952年1月完成，并由陈云主持审批。关于厂址，曾先后提出十几个方案。最初方案是准备设在北京，苏联专家提出运输、电力的问题无法解决。最后，毛泽东说：“在沈阳和哈尔滨之间，就建在长春吧。”

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最后有关部门确定汽车厂建在长春西郊的孟家屯铁路西。当年秋天，政治局开会讨论第一汽车制造厂领导班子。讨论到饶斌任厂长时，毛泽东问道：“就是那个当市长的白面书生吧？他有没有魄力做这个工作？”

列席会议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段君毅回答说：“我们议过，可以胜任。”

于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任命饶斌出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郭力、孟少农、宋敏之为副厂长。

1953年6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责成有关部门给予建厂以最大的支持，并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汽车厂，力争三年建成投产。而在此时长春市孟家屯铁路西边的大片工地已经热闹起来了。工厂的先遣人员和两万

多名施工人员搭起了临时工棚，盖宿舍，建办公楼……工厂的代号叫“652”。毛泽东发出号召后，工厂就要正式开工。工厂叫什么名字呢？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请毛泽东起名，并提了两个方案：（1）毛泽东汽车厂，（2）第一汽车制造厂。并且，他建议说：“苏联有个斯大林汽车厂，长春的汽车厂是斯大林汽车厂援建的，因此第一个方案好些。”

但毛泽东没用自己的名字，对黄敬说：“还是叫第一汽车制造厂好，将来我们还会有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三汽车制造厂……”

7月，周恩来把即将举行开工典礼的喜讯报告毛泽东，并请他题词。毛泽东满怀喜悦地提笔写下：

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毛泽东

1953. 7. 15

7月15日，几万名建设者云集长春西郊。李岚清等六名青年党员将镌刻着毛泽东题词的汉白玉基石抬到会场，端端正正地放在基座上，东北局书记林枫和黄敬把基石和基座安放好。

建设我国第一个汽车城的战斗打响了。

第一汽车制造厂寄托了毛泽东等人发展国家汽车业的梦想。毛泽东急切地希望能早日见到国产的汽车。次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针对一些人强调要发展轻工业的想法时，毛泽东生气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试想，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怎么能摆脱这种经济落后的被动局面，怎么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面

对是一穷二白，极端落后的工业基础，他一心要改变，不能造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他要去直追。

毛泽东的决心和大智慧统一了党中央多数人的思想，也大力推进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进程。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得到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大力支援。在建设的第一年，木工厂、热电站等就相继动工兴建。1954 年进入了土建高峰。1955 年，安装工程开始进行。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大军，为实现“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目标而忙碌着、奋斗着。他们坚持寒暑两季施工，用汗水浇灌出一串闪光数字：建设了 150 公顷的工业区、几十万立方米的工业建筑物、30 多公里铁路专用线和近 10 万米工业管道，安装设备 7554 台。长春市于 1955 年、1956 年连续两年把市政建设投资的 94% 和 84% 用于一汽基础设施建设上。施工紧张时，长春有三万多人义务献工，包揽全部临时用工。

经过三年的努力，1956 年 6 月，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城终于在长春落成。经过调试很快就可以投产，毛泽东为这个盼望已久的“宝贝”起了个响亮的名字：“解放”，并且亲笔题写“解放”二字。“解放”，这个响亮的名字，像一面旗帜，召唤几万万人民为争取经济上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而再去拼搏奋斗，而“解放”牌汽车也成为人们在新的“经济解放”的路程上奔驰的运输机器和牵引机器。

7 月 13 日，人们期盼已久的“解放”牌汽车披红挂彩地驶出总装线，几亿人的中国终于能自己制造汽车了！对此，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述《十大关系》时，高兴地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制造汽车，不晓得制造飞机，现在，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也开始能制造飞机了。”

接着，他又说：“我们的汽车工业先搞卡车，不搞轿车，所以我们

每天只好坐外国的车子来开会，哪一天开会的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小汽车就好了。”

他不仅仅满足于生产卡车，还保留着自己生产小汽车的梦想。

然而，他的梦想甚至还不止是自己能生产的小汽车。

同一年，在参观一机部举办的机械工业汇报展览时，毛泽东对黄敬、段君毅等人说：“我们一个省顶欧洲一个国，将来我们还要有第二汽车厂，第三汽车厂，生产更多的汽车；将来我们的汽车也要出口。”

我们的汽车还要出口，毛泽东的目标宏大而高远。后来丹麦首相耶恩森评价毛泽东时说：毛主席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有把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变为具有自信心的强国”的组织才能，“毛泽东的最伟大的成就也许是把他的思想传达给了全体居民，从而形成了一种民族意识、一种团结精神。”^① 而在此，我们更愿意引用法国人法布里评价毛泽东的一句话：“他使中国得到了统一，使它列身于世界大国之林，并使它的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满怀信心。”^② 这种信心，是信念，是蓝图，如果引用德国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文章：“他是八亿人民的心脏和发动机。他通过他的主要是以对内对外独立自主为基础的学说使八亿人民恢复了自信心。”^③ 确实，是毛泽东指引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他罕见

①《一些欧洲国家政府首脑和外长悼念毛主席 德新社说 对毛主席的赞扬如潮水般涌来》，载 1976 年 9 月 11 日《参考消息》。

②《法国各界人士纷纷悼念毛主席 密特朗说 毋庸赘述，毛泽东是过去 25 年中世界上的居支配地位的人物》，载 1976 年 9 月 13 日《参考消息》。

③《我会见毛的日子》，施特劳斯著，载 1976 年 9 月 14 日《参考消息》。

地给予了人民信心，超前描绘出了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宏伟蓝图。

共和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牵动着毛泽东的心。尤其是国家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之始，他对于远胜过人力的汽车更是关心备至，希望他在跃进式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时左右，毛泽东等人的轿车沿着东风大街驶进了第一汽车制造总厂正门前的中央广场。当毛泽东在车门前出现时，聚集在厂门前的人们掌声雷动。

在厂长办公室，党委书记赵明新和厂长饶斌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工厂的生产状况以及三年来的成就。毛泽东对一汽的成绩给予了肯定，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在谈话快要结束时，他再次对赵明新和饶斌说：“我们有了国产的卡车，是不是还要有国产的轿车呀？我想一定会有，这就要靠你们喽！”期望之殷切，全在言语中。

听完汇报，众人离开厂部大楼，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视察车间，先到了铸工车间。

这是全厂条件最艰苦、活计最累的地方。毛泽东放慢了脚步，边走边看，突然停步站在正在聚精会神工作的青工万国忠跟前，看着他一举一动地操作。小万只顾埋头工作，没发觉毛泽东，猛一抬头，只见他微笑地站在自己身边，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嘿嘿”地憨笑。毛泽东拉住他满是油污的手说，“你辛苦了，小同志！”

万国忠更不知说什么好了，还是“嘿嘿”地笑着。

毛泽东很喜欢这位干活认真又憨厚的青年人，说道：“来来来，我们一起合个影。”拉住小万站在自己身边。随行的摄影师立即“咔嚓”一声，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随后，毛泽东来到了总装配车间，仔细观看工人装配前后桥的情况。当他知道这个车间青工占多数时非常高兴，对党委书记赵明新说：“青年很多，要加强思想教育哟！”

在观看装配发动机时，他得知发动机可用于农机排灌，高兴地说：“要多生产，支援农业。”

他时刻都想着工农业齐头并进，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几条腿走路。

接着，毛泽东领着大家信步走进底盘车间。“毛主席来了”的消息已不胫而走，工人和家属们纷纷从宿舍、车间、办公室赶来。当毛泽东走到门口时，车间站满了迎候的人群，个个笑逐颜开。毛泽东见着大家，热情地招手致意。

他走到了调整工彭德华跟前，细心地观看他的操作，并拿起刚刚加工好的一个零件，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用手摸一摸表面的光洁度，然后轻轻放回原处，然后，对彭德华亲切地说：“你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争取戴上大红花呀！”

小彭点着头，回答说：“毛主席，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争取戴个大红花到北京去看望您老人家。”

这一日，毛泽东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徜徉了很久，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对每一项工作都看不完，有问不完的问题，和工人们也有说不完的话儿，直到很晚才离开。

毛泽东的视察，对汽车工业的殷切期望，激励了一汽工人。他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随后仅用7个月时间，9月份便试制我国第一辆轿车——东风牌轿车，并送到了北京中南海。

当毛泽东获知这个消息时，高兴地来了看，并且坐进车内，让司机开着，在中南海的草坪上连续开了三圈。

在第一辆轿车的基础上，工人们又对小汽车加以改进，生产出“红旗”牌轿车。1959年国庆十周年阅兵典礼中，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乘坐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红旗”牌轿车，参加庆典，国防部长彭德怀和阅兵总指挥分别乘坐“红旗”敞篷轿车检阅部队，中国人以

自己制造的轿车高调亮相了。

新中国汽车工业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与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丝丝相连。后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回顾这一段难忘的历史，由衷地说：“没有毛泽东高瞻远瞩，搞只买不造这一套，21世纪中国汽车的繁荣，就很难说。”确实是如此的。区区几十年过去，当时光迈入21世纪后，中国汽车业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春天。浙江省普通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李书福不仅把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吉利”牌小汽车卖到了国外，而且以蛇吞象的气魄收购世界汽车顶尖名牌“沃尔沃”整个企业。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希望和豪言，像一个神秘的谶语，变成了现实。

人们惊讶毛泽东的“神算”。

对毛泽东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德国基督教领袖性人物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有一句很中肯的话：“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①这个“缔造”并且是极其成功的，获得国际上公认的。18年后，委内瑞拉《宇宙报》在题为《毛泽东这位伟人》文章中是这么评说的：“在执政的27年中，毛领导了20世纪发生的最全面的和最有效的变革。……中国的工业化已根据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个国家即将成为地球上的第三工业大国。规模巨大的重工业、制造业、工业部门遍布全国各地，使中国具有这一无可争议的地位。”^②

①《施特劳斯回忆毛主席说毛主席是八亿人民的心脏》，载《1976年9月14日参考消息》。

②《委内瑞拉〈宇宙报〉说：毛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载1976年9月16日《参考消息》。

此话一点也不假。

7.毛泽东阅批高生日记

在毛泽东忙于二五计划建设开局工作时，1958年2月26日，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第四期首篇刊登了一篇题为《假期回乡日记》的文章，作者署名为北京实验中学高三学生王桂芹。在文章前，有两行醒目的刚劲挺拔、潇洒自如的草体字批语：“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

为这一段批语，《中国青年》杂志编者特地写了200多字按语，首先指出：“上面这几句话，是毛主席看了这份日记后的批语。”接着说：“这份日记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毛主席看了之后很为赞赏……希望广大青年和学生都能好好看几遍，以便从这里得到有益的启发，特别要记取毛主席的教导，争取在假期里下乡参加一个时期的劳动。”

这篇《假期回乡日记》发表后，在广大青年和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

时值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体力劳动，并要求年轻干部去下乡参加劳动锻炼。很多青年学生和干部纷纷写信给杂志社说：读了这些日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并且表示要接受毛泽东的教导，争取机会下乡，在劳动和群众中锻炼成长。也有青年来信询问：毛主席是在怎样的“一个偶然的时机”看到日记的？然而，《中国青年》的编辑出于种种考

虑，对读者所问避而不答，保持了沉默。

这篇日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是如何看到了它并写了批语呢？

这要从北京实验中学高三学生王桂芹的暑假生活说起。

1957年的暑假，王桂芹回到了在河北省阜平县老家的母亲身边，参加合作社的生产劳动和社员会活动，同时勤奋地记日记。回京开学后，一次北京实验中学组织同学们到郊区参加秋收义务劳动。休息时，和王桂芹同班、一块儿去劳动的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看到她的背包中整理好的这篇日记，就拿出来看，但没有看完，又开始劳动了。劳动结束回家时，李敏征得王桂芹的同意，把日记带回家看。

她在家看完日记后，吃饭的时候，对毛泽东说：“爸爸，我这里有篇同学写的日记，写得很有意思，你能看看吗？”

“哦，什么日记呀，还向我推荐？”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

“一个同学暑假的时候写的。”

于是，毛泽东就要了过来。

之后，他还真的认真地阅看，写了批语，还细致地修改了原稿中的错别字。例如，日记8月5日一节中，王桂芹把“我看着满心眼里欢喜，真是喜花怒放”中的“喜”字，改正为“心”字；日记8月8日一节快结束时，把“……其实别人过余夸奖我了”中的“余”字，改正为“于”字；日记8月13日一节中，把“那儿要一标糠”中的“标”字，改正为“瓢”字等。

毛泽东如同古时老先生阅读文章一样，还对王桂芹日记中写得好的段落和文句，用笔加以圈圈点点。在阅读日记时，他对不少段落和文句在旁边用铅笔画了圈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作者的行动和思想的肯定和赞许。

在日记8月5日一节中，王桂芹记述回乡的路上看到旱地里的

谷子、花生因缺少雨水而干旱得像火烧了似的后写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会人工下雨呢？我想，我若是能呼风唤雨多好！那庄稼年年丰收，国家年年富足，人民年年丰衣足食！”毛泽东在旁边连画了两个圈。这一节的最后，作者写快要到家的途中遇到了雷阵雨，雨点打得她不由自主地打抖起来，写道：“我再看看田地里干枯的谷苗，它饱吸着雨水，好像又恢复了生命力，逐渐精神起来，我尝尝雨水，觉得也是甜滋滋的。我想，我淋湿了又算得什么，只要庄稼长得好，比什么都强哩。雨啊，下吧，下个透吧！”毛泽东读到这里，重重地画了圈圈。很显然，他赞许王桂芹看到庄稼受旱和自己遭雨淋的想法和感受。

因为她的这种思想和感情完全和劳动者——农民的思想和感情相通了。

在日记8月7日一节中，王桂芹听说社员们要去打坝，就想邀女友小斤一块去参加，可是小斤母亲说：“外面日头晒得火热，你们受不了！”二大伯也不赞成：“别去了，够累的，连我都有点受不了。去也挣不了多少工。”

王桂芹对他们说：“我不怕累。再说，我又不是为挣工分，我是为了劳动和出汗。”

随后，她回到家里，和母亲商量。母亲很支持她，并且说：“去吧，尝尝什么滋味儿，别累坏了，但也别娇气。”母亲还向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干活儿要像个样。把你的缎子裤和绸子褂脱下来，穿一套劳动服，那才不显得软气。”

毛泽东看到这里，连连画了三个圈，既赞许王桂芹不怕苦、自觉要求去打坝的态度，又很欣赏她母亲的做法：一方面积极鼓励，一方面又关心备至。大概他认为，这样做，才是一位好母亲。

日记8月10日一节记述了王桂芹给同学贾达黎做鞋的事。三年前，王桂芹答应给同学贾达黎做一双鞋，但因没有时间，一直没有

做。这次回家，她把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郑重地说：“这么久了还没给人家做，为什么不早说？我就不喜欢光答应、不做的人。现在做吧！”于是，在妈妈的监督下，她给贾达黎做了一双花鞋，然后在日记中写道：“我想，达黎决想不到我这个假期会给她做鞋，也许她早认为我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了。永远做个守信的人！永远做个执行诺言的人！”

毛泽东看了这节日记，有三处连画了三个圈，对王桂芹母亲的教育孩子的态度，对一个高中女学生自己动手做鞋，对王桂芹要做个守信的人，都表示了肯定和赞许。

在8月11日一节日记中，王桂芹写道：“我牢记着爸爸的嘱咐：我去劳动，我去访问，我去参加社员会。我被称为‘临时社员’。”“我简直成了个忙人了，现在我取消了午睡。”“农村里有许多事情是我在北京的报纸上看不到的。从前我对合作社只认识一个轮廓，现在钻进去看看吧。”在以后几天里，她写了参加社员大会讨论关于吃菜问题，写了她在地头休息时给乡亲们读报，写了参加关于“从前地主雇长工是剥削，现在高级干部使勤务员，一般干部雇保姆算不算剥削？”辩论会，等等。毛泽东在这些地方也连画了三个圈，肯定她参加这些社员活动大有益处。

如此等等，在这篇13节（天）约一万字的日记中，毛泽东画圈圈的地方有27处，其中连画三个圈的地方达17处之多，足见他阅读这篇日记时心情是何等喜悦，无怪乎他最后在日记后面批上“此文写得很好”六个字的评语。

一个普通高中生的日记，60多岁的毛泽东竟然全篇通读，并且那么认真细致，还圈圈点点，最后作如此严肃的批示和评语，可见他治国理政不仅仅做那些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大事”，也认真做一些“小事”。而这些“小事”，在他心中并不“小”，其实事关青年

和青年工作。

毛泽东早就指出世界的未来属于青年人，中国的前途属于青年人，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因此，他非常重视青年工作，非常关注他们的成长，十分注意如何使他们获得好的思想和作风。为此，他不是采取下命令的方式强令青年们接受这种思想而不能接受那种思想，而是很注意发现青年自身中涌现出来的好材料，以求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来教育广大青年，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次王桂芹的日记生动、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青年学生回乡参加劳动之举极为有益，是年轻人获得好思想、好作风的好途径。

因此，他向青年学生们发出了“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的号召，还在日记上写道：“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最后，他意犹未尽地在日记第一页上用铅笔批着：“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

他要求青年学生去下乡，去锻炼，并非如一些人只是要求别人家的孩子，把自己的子女当做宝贝搞特殊化，又写道：“李讷应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要求自己的两个女儿也要去学习，并且落实到行动之上。

李敏把日记退还给王桂芹时，告诉她说：“我爸爸也看了你的日记，还写了批语，他说可以送到《中国青年》杂志发表。”

1958年元旦前夕，王桂芹委托两位同学将日记送去《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辑秦浩接待了他们。在附信中，王桂芹简单地说：“这份日记曾经毛主席看过，他托人嘱我可送给《中国青年》发表。”秦浩翻开日记，在第一页上看到毛泽东用铅笔写着“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的批示，感谢两位女生后，他立即阅读起来。日记后面留余的空白纸上，毛泽东用铅笔着力地写了这么多的批语，让他十分惊讶。

随后，杂志社负责人也通读了日记。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日记确实写得生动、具体、风趣，有着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字里行间洋溢浑厚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朴素地表露出一位勤奋踏实、要求进步的青年自觉地要在劳动和群众中锻炼自己的热情和追求。这篇日记确实不失为一篇好日记。编辑部于是决定尽快发表，同时发表毛泽东的批语。

但在编发日记时，有人还是忍不住存疑地说：“毛主席是怎么看到这篇日记呢？他这么忙，怎么会对一篇中学生的日记如此上心呢？”秦浩觉得有责任弄清疑团，以对工作、对读者负责。于是，约请王桂芹来编辑部面谈。

一个星期六下午，王桂芹应约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同她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位女同学，即日记中提到的贾达黎。秦浩告诉她们说：“我们决定尽快刊登日记，但编辑部还是想知道毛主席是怎样看到这篇日记的。”

谁知王桂芹很机警，不说。

秦浩只好向她说明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并不是要把它写出来，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正确地表述编者的意见。因为我们发表日记时，更重要的，还要把毛主席的批语发表出来。”

这样，王桂芹才把毛泽东是通过女儿李敏而看到日记的前后经过说了出来。

北京实验中学有不少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子女就读。王桂芹是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某负责人的女儿，贾达黎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的女儿。这些干部子女相互之间，有的知道对方的家庭情况，有的不知道。秦浩不知李敏和李讷是毛泽东的女儿，问道：“李敏和李讷是什么人，毛泽东为什么叫她们看？”

“她们是毛主席的女儿。”王桂芹说。

“学校里大家知道不知道？”

“有的老师和同学知道，多数老师和同学不知道。”

这个情况让秦浩等人意料不到。李敏已看过日记了，毛泽东还要她再看一遍；李讷没看过，嘱其看两遍。他叫自己的女儿去细看日记，就是希望她们能从日记中受到教益，有机会也去参加劳动，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秦浩获知这个情况后，深深为毛泽东对子女严格要求感到惊讶，也深深体会到他对子女要求之严格、之无特殊化。

《中国青年》是团中央机关刊物。核实事情的经过后，秦浩等人认为发表毛泽东对日记的批语，如果不向他本人报告并征得同意，就贸然发表，恐怕不妥，于是又给毛泽东送去一封信，报告杂志将刊登王桂芹的日记，并准备在文前刊登批语。信送出后，他心里总掂量着：“毛主席会不会同意呀？”

过了两三天，一个晚上，他等不住了，直接向毛泽东办公室挂电话。一位姓高的秘书接了电话。秦浩说完事情的原由后，他很明确地告诉说：“主席同意你们刊登他的批语。”

“毛主席同意发表了！”秦浩高兴地放下了电话。

消息传开，同事们都高兴若狂，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对青年的教育问题真重视，对《中国青年》非常厚爱，非常理解我们编辑的焦急心情啊。”

经过郑重考虑，在最后发表刊登毛泽东对日记的批语时，“李讷应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这句没有刊登。

为什么呢？

随后，秦浩等人曾试图通过王桂芹邀请李讷和李敏来编辑部，想多了解一些毛泽东阅看日记的情况，但她们都没有来。基于这种情况，经过再三考虑，编辑部决定不刊出两人应读两遍的批语，在编

者按中也就用了“在一个偶然的会里”这样的话，模糊了事实的具体经过。

几十年过去后，当年编发日记的秦浩已年逾花甲，日记的作者和她的同学贾达黎、李讷、李敏也都是青年人的父母辈了。但每当秦浩谈起此事时，都由衷地说：“毛主席的这两句批语（指刊出的话），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其意义之重要和深远，完全可以和前面三句话媲美。而且从某个角度来思考，今天更是令人深省……岁月易逝，30余年来，青年成长的道路虽曾几度坎坷，但知识青年应在劳动和群众中得到锻炼的教导是常青的，对子女特别是高干子女的教育则是社会关心的一个热点……我们都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得到健康的成长。因此，我……感到有责任让青年们知道，毛主席是如何寄希望于青年人，是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的……我认为，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应在劳动和群众中锻炼的这一教导的继续贯彻。”

毛泽东为一位中学生批改日记，并非如某些领导办事，是一时兴趣来了乘兴而为，而是严肃地对广大青年学生们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成长途径——去参加体力劳动，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而他号召广大青年去艰苦地环境中去劳动锻炼，如同当年号召青年参军抗美援朝一样，没有只号召别人，而是也要求自己的子女们去和普通青年们一样投身其中，去经风浪，经风雨。以后，毛泽东把李讷派去江西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

毛泽东这种重视培养青年人的做法很有远见。有一家摩洛哥报纸这样说：“毛泽东被认为是经过长期斗争的、富有组织人民群众的杰出才干的当代最伟大的人之一，这种才干从他最初从事斗争时就表现出来了，并持续到去世，这种超人的组织才干特别表现在从长征到建设新中国。毛泽东用他的不寻常的组织能力，把几亿受压迫

的、饥饿和愚昧的中国人民，变成了有工作有智慧的人民。”^①事实上，毛泽东“把几亿受压迫的、饥饿和愚昧的中国人民，变成了有工作有智慧的人民”的“组织能力”（确切地说不是“组织能力”，而是一种高超的治国智慧），是从重视教育和培养青年开始的，并且他们变成“有工作有智慧的人民”，才使得国家有了真正的希望和前进的动力。

8. 成都会议：生动讲述“建设速度”的辩证法

1958年，是“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开年之初，各项建设的捷报就频频传来，先是西北地区的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接着，东南地区的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在技术方面，我国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宣告制成，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宣布试制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在蒋介石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令人十分振奋。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还是照样十分忙碌。1月，他在杭州、广州、南宁；2月，他在北京、沈阳、长春、广州；3月4日，他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祖国西南的“天府之国”——四川省成都市，住在外西金牛坝省委招待所。

他来成都不是来游山玩水，而是开会——准备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①《非洲舆论称颂毛主席的巨大贡献 摩洛哥报纸：毛泽东思想永世长存》，载1976年9月14日《参考消息》。

他在招待所吃第一餐饭时，看到雪白的大米饭，感慨地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吃这样好的大米啊！下次在饭里给掺些杂粮：包谷颗颗、胡豆颗颗，就是你们四川的玉米粳粳饭。”

服务员猜想他大概是想到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现在还有不少地方的老百姓吃不上大米，觉得吃这样白的大米太可惜了。

这时，毛泽东又发现桌上摆的几样菜，顺手端起一样递给服务员说：“菜多了，下一顿热来给我吃。”

结果，招待所的干部职工听说毛泽东不吃菜，还要吃杂粮，心里很难过，想到他已65岁高龄了，又那样操劳，怎么能吃不易消化的粗粮呢？虽然心痛，炊事员朱维新师傅还是照办了。第二餐时，毛泽东端起掺了玉米、胡豆等杂粮的饭，吃得特别香，一粒饭掉在桌子上，他捡起来吃了，还对服务员说：“这样吃既节约，又有营养，会议伙食也该这样办。”

随后，会务组取消了与会人员的伙食补贴。

因为这次成都会议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发展地方工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就对负责会议招待工作的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周颐说：“我们出去看看，坐车绕城看看。”

当汽车经过西城和南城城墙外围时，毛泽东看见靠马路和城墙边上有不少破烂的棚户，有的棚子不仅很矮，还用草和树枝盖顶，不能遮蔽风雨。这时，他的神情变得严肃了，对周颐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消除‘四害’？”

他关心群众生活的心让周颐感到很惭愧，说：“我们工作没做好。”

当看到不少茶馆里围坐着许多群众时，毛泽东说：“四川茶馆真

多。”

“不仅城市有，乡场上也不少。”周颐告诉他。

毛泽东问道：“我们四川是几天赶一场（即赶圩）？”

“说场期不一，有的是三六九日，有的是二五八日，还有一四七日，在一个区范围内，几乎每天都有场可赶。”

“乡下一碗茶是多少钱？”

周颐告诉说：“要看茶叶好坏，三五分钱不等。”

毛泽东用指头算了一下说：“就算一个社员每月赶七八个场吧，光茶钱一年就要好几块钱。”接着说：“场期过密了，不可以改革一下吗？”

随即，他又叮嘱说：“改革场期关系到各个方面，要研究好，不然会受到影响。”

汽车在城墙边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问道：“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

“在人代会上讨论过，有人提议要拆，有的人说这是文物，不能拆，要保留。”周颐回答。

“为什么不能拆除，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毛泽东说，“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群众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后，方便群众交通，土可以作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

在回来的路上，他看见一座高塔，问是什么地方？周颐告诉说：“那是成都量具刃具厂。”

毛泽东立即来了兴致，问道：“可不可以去看看？”

当周颐说可以时，毛泽东说道：“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了，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随从人员赶紧派人小跑步去厂里，请来备料车间主任王德明作

向导。王德明走过来时，毛泽东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呀！”便随他进了工厂。

一行人来到了备料车间。车间机器轰鸣，门口一台汽锤有节奏地一起一落，锤打着火红的铁件，火花四射，好似燃放着一串串喜炮。繁忙热闹的景象吸引了毛泽东。他停下脚步，仔细观看着工人如何操作。

高大的厂房内排列着许多崭新的机床。众人再往前走，王德明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些机床大部分是我国自己制造的，型号是最新式的，生产效率很高。”

毛泽东听着，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神情。

当他们来到第二台车床时，一个工人认出了毛泽东，惊喜地欢呼：“毛主席来了！”顿时，整个车间沸腾了，一呼百应，随即整个工厂都沸腾了，成百上千的工人争先恐后赶到备料车间，涌到毛泽东身旁。

工人们没见过毛泽东，人人想来一睹他的风采；而刚见到他的，又想和他握握手；握了手的，还想请他题字。人们不断地往前涌，一层又一层簇拥在他身边，不久楼上、窗台、机器上到处挤满了工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毛泽东不断挥手，向大家致意，还关切地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要让群众挤伤了，踩坏了。”

有了群众，毛泽东的情绪极佳，边走边看边问，还时不时握住工人沾满油污的手。走到调直台前，他问道：“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德明回答后，他可能没有听明白，便说：“你边操作边讲解给我看看。”

王德明于是走上前，旋转上面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他操作完毕，然后继续往前走去。前面检查台上放着许多刚做出来的产品配件，他又停下来，问了一个又一个

配件的名称，然后拿起一个配件问：“这是量尺？”

王德明说：“是量尺，也叫卡尺。”

毛泽东走到机修车间时，写在黑板上的“生产跃进保证”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兴致盎然地看着保证中的一条条内容，其中一条写着：“要做到文明生产。”回过头问道：“什么是文明生产？”

“文明生产就是要做好机器的维修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王明德回答说。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笑着说：“这很好！”

这次考察的收获，几日后他在会议中插话总结说：“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既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3月8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金牛坝省委招待所开幕。与会者，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外，还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39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建国八年来的工作，研究经济建设方面的有关问题。

会上，毛泽东专门要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山东近年来工农业发展的情况。当舒同讲到山东掖县、招远金矿开采前景喜人的情况时，毛泽东异常兴奋，插话说：“只知道山东有烟台苹果、莱阳梨，还有肥城的桃子。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金矿哩！还有铝，又有煤（指兖州煤矿）、又有铁（舒同汇报过莱芜准备兴建钢铁基地的情况）……嗬嗬，不得了啊！舒同同志，你们山东这下子可好啦，要什么有什么，万事不求人。山东可以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了！孔夫子时代，山东就是一个国家嘛！那时候叫‘鲁国’，他是鲁国大夫。”

听到“独立王国”四个字，舒同吓了一跳：当年中央处理山东“向明问题”^①时其中就有一条，叫“地方分裂主义”。谁知完全是“庸人自扰”，毛泽东并无此意。列数完山东的优势后，他关切地问道：“舒同，山东还有哪些困难需要中央帮助解决？”

舒同也顾不得许多，便一股脑儿地打开话匣子说：“山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饱受战火煎熬，做出了重大牺牲，工农业基础薄弱，干部对搞经济建设普遍缺乏经验，特别是财政方面资金短缺，无法在基本建设上更多投入，至今还欠中央巨额债务……”

出乎他意料的是，说到此时，毛泽东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匣子，突然提高嗓门喊道：“先念同志，舒同同志说他们还欠中央的钱，对不对呀？全国的解放，山东是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这些钱，我看就给他们免掉吧！”

毛泽东要免掉山东的债务，这是中央第一次对地方开口子，语惊四座，会议室一片寂静。掌管中央财政大权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望着舒同，两人会心地笑了。随即，李先念大声回答：“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一个字：免！”

在场的东道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一听就急了。他和舒同是“江西老俵”，早年还是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同学。此刻他见山东巨额的债务就这样给毛泽东一句话免掉了，赶紧举手，大声喊道：“主席，我们四川也有债务哩！”

谁知毛泽东却风趣地伸出四个手指：“另——当——别——论！”

毛泽东减掉了山东的债务，乐得舒同好几天睡不着觉。会议结

^①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处理期间，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被认为“闹独立王国，参加高饶反党联盟”，受到组织处理。

束后，他回到家里，在饭桌上还忍不住对家人眉飞色舞，讲起毛泽东一句话帮山东免掉巨债的感人情景。而毛泽东这一招确实很英明，山东工农业从此甩掉了包袱，很快就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尤其是掖县、招远金矿的开采，使得山东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黄金生产重地。若干年后，“山东黄金”名扬全球。

3月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正式讲话，第一个问题是谈协作问题。他说：“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接着，他谈到了不能照搬外国的问题，说：“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

他谈了我们在建国之初搬苏联的管理和制度后，说：“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

第二日，他再次在大会上讲话，从规章制度讲起了工作方法问题——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指出：“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会议期间，毛泽东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连

吃饭和休息的短暂时间都在批阅文件或看书，其他时间几乎全部放在工作上。

3月16日下午6点多钟，趁着会议的空隙，毛泽东等人来到了成都市郊，视察郫县红光农业社。

他首先走进了老婆婆林赛华的家，在堂屋坐下，用四川话对林赛华说：“我们摆一摆好不好？”（“摆一摆”意即“聊一聊”）与普通农妇拉起了家常。

他关切地问林赛华一家几口人，有几个劳动力，交多少公粮，多少统购粮。

“口粮够不够吃？”毛泽东问。

林赛华回答：“够吃。”

这时站在一旁的副社长向毛泽东说：“去年平均每个社员分400斤粮……”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对林赛华说：“他说的不算，你说，是不是真的够吃？”

林赛华感动得流下泪来，回答说：“真的够吃！”

毛泽东又问她：“你认不认识你们的社长？”

“认得。”

“社长对你们好不好？”

“好！我们的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

这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接着，毛泽东关切地同林赛华谈起了除“四害”：“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知道，我们是除‘七害’。”

“你们是除‘七害’？哪‘七害’呢？”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

“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即蟑螂）。 ”

“为什么要除‘七害’呢？”

林赛华告诉说：“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要吸人的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

“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毛泽东问道。

“偷油婆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毛泽东对她的回答很满意，称赞说：“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哩！”

他想看一看偷油婆，可人们在林家的碗柜里找了个遍，也没发现一只。毛泽东慢慢站起来，走到碗柜前看了看。碗柜里没有灰尘，碗盏放得整整齐齐。他对普通农户卫生水平的提高很高兴。

除“四害”一直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的事情。去年年底从莫斯科回来后，他一面部署国内的经济工作，另外重点抓的就是讲卫生、除“四害”工作。12月7日，他看到《安徽日报》社论《“四害”不除，决不罢休》，很是赞赏，立即批示送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1）此文好，转载并广播；（2）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此点请你和邓、周一商，指人起草，两星期内务必发出；（3）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

第二日，《人民日报》对这篇文章予以转载。胡乔木组织了一个除“四害”的通知。12月25日晚，毛泽东看后又对胡乔木批示：

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堆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逡

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此时，除“四害”已在全国形成浪潮。12月27日《浙江日报》刊登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九张有关内容的照片。毛泽东看到后又批示胡乔木：“这里有一篇报道，一篇特写，一篇社论和几张照片，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似可转载。请告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报道、特写、社论和其中一张照片，只是将报道的题目改为了《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无蝇镇——吴兴南浔》。这些工作对方兴未艾的除“四害”工作起了巨大推进作用。

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止步。1958年年1月3日，他亲自草拟和签发《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

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起来。兹将1958年1月2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1958年12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27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中共中央

1958年1月3日

他写下通知后，又要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传阅，杨尚昆用电报发去，抄卫生部和各部门。

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通知时，一并发表了《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于是乎，在冬闲和春节之际，全国兴起了新一轮除“四害”热潮。

在林赛华家看到的情况，让毛泽东很高兴。随后，在村子里，他询问大家的农副业生产、积累、分配、负担以及社员口粮、现金收入，乃至文化、教育等情况，继续到社员家中走访。当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因参加劳动时手受了伤，伤口正在化脓，马上就吩咐随行医生说：“给她敷药。”

当走到油菜田边的时候，毛泽东看到一个女社员扯了一背篋草，就问：“你扯的这个草是什么草，是作什么用的？”

社员说：“这叫打破碗花花，又叫野棉花，它可以肥田，也可以杀虫，放到茅坑里或水凼里，还可以杀死蛆和蚊子的幼虫。”

“打破碗花花”是一种野生的毒草，它的花或浆汁放在粪坑里，能杀灭蛆虫和蚊子的幼虫子了。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从前为了防止孩子们去摘这种有毒的花，农民就对小孩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打破碗花花’就是这样得了名。”社长说。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大创造。好办法，要推广。”

社长说：“这种花到处都有。”说着，便在田坎上随手拔了一株。毛泽东接过花，满意地对周颐说：“有这么大的用处，既可以肥田又可以消灭‘四害’，带回去明天放在会议室给大家看看。”

他又对县委和合作社社长说：“你们可以叫一个技术员同志把这个草的作用写成材料，后天见报，要广为宣传一下。”

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登了介绍这种野草的一份材料，还附有它的样本图。材料介绍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凼里能杀蛆灭子了，还能毒杀土蚕、蜈蚣，同时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3月2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特地把《四川农民日报》这个材料推荐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并专门介绍了这个有意思的名字的由来：“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

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

在会议当中，毛泽东谈起了农具改良，强调说：“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还重点讲了“建设速度”这个问题，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他第一次提出了“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并且指出“有些指标高”现象。

此时大跃进运动正在发动阶段，毛泽东就敏锐地发现了提出了“虚报、浮夸”和“高指标”等问题，在大会上警醒干部们。

在接着谈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协作区要开会时，他再次语重心长地说：

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

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委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

他强调了要有节奏，“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不能只追求速度，不能急。可见毛泽东的“人定胜天”是讲科学的，是“主观、客观都能办到的”才去干，而不是那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快”。英国伦敦大学东亚和非洲研究院教授斯图尔特·R·叔兰后来在自己研究“大跃进”运动时断言说：“毛泽东决不是一个稳健派或者说是一个完全不考虑经济增长的人。相反，他从来未停止过号召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为

这种发展规定了钢、粮产量等。”^①且暂不论他所言是否毛泽东亲自“规定了钢、粮产量等”，从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来看，叔兰的前一段话至少是不准确的。

在成都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工作十分繁重，除开会外，夜以继日审阅文件、读书。一次，他工作了一昼夜，24小时过去了，还以为是昨天，问招待员现在是几号了。当听到回答已是第二天的日期时，他马上又说：“通知参加会议的同志开会。”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但在紧张的会议期间，他边开会，边继续抽出时间深入四川的各个基层，视察农村和厂矿，走访农家、乡村和城镇。

3月21日，他又来到了神往已久的都江堰。

都江堰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古代杰出的一座水利工程。它位于岷江中游灌县城郊，建于秦昭王后期，距今已有2200多年。毛泽东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又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到成都后便提出要来都江堰。事先，他请秘书到图书馆借来了《灌县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等史籍，认真研读，了解都江堰的沿革。

当他站在苍翠欲滴的玉垒山腰上，俯瞰脚下的岷江时，它宛若一条白练，由北向南奔腾而下。岷江发源于岷山南麓，穿雪山，过草原，奔腾湍急，一泻千里，流经松潘、汶川等县到灌县，“脱缰野马”才被都江堰驯服。“野马”成了为人民服务的“良驹”，灌溉千里沃野，造福人民。毛泽东边看边赞叹：“灌县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哟！”

省委书记李井泉汇报了都江堰的维修情况，毛泽东关切地问：“每年岁修给不给民工的钱？”

^①《毛泽东》，载《毛泽东的思想研究》1985年第2期。

“给的。”李井泉回答。

当了解到每年挖泥淘沙全靠人工时，毛泽东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呼出，稍顿片刻后说：“今后应该改用机器，用卷扬机、掘土机，就省人力了。”

在昨日会议上，他再次专门谈了改良农具，说：“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它的意义极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迅速有效。”并对现代化机械与改良农具的对立统一关系说了自己的意见后，要求请各省市普遍推行。此刻他对都江堰每年的岁修也提出了机械化的思想。

说罢，他意犹未尽地指着索桥下的分水鱼嘴，对都江堰管理处负责人说：“今后要想办法，用现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毛泽东在都江堰观看了很久，中午已过，还未用午餐。有人说肚子饿了的时候，他饶有兴致地说：“吃小吃怎样？”

四川的小吃很多，也很有名。有人立即提议说：“灌县的豆花好。”

“那就吃豆花吧！”毛泽东说。

于是，一行人去了街上，在一家普通饭馆用餐。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陪同人员每人一支，提出要与随从的地方干部“摆一下龙门阵”。

他看到身旁的地方干部有些拘谨和紧张，便笑着问：“今天谁请客？”

“我请客！”

“我请客！”

李井泉和东道主——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争相回答。毛泽东哈哈大笑：“还是我请客吧。”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这顿午餐非常简单，没有山珍，也没有海

味，主菜是四川家常菜——豆花和回锅肉。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他很喜欢吃辣子，吃得大汗淋漓，满脸通红，吃着索性把外衣脱了。

那些地方干部见他如此随便，也少了许多拘谨，放开手脚吃起来。不大功夫，一桌人便秋风扫落叶一般把端上来的豆花和其他菜吃了个精光。

饭后，毛泽东很满意，特地接见了服务员和厨师，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

下午，毛泽东等人离开灌县回成都。汽车出县城不远，他看到路旁有许多苕田，吩咐司机说：“停车，下去看看。”

两个老农正在田里劳作，忽然发现一行人走下公路，沿田坎向他们走来。毛泽东身着中山装，脚蹬青布鞋，身材魁梧，红光满面，气宇轩昂。两位老农心里嘀咕：“谁呢？”

谁知他们还没来得及擦掉手中的泥土，毛泽东已健步走过来了，伸过手握住他们的泥巴手，就和他们交谈起来，气氛轻松自然。

毛泽东问：“扯来做什么用？”

老农说：“扯回去当菜吃。”

“好，苕子很好，人可以吃，也可以作饲料，还可以肥田，要好好地管理，大力推广。”

毛泽东还亲自扯了一把苕尖，问老农道：“这样扯行不行？”

“要得要得！”

老农觉得眼前这位干部对庄稼农活很内行。聊了一会，其中一位老农突然停住了话头，仔细端详着毛泽东，突然有些醒悟，但又有些不相信：全中国几亿人的领袖怎么会到田头跟我们这些黄泥脚农民“摆龙门阵”？他不甘心，继续打量，左看右看，眼光最后落到毛泽东唇下的一颗痣上，就是他！就是他！！终于确信是谁了，急促又兴奋地说：“你是毛主席！？ ”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态度怡然安详。

老农欣喜万分，眼眶里包着晶莹的泪花，嘴唇微微张开，喃喃地说：“过去蒋介石来灌县时，总是叫人把我们按在苕田里不准出来，深怕我们会刺杀他。今天您来了，我们这些农二哥可以随便见，还跟您一道摆龙门阵，新旧社会硬是不一样啊！”

李井泉笑着说：“共产党人还怕老百姓，那就不叫共产党了！”

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也笑了，顺手把苕尖亲切地送到老农手中，如同一家人。

当众人转回到公路旁的时候，附近的许多群众都闻讯涌过来了。毛泽东边走边向大家招手。汽车开动的时候，社员们满脸笑容地热烈鼓掌，情不自禁地喊：“毛主席万岁！”

第二日，毛泽东再次出现在大会上，并作长篇讲话。他从《西厢记》中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引发出来讲述了干部要接受群众批评和帮助的道理，说：“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他指出：“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他还强调“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

3月25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角度谈了工作方法问题。

26日，大会闭幕，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先后作了六次重要讲话，并在其他领导人发言时插话，这些讲话涉及宏观的，涉及微观的，有理论，又有现

实问题，涉及经济、哲学、文化、工作方法、学习等各个方面，有税制、价格、地方工业、劳动法、粮食包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农村工具改革运动、地方工业发展速度问题、招工问题、平衡问题、搜集民歌问题，国防，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创立学派问题，等等，对众多问题阐述了各项政策。

这次会议涉及的内容很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继续对残存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文件。前者指出：“会议完全同意毛主席关于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经过这个运动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此提出“三个为主”方针，即农业机器应以小型为主，农业机械的制造一般应以地方为主，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靠农业合作社自己的力量。至此，中国农业发展提出了机械化的目标。

这是毛泽东机器化思想在农业和农村中的进一步推进。后者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要求“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走群众路线”。而办企业的主要和最近的目的是：“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长远的目标是：“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我国最早开始兴办县办企业、社办企业（即后来我们所说

的乡镇企业)的动员令。

在会议中，毛泽东多次在其他发言中插话，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如“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如“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后来证明都是非常正确。当有人谈到粮食三年实现亩产400斤时，他插话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

有趣的是，他还谈到了长期滞留在苏联不归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王明，说：“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20年，赶上英国再说。”

这一次，毛泽东在成都住了23天。成都会议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会议，围绕“二五”计划等经济工作，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决议，诸如地方工业、农业机械化、合作社合并、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问题都规定了政策和方针。这次会议影响深远的是贯彻了1957年底以来“大跃进”的思想，对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提出批评，认为“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泄了气，影响了经济发展。他再次发出了改变落后面貌的号召，并且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这些类似的话语和思想，对于党内同志起了莫大的鼓动作用，激发了众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思想。

这种思想随后在全中国涌现出一股希望急起直追、快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大跃进”运动，土耳其人后来称之为毛泽东和中国共

产党人“在工业生产上，与西方展开了大规模的竞赛”，^①但为一些干部“头脑发热”和高指标、浮夸风等埋下了根子。

成都会议结束次日，3月27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前往山城重庆。

9. 广州棠下农业社之行

毛泽东离开四川后，沿江而下，考察了三峡，然后在武汉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听取河南、山东、江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关于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划以及安徽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汇报。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之后，他在长沙住了一天，4月13日，就来到了南国之都——广州。

这是毛泽东今年第三次来广州。1月23日，他从杭州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等人陪同下接见了即将离任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其夫人。2月中旬，他从南宁回到广州，与广东党政军干部一起参加了春节庆祝活动。这次他第三次来到了广州。这是极其罕见的。他来广州，并非爱上了这里冬天温暖气候，还是因为工作——准备在此召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工业问题。

4月15日，毛泽东阅看河南省封丘县委3月20日给他的报告。

^①《土〈回声〉周刊赞颂毛主席》，载1976年9月23日《参考消息》。

其中说，应举农业社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苦战二年，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不仅战胜自然灾害，而且还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河南一直是灾害频发的地区，应举社战胜了自然灾害，谱写了“人定胜天”的壮曲。毛泽东很高兴，也激发了他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欣然提笔他写下《介绍一个合作社》批语：“‘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

他认为中国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景象。而过去中国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因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于是，他写道：“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在批语末尾，他写道：“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最后，他批示：“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短短的批语中，毛泽东虽然充满了激情，但对于赶英超英还是十分慎重的，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但秘书

胡乔木具体落实时，综合各同志意见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

毛泽东针对胡乔木这段修改批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而所谓“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是在上几次会议中党内多数同志的看法。但毛泽东再次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十五年”之说。

他相对来说还是冷静的。但其他同志的思想却开始变得狂热。

4月26日，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等人从北京赴广州，与毛泽东等人讨论工业问题。在火车上，他们和陆定一、邓力群闲聊，从半工半读、普及教育，扯到乌托那、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提出一个“大公”的集体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名称，第一次在中国正式出现。

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讲话，再次谈到速度和时间的问题。在讲话提纲中，他在“十五年能否超过美国”后还是划了一个大大的“？”，并且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这次会议虽然是抓工业，讨论钢铁产量十五年超过英国等问题，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忘记更重要的粮食和吃饭问题，在汉口会议上，在其他同志发言时他插话说：“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500斤，北方360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在会议之余，他准备利用休息时间去广州郊区看一两个农业社，检查农村和农业的情况。

4月30日下午，广州市郊区棠下农业社的社员们扶老携幼，齐集到村边南口，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棠下地处广州市的城乡结合部，是全省的先进农业社。1956年，棠下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和虫害，加上肥料短缺，刚建立起来的合作社面临着重大考验。社长钟叙本带领全社干部和群众进行抗旱、抓虫，大搞积肥和水利建设，在大灾之年夺得好收成，提前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各项指标，农业社也被农业部授予“爱国丰产奖”，钟叙本获得爱国丰产奖章。社里用盈余的钱发展生产，买了一台苏联产的吉斯货车。一个农业社能买上货车，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竟然却成了现实。社员们感叹地说：“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好。”也由衷感激毛泽东和共产党。

3时45分，路边拥挤的人群中有声音嚷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来了！”果然，绿树成荫的公路上，三辆小汽车自广州方向疾驶而来。

很快，汽车在村口停了下来。毛泽东走下了车。他穿着一双浅口黑布鞋，笑眯眯地缓步走到社员面前。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广州市长朱光正要把社干部介绍给他。谁知欣喜若狂的几百个社员一下子围拢上来，鼓着掌，欢呼着，将毛泽东团团围住了。

毛泽东含笑环视人群，频频举手答礼。社长钟叙本赶紧说：“让开一条路。”

众人自觉地让出了一条小路。

毛泽东沿着街道向村里走去，石砌的街道两旁都是密密麻麻的人们。毛泽东向他们点头致意。

进了村，钟叙本把毛泽东引进了农业社办公室。室内有一条长方形的桌子，钟叙本和社党支部书记梁富与毛泽东并排坐着。毛泽东逐一询问了他们的名字、年龄，接着便问道：“你们今年的生产还

可以吧？”

“今年比去年好得多了。”28岁的钟叙本回答。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社员自养的多少？”

“300多头。”

毛泽东听了表示满意，点着头说：“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

养猪是毛泽东最提倡的事情。他主张多养猪来改善人民生活的。早在1956年11月，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写的一篇文章《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非常高兴，当即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12月23日，这个批语随宋保恩的文章一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随后，在毛泽东指示下，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毛泽东亲自在灯光下进行了修改。决定第五页上有句“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他在后面还加写上：“（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第六页有“除大城市外，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一句，他改为“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

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养猪可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毛泽东为此花了很大心血，多年来一直倡导和致力促进这件事。不久前，在成都开会时，他专门去了一个养猪场视察，当女饲养员介绍用糖化牛粪来喂猪，猪很爱吃时，他摸出日记本来作记录，并对随行的干部说：“来，我们都记上吧，这是群众的创造！”他还亲自给一头猪打了蛋清针，对女饲养员说：“谢谢你们！对我们教育太大了！”随后，在大会小会上，他一再提到农户要养猪的问题。

此刻毛泽东还是不忘养猪吃肉的事情。在他与钟叙本谈话时，旁边的陶铸插话说：“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年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微笑着问：“你们合作社散伙吗？”

党支部书记梁富利落地答道：“散不了，铁桶江山！”

“散不了？为什么？”毛泽东问道。

“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钟叙本说，“入社前，按照上小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一年纯收入107.4元。”

“现在呢？”毛泽东问。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毛泽东点着头，满意地、慢慢地说道：“啊，从107元增加到164元！”

陶铸笑着问：“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这才想起自己说了第一，没说第二、第三，连忙提高嗓子说：“第二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话未说完，在座的人已经纵声大笑。

全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毛泽东也用含笑的眼睛望着大家。摄影记者蔡忠植“咔嚓”一声把这个场景拍了下来。日后，刊载“毛主席

席视察棠下社”的图片，就是以这幅照片作典型。

接着，毛泽东询问了社里的公共积累，党、团员情况，社干部们都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勉励说：“大家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把生产搞好。”

然后，他指着在座的广州市郊区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问广州市长朱光说：“这几位同志是谁呀！”

朱光一一作了介绍。陶铸打趣地说：“现在是四级干部在一起。”

毛泽东转而对陶铸说：“连你，我，我们是六级干部在一起了。”

大家跟着欢笑起来。

这时在社办公室门前的人越聚越多，欢呼声此起彼伏。毛泽东闻声，走出了大门，立即几十几百只手伸向他。他高兴地把手伸向大家。握手时，他总是笑，点着头说：“感谢你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

钟银地的老爷爷，今年 80 岁了，听说毛泽东来了，也跑到了门口等候。毛泽东在欢乐的人群中发现了，立即把大手伸向他。钟大爷愣住了，错把左手给伸了过去，清醒伸错了手后，急忙高高举起右手，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笑着给他还礼。

毛泽东边同群众握手，边向着村庄西北面的干部试验田走去。走出村尾，在榕树脚不远的地方，便是一片葱绿的稻田。他站在田边，仔细观察后说：“这禾长得不坏！”

陶铸问社干部道：“一季稻能打多少？”

“大约可打 700 斤吧！”钟叙本说。

接着，毛泽东问旁边的梁富利说：“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

梁富利回答说：“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着田埂走去。

广州不像北方，初夏的太阳就已经像火一般毒热。乡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广东人常戴的竹制的遮阳帽。毛泽东接过它，略略端详了一下，轻轻地戴上，笑着说道：“我也像个农民了。”

突然，他发现了一块奇怪的菜地。站在他旁边的人指着瓜田里的作物介绍说：“这是藿香，这是黄瓜，那是豆角、生姜，一块田同时种了四种作物呢！”

“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毛泽东表示满意。

再往前走，众人便来到了干部试验田。这时农民妇女黄三女气喘吁吁地从村庄赶来，拨开人群，跑在毛泽东的身后，将一柄布伞撑开，小心地给他挡住炎热的太阳，毛泽东理解她的心情，没有拒绝，只是笑着说：“你这么撑着，很累的啊！”

试验田的稻禾生长得特别好。社副主任钟礼明介绍说：“干部试验田一季稻计划收获1600斤，两季稻3200斤。”

毛泽东问道：“一季稻就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问罢，他一抬头，发现北面小渠那边的田垄上站满了二三十个戴着红领巾的学生。几十双乌溜溜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瞅着他，不好意思挨近过来。他立即笑着迎上前去。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勇敢地从渠那边跳过来，学着大人的样儿，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来这里做什么？”

任溥华高兴地回答说：“我们是广州市第三十中学的学生，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劳动来的。”

“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

任溥华操着普通话回答了毛泽东。

毛泽东满意地点头说：“你们都懂得一点，可以讲一些了。”然后，指着他们问身旁的社干部说：“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钟叙本回答说：“社里劳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毛泽东转身往回走去，沿着旧路。一行人穿过村庄。太阳西下。毛泽东要离开村子了。四面八方的人流跟着他移动。他走到那里，欢呼声和掌声就在那里响起。毛泽东走在夹道欢送的群众中，特别关心老年农民，跟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欢呼声一直伴送他的汽车离开村口。

毛泽东到棠下村只是一次短暂的视察，然而，棠下人的幸福感却不短暂。当天从黄昏到晚间，整个棠下社都沉浸在幸福、欢乐的气氛中，老年人、青年、妇女、孩子，在街心上、在家里、在树脚下，一簇簇，一群群，兴高彩烈地议论着毛泽东参观棠下的一点点。党支部决定立即召开全社动员大会，叫大家永远不忘毛泽东对大家的关怀。在会上，有人提议团员和青年修一条幸福路，这马上获得鼓掌通过。第二天，青年们开始测量，连夜开工，第三天就修好了路坯，至今村西边的那条路还在走着。

在会上，有人建议说：“毛主席视察时，我们村的猪平均一人不到一头，要大力养猪。”

“好哇！”这也获得大伙儿的响应。

不久，全社的生猪增加到6000头，平均每人两头。

毛泽东视察棠下村，给棠下人留下了建设新农村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成为乡亲们最珍贵的记忆。村里人将这事编成了歌谣传唱：

毛主席来到棠下村，
跟我们社员来谈心，
他问庄稼长得好，
又问生产怎么样……

在悠扬的歌声中，棠下村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毛泽东视察棠下村的照片公布后，周恩来、贺龙和朝鲜主席金日成等 30 多位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 also 来到棠下，参观当地的深翻改土试验。这个新农村学习热潮持续很长的时间。

在广州期间，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集中研究了工业问题。会议一结束，他匆匆就赶回北京，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10.毛泽东带着中央委员修十三陵水库

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 977 人，列席代表 389 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市委书记，企业或基层的党委书记等。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作的工作报告、谭震林副总理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等 117 人在大会上发言，另有 145 人也作了书面发言。

刘少奇工作报告的核心就是一个：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在大会上多次发表了一些讲话，讲了国内国际形势、除“四害”，破除迷信，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等问题。

5 月 23 日下午，大会完成预定的议程后即将结束，毛泽东发表总结性讲话。他说：“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

然后，他讲述“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的道理，说：“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论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他肯定了大会通过的总路线，并且解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

他总结讲话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闭幕。

2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会增选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出版中共中央理论半月刊《红旗》。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亲自带着全体中央委员们，乘坐六辆公共汽车，前去北京昌平区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进行“劳动实践”。

十三陵水库是北京正在兴修的一个较大的水库。

在该地区兴修水库是人们很久的愿望。这里是北京城外的一个盆地，周围群山环抱，整个流域面积达223平方公里。每遇夏季暴雨时就山洪暴发，滔滔洪流直泄东山口，从东沙河一直泄入温榆河。两岸的村舍、农田经常被毁，洪水过后，这里又变成一望无际的卵石沙

滩，天不下雨就缺水，一片枯干。自明代以来这里是皇陵禁地，埋葬了13个皇帝，金碧辉煌的帝陵建筑群散落在群山之中，又成为北京的旅游胜地。1954年春，周恩来来十三陵地区视察时说：“北京名胜古迹甚多；风景优美，但有山无水是美中不足。尤其是十三陵这个名胜古迹，是外宾必游之处，有山无水是一大遗憾。若能修个水库，有个大的水面，那就更美了。”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向北京市委传达了 this 指示。从此，北京市就开始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设想和规划。

兴修水利变害为利，是毛泽东战胜自然和发展农业的一个方略。水利建设一直是他格外致力的事情。195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积肥运动的决定》。这像一股春风吹醒了全国各地，千军万马奔赴农田水利建设战场，战天斗地，征服自然。中共昌平区委也应时正式提出修建十三陵水库的计划。12月26日，北京市政设计院完成水库的设计方案。1958年1月，北京市委成立以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任为总指挥的十三陵水库修建总指挥部。1月21日，在隆隆的开山炮声中，十三陵水库开工了。

十三陵水库大坝建在东山口、蟒山和汉包山之间。坝长627米，坝底宽179米，顶宽7.5米，高29米，为粘土斜墙式大坝。大坝主体工程总需231万土石方。这么大的工程，能不能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完成，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牵动所有人的心。因此，工程一开始，就得到党中央的重视。2月9日上午，在凛冽的寒风中，72岁高龄的朱德来到工地视察，关心地询问工程情况，坝多高、多长，之分的细致。他还勉励大家：“这么大的工程，要努力，再努力！”周恩来三次到工地，并亲自手擎大红旗，带领国务院的部长、副部长等干部300多人，组成劳动队伍，在工地劳动，吃和群众一样，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前后达七天之久。

而这一次，毛泽东也要来参加劳动了，并且他趁会议才结束，而全体中央委员还没回去之际，把他们也一起带过来了。

5月的工地更加热闹和繁忙，到处是彩旗迎风飘扬，建设者们正在紧张地施工，劳动的号子此起彼伏，震动山坳。在初夏的阳光下，六辆公共汽车开进了总指挥部门前广场。每天北京市都有许多干部职工从四面八方坐车来这里参加劳动、参观访问。六辆汽车的到来，并没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

突然，一个惊喜的声音传来：“啊，毛主席来了！”紧接着，一位女同志使劲高喊：“毛主席万岁！”周围的人们如梦初醒似的，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鼓掌声，响彻广场，掀起一股巨浪传向四方。毛泽东站在人群中间，满脸笑容，不断地向大家招手。紧跟他的后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中央委员陆续地下了车。

他们都戴着草帽、穿着布鞋，准备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

众人先来到了接待室。毛泽东等人站在水库模型四周仔细观看，并且问道：“大坝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后山坡下面，离这儿很近。”水库总指挥罗文坊回答。

“大坝到了20公尺没有？”周恩来关心着大坝的高度。

“再过几天就差不多了。”站在一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告诉。他组织解放军部队也参加了水库建设，并且是指挥部成员之一。

谈到工程的建设进度，罗文坊兴奋地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们报告说：“近来水库工程进展很快，前几天每天上坝3万方，接着又提高到4万方，昨天来了个大跃进，砂土上坝突破5万方，坝身最高的地方已经超过20公尺了！”

毛泽东点头微笑着，称赞说：“坝长得真快呀！”

朱德问道：“坝要多高才能挡住洪水？”

杨成武回答说：“20公尺就可以了！”

毛泽东关切地问道：“水库蓄水后，会不会淹掉村庄？”

“会淹掉一部分村庄。”杨威武说，“不过，这些村庄已经作好了安排。”

毛泽东很满意，对着杨成武点了点头，说：“很好！”

这时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来水库参加劳动的消息已像电流一样传遍了工地。距工地三里多地的朝凤庵村有一个评剧团正在进行慰问演出，演员们已化好了妆。听说毛主席来劳动了，台子下的观众立即奔向工地，身上穿着戏装、脸上涂着油彩的演员见状，也顾不上演戏了，跟随着他们一起撒腿奔向工地……

在沸腾的人海和震耳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们走进工地。他们首先登上大坝东墩台，视察了工程的全貌。随后，来到现场指挥所会议室，杨成武汇报了水库修建的工程情况。毛泽东边听边点头。这时一个结着两根长辫的小姑娘小心地把一块面巾送给他。毛泽东注视了一下她，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惠兰。”年轻姑娘回答。

“啊，王惠兰，那么你是九兰组的吗？”

九兰组是工地上由九位名字中有“兰”字的姑娘组成的青年突击队，许多人很惊讶：毛主席咋对我们工地如此熟悉啊！王惠兰红着脸说：“不是，我不是九兰组的。”

“应该向九兰组学习，工地上要多出现一些九兰组就好！”毛泽东鼓励说。

指挥部一位女同志拿来了纸笔墨砚，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题词。毛泽东拿起了笔，谦虚地说：“题什么词呢？”

杨成武说：“请主席为十三陵水库题字。”

毛泽东提起笔来，蘸饱墨，写下了“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接

着，刘少奇题了“劳动万岁！”，周恩来题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朱德题了“移山造海，众志成城！”。

然后，众人走向工地，参加劳动。

毛泽东来到土坝东段停下了脚步。他拿起一把铁锹，参加装土的队伍。土是装进柳条筐内运走。他熟练地铲土，一铁锹一铁锹装进筐内，旁边的人把一筐筐土运走。

工地上热火朝天。虽然有一点风沙扑面，但天气十分闷热，稍胖的毛泽东很快就汗水流下来了。他顾不上擦汗，继续挖着。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被他这种劳动精神感动了。附近村庄的社员白玉丰高兴得含着眼泪说：“过去的皇帝强迫人民替他们修陵墓，今天，共产党带领我们修十三陵水库，多打粮食。毛主席还亲自和我们一起劳动，我们有这样的领袖，真是太幸福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人劳动了两个多小时。

劳动结束时，毛泽东刚放下铁锹，身边一名解放军战士余秉森马上脱下一件衣服，把它包起来，激动地说：“我要把这把锹好好保管起来，以后一看到这把锹，就会想起毛主席，我的干劲就会增加几千斤！”

毛泽东的劳动精神完全感动了这位战士。他此举完全是毛泽东的“劳动粉丝”了。

6点20分，太阳从西边的云缝中射出一道一道金光，整个工地分外美丽。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登上了汽车，工地上成千的群众依依不舍地和他们挥手告别。汽车启动时，工地上机器响得更欢，“一定要提前修好十三陵水库”的口号声响彻山谷、云霄。

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的消息传出后，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大干快上”的跃进浪潮。

各地群众纷纷参加冬修水利的大战。1958年11月18日，海河

拦河大坝合龙，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接着，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九年，于1969年7月竣工。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这些工程加上那些遍布全国、大大小小的水库，主要是靠人力完成，然而，它们星罗棋布，极大地改善了全国的水利面貌。

在大修水利的同时，各地修筑公路也是“大干快上”的内容。

旧中国交通闭塞，乡村更是羊肠小道。在各地，几块石板铺设一米左右宽的石板道是官家驿道，老百姓没有权利行走。丘陵和山区的人们，由于没有通畅的道路，出门便要爬山越岭。交通难，极大影响经济的发展。各地群众“战天斗地”，修道筑路，也是冬闲不闲的战场。一时之间，各地都是劳动大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原来的古老驿道被宽敞的沙土公路所代替……

旧中国在73年间仅修筑公路8.07万公里。共和国现有的水库和沙土马路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的。以后的柏油马路、水泥马路大多是在这些沙土马路基础上进行拓宽、铺设的。从难度上来说，修筑沙土马路比把它们进行扩宽和铺设柏油、水泥的工程难得多。因为五六十年代高山劈路，水上架桥，全靠的是人力、畜力，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机器作业，其艰巨性可想而知。然而，在“人定胜天”的干劲下，到1976年，中国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全国的马路网就此基本建成。有网友感慨说：“新中国的交通业的发达，离不开毛泽东时代的基础。前人在没有路的基础上劈山开路，一没挖土机械，二没运输车辆，唯一的机器，就是工地上临时安装的一个播放革命歌曲的大喇叭，全靠人力手挖肩挑，更难，更不易！靠的是意志力，靠的

是干劲,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在历史上,在全世界,都难找出一个可以比拟的例子。”

确实如此。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不仅修筑了水库和沙土公路,多数铁路也是战役时期兴建的。在1958年初,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和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的基础上,8月,全长1000公里的包兰铁路通车;1959年2月7日,全长605公里的黔贵铁路正式通车;1960年1月1日,全长1315公里的兰新铁路通车。而旧中国仅修筑铁路2.18万公里,还只是中东部发达地区,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千万劳动者不分日夜的大奋战,大建设,用简单的体力劳动却确实改变了中国基础建设的落后面貌,使得许多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从无到有,并且逐步形成体系、网络,从而奠定共和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因此,如果借否定“大跃进运动”而否定这个时期千万劳动者战天斗地,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自力更生奋斗精神和为此付出巨大劳动和汗水,是无视这段客观历史的。

因为,这正如南斯拉夫人所说:“大跃进就是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在任何外国都是难以想象的)克服经济不发达状况的一个尝试。”^①

因为,这正如美国人所说:“1958年起,中国的工农业格局在名为‘大跃进’的运动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②

①《路透社驻北京记者评述:毛主席立下了丰功伟绩》,载1976年9月12日《参考消息》。

②《南斯拉夫〈阵线〉杂志评论〈当代中国的奠基人〉》,载1976年9月29日《参考消息》。

不管“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评价如何，这段“尝试”和“变化”在中国乃至世人心目中却是久久难以抹去的历史。

11. 库尔班大叔和毛泽东的故事

毛泽东的国家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大型的方略，是全国一盘棋。他不是自己老家在东部就只发展东部，老家在西部就只开发西部，自己是汉族就只重视汉族，自己是满族就唯满族为老大，而是把全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北部、南部一并进行统筹、全面建设，把汉族、苗族、壮族、蒙古族、布依族、朝鲜族、维吾尔族……所有的民族皆以一个整体来一起发展。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法是：“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① 在新中国成立后近十年来，落后的西部和西南等地以及诸少数民族，发展得十分快捷，生活也逐渐变得美好。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少数民族发生的这种喜人变化，有一首优美的新疆民歌以别样的方式记载下来。那就是《库尔班大叔喜洋洋》：“库尔班大叔喜洋洋，赶着毛驴叮当响，绿葡萄，红苹果，一筐一筐往上装，蹄声洒一路，歌声满天涯……”

这首歌曲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曲调，讲述的是一位如同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小说中的“名人”——“堂吉诃德”式的中国新疆维

^①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吾尔族一位老人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段浪漫故事。这一首歌曲吟唱了毛泽东民族发展方略的成功。

新疆和平解放后，毛泽东非常重视那里的发展，据赛福鼎·艾则孜说：“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示我们说：‘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①新疆一解放，毛泽东就下令把入疆的解放大军就地组成建设兵团，转化为垦荒大军，在当地发展农牧业生产，并派遣干部参加当地社会改革，带领新疆各族人民开展土改，使得少数民族人们拥有了土地。并且，援疆大军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边疆，支援新疆的各项建设，推动边疆发展。在毛泽东亲自掌舵下，新疆各民族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使得新疆的发展航船躲过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暗礁，顺利向着理想的彼岸航行。近十年来，新疆各地羊群扩大了，农业生产上去了，公路也修起来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族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生活好了，各族人民没有忘记是毛泽东、共产党使他们变成了国家主人，引领他们走向了幸福之路，为此纷纷用自己最美好的言词和超出人们想象的举动，来表达对恩人的感激之情，一度新疆各民族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

让天下的森林都变成笔，
让天下的海洋都变成墨，
让天下的人都变成诗人，

^①《毛主席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赛福鼎·艾则孜著，见《缅怀毛泽东》（下），第33页。

也写不完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

新疆于田县托格日尕孜红旗公社的农民库尔班·吐鲁木就是这样一位懂得感恩的维吾尔大叔。库尔班大叔，严格来说，应该叫库尔班大爷，因为他已年过七旬，是位饱经风桑的老人了。他为什么如此对毛泽东、共产党感恩呢？这与他过去的人生和经历有关。

库尔班生于大清时期的1883年。在解放前，他家祖孙三代给巴依（地主）当长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祖父活活累死在巴依的庄园。父亲给巴依当长工，穷得无一席之地。库尔班本人就生在巴依家的牛棚里。两岁时，父亲因为欠巴依的地租遭到毒打，不久离开人世。5岁时，母亲又遭巴依婆的毒打，含恨死去。他的哥哥给巴依放羊时，因肚子饿爬到树上吃果子，被巴依吆喝惊吓，掉下树给摔死。姐姐被城里人抢去做小老婆，后来也被折磨致死。全家六七口人，几年时间下来，却只剩下孤儿库尔班一人。8岁起，他给巴依当长工，勉强活下来，但也受尽了打骂。20岁时，他和巴依的女佣相爱结婚。为了挣脱被奴役的生活，他们逃到荒漠中，靠吃野果生存。但是，远离人世的生活还是弄得他妻离子散。最后，他本人不得不独自在山野中生活，过了整整17年的野人生活。

1949年年底，解放军来了，共产党推翻了巴依阶级，消除了民族压迫。67岁的库尔班下山后，在土改中分得14亩地、一处房子，还有一头驴。他高兴万分，逢人就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有了土地，库尔班大叔过上了好日子。然而，心地善良的他感情朴实，深知幸福生活来自“恩人共产党、毛主席”。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久而久之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见见“救星毛主席”。可“救星毛主席”是谁呢？他并不知道，结果先是把在托格日尕孜工作

的汉族干部当作了“救星毛主席”，拎着甜瓜，跑去探望。汉族干部告诉他说：“我自己不是毛主席。”

“那毛主席是谁呢？”库尔班大叔失望地问道。

“他在北京，是各族人民的领袖！”

“那我如何见到他？”

“我们于田离北京太远了，只能写信！”

于是，库尔班大叔当场委托汉族干部当翻译，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了信，忆过去的苦，思如今的甜，感谢恩人。

信笺发出后，中央办公厅还真的给他回信了，鼓励他好好劳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还寄来了一张毛泽东的照片。库尔班大叔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他把毛泽东的照片挂在屋子正中央，天天仰望着它说：“全托您老人家的福，您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可是，这样天天“看照片”，并不能止住他去见“救星毛主席”的渴望，越想思想越深。1956年，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念头，开始准备礼物，打算去北京见毛主席。等到金秋10月，果实收获好了，他便戴上小花帽，拿着地毯、杏干、葡萄干、哈密瓜、玉米等礼物，告别乡亲，骑着小毛驴，启程去北京“看望恩人毛主席”了。

可他哪知道北京到底有多远呢。

小毛驴身上的铃铛叮当作响，一葫芦水和一袋干馕背挂在毛驴背两旁。老人满面幸福地骑在毛驴背上，向东方走去。他不知北京有多远，世界有多大，也不知前方的道路有多难走，只怀揣着一个信念——去北京，去见“救星毛主席”。

路上，有个驼队告诉他说：“到北京去，要走40个沙漠、40个戈壁，翻40座大山，过40条大河。”他并没被吓倒，反而更鼓足了干劲，飞快地往前走，准备跨越这一个个“40”难关。

库尔勒骑着小毛驴上北京的消息很快被当地政府知道了。于田县委书记马上就急了，跺着脚说：“这么远，哪里去得了！赶紧叫李常委把库尔班大叔追回来！”

李常委来不及准备，骑马赶去。在半道上，他拦上一辆军车，驱车急赶。这样，好不容易，他才撵上快乐的库尔班大叔和他叮当作响的小毛驴。军车追上去后，他跳下车，拦住小毛驴，急切地说：“大叔，北京太远了……你去不了！”

库尔班大叔弄明白李县委的“意思”后，却有着自己朴实而天真的执著想法，大声地回答说：“李常委，谢谢你好心的劝说。不过，北京在地上。只要我的小毛驴不倒，一直走下去，就一定能到北京。”

“要走40个沙漠、40个戈壁，翻40座大山，过40条大河……”

“李县委，你说的我都知道，北京再远，过的沙漠和河流再多，嘿，我的小毛驴也走得到。”说罢，库尔班大叔继续打驴而去。

此时，大叔已经73岁了。他有着维吾尔族人的质朴、执著，也有着老人的可爱和固执。而他这种浪漫天真而又坚决的决心，叫李常委忍俊不禁，又不得不心生敬意，但他知道大叔这样走下去肯定是不行的，坚持说：“在沙漠中，你肯定要渴死饿死的！”

“我不会。”

库尔班大叔催赶着小毛驴，还撒开了蹄子。李县委不得不跑步追上去，好说歹说，但还是劝不下执著的老人。最后，他不得不站在路中央，严肃地说：“我以县委和党组织的名义下命令你回去。”

除了毛主席，库尔班大叔还敬重一位恩人，那就是共产党。此刻“县委和党组织”都下了命令，他的脚步终于停了一下……就这样，李常委把库尔班大叔半劝半拉，带回了家。

这次半路上被截回来了，库尔班老人虽然没有走成，但并没有歇下此心，相反，他从李常委那里获知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

要去北京，一定要坐汽车才能到达，小毛驴是走不到的！可哪里有汽车去呢？

这难不倒他。

以后，他天天到大路上挡过路的汽车，要求驾驶员们把他带到北京去。

自然，他天真的想法实现不了。

不久，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到于田县检查工作。县委专门向他汇报了执拗的库尔班大叔的这个情况。王恩茂感动了，说：“我要见他！”

他亲自驱车赶去托格日尕孜。结果，在半路上，正好撞见正背着大馕拦车的库尔班大叔。王恩茂立即下车，接见他，称赞了他，并且劝告他说：“大叔你别拦车了，这样很危险的！”

“做什么事情没点危险哩！去见救星毛主席，我冒点险，没有关系！”库尔班执拗地回答。

王恩茂没办法了，只好说：“你先在家乡搞好生产，安心劳动，做乡亲们的榜样。等有机会，我一定让你到北京去。”

这话很管用，库尔班大叔听从了。以后，他在合作社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处处带头，事事认真负责。但在努力劳动的同时，他要去北京见恩人毛主席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隔一段时间就托人给毛泽东写信，并寄去干果，表达一位翻身的少数民族农民迫切见到救星的激动心情。中央办公厅也先后四次给他复信，再次给他寄来毛主席的照片。这些都给他极大的鼓舞，使他把冲天的干劲放到农业生产上。

然而，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王恩茂书记答应的话一直没有兑现。库尔班大叔终于决定“不等他”了。1957年秋，他再次把新收获的瓜子、桃干、杏干、葡萄干选了又选，仔细打成包，挂在房梁上进行

风干，十天半月拿下来看一看，拍拍土，又原样挂在房梁上。他准备带上干饷拦汽车上北京去。

县委书记闻讯，不得不再次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再等一等，答应一有机会就第一个带他上北京。随后，县委再次向王恩茂专门作了一次汇报。

1958年5月，机会终于来了。

上级决定和田地委从地直单位和各县选派189名优秀农业社主任、技术员和劳动模范进京参加全国农具改革展览会。在各个部门的关照下，库尔班大叔终于被选进了参观团。

当他得知可以随参观团去北京见毛主席时，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常常半夜起床，将准备送给毛泽东的礼品翻来覆去，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出点差错儿。和田地委派参观团秘书武诚专门来看望他，帮他做一些准备工作。他领着武诚看了要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急切地问：“何时能去北京？”

“快了。”武诚告诉他。

大叔朝他由衷地笑了：“嘿嘿，我终于可以去北京见救星毛主席了。”

很快，新疆参观团启程去北京了。

经过了数天的汽车旅行后，到达了尾亚，众人转而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库尔班大叔非常兴奋，火车每到一站，都要向人打听：“是不是到了北京？”

“还远着呢，不过快到了！”武诚也同样兴奋地告诉他。

参观团在河南郑州需要转车时，不识字的库尔班大叔见到郑州繁华的街道和高楼，以为到了北京，下车后就唠叨着说要去见毛主席，走着走着，结果掉了队。后来，在铁路警察的帮助下，参观团才将他找了回来。

6月18日，列车终于到达了伟大的首都——北京。参观团在宾馆住下后，团长就向中央民委递交了自治区党委和和田地委请求毛泽东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库尔班·吐鲁木的报告。中央民委和中央办公厅联系后，答复说：“毛主席的工作特别忙，接见活动要等几天。”

在参观农具改革和等待接见的日子里，库尔班大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别人以为他生病了，要请医生来诊看。他说：“我的病医生看不了。”

“咋病还有北京的医生治不好？”

“不用。见了毛主席，我的病就自然好了。”大叔回答说。

为了尽快见到毛泽东，他托人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然后悄悄跑到邮局去寄，问邮局工作人员：“寄什么信最快？”

邮局工作人员顺口告诉他说：“航空信最快。”

“那就寄航空信吧。”

他真的要在北京寄航空信给中南海的毛泽东，恳请他抽空早日接见他。邮局人员获悉他要寄往中南海时，告诉说：“普通的信件就可以。”他才没做出让人捧腹大笑的“傻事儿”来。

6月27日下午，新疆参观团接到了中央办公厅通知：“28日毛主席接见参观团全体成员。”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高兴，不少人跳了起来。当晚，洗衣服的洗衣服，理发的理发，兴奋之余，白天参观的疲劳早已散尽。库尔班大叔更是处于亢奋状态，对谁都笑嘻嘻的，见谁都想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做什么好。于田县的同志帮他将衣服洗干净，连同他的红布腰带也洗得一尘不染。大叔呢，在住处高兴地跳起了民族舞。

晚上，很多人躺在床上睡不着，有手表的不时起来看表。库尔班大叔更是一夜未合眼，把带给毛泽东的礼物放在床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沾上一丝尘土，细心的他还用外衣盖上哩。他不止一次

地起床，看着天上的月亮，盼着天快点亮起来。

还是凌晨的时候，参观团的成员就不约而同地早早起了床。库尔班大叔更是心急火燎，将本来很干净的长衫拍了又拍，抻了又抻，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慢……

上午12点左右，大家终于乘坐中央民委的大客车，到达了毛泽东等人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

在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前，有一块专门接见群众的小草坪，绿草如茵，好似一张绿色地毯。在工作人员安排下，库尔班大叔和参观团成员们依次排好了队，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过了一小会儿，有人说：“毛主席来了。”众人抬眼看去，只见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朝他们走来了，边走边向大家招手致意。在场的所有人顿时情绪激昂，热烈地鼓掌，欢呼声一片。库尔班大叔更是按捺不住，好几次要走出队列去，都被旁边的人拦住。

毛泽东与朱德、林彪等人一起来接见新疆代表团。大家先一起合影留念。

照相一结束，毛泽东径直朝库尔班大叔走过来。大叔也快步走出队列，激动地大声高呼：“斯拉木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走到毛泽东面前，向他行了一个维吾尔族民族礼。毛泽东已伸出了大手。大叔紧紧握住伸过来的大手，紧紧地握着，久久不松开。他的心愿在这一刻终于实现了，只是语言不通，怎么也说不出来。

就在两人握手的动人时刻，“咔嚓！”新华社摄影师侯波按下了快门，记录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毛泽东似乎知道大叔“有话说说不出的难处”，叫来了翻译，然后详细地询问他的名字、年龄和生活情况。尽管参观团人数众多，两人握着手还是交谈了近十分钟。然后，大叔领着毛泽东来到一只藤条圆桌旁。桌上摆放着他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他通过翻译告诉毛泽东

说：“这是我于田县特地给你做的。”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他带来的土特产礼物后，用带着浓浓湘音的口气说：“谢谢你。”

库尔班大叔见到毛泽东收下了他从新疆带来的礼物，非常高兴，激动得浑身都轻飘飘的，几乎“醉”了。最后，他连自己是如何被代表团领回住地，都不知道。

让他没料到的是，他送礼物给毛泽东了，第二日，毛泽东也派人给他送来了礼物，并且还专门为他题了一幅字：“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这次上北京，是库尔班大叔 70 多年人生岁月中最幸福的一次远行。

8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摄影师侯波拍摄的《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照片。一夜之间，库尔班大叔成为了全国老幼皆知的人物。随着照片的发表，大叔不顾七旬高龄，要骑小毛驴到北京见毛泽东的故事，也传出去了。

若干年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库尔班大叔要骑小毛驴上北京的真举动与西方小说中一个童话般的人物——堂吉诃德多么相似——堂吉诃德一心要当骑士，骑着一匹瘦马，不畏艰险，行侠仗义，勇往直前。而库尔班为了感恩，要骑着小毛驴，去跨越 40 个沙漠、40 个戈壁，翻 40 座大山，过 40 条大河上北京——他们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老人，身上都洋溢着浪漫的理想主义气息，都为了心中的信念而执著地甚至奋不顾身地去追寻，都是执拗的行动派。而他们的两个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坐骑是瘦马，一个是小毛驴；一个是童话，一个是现实。

现实的库尔班大叔之所以要骑小毛驴上北京，是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救星，带领各族人民翻了身，成了国家的

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因此，“堂吉诃德式”的库尔班大叔并非天真得荒诞和不可理解。他的执拗是因为新旧对比，现实生活太美好，是感情朴实、心地善良的他对党、对人民领袖的由衷感恩和热爱之情。

大叔堂吉诃德式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后来，有人谱写了《库尔班大叔喜洋洋》歌曲、拍摄了《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电影，他和毛泽东“握手”的场景还被创作成了到处张贴的年画。“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通讯和照片还被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

库尔班大叔爱党爱领袖，又勤奋劳动，和这个时代先进人物一样，是来自于普通群众的时代典型，由此，他也成为维吾尔族群众追求进步、民族团结的楷模。毛泽东的接见更成为他积极劳动的动力。回乡后，他带领乡亲们投入新疆的工农业生产和建设。1959年7月，76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他再次随新疆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1日在天安门再次见到了心仪的领袖毛泽东。

当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大叔真是幸福得快晕了。

回到家乡后，乡亲们问他：“毛主席说啥了？”

听不懂汉语的库尔班大叔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挥着帽子问：‘这是谁的帽子？’广场上的人都争着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乡亲们问他：“在北京见到啥稀罕物了？”

他告诉说：“在北京动物园，看到了毛驴子（其实是斑马），它穿着海军衫，以为我不认识它。我还是把它认出来了。”

虽然库尔班大叔因为听不懂普通话，闹了不少笑话，但这次上北京仍是他一生中最感到光彩和幸福的事情。

这次新疆代表团在北京国庆观礼期间，毛泽东专门会见了新疆

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和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听取了他们关于新疆工作的汇报，再次指示说：“在新疆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为此，首先要搞好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这里的关键是要搞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为了三个“搞好”，毛泽东用手指着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你（指王）要做好汉族干部的工作；你（指赛福鼎）要做好民族干部的工作。”

事后，赛福鼎·艾则孜对此由衷地感叹说：毛主席“真是苦口婆心，谆谆教诲。”^①

而对于库尔班大叔“堂吉诃德式”的天真举动，他是这样评价说：“这是多么感人的言行！它完全是维吾尔人民纯朴感情的表露，也是对毛主席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回报。”^② 其实，这何尝不是维吾尔族人的儿子赛福鼎自己的心声呢？！

毛泽东与新疆的关心伴随库尔班大叔的一生，他们之间的佳话没有就此画上句号。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老农民库尔班大叔更加老当益壮，在和田带领乡亲们大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1968年，80多岁高龄的大叔还担任了和田地区革命委员会成员、于田县委委员，于田县红旗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73年10月，在毛泽东的关怀下，90岁的他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委员。1975年，他又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只是因年岁太高未来北京出席大会。5月26日，库尔班老人在和田家里去世，终年92岁。

^{①②}《毛主席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赛福鼎·艾则孜著，见《缅怀毛泽东》（下），第34、第36页。

库尔班大叔与毛泽东交往的这段佳话，是毛泽东少数民族政策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和对各族人民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两位当事人去世几十年后，人们仍不能忘记这个浪漫而又感人的故事。1995年新疆于田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县城显著位置建造了《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大型塑像；2003年又在大叔的家乡于田县建造了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并被命名为和田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浪漫的堂吉诃德”——库尔班·吐鲁木成为了毛泽东时代民族关系的象征——这个传奇的故事不但表达了库尔班·吐鲁木和新疆人民与毛泽东心连心，同时也表达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民族政策的正确、伟大。

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库尔班，从古至今，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也不曾发生过这样动人的故事。这样的人间奇迹，只有毛泽东才能创造出来。

因为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芒没有遗漏56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人。这正如赛福鼎·艾则孜所言：“回想起来，40多年来，我能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这和毛主席的关心、教育和培养分不开的。”^①

^①《毛主席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见《缅怀毛泽东》（下），第23页。

12.“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消灭血吸虫病的“血防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当时间进入1958年夏时，这场持久战终于如同当初历时八年的持久战——抗日战争一样迎来了胜利的时刻。

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文章。该文报道江西省余江县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

虽然是第三版，但这些喜讯还是被许多人发现，拍手称庆。这则消息，也被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在当晚看到，并且让他激动不已。

该文章说：江西省余江县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原有6000多名病人，钉螺面积达到97.2万平方米，近几十年死于血吸虫病的人达3000名之多，有的村子几百户人家只剩下区区几十户、十几户，万户萧瑟。1956年春，毛泽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传达下来后，结合实施农业发展纲要，余江县委紧急动员，制定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指挥，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掀起消灭血吸虫病的热潮，于是乎，全县干部群众千军万马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新田。当农田修好了的时候，6000多血吸虫病人也全部治愈。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创造了完全消灭血吸虫病的人间奇迹，疫区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出现劳力增强、产量提高、人畜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人无病，社员们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上了台阶。

这正是毛泽东所一直希望的。

自从当初上海第二次血防会议后，各有关部门把防治血吸虫病作为一项工作任务来抓。全国各血吸虫病流行区从1955年底和1956年春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

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第三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的通知》。在通知中，毛泽东强调要求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并定期向中央作报告。这些指示和通知有力地推动了血防战的深入开展。

毛泽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抓住不放，不走岔道，一抓到底。但他又不是蛮干，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继续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和科学方法。1957年初夏，他在上海视察时专门接见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我国流行病学重要奠基人、血吸虫病防治专家苏德隆。毛泽东询问苏教授道：“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

苏德隆说：“不能。”

毛泽东又问：“五年呢？”

苏德隆说：“也不能。”

毛泽东又问：“那七八年呢？”

这时旁边有人杵了杵苏德隆。苏德隆回答说：“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

毛泽东迫切希望马上就消灭血吸虫病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但他还是没有去蛮干，给人限定时间，限定期限。

在此期间，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成立了，并且提出“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而这时消灭血吸虫病有三条途径：一是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而死亡；二是

科学处理粪便，切断血吸虫繁衍传播途径；三是消除疫水和钉螺密集区，人畜只要不接触疫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其中，消灭钉螺是最有效的防治办法。为此，县委和血防小组发动学生、工人、农民，每人带一双筷子一个小桶到疫地捡螺。除捡螺外，还组织人员用茶子饼、硫酸铜、巴豆等药物进行杀螺，但此举试验效果不理想。钉螺只比大米粒稍大，藏在阴暗潮湿的草滩或沟渠边，繁衍能力极强，一对钉螺一年可繁殖 25 万只，因此要彻底消灭它非常困难。有人想起 1955 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看到浙江卫生实验院《1954 年报》上面登载的一篇《土埋杀灭钉螺的现场实验》文章，其中说实验结果表明，土埋三个月后，减少钉螺近四分之三。有了科学依据，余江人开始轰轰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是“开新沟，填旧沟”：先清理沟岸塘畔的荆棘，铲出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 15 至 20 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然后从无螺区运来旱土，换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填一米厚，再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做上标记，三年内土不翻动，也不耕种；开新渠时，与旧沟保持一定距离。全县 15 个乡 4000 多个民工展开劳动竞赛，奋战三个昼夜，完成预定五天的任务，一共填埋大小旧沟 51 条，全长 3.5 万米，填平水塘 110 口。同时，治疗血吸虫病的医疗工作也得到扩大。参加灭螺的人大多得过血吸虫病。人们查出来有血吸虫病，立即去治疗，治好了马上回工地灭螺。工地上流行这样的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群众参加灭螺工作的热情非常高。

从 1955 年冬到 1958 年春几年间，余江县共发动 3.6 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 300 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 500 多个旧水塘；填平老沟 347 条，长 191 公里，开新沟 87 条，长 167 公里；填旧塘 503 口；搬动土方 416 万立方，终于把钉螺消灭得差不多了。

1958年2月7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转批了中央和江西省联合调查组呈报的《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余江县委又发出了“乘胜追击，苦战三十天，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口号，将全县划分为六个“战场”。各疫区纷纷贴出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7000名民工再次上阵，三个月内，光是填的旧沟，就可以绕余江县两周。5月10日，《江西日报》第三版头条发表《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介绍了余江县的灭螺经验，宣布余江县通过开展“最后的歼灭战”，取得了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实现了疫区人民多少年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夙愿。

5月12日至23日，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全省抽调37个专业技术人员前去复查。5月27日，专家小组审议并给余江县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余江县党政领导在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措施的方针指导下，发动了群众，进行了反复斗争，通过全面复查，证明该县已根除了血吸虫病，特予鉴定。”

6月5日，卫生部给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来了贺电。

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一文。原来让人们无可奈何的大肚子病，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上下总动员，终于在余江县被彻底消灭了。这是何等喜人的消息！毛泽东看到这则消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早在4月份，他在广州与卫生部副部长朱琏、医生高敏谈论中西医的时候还专门谈起了治疗血吸虫病的问题。当朱琏谈起了用中医针灸治疗疟疾的事时，毛泽东却想到了血吸虫病等，说：“你讲一讲针灸除疟疾和痢疾之外，还治疗过哪几种传染病。”

朱璉举出流行性感冒、流行性乙型脑炎，并告诉说：“针灸和中药配合，可治小儿麻痹症、黑热病，治血吸虫病时针灸还能解除锑剂中毒。”

说到血吸虫病，毛泽东立即打断她的话头，问道：“锑剂中毒有哪些症状？肝脾肿大、腹水，是大肚子吧？你们怎样参加这个工作的？”

“1956年中医研究院以针灸研究所为主力，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队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多，发现锑剂对血吸虫病有特效，但不论注射与口服都有毒性反应，病人会发生呕吐、腹痛以及心跳不规则等症状，甚至有晕倒的。”朱璉说，“用针灸治疗则可以很快控制这些症状。”

毛泽东的兴趣更浓了。朱璉说：“现在这个方法还没有宣传推广，我们计划再派针灸组去安徽工作。我个人曾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单用针灸治疗血吸虫病早期症，如果行的话，不仅可以节省锑剂，而且可以解除锑剂治疗带来的副作用。”

毛泽东立即表态说：“你们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也应该那样想、那样做。我想，锑剂能治血吸虫病，也是属于破坏了血吸虫生存的条件的问题。”

然后，他若有所思地说：“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知道吧？它威胁着一亿人口的生命，侵占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周围地区都有，因此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

群众的疾苦和病痛是毛泽东最为忧心的问题。血吸虫病一直是他心头牵挂的大事。谁知广州谈话才过两个多月，余江县就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这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消灭这个肆虐人们多年的顽疾。毛泽东看着报纸，激动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一直在室内踱步

浮想。

这时窗外微风送爽。当旭日临窗时，他凭窗遥望着南天。这些年来，小小的血吸虫，深深地刺痛了一颗伟大的心，此刻这个残暴的“瘟君”终于覆灭了。这大大激发了毛泽东的磅礴之情。他要歌颂这一人间奇迹，走到桌边，欣然拿起毛笔，挥毫写下《七律·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他一挥笔就是七律两首，而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欢快和欣喜，兴奋之情可见一斑。其实，与其说毛泽东是为消灭了血吸虫病而高兴，不如说是他是为人民送走了千年的“瘟神”，从此他们少了一种病痛而欢呼。

瘟疫一直是人类挥之不去的魔鬼，英国史学家纪考莱称之为“死神的忠实帮凶”。与血吸虫病的杀伤力可以媲美的另一个瘟疫，

是天花。公元 846 年，在入侵法国巴黎的诺曼人中间，天花突然流行。诺曼人首领惊慌失措，那些在战场上久经厮杀不知恐惧的士兵人人恐慌。残忍的首领为了不让它传播，下令杀掉所有天花患者及看护人员。这种一种可怕的手段，是残酷无情的办法。透过这血淋淋的事实，可见人类对于瘟疫的束手无策。而中国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一没杀人，二没花费巨大资金，仅仅用群众的智慧、用简单的人力方法就战胜、消灭了它。这无疑是人类医学防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或许战胜瘟疫的奇迹，在历史上也有过。就比如天花。18 世纪末，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从此人类对这个由比细菌还小的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有了杀手锏。然而，当时号称“爱民如子”的“日不落帝国”的女皇和大臣们，并无多少欣喜之色，更无“以诗言志”的记录，甚至伟大的医生琴纳在 74 岁离世时都没得到一个孜孜以求一辈子的大学教授头衔。两相比较，毛泽东不仅亲自布置和指挥这场消灭血吸虫病战役，而且不时会见医生、专家，进行咨询、鼓励。此刻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他又是何等喜悦和赞赏，连写两首诗词表达自己心情，这无意识的举动更显他潜意识中的爱民之心。

毛泽东《七律·送瘟神》诗篇发表后，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与血吸虫病作斗争的热情。全国各地人们再接再厉，向血吸虫病进军，夺取更大胜利。这首《七律·送瘟神》也成为了中国人和血吸虫病战斗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革命史诗。

若干年后，欧洲人是这样评述的：“由于有了毛泽东，中国便从一个分崩离析的附庸国家一变而为统一的独立国家，从一个孤立无援的大国的猎物一变而为大国之中最强大的国家。它摆脱了夺去千百万人生命的饥饿和使居民大量死亡的流行疾病，使中国人的衣食

有了保障。这一最基本的成果是一种历史性的胜利。”^① 确实，消灭血吸虫病，是中国人莫大的福音，也是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之一。

这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历史性的胜利”。

13. 南巡途中

1958年夏，在全国几乎是几夜之间，高指标和浮夸风刮起来了。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喜欢大建设，他鼓励人们去“战天斗地”，希望以此去摆脱贫穷，甩掉“落后”的帽子，他鼓励各地群众破除迷信，去解放思想，去敢想、敢说、敢干，但他对那些漫不着边际的高指标、浮夸是有保留和反对的，并且对那些异想天开的做法是泼冷水，投反对票的。

仲夏之际，毛泽东南下外出视察，到河北徐水、定县和安国看了，又到河南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接着又到了山东。在这几个地方，他主要是考察农业生产。8月10日，他来到了天津。

下午4点多钟，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人陪同，毛泽东头戴一顶草帽的，迎着依然灼人的骄阳，前去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

^①《新中国的缔造者》，南斯拉夫《政治报》（1976年9月10日），载1976年9月13日《参考消息》。

为什么去那里？原来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种试验田的号召，东郊区区长张福安在新立村抽调了 28 名社员和干部，组成试验队。这块试验田的土质原不算好，去年亩产只有 600 斤。今年他们遵照农业“八字宪法”，将地深翻了将近一米，施放粗肥五万斤，化肥 200 斤。精选优良种子，按密植的要求插了秧苗。为了便于加强田间管理，试验队全体人员吃、住都在地头，又赶上老天爷赏光，风调雨顺，禾苗长得异乎寻常的茁壮。经村党支部讨论，他们决定把这块试验田的计划产量，定为十万斤。《人民日报》驻津记者闻讯，赶到新立村采访，写了一篇报道，在《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上刊出。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报道。他对待工作，每到一处不光听汇报，都要眼见为实，这次来天津视察，便决定去那里参观，实地看看。

毛泽东等人到来时，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社主任徐树清、社支部书记王星元正在村口。见着毛泽东等人，立即三步并两步，迎上去握手，问主席好。

毛泽东随即便提出说去农田看看。

路旁小溪潺潺的流水正被引往稻田。稻田旁绿树成荫，田内刚刚吐穗扬花的水稻散发出阵阵清香。毛泽东和村干部边走边谈。走到一块稻田前时，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 10 万斤的试验田。”

“搞亩产十万斤有可能吗？”毛泽东当即表示疑问，摇着头，表示不相信说，“不可能的事。”

接着，他指着另一位干部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有人不以为然地说：“为了增加照明，我们用上了电灯为水稻照明，实行密植，用鼓风机吹风，亩产十万，是有根据的。”

“吹牛，靠不住！”毛泽东还是摇头，“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

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有人见毛泽东不相信，为了证明亩产十万斤，找来几个孩子，往早几日连夜移栽过来的“密植”水稻上站。但他还是不相信，喊着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

其实，毛泽东这么说，是他一贯的冷静思维的体现，尽管各地放了不少的“卫星”，他是不相信高产量的。7月3日，他看到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一份工作报告，欣然批示道：“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连“800斤”的指标都高了，何况于十万斤呢？可是，他不相信新立村如此惊人的“高产量”，令人奇怪的是，后来报纸上还是登出了该地“亩产突破十万斤大关”的“喜人消息”。

对于十万斤高产量的否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也有一段回忆：

1958年的一天，我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汽车驶得飞快，毛泽东忽然问：“高智，你相信不相信一亩地产十万斤稻谷？”我摇晃脑袋：“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

“你不要相信这些事情。”毛泽东吸燃一支香烟，沉思着说：“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此时天津市正在准备举办一个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展览会虽然尚未开幕，但馆内展出几百种产品都已经陈列在展台上了。

12日晚8点多钟，毛泽东等人提前来到了展览大厅，成为这里的首批观众。众人首先参观陈列发明创造的东风馆。毛泽东先看了天津拖拉机厂的热轧齿轮新技术，接着来到了国产矽胶的展览台。21岁的发明人、青年工人孙守纲激动地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弯腰伏在展台前，一行一行地看着各国的矽胶样品和质量比较表，看得非常仔细，得知这种硅胶吸酸能力超过英国和日本同类产品时，他赞扬说：“好！”

毛泽东对新产品、新技术都很感兴趣，在无梭织布机、电火花机床、七头绕线机等展品前，都驻足询问细看。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气筒质量超过美国”时，他笑着说：“气筒也在赶？”

讲解员介绍说：“这种国产气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接着道：“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看完东风馆，众人去看重工业、机电工业馆。天津钢厂总工程师向毛泽东等人详细介绍了转炉炼矽钢的情况。

接着，大家去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馆。

在化工馆，毛泽东对展出的玻璃布、人造革以及用人造革制成的雨衣、皮包、短大衣、皮鞋等产品都很感兴趣，看了又看，一一询问。很快，一幅红白灯光相映的玻璃画板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海水取宝”四个字，下列从海水中取出的盐、纯碱、烧碱等产品的名字。讲解员说：“海水里东西很多，永利久大沽厂今年准备从海水中提取金属镁、金属钠等多种产品。”

毛泽东笑了，说：“海水里有那么多金属，将来缺少金属，你们从海里取就行了。”

众人走进色彩斑斓的纺织和毛麻丝工业馆时，毛泽东顺着展台走，迎面一个青年人跑过来，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手。有人介绍说：“这

是研究不用染料染丝绸的青年技术员梁树楷。”

毛泽东问道：“你的发明在哪里？”

梁树楷便引着毛泽东走到排着一匹匹粉、浅黄、棕色丝绸的展架旁边，说：“这就是不用染料染成的。”

“颜色怎么不太多呀？”毛泽东说。

梁树楷解释说：“这是拿来展示的一部分，还有色泽更好看的，没拿到展览会上。我们还准备染出更多的颜色，到北京向您献礼。”

“谢谢你们。”毛泽东说完，便仔细询问染色用的原料，并且说：“我在报上见到过你的名字。”

梁树楷谦虚地说：“这办法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试验成功的。”

临走时，毛泽东再次同这位革新能手握了手。

在手工业馆，他参观了一台机身用木头做的土造车床，并且还试听了聋哑教话器。

参观了一个小时后，大家回到了展厅休息室，毛泽东关心地询问起天津工业的情况和问题。

李耕涛汇报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同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些困难。”

毛泽东指示说：“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

接着，他又问：“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来？几年能够建立起来？三年怎么样？”

刘子厚说：“现在开始向独立方向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毛泽东又关心地问专区、县的地方工业基础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来。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汇报了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其他地区上山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毛泽东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

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他对天津工业制造大型设备的工作也很关心，听说天津几个发电厂的修配工正在制造发电机，说：“这个办法很好。发电厂为什么只能发电而不能制造发电机呢？可以扩大一点，固定一些工人，成为发电厂附带的车间。”

休息后，毛泽东等人便来到了轻工业馆接着参观。

他看到放着各种彩花的口杯、花瓶和茶盘的玻璃器皿展台时，赞叹说：“你们好东西多得很啊！”

“有一种钢化玻璃，不怕摔也不怕炸。”讲解员说着，顺手拿起一个稍厚的玻璃杯，从一米多高的案子上扔到地板上，“当啷”一声，真的没有破！毛泽东看后，连连点头。

再往前走，他仔细看了棉籽综合利用与造纸总厂多种产品经营的图表，并仔细询问制造过程……

毛泽东对工业技术革命非常关心，对每一件新技术、新产品都很关注，足足看了三个多小时，参观到夜里11点多钟，他才结束了这次参观，上车离去。

第二日上午，毛泽东等人前往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参观校办工厂。

当他们驱车出现在南开大学的校园时，师生们立刻轰动了，到处人头攒动，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很快，校园里人挤人，欢声雷动。毛泽东参观了好几个校办工厂，化学系的“敌百虫工厂”、“离子交换剂工厂”和“硝酸钍工厂”。

等他们参观完毕时，外面聚集的人群太多，已无法走动了。

卫士长李银桥立即和天津市警卫处处长李侃商量，调来随行的一辆小华沙汽车，请毛泽东上车，以便离开。

华沙汽车很小，毛泽东身材魁梧，平时坐不进去。警卫员们急

了，硬是用力把他挤进了车里。小汽车从人群中开出来，驰向天津大学。

在天津大学党委办公室里，校长张国藩汇报学校的情况，主要是有关勤工俭学方面的，告诉说：“学校已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还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

“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毛泽东说。

接着，他问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元之：“天津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元之回答：“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搞起勤工俭学来了，60多所中学还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

“好啊！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毛泽东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刘子厚说：“有些人有顾虑，怕搞勤工俭学影响了教育质量，实际上搞了勤工俭学，学习才好。”

毛泽东笑着说：“河南省的长葛县已经有了证明，那里的学校有的搞了勤工俭学，学生学习成绩好，升学的很多；有的没有搞勤工俭学，学生学的不好，升学的少。”

就在这时楼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近万人。大家高呼、鼓掌，欢声雷动。声音传进办公室，打断了众人的谈话。毛泽东站起身，走到窗口，向大家挥手致意，窗下随之再次涌起一片欢腾，本来就激动的青年学生们更是按捺不住了。好一会儿，毛泽东才回到座位前，继续听汇报。

省委负责人说：“前几天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工作会议，

有 1000 多人参加，开了近一个月。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等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规划在 15 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使现在 30 岁以下的人，在那时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毛泽东听罢，说：“我想现在 15 岁左右的，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 30 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你们想得更好。”

将近 12 点的时候，毛泽东出来了，站在门外的平台上，与已等待许久的学生们见面。然后，他穿过人群的夹道，与随行人员走进校办机工厂，边看边与学生谈话。参观完机工厂，又去铸工厂，然后去一公里之外的硫酸厂参观。

当这些参观结束时，已是下午 1 点多钟了。毛泽东兴致很高，提出去吃饭馆。

毛泽东下基层，对吃饭很随便，不讲究，也不提出要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但做丰盛了会发脾气。这次破例提出去吃饭店，刘子厚等人很高兴，一商量，便决定去天津有名的正阳春饭馆吃烤鸭。于是，众人驱车前去和平区沈阳道的正阳春饭店。

毛泽东进屋后，先看望了厨师们。店家安排他们在二楼吃饭。

毛泽东吃饭一般都很快。别人没吃完，他就先吃完了。这次，他撂下碗筷后，便站起身，在楼上随便地走两步。

正阳春是一个有两层楼的饭馆。他起身走动时，经过窗口，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

谁知这一眼望出去，不打紧，随即引出一场大麻烦。饭馆对面的楼上，一位妇女正在晾衣服，距离很近。毛泽东这么一晃，眼尖的她一下就认出了，立刻脱口叫喊出声：“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声呼喊像一声惊雷，整个天津城都震动了。刹那间，人群像

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很快把正阳春饭馆包围了。所有的人都在拥挤着，欢呼着，越聚越多，堵满了路口，挤满了好几条街道。有人起身从窗子望去，门外到处都是人，交通完全陷于瘫痪，连交通警察也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在外面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这样的场面，让随同的警卫员和刘子厚等人着急了：因为毛泽东根本就没法儿下楼了。楼外的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也坐不住了，前后六次打开窗子，向群众招手致意，并且高呼：“人民万岁！”

结果，他一喊，群众越高兴，越喊：“毛主席万岁！”

这样，毛泽东等人完全被困在正阳春楼上了。他在喊过“人民万岁”后，不得不再去向群众招手。市长李耕涛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没有人听。他又转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只听下面迭声地叫。

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嗓子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毛泽东也出来喊话，想叫群众散开。可根本不行，他越喊，人们拥挤得越厉害。

结果，毛泽东和众人从中午2点多钟一直被困到下午5点多，都无法“突围”。

中央办公厅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说：“群众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看来出不去了。”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没办法，只好采取在南开大学用的老办法，把华沙牌小汽车想办法开过来。”

于是，天津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小伙子，战士们在前面奋力开路，硬是将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一步步推过来，推到正阳春饭馆门口。

汽车一到，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李家骥等人和警卫人员立即前呼后拥，保护着毛泽东，再次将他挤入小汽车。然后，警卫排派人在前面开路，后面派人推车，左右用人卫护，一步一步，硬是将汽车抬一般推出了人群。

在车里，毛泽东笑着，向人们挥动着手。

“突围”后，他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下不了的黄鹤楼噢。”

傍晚，毛泽东乘火车返回北京。到了近郊时，他在卢沟桥又下车，去了两个公社视察。

次日，有人告诉卫士长李银桥说：“昨日在正阳楼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收了七筐半。”

手表是此时人们很贵重的东西。

当李银桥把“七筐半”的事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问道：“群众没挤伤吧？”

“没有。”

毛泽东放心了，笑着说：“手表是宝贝啊，为了见我一面，把它丢了可划不来呀！”

李银桥忍不住感叹说：“天津群众对主席很有感情啊。”

这次外出视察，毛泽东看到了群众火热的生产热情和改变落后面貌的高昂斗志，精神面貌大大不一样，也深深地受到了感染，对“大跃进”放出的一个个“超级卫星”，虽然有所怀疑，但没有去批评，使得这场运动的热度更加升温。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无论走在哪里，都掀起一股股巨浪，甚至因为被围观而引起交通堵塞。这不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而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而这种自发的行为不是无缘无故的追星，而是现实的生活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伟大、崇高。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经济快速发展，使得人民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生活一日比一日变好的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任与日倍增。与此同

时，旨在改变落后面貌的“大跃进”运动也极大地振奋了人们的精神，许多人的内心潜藏着一股热烈的情绪，更加助长这种对毛泽东的敬爱之情。这个时代，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感情是难以言表的。一位叫阎彦的天津人描述自己在正阳春饭馆前见到毛泽东时的心情说：“人们立着脚尖，仰着脸，看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也举着双手跟着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用了最高的嗓门，但总还觉着自己的声音低。我的嗓子沙哑了，但我还是拼命地喊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表达出我内心的对毛主席的热爱。大家挤得紧紧的，真的把身子都挤成像一根‘细麻秆’了，狂呼的人们个个都激动万分，当时每个人的心情我用文字都表达不出来……”

的确，这是发自内心的爱戴，是最真实的情感。

而这种爱戴和情感，为什么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对自己的领袖从来没有过，只有在毛泽东身上出现？深究其原因，后来英国人麦克法夸尔总结说：“毛领导他的中国人实现了他们一百年来的理想：驱逐帝国主义，恢复中国的力量和自尊。”^① 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也有类似的说法：“毛使他的人民对自己和对国家有自豪感，有目的性和有新的道德，这在亚洲是无与伦比的。”^② 这大概就是根源。

①《英〈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百年来的理想》，载1976年9月19日《参考消息》。

②《加拿大报纸说：毛主席改变了世界和二十世纪面貌》，载1976年9月14日《参考消息》。

14.1070 万吨的钢指标是毛泽东一人的过错吗？

高指标、浮夸风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特征。然而，这并非是毛泽东一人之过。

“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各项高指标，貌似都是毛泽东的责任。细查他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的讲话，他批评过“反冒进”，说过“赶超”，说过“要鼓干劲”，但并没有要求提出过高指标或类似的话语。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超级产量的诸“卫星”，他不是始作俑者，但在南下视察中发现了，质疑过，而没有制止。而那些遥不可及的高指标（主要是 1958 年、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二五”计划指标），则不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后来在庐山会议中，毛泽东也曾说过，钢铁产量翻番是他提出来的，错误应当由他负责。这大概是与他最直接和有关系的高指标吧。

然而，就是这个钢铁高指标，细查它是如何提出来的整个过程，却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无辜”——不过是他勇于承担责任而已。

在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火热的情绪氛围下，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工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教育工作和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列了一个大提纲，要讨论的 17 个问题包括：（1）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2）今年铁、钢、铜、铝问题，（3）明年农业问题，（4）明年水利问题，（5）合作化问题，（6）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7）教育问题，（8）干部

参加劳动问题，(9) 劳动制度问题，(10) 570 万人去边疆问题，(11) 技术保密问题，(12) 国际形势问题，(13) 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4) 协作问题，(15) 深耕问题，(16) 肥料问题，(17) 民兵问题。

这次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党组负责人参加。由于各地日渐狂热的情绪，使得会议出现极为乐观的情绪。结果，会议对 1958 年的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 1958 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

对钢指标，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谈到会议要解决的 17 个问题时，说：“钢由 1957 年的 530 万吨翻一翻，达到 1100 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但在会议后期，对各项“指标”都已定调。眼看会议就要结束，把握全局的毛泽东却对这个高指标不放心了。

他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找到小会议室，一起开会。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及各钢铁大省、市许多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小会”。

在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 1070 万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由于不放心，他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他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

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安徽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

赵敏说：“可以。”

毛泽东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

他又问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原钢铁厂)：“行不行？”

太原市委书记姓麻，说：“可以。”

毛泽东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

麻书记回答后，毛泽东言归正传，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毛泽东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

刘彬告诉说：“我是刘英的弟弟。”

刘英是张闻天的妻子，是毛泽东的老熟人。毛泽东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

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

“就看你拿主意啦。”毛泽东说。

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袁宝华在冶金工业部具体分管主要管建设和计划，对这样过高的指标自然心中有数，用他后来的回忆说，此时的心情是“心里打鼓”。他估计毛泽东也会问到他，只得作些准备。随后，毛泽东果然问到他：“你做什么呢？”

“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袁回答。

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

“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袁宝华讲了“十面红旗”，毛泽东很注意听了，他虽然“心里打鼓”，但也没直接说出行不行，这样的“提醒”自然不能算是提醒。接着，毛泽东问到了钢铁“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

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此时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有疑问的没疑问的，都赞成这个目标。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是个好主意。”毛泽东说，“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万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万吨，翻一番是1070万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于是交代会议秘书说：“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

这次会谈，足足有两个钟头。他提出了钢产量，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会再次进行研究，结果大家都说行，所以他也相信了，并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在报纸上发表。

随后，他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万吨，看来还是可以的。”

陈云却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

“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账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账，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账。”陈云说。

袁宝华把陈云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再把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能力打了折扣算，时间还剩下五个月则按四个月算。算了细账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质疑的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对这个数字似乎还是不放心，又找陈云谈话。陈云告诉他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账，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陈云为人谨慎，说话一向很慎重，此句“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其实就是“完全可能”。这样，1070万吨钢铁指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若干年之后，袁宝华回忆此事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

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人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①

这就是北戴河会议确定1070万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这个1070万吨钢铁指标是不切实际的。而这个数字也不完全是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提出来的。6月6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这两天我们在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9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6月17日，薄一波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汇报性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批发报

^①此会和对话细节见《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袁宝华著，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21日，冶金部党组将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呈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中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工作。

毛泽东于次日批示：“小平阅。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6月27日，他作了两个批示：（1）“此件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2）“刘邓阅发。各省市用电报发去。军委会议，请克诚印发。”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克诚，即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可见，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提出的钢指标是在冶金部多次认为华北区能达到800万吨，全国能达到3000万吨钢铁的数字上，且批示给中央和地方众多高级干部阅看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提出“翻一番”的。作为国家重大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不可能把基层的任何情况亲自弄清楚，只能根据各个部门提供的情况和其他负责人意见进行民主和集中来决策。这个数字，不是他摸脑壳想出来的，完全符合一般的决策程序。其他高指标的制定，也基本上是这个程序，是由各主管部门提出来的。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现高指标出了问题后，毛泽东没有回避自己的领导责任。除在庐山会议上，他主动承担钢铁指标失误的责任外，还在党内通讯中提出，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本人要负责任，为此写出检讨书，要求发到全党。最后刘少奇压下没有发。在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但毛泽东没有就此而心安理得。1961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当着中央、省市、地委和县四级干部、7000多人承担责任，再次作了自我批评。有意思的是，尽管高指标的出炉很复杂，责任涉及许多干部，但在毛泽东去世后否定“大跃进”时，有人把1070万吨钢指标的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袁宝华后来站出来，中肯地说过“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的话。他还回忆道：“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哪里糊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①

对此，前副总理谷牧有如此回忆——1959年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

^①《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上），第331页。

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因此，把“大跃进”的责任归于毛泽东一人身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这次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13日，讨论了17个问题，于8月30日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八个文件，农业方面的九个文件，财贸方面的十个文件，教育方面的一个文件，其他方面的九个文件，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等。在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

他肯定了人民公社，谈了全民办工业问题，还不忘强调绿化和除“四害”工作。对于绿化，他说：“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副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

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没有树怎样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谈到除“四害”，他说的更加有意思：“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这次会议就在毛泽东“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的笑声中结束了。

随后，与会人员回到各自的省市区，传达了会议精神。各地掀起了如同当初农业合作化高潮时的人民公社化热潮，群众情绪非常高涨，到处是锣鼓喧天，社员们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大字报，要求办公社。

9月4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各省、区、市委（缺西藏）电话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办人民公社的情况。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向毛泽东报送的关于各地办人民公社情况的全国电话汇报会议的材料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次运动发展非常迅速，已办公社的地方，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河南已经全省实现公社化，河北、北京市郊区9月10日前可实现公社化，山西、山东、上海市郊区9月半可实现公社化，其他大部分省正在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展开，估计9月底前均可实现公社化。只有内蒙古、福建、新疆三个地方，9月搞试点，秋后铺开，计划到今冬全部搞完。据

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 9034 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除河南修武县外，山西、陕西、青海也有个别县实行一县一社。最大的社已达 6.4 万户（山西高平县），最小的不到 100 户（黑龙江一个公社，但方圆有八九十里）。

中国农村又迎来了一次体制的转变，转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不过，这次人民公社化与以前的土改或者合作化不一样，它几乎是在毛泽东没有设想之下突然来临，又快速实现的。

这些情况也改变毛泽东原来不相信的思想。9 月 5 日，他在第 15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 6 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为此，他乐观地说：“这一干的结果，粮食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 3700 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 3300 万担，今年大概有 7000 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1956 年中共八次大会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 1050 万吨到 1200 万吨，如果说 1050 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到 1100 万吨……今年如果搞到 7000 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 1.5 万亿斤……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 1 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 2000 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在一个星期前在北戴河会议闭幕式上他还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这个“一曰大，二曰公”的模式，他的思想也完全与以前的看法不一样了。9 月 8 日，他在第 15 次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讲话说：“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

概9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毛泽东也被下面那些浮夸的表象迷住了。所谓人言“三人成虎”，这句古话也有一定的真理性啊。

15.炮击金门：美国航空母舰吓不倒毛泽东

这场“大跃进”运动又与复杂的国际环境相关切着，是在外部形势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展开的。这主要体现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上。

毛泽东的强国梦是宏大的，包括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的统一。蒋介石占据着台湾岛，同胞分开，这一直是他所挂牵的事情。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通过章士钊等人向蒋介石发出了国共和谈的邀请。1957年初，经过一年多的考虑，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让他推荐和谈人选。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了三个人选，即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为何选择宋呢？因为他哥哥是蒋的黄埔学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在解放战争被俘后至今还在大陆功德监狱服刑。派他回大陆，可借探亲名义掩人耳目。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达北京。

这立即获得了中共方面的积极回应。

4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翌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外公布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大震动。

随后，周恩来亲自会见宋宜山，阐明了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主要内容为：（1）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3）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4）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也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个表态之后，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明确表示：“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他还表示：“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甚至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之后，负责台湾工作的周恩来就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说明。

几个月来，毛、周多次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了阐述，其要点有：一是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央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早与家人团聚的心情和愿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三是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坏。

谁知国共双方相互走近时，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美国人却不干。

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提出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12月起，美国中断已展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继而怂恿蒋介石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破坏，妄图通过制造既成事实，把台海两岸的分裂状况永久固定下来，使得台湾成为美国人在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而蒋介石以为依仗美国人，就可以打回大陆。结果，国共和谈，由于美国人插手，刚刚启动就又陷入了停顿。

尽管美国人言而无信，毛泽东还是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原来的协议，从1958年3月起，从朝鲜第一批撤军。而蒋介石有了美国人的支持，思路大转，从1958年起，不断出动飞机深入大陆内地，在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还在福建沿海地区派飞机轰炸。与此同时，还不断向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岛屿增兵，制造紧张局势。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蒋介石还是看错了形势。由于连接鹰潭和厦门间的鹰厦铁路已经通车，福建前线的国防运输能力大大加强。当他在金马“增兵”十万之众时，毛泽东终于作出了反应，批示国防部：“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3月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经过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讨论，拟定在7、8月调空军进入福建，并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至此，党中央明确提出了轰炸金门、马祖，警告蒋介石的设想。

3月8日，毛泽东阅看彭德怀的报告批示：“进福建事，同意你的意见，照那样作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他没有轻易激进，还在等候。

5月，美国在台湾成立“美军联合协防军援司令部”。6月30日，毛泽东指示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声明，限定美国在15日内恢复中

美大使级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次日，美国总统杜勒斯亲自发表讲话，宣称若中国同意更改会谈地点，美国则派驻波兰大使参加会谈。但除毛泽东外，还从没一个人对强大的美国“限定”过。杜勒斯也强硬地表示美国不会向中国“限定”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最后通牒”低头。

7月15日，毛泽东“限定”的最后期限到了，杜勒斯不仅没答复，反而在中东出兵黎巴嫩，干涉伊拉克革命。杜勒斯的霸道行径使得世界舆论为之哗然。美国出兵中东，偏安一隅的蒋介石大为振奋，于17日宣布进入“特别警戒状态”，加紧针对大陆的军演和空中侦察，趁火打劫式地要“反攻大陆”。

此时按照毛泽东未雨绸缪的安排，彭德怀和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已制定好了炮击金门的方案。毛泽东于是果断决定炮击金门、马祖岛，惩罚挑衅的国民党军，向美国示威，对蒋介石发出严厉警告。

7月17日，彭德怀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传达了毛泽东的“空军要尽快入闽，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的指示。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及空军、海军将领开会，宣布说：“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决定在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打击蒋介石，牵制美帝国主义。地面炮兵第一次打10万至20万发，以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打两三个月。两个空军师在炮击的同时或稍后转场到汕头、连城。”

随后，彭德怀连夜主持军委会议，对炮击金门做出进一步的具体部署：空军在27日转场，炮兵准备于25日炮击金门蒋军舰艇，封锁港口，断其海上交通。

20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的情况。到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成员，共44人。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叶飞

为首的前线指挥所。

叶飞受命后，立即从福州乘车赶往厦门，现场部署炮击金门行动。

就在金门作战即将开始时，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突然造访，向毛泽东提出苏军在中国沿海设立“长波电台”和建立中苏“联合舰队”的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随后，赫鲁晓夫亲自来华解释此事。中苏关系的横生枝节迫使毛泽东在开战前又不得不分散精力处理此事。

24日前，叶飞的作战部署准备就绪，只等毛泽东一声令下。

7月27日上午，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就把握打金门时机给彭德怀、黄克诚去信：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搞（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够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27日10时

叶飞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即找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兼任福建前线指挥所参谋长）和副政委刘培善商议毛泽东的意见。由于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19天降暴雨，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严重。部队在冒雨抢修，疲劳过度，疾病滋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工作尚未完成，海军入闽还在调动中。几个人经过研究认为，推迟炮击时间比较有利。叶飞复电彭德怀说：“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指挥空军加快转场行动。很快，海峡那边的国民党军发现福建有解放军飞机，梦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闻讯，来了个“先下手为强”。

7月29日，国民党空军飞机出动。毛泽东一日前所说的“最妙”的战机来了。11时7分，解放军航空兵18师师长林虎下令第54团大队长赵德安率四架飞机升空迎战。41分后，赵德安率领四架飞机安全着落。地勤人员向还在滑行的飞机跑去，赵德安举手伸出三指：三比零。机场上一片雀跃欢呼！

这次空战，出敌不意，从起飞到着陆才41分钟，战斗仅用两分钟，就取得了解放军空军“入闽作战”的首战胜利。美国合众国际社惊呼：“在台湾海峡上空发生了一场使国民党透不过气来的一对一、一边倒的三比零空战。”

第二天，毛泽东向刘亚楼、空军政委吴法宪祝贺说：“空军旗开得胜！”

几天后，解放军空军第27团进驻漳州，第3团进驻连城，第46团进驻龙田，海军航空兵第10团进驻福州。至此，彭德怀和叶飞在福建沿海一线布置了六个歼击机团，加上二线部队，共17个团，有米格—17、歼—5飞机共520架。

一切准备完毕。而蒋介石却还蒙在鼓里。

8月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获悉确切情报:中共方面准备炮击金门。蒋介石随即宣布:台澎金马地区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台海局势陡然紧张起来。但是,中共方面还是没有出手。

8月14日是国民党的“空军节”。蒋介石出动26架F—86战斗机袭击福建。当敌机黑压压地向平潭飞来。解放军空16师46团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俊山率队迎战。结果,蒋介石完全输了。从7月29日至8月14日,解放军空军击落击伤蒋介石美制战机九架,不仅取得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而且为大规模炮击消除了后顾之忧。

蒋介石的一再空袭,促使毛泽东终于下定了炮击金门的决心。

8月18日凌晨一点钟,毛泽东经过一夜的思考,在8月13日广州军区关于在深圳方向上进行演习的部署给军委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州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他还写道:“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决心一下,毛泽东才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当日,在福建的叶飞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让他立即去北戴河。他随即乘专机北上。当飞到徐州上空时,北边正下大雨,遇上雷区,无法飞行,只好绕道开封。谁知开封也是雷区,只得在开封降落。第二天上午,专机继续飞行。中午,他才赶到北戴河。

毛泽东正召集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黄克城、叶飞、萧劲光、陈锡联、王秉章、王尚荣、陶勇开会,布置炮击金门的作战,并已决定暂时不打马祖,集中火力打击金门。次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把叶飞叫到他的住处。

叶飞来时,彭德怀、林彪、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都在座。

叶飞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报

告了如何实施炮击的方案。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上。毛泽东边听他讲解，边看着地图。汇报完了，他突然对叶飞提出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

叶飞回答说：“美国顾问配备到了国民党部队营一级，那是打得到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道：“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

“那是无法避免的！”叶飞肯定地回答。

毛泽东没再问其他问题，也没作其他指示，宣布休息。

晚饭后，毛泽东叫王尚荣送给叶飞一张条子。叶飞接过一看，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林彪大概意思是：看到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我觉得，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我国驻波兰大使）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了蒋介石。这怎么行呢？叶飞非常吃惊，问王尚荣：“主席把这张条子给我看，有没有交代什么，是不是要我表态？”

王尚荣回答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既然毛泽东没要自己表态，叶飞也没说什么了。所谓军机不可泄露，提前泄露炮击时间，在战略上是犯军中大忌啊！

第二天，众人继续开会。毛泽东没提及林彪的建议，但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

接着，他看了看叶飞，说道：“你不要回福建了，就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老总一起住。”

叶飞有些紧张，心想：“我怎么好跟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啥意思？”说来也怪，彭德怀没让参谋叫他去一起住。王尚荣知道叶飞的难处，替他想了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他下住的房间，说：“福建前线直接与你通电话，你再通过我转告毛主席，主席的指示也

由我转告诉你。”

“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叶飞问道。

“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王尚荣说。

当晚，解放军调入福建的参战部队——包括 459 门大炮、80 多艘舰艇，200 多架飞机和各路人马全部到达了指定位置。

8 月 22 日，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第二天，即 8 月 23 日，毛泽东下令对金门进行炮击。

金门岛与马祖列岛，是国民党军伸入大陆附近的两个前哨据点，与台湾相呼应，控制着台湾海峡。蒋介石在金门岛设立了防卫部，辖 8.5 万多人。金门岛与厦门隔海相望，分大金门与小金门，东边为大金门，西边为小金门。大金门岛距厦门岛约十公里，小金门岛东距大金门两公里，西距厦门岛六公里。

这次炮击，由毛泽东在北戴河直接指挥。福建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替叶飞指挥。

下午 5 时 30 分，炮击开始。随着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解放军 400 多门大炮对准金门 30 公里海岸线，开始猛烈的炮击。往日寂静的厦门前沿，顿时滚雷四起。一发发炮弹，越过大海，直飞金门。炮弹在金门岛升起一朵朵棉花球似的又亮又白的烟团。烟团越聚越多，很快就汇成一片，接着又变成灰色的浓烟，岛上的浓烟与大火开始向四周蔓延，四周的海面和晴朗的海空很快就被染上了灰色。浓烟烈火遮住了视线。

万炮突然齐轰金门，金门守军措手不及。

在金门视察的蒋介石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和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璉正在招待所附近一块平地上对坐交谈，突然，大炮轰响了，数千

发炮弹呼啸而来。俞大维本能地蜷缩身体趴在地上，紧紧抓住胡璉的手臂说：“这里不安全，你跟着我走！”胡璉抬头一看，他已被弹片炸伤多处，血流满面。十分钟后，待炮火稍稀时，俞大维被两名宪兵搀扶着进入坑道，借微弱的烛光包扎伤口。当晚，这位“国防部长”就头缠绷带，手吊在脖子上，被人抬上飞机，紧急返回了台北。

而正在水上餐厅就餐的国民党军三位中将副司令就没这么幸运了——副司令赵家骧腰部被纷飞的弹片击中，不治而亡。另一副司令吉星文遭密集的弹片重创，急送医院手术后，弹片被逐一取出，接着调来一排兵献了3000毫升的血，伤情稍加稳定，院方认为已无大碍。不料腹中还残留一极微小的弹片未发现，三天后引发腹膜炎而亡。第三位副司令章杰之死是炮击次日黎明才确认。炮击过后，胡璉清点军官，唯独不见“三司令”章杰。至次日清晨，有人在水上餐厅附近发现了他的若干残碎遗物，并经其传令兵辨认，证实章杰确已死亡。

当日17时30分，在台北的蒋介石刚刚准备吃饭，收到金门遭受猛烈炮轰的报告。闻听此讯，已是七十古稀的他先是一怔，不一会儿眉头舒展，连说三个“好！好！好”，随即命令左右：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信求援。

原来，根据美蒋双方1954年12月4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如果解放军跨海攻台，美国就要根据上述条约出兵干涉。

午夜0时55分，张翼翔向北戴河报告了一天的战况：从敌方获悉，大担、二担国民党军伤亡70人；小金门敌军伤亡惨重，但具体数字不详；大金门敌人一片混乱，伤亡数字连敌方自己也搞不清楚；美顾问团20余人下落不明。我一线炮兵已撤下十多个营，阵地上还留下20多个营，共伤亡10人。

第二天下午，解放军继续炮击。

经过两次暴风骤雨式的轰击，共毙伤国民党官兵 600 多人。

这时，美国军舰还没动静。蒋介石发慌了，感觉台北待不下去了，连忙下命令搬家。“行政院长”陈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搬家的问题，要各部门统统搬到乡下去。远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闻讯，也是通宵睡不着觉，摸不清毛泽东此举意图，慌乱中判断：“共军”大规模炮击金门，决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了，立即命令驻在亚洲的美军快速完成作战准备，并下令从地中海第六舰队调出两艘航空母舰驶过苏伊士运河，加入台湾海峡的美军第七舰队。

次日，美国向台湾增兵。其第 13 航空队司令托马·穆尔曼对外声称：美国部署在台湾的飞机，如果接到命令，“以用来同中国共产党的飞机进行战斗”。几天之中，台湾海峡附近集结了美军 6 艘航空母舰（占美海军在役航空母舰的一半）、3 艘巡洋舰、40 艘驱逐舰、一个潜艇集群和 20 多艘后勤补给船只。有了山姆大叔的撑腰，刚受重击的蒋介石又壮起了胆，下令出动飞机，报一箭之仇。

25 日下午，国民党空军集中 48 架 F—86 战斗机，飞临金门以东沿海上空，摆开大战一场的阵势。为了引诱解放军空军到公海上空作战，8 架蒋军飞机飞到漳州上空作“诱饵”。解放军空军起飞迎战，飞行员刘维敏在无僚机掩护的情况下，同四架敌机鏖战，仅用八分钟就击落两架敌机。当他咬住另一架敌机正紧追猛打时，不幸的事发生，解放军地面高炮部队的大炮轰响起来，误击中了他的飞机。

消息传到北京，黄克诚受命召集刘亚楼及炮兵司令陈锡联开会。刘亚楼、陈锡联双双赶到福建漳州，通过总结教训，制定了空炮协同作战的原则。

8 月下旬，叶飞从北戴河返回厦门前线，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提出用空军轰炸金门。叶飞认为毛泽东没有作出立即登陆解放金门

的决定，事关重大，没有同意。但考虑到韩先楚是福建军区司令员，他的建议应该尊重，便决定把两人的意见一并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第二天，王尚荣打电话给叶飞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韩先楚便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有趣的是，在炮击金门过程中，解放军力求避免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美军更是如此。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中心线划了一条分界线，美机在上空巡逻飞行，严禁飞越分界线。但美机驾驶员往往发生失误，一旦越过分界线，地面管制站的军官便总要大骂：“你们这些笨蛋，不能越过分界线的。”对话被解放军福建前线监听站听得清清楚楚，让人哭笑不得。

毛泽东没出动飞机轰炸，美军也自划分界线，而蒋介石自恃有美军航空母舰壮胆，一心把战争扩大，把美军拉入战争，于是炮战形势变得更加风诡云谲。

此时大、小金门岛屿，包括金门唯一港口料罗湾及其海面，全部在解放军炮火射程范围内，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完全被截断。金门守军补给全靠台湾从海上运输。国民党军舰不断被解放军海岸炮火击沉击伤，最后，海上运输线完全中断了。金门岛上守军得不到弹药、粮食、燃料补给，频频告急。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粮弹补给。但是，国民党军负责运输任务的海军陆战队每次运输一点给养，也都是死里逃生，损失惨重。

9月4日，毛泽东等人以中国政府名义在北京向全世界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并且重申：“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

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这个声明是针对美国人的,且向美国当局表明了中国政府捍卫领海领空的严正立场。毛泽东有试探美国底牌的意思。这下美国人沉不住气了。当日,杜勒斯发表语气强硬的声明,重申“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福摩萨)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蒋介石这才吃了一颗定心丸。

金门岛炮声隆隆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苏联态度也很微妙。赫鲁晓夫担心中国行动扩大,导致美苏之间发生冲突。9月5日晚,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科夫面见周恩来。周恩来表示,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如果打出乱子,我们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次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来华。会谈中,周恩来再次表示,我们已做好了迎击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的局部战争,包括核袭击的准备。随后,毛泽东会见葛罗米柯,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而这位苏联部长却特意带来了核试验的纪录片,请中国领导人观看。毛泽东看后,淡淡地说:“中国人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人胆敢施行核打击,中国就把政府迁到延安,然后继续斗争。”他如此坚决的态度,让葛罗米柯大吃一惊。

毛泽东等人不怕航空母舰,也不怕核讹诈,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可见一斑。

当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分析了炮击金门以来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政策”:“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

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绳子绞住了。”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谈到他的“绞索”政策，说：“至少美国是被动的。它仓促调兵，有一个航空母舰，是从菲律宾调来的，还没有到，有些是从夏威夷调来的，有些是从日本调来的。它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去登金门，它是被那个索子把它套住了，使它难办。台湾是一根大索子把它套住，金门、马祖也算一个索子。我们这个蒋委员长，就是有那么多兵，他搞三分之一的兵力11万人在两个岛上，其中9.5万人在金门岛，1.5万在马祖岛。而金门岛三面在我们炮火包围中。金门距我们只有三公里。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港，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塞住了。这个东西得整它一下。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

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继续说：“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了，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我还是暂时不去，你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你不打它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它感觉到痛了，它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它就不谈。他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撤退金门、马祖，但是他又不撤。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那我就可以不打了，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他的土地也就不大了。”

毛泽东的诙谐话语逗得会场又是一阵笑声，他自己也笑了，接着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你现在不撤，我们反正老是打，我可以隔几个星期或者隔几天打那么一次，或者隔个把两个月打一次，一打就是几万发炮弹，或者每天打点零炮，打个什么一百发两百发炮弹。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

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个东西总不可以吧？！在座诸公，可不可以？原则上总不行吧。至于解放，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一定要在哪一年哪一月解放。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

随后，毛泽东下令，三天之内不打炮，看一看美国要干什么。

谁知这时美国军舰却为国民党军舰“护起航”来了。9月7日，美国军舰和国民党军舰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国民党的军舰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舰相隔只有两海里，从台湾向金门开来。解放军从雷达屏幕上看得一清二楚。美军已经卷入了，怎么办？还打不打？如果大炮一响，势必会连美舰一起打，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叶飞不敢做主，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并且请示打不打。

毛泽东回答说：“照打不误。”

叶飞又问道：“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

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接着交代说：“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你们每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

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叶飞又一次问道：“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回答得很明确：“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命令是由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叶飞接到电话后非常吃惊，担心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又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

“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

叶飞总算明白了，但感到压力很大，要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相

距太近，如果哪一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中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这倒好办，不予还击就是了。为了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他亲自向前线的第31军及各炮兵群下达死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

各炮群指挥官接到命令后，吃了一惊，纷纷追问这是为什么。叶飞只好把毛泽东的命令再复述一遍，然后问道：“你们是否都听清楚了，听明白了？”

“听清楚了。”

“明白了。”

部下们明白了，叶飞还不放心，再次把美蒋海军联合编队的队形、美舰和蒋舰在编队中的位置及相隔距离、航速，预计到达金门料罗湾的时间详细通报给第31军及各炮群，要他们作好一切准备，一接到开火命令，都要准确无误地执行“只打蒋舰”的命令。

谁知“护航”的美国人也只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嘴硬，骨子里却是最害怕解放军的，一启航，官兵们就在军舰上铺上老大一面美国国旗，远远的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这么做，就是要告诉解放军：“不要朝这儿打炮！”中午12时，美蒋海军编队驶抵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在料罗湾港口码头卸下了补给物资。叶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北京。

毛泽东下令开火。叶飞立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专打蒋舰，不打美舰。”

各炮群接到命令后，以密集的火力突袭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出乎意料的是，遭到解放军炮火猛烈攻击，解放军空军、海军尚未出动，美舰没有开火就立即掉头，丢下蒋军就跑，以最快的速度呼啦啦地向台湾方向逃去。

美国军舰一走，蒋舰及所有运输船只完全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在飞射而来的炮火猛击下，陷入一片混乱，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国防部”接到求援电报后连忙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

“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早已经掉头跑了！”

“美国人混蛋。”

没有护航保驾的，蒋舰和台湾的人马都急疯了，干脆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了，结果，这些对话被解放军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叶飞在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正准备应付美舰向我开火呢！当他从望远镜里看到美国军舰丢下国民党军舰只顾自己开溜的情形，感到十分意外，明白是怎么回事后，轻蔑地说：“真是只纸老虎。”

结果，这顿炮火，国民党军吃了大亏，军舰被击沉三艘、击伤好几艘。蒋介石只好紧急下令他们返航。

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在中南海继续举行。

在大会上，毛泽东继续讲了他的“绞索理论”，说：“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20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800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古老的绞索，他已经占领几年了。他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人的脖子套住了。中东是最近套住的。谁人让他套住的呢？是他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

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也是他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绞索的一端就丢在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手里，大家都骂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是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他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他是订了条约的，和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一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边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人一愿意，就套上了。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们看也套上了……”

到了中午，毛泽东突然停了下来，问身边的周恩来：“今天我们总要打几万发炮弹吧？”

周恩来回答：“3万发，20分钟就解决了。”

“20分钟打3万发炮弹。什么时候打？”

“12点。”

毛泽东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是11点半，快到了。”

“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已经公布了12海里，美国人到了7海里我都不打。我专打国民党军，我就不打你这个美国军舰，七打八打，你也得跑。金门、马祖这11万人，你不退，我就有文章可做。今天打一炮，明天打一炮，有时打几万发，总是使得你不安宁就是了。”

北京这边还在开会。在美军舰艇的掩护下，国民党海军两艘“美”字号登陆船正向金门岛驶来。这两艘军舰是美国人送给蒋介石

的中型登陆舰，一艘是“美乐”号，另一艘是“美珍”号，排水量均为912吨，体积虽小，但比较灵活。一路上，美军护航舰在外侧小心谨慎地护卫着，两艘“美”字号登陆舰大摇大摆地驶进料罗湾锚地。就在他们忙着卸载的时候，解放军42个炮兵营突然又朝料罗湾发起轰击。顷刻间，炮弹就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美乐”号当即中弹起火。护航的美国大鼻子却站在护航舰上，眼睁睁地看着它在一片爆炸声中沉入海底。“美珍”号登陆艇也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受伤。

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9月8日的讲话。这一日，毛泽东最后结尾的话是：

“13个航空母舰，就来了六个，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120个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你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用了的，统统集中起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毛泽东对美国航空母舰，根本没放在眼中。嘴巴子强硬得不得了，美国人把航空母舰开进了台湾海峡，也是胆小如鼠，不敢妄为，真是应了中国那句古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对于毛泽东的骨气，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后来在一篇题为“代表二十世纪的英雄”中说：“毛泽东主席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光芒的巨大红星。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而自豪的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的半殖民地地位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新生，现在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夸耀享有现代文明成果的西欧、日本进行较量，在世界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现代中国的历程，在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不能同毛泽东的名字分开来考虑的。总而言之，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变时期在历史的轨迹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那么，毛主席的确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二十世纪的世界英雄之一。”^①

在动荡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下，毛泽东以他的英雄气概与美国人进行较量，镇住了它的航空母舰，宣布了中国领海宽度，也捍卫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16. 喜看铁水奔流，两次都不过瘾

常言道，马背上打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毛泽东治国的一个方法就是沉下去，到基层做调查研究，到“民间”去看一看，做细致的了解，体察民情、社会，用他自己的话，叫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58年9月初，在台海炮战初见成效后，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又开始南下巡视。

在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听到各地许多关于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有人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为此决定亲自去下面作一些调查研究。

^①《共同社记者福原文章〈代表二十世纪的英雄〉毛主席是彻底的革命家》，载1976年10月6日《参考消息》。

专列沿京广线一路南下，直达武汉。

这次“大跃进”运动除了修水利、道路外，炼钢炼铁是一项主要任务。钢铁是工业的血液，毛泽东对工业十分关注。他对于钢铁业十分重视，提出赶超英国，主要是要以此去发展、壮大国家薄弱的工业体系。9月13日下午2时，毛泽东等人乘坐江轮，抵达长江岸边的蒋家墩码头，前去视察武汉钢铁公司的情况。

毛泽东等人登岸时，武汉钢铁公司负责人李一清、韩宁夫已在码头等候。随即，众人上车向武汉钢铁公司而去。

武汉钢铁公司是在“一五”计划中建立起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954年底，在先后选点23处之多以后，国务院决定在华中腹地——武汉兴建我国第二个钢铁工业基地。武钢于1955年10月破土动工。毛泽东十分关注这里的施工进度。1956年5月底，他视察南方，离开广东时，特意带上当地特产——芒果来到武汉，款待两位“客人”。

这两位“客人”就是武汉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李一清和副总经理韩宁夫。

6月3日上午8时，李一清和韩宁夫被有关部门通知到省委招待所——东湖客舍汇报武钢建设情况。两人走进客厅，眼睛一亮，召见自己的人竟是毛泽东！激动得不知所措。毛泽东刚吃过早餐，还穿着睡衣，脚上穿着拖鞋，见着两位“客人”，立即和他们握手，并且急不可待地说：“冶金工业过去都不熟悉，大家都要好好学习。今天你们谁讲？”

说着，他把沉甸甸的手掌搁在李一清肩上，拍了拍他的肩头，深沉地说：“李一清啊……”

这一举动和话语，很是亲切，却是饱含着希望。毛泽东把手掌收

回来后，指了指沙发，示意两人坐下。

韩宁夫首先汇报武钢的建设规模、平整场地、施工进度以及施工队伍与工程衔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接着，李一清介绍了施工中修改苏联设计的两个问题，其一，若依葫芦画瓢，武汉的夏天胜似火炉，武钢厂房若按苏联地处寒带的设计，成全封闭式，则就成了一座座“蒸笼”，因此将厂房由全封闭改成了敞开式结构；其二，中国缺钢材，苏联设计的厂房全是钢结构，武钢则改成水泥结构。这两项改动，打破了条条框框，在建设中节省了资金和时间。

“要因地制宜。”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做法，接着又问道，“为兴建哈尔滨亚麻厂，苏联提供的初步设计中，有马厩和洗马间。我们中国工厂不养马，难道也照修照建？”

汇报谈了一个上午，毛泽东始终兴致勃勃。到了吃中饭时，工作人员进来提醒说：“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时间不早了，咋（吃）饭！”

他的湖南话听起来很风趣，就像对家人说话。李一清和韩宁夫俩做梦也没料到要同毛泽东一起进餐，便跟着他进了餐厅。

饭桌上摆着西瓜和芒果。李一清、韩宁夫第一次见到芒果，叫不出它的名字，不由相互望了一眼。这被毛泽东看在眼里，用手指着告诉说：“这叫芒果……芒果。”

入席后，两人和毛泽东隔着桌面坐着。毛泽东伸手把整盘芒果推过来，自己随手拿了一块西瓜，抬起头幽默地说：“楚河汉界，你们吃高贵的，我吃卑贱的……”

李一清、韩宁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约而同伸手欲将芒果盘推向桌面中间，毛泽东阻止了他们的举动，吃了口西瓜，边吐瓜子，边以开心的口吻加重语气说：“我吃西瓜，吐出瓜子。芒果归你们，吃了芒果，要吐出钢铁。”

李一清、韩宁夫手托着芒果，倍感毛泽东的期望，觉得责任沉甸甸……

这次会见后，两人一回到武钢建设指挥部，立即高喊：“开会，开会！”立即传达毛泽东的殷切期望……

过了两年，毛泽东又要亲自到钢厂视察，看武钢的发展。李一清、韩宁夫倍感振奋。接到通知后，就高兴地来到了码头迎接。

几辆轿车很快就驶入了武钢厂区，在一排低矮的简易活动房前停下来。毛泽东走进了活动房，仰起脸打量一下，伸手指着房顶的石棉瓦，侧过头问李一清：“你们在这里办公？”

“是，主席。”李一清说着，打开一台老式电扇送过去。

毛泽东笑着说：“小米加步枪能打败国民党，活动房里也能流出铁水来！”

活动房并不宽敞，石棉隔层不易散热，进来的人不多。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很尊重，向武钢的同志介绍了同行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先生。韩宁夫便拉开了墙上挂着的厂区总平面图帷幕，准备介绍建设进程。毛泽东立即认出了他，可一时记不起姓名，便问道：“两年前见过一面，你叫什么？”

“主席，我叫韩宁夫。”

毛泽东想起来了，幽默地说：“你取了一个苏联人的名字喽，又是‘宁’，噢，又是‘夫’喽……”引得大家笑开了。

他坐下来，满怀兴致地听着韩宁夫的汇报，听得很认真，不住地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铁呀？”

“今日就可以。”韩宁夫告诉说。

毛泽东关切地问道：“是不是有把握呢？”

“有99%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万一。”韩宁夫回答。

毛泽东笑了笑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

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他继续饶有兴趣地听着韩宁夫的汇报，不时插话。当介绍到矿山时，他问道：“你们矿里的铜也含得不少嘛，年产多少？”

韩宁夫回答后，毛泽东笑着说：“看来，你们这个钢铁公司应该叫钢铁铜公司。”

“我们炼焦可以回收 200 多种产品。”韩宁夫说。

毛泽东又问：“你们回收多少种？”

“11 种，有硫铵、粗苯、萘……”

毛泽东立刻插话说：“你们的硫铵怎样？那是农作物的主要肥料，应该多产些。”

有人回答说：“我们第一个焦炉一天产 10 吨，将来要提高到 20 吨。回收的 11 种，别的化工厂能提炼出 180 多种产品来。”

“你们也可以回收，应该多搞些。”毛泽东指示说，“你们这样大的企业，应该办点化学工业，办点机械工业，办点建筑材料工业，各种工业都办点，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

韩宁夫开始介绍一号高炉了，说：“一号高炉有 70 多公尺高，12 公尺直径粗，日产 2000 吨生铁。”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的高炉不同一般，应该叫大大高炉。”

韩宁夫介绍完后，大家便去参观。众人离开闷热的简易活动房，乘车驶向一号高炉。

这时武钢职工正聚集在一号高炉出铁场，准备出铁呢。当毛泽东等人到达时，骤然爆发的欢呼声居然压倒了高炉风机的巨响。毛泽东扬起右手，朝人群致意，然后来到铁梯口。高炉工地主任韩喜见毛泽东上来了，伸手想扶一把。毛泽东微笑地摆了摆手，沿着铁梯，一步步登上高炉炉台。

在高炉上，他和武钢建设劳动模范见了面，然后又登上炉前工

休息室屋顶的小平台，走近平台一侧的铁栏杆前，望着地面上海潮般涌动的人群，再次伸出宽大有力的右手挥手致意，并且招呼身边的张治中和劳模们坐下来。

韩喜想紧挨着毛泽东坐下，又怕挤了他，正犹豫着。毛泽东见状，立即伸手按住他的肩头，挨着自己坐下，并递给他一支香烟。韩喜却没抽，将香烟珍藏在口袋里，掏出火柴替毛泽东点烟。毛泽东微笑地表示谢意。这时他又见毛泽东脸上渗满汗珠，立即回头从人手里拿过一条白底蓝条子手巾，递过来。毛泽东接过了这条毛巾。

为了让一号高炉提前出铁，工人们已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下午3时25分，炼铁厂厂长谢健发出“出铁”的命令。出铁口打开了。刹时之间，只见从炉内喷出大团大团焰火般的火花，紧接着，射出一道闪电似的烈火，照得满炉台通红。

站在二弯沟岗位上的劳动模范李凤恩兴奋地仰着头朝平台报告：“毛主席，铁水流出来了！”

火龙般的铁水顺沙沟蜿蜒奔腾而去，一路“噼啪”作响闪出金花，从出铁台飞泻而下，垂挂成一束耀眼的火柱倾进铁水坝罐里。

这是武钢炼出第一炉铁，标志着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建成投产。毛泽东兴奋地站了起来，望着奔流的铁水，满面笑容地同张治中指指点点，炉台上下欢腾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毛泽东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朝炉台上忙碌的炉前工们鼓掌致意。可他似乎还不够，又兴致勃勃朝护栏走过去，想走近他们。谁知正前方的花盆拦住了去路，他举步走向没有花盆的护栏前站定，笑盈盈地鼓掌，向工人们致意。

张治中站在一旁，立即停止鼓掌，用手抓住面前的扶栏，试探楠竹扎成的护栏牢固不牢固，担心毛泽东再往前走会有闪失。

然而，第一炉铁水流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断流，火龙消失。毛泽

东看在眼里，倏地收敛笑容，皱了皱眉头，将视线投在李一清的脸上，几乎不相信地问：“没有了么？”

李一清很镇静，简短地回答：“完了。”

毛泽东离开扶栏，把手一招，急切地说：“到前面看看，铁水流出多少？”

“主席，”李一清跟上毛泽东，忙说：“100吨。”

毛泽东摇了摇头，边走边说：“就出这么一点，再多一点嘛！”

李一清正要回答，炼铁厂厂长谢健赶上来了，解释说：“第一炉铁只要温度好就行，少一点没关系。”

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又兴致勃勃地朝下走去。

迎着灼热的火浪，他走到出铁台，又从出铁台前边的栏杆向台下走去。这时在出铁台的沙沟边，一架悬臂式的钢铁构件正拦腰挡住了去路。李一清用手掌护着钢铁构件的顶端，示意他绕一步走过去。他却没有走，驻足好奇地打量眼前的这个钢铁构件，问道：“这是什么？”

“主席，这是沙沟上堵放铁水的闸门，开启很轻巧，用手工就能操作。”

“唔……”毛泽东明白了，不由将手掌搭在铁臂顶端的铁砣上，暗暗地用力试了试，另一端的闸门就徐徐地提升起来，他笑了笑，松开了手说：“这是利用杠杆原理，好。”

毛泽东走过沙沟，经过炉前工人李凤恩身边时，李一清说：“老李，这次铁出的不多呀。”

毛泽东在一旁亲切地看着李凤恩，笑着说：“这次少，以后会多！”

炉前工人为此正有点不安，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心情轻松了许

多。在毛泽东视察后不久，他们为不断提高生铁产量而加倍努力，日产量迅速突破了 2000 吨大关。

随后，毛泽东一行人视察了炼焦厂。

整个视察结束，尽管时间不早了，毛泽东却似乎感到不满足，对随行的王任重说：“没有看好，人太多，受限制。不是我看群众，是群众看了我。要到晚上看就好了！”

王任重于是与李一清、韩宁夫等人商定说：“主席很关心武钢，希望很大，觉得没看够，明日再安排一次视察。”

第二日，毛泽东再次莅临武钢。

钢铁生产不能搞无米之炊，必须有足够的铁矿。这次他要驱车 100 公里去武钢属下的大冶铁矿看看。

上午 11 时左右，毛泽东与张治中、王任重和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黄石市委及武钢负责人等来到了尖山 180 米高的平台。大冶铁矿党委书记张品、矿长陈明江迎上前，将毛泽东等人接到临时搭起的芦席棚里。

但是，毛泽东没休息多久，就离开席棚，顶着炎炎烈日，爬坡前去露天采场。

矿区光秃秃，山石炽烫。为了遮避烈日，毛泽东和张治中手里拿一把大芭扇，边扇风，边遮阳。毛泽东登高远望，被对面两座剥去了“绿衣”的山头吸引，问身边的矿长陈明江：“这两座山上在搞什么？”

“那是尖山和狮子山，”陈明江用手指着，“正在搞剥离工程。”

“有多少矿石？”毛泽东追问。

陈明江主管矿山生产，不假思索地回答：“一亿吨。”

“恰恰是这么多，不多也不少？”毛泽东望着他风趣地笑着问，引得大家情不自禁地笑了。

王任重捡起一块矿石，送到毛泽东手上。他掂了掂手中的矿石，

问道：“品位有多少？”

“含铁 60%左右。”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回答。

毛泽东一听含铁量这么高，高兴地将手里的矿石递给张治中，并向他介绍矿石的含铁量，什么是富矿，什么是贫矿，铁矿一般含些什么矿物，然后转过头再问陈明江：“大冶的矿石里有些什么东西？”

“有铁、铜等五种矿物元素。”

“光要铁，其他的不要了？”

“不，其他的也准备选。”陈明江回答。

“这里有没有长铜草花？”毛泽东听说矿石中含铜，又问道。

“有。”采矿车间主任张松堂立即跑过去，在路边摘来一些铜草花，递给王任重，王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观赏着这种紫色的铜草花说：“都开花了，提高选矿水平，搞好综合利用。”

顶着烈日，毛泽东一行沿着采场掌子面而行。沿途的职工和群众获知毛泽东来了，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人太多，毛泽东等人好几次都被堵着了，走不过去。在拥挤的人群中，张治中一只鞋都被挤掉了，急得张平化大喊：“后面的同志们，快给首长找一找鞋子！”

一会儿，有人把张治中的鞋送过来。这位从国民党阵营过来的将军，当年还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穿上鞋后，不由得大发感慨：“毛主席如此受人民拥戴，蒋介石哪里比得上一半！”

毛泽东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招手，电铲司机王金忠想伸手去和他握手，发现自己双手糊满了油污，正在犹豫不决时，毛泽东已把大手伸过来了，于是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掌子面采场下方是几丈深的作业区，里面一位电铲司机不能离开岗位，激动地站在电铲棚顶上，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闻声，走到陡峭的掌子面边沿，向着下面的他招手致意。

毛泽东的举动让他四周的人捏了一把汗，太危险了！大冶铁矿

党委书记张品立即赶上前，对毛泽东说：“掌子面边沿有爆破震裂的痕迹，人踩上去危险。”

毛泽东听后马上关心其他人，对周围的人们说：“不要从外边走，外边走不安全。”

走着时，他看到一个用石头砌成的窑洞，问道：“这是矿工休息的地方吗？”

“不是。还在上面。这是避炮洞。”陈明江回答说。

毛泽东听说是开采矿石的避炮洞，忙笑着说：“我也进去避避炮。”说着，就弯身进了避炮洞，随即坐在一个装过炸药的空木箱子上，仰起脸来，环视着洞的四壁和洞顶，关心地问：“这个洞壁很薄，能顶得住石头吗？”

“小的石头可以顶得起，大石头飞不到这里。”陈明江告诉说。

毛泽东还是叮嘱他说：“要关心矿工的安全啊！”

在旧社会，矿主们为了多挖矿，只要工人们多挖多装，不讲安全，不顾他的死活。毛泽东的话语让在场的许多人都十分感动。随后，大冶铁矿决定一定要把矿工的性命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负毛泽东的期望。

视察大冶铁矿后，毛泽东等人又去了黄石大冶钢厂。

他们进入车间时，正在炉前的炼钢工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猛然见到毛泽东，非常激动，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从一位炼钢工人手中，接过一块蓝色的炼钢视镜，不顾炉火灼热，也不顾煤气灰尘呛人，走近炉前，认真观看，详细询问。

毛泽东两次视察武汉钢铁公司，给武钢人莫大的鼓舞。随后，为纪念他9月13日到武钢来视察的这一盛事，公司规定每月13日为发工资日。

《人民日报》后来公布了毛泽东在武钢视察时的两段讲话，分别

是：“像武钢这样的大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了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在9月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强调说：“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砌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这次他在武汉对钢铁工业的视察，有高兴，有意犹未尽，而他对钢铁工业的重视和期望，却让随行的人们感动。对照美国人莫里斯·迈纳斯说：“在失败的‘大跃进’运动中所执行的极端政策，反映了毛主义由来已久的对与城市大工业相联系的社会和经济形式的敌视，这些形式包括：专业化分工、理性化的官僚机构、大型集中化组织以及正规高等教育”^①之语，试问：一个如此“敌视”“城市大工业相联系的社会和经济形式”的人，会如此关注体现新中国大工业的武汉钢铁公司的建设，会一次看罢工厂还不够，一次出钢100吨还觉得不满足吗？

^①《中外名人谈毛泽东》，郑新等编，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270页。

17.第一次视察安徽

建国后，毛泽东到各省走动、视察，一直没去过安徽。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非常希望他到自己的家乡安徽特别是巢县去看一看。为此，张和毛泽东一起时曾多次向他介绍安徽的情况，有时说安徽山河壮丽，物产丰富；有时说安徽古今人物荟萃，有刘邦、朱洪武、朱熹等名人，还谈起淝水之战等脍炙人口的大事件；还介绍黄山胜迹，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你已到了许多省份去了，为什么还没到我们安徽？”

一次，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京。张治中见着他，就问道：“这次没到安徽去吧？”

毛泽东说：“嗯，还没有去，作为‘负债’吧，记下这一笔债吧！”

由于张治中谈到安徽的次数太多了，毛泽东就幽默地说：“看来，你这人乡土观念相当重！”而说多了，他也对安徽终于心动了，问张治中道：“你说黄山如何如何好，可有上山的路？”

张治中回答说：“可以从皖南坐车到黄山山脚，上山时可以坐滑竿。”

毛泽东说：“我不能坐滑竿。”

结果，还是没有去成。

这次在武汉陪同毛泽东一起考察时，张治中重申前请。毛泽东幽默地和他开玩笑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

其实，因为张的多次邀请，他已决定到安徽去视察那里的工农

业生产了。9月16日，毛泽东与张治中、谭震林、罗瑞卿、张云逸等人从武汉乘坐“江峡”号轮船溯江而下，上午到达了安徽安庆西南的杨家套江面。

毛泽东伫立在船头，极目远眺，波澜壮阔的长江浩瀚无垠，天水一色。张治中走到船头，毛泽东问道：“你是否游过长江？”

“没有。”张治中回答说。

“我想下江游泳，你可下水？”毛泽东又问。

“我只能套上汽圈在江边泡一泡，不能奉陪了。”张治中抱歉地说。

可是听毛泽东说要下江游泳，随行的保健医生立即反对：“今天水温太低，不能游。”

“谁说不能游？水温还低，还游过嘛。”毛泽东坚持说。

其实，毛泽东蓄谋在安庆游泳已久。昨日安庆地委已接到他要在长江下水游泳的通知，并且叫上了五名少年游泳运动员一起来参加游泳，和毛泽东亲密接触，以提高他们努力锻炼的决心。此时他们乘坐“航川”号轮船溯江而上，赶到了杨家套，正向着毛泽东等人乘坐的“江峡”号轮驶来。

五名少年游泳运动员中，有省游泳队的小队员三人，分别是成润英、韩秋霞、陈惠英。她们昨日接到去外地比赛的通知就出发了。“航川”号与“江峡”号慢慢靠拢了，船舱的门一打开，年纪最小的成润英第一个冲了出来，谁知第一眼就看见坐在座椅上的毛泽东。

毛泽东微笑着，朝她点点头，站起身，走到“航川”号轮和她握手，慈祥而亲切地说：“你们好！”

成润英剪着短发，高兴地笑着。毛泽东也笑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她腼腆地回答：“我叫成润英，11岁。”

“游过长江没有？”毛泽东望着她问道。

“没有游过。”成润英回答。

“那你在静水里能游多少距离？”

“600 公尺。”

“那好啊，有这么多哥哥姐姐，还有我保护你，下江好了。”毛泽东还是笑着说。

听了这话，成润英勇气立即变大了。而毛泽东见她长得又矮又瘦，又问道：“你怎么长得这么瘦啊！”

接着，他转过身，问一位剃着平头的男少年：“你呢？”

这位男少年机灵地回答：“我叫许成荣，今年 15 岁。”

“游过几次长江？”

“经常游。”

毛泽东点点头，又转头向成润英故意逗趣道：“想不想妈妈？”

成润英有点害羞地低着头，想笑又不敢笑，这引得船上的人一阵笑声。

笑声过后，毛泽东就要游泳了。他在船甲板上做了一会儿准备活动，便攀着舱门口的扶梯，一级一级往下走，抄一把水拍拍胸脯，又浸了浸全身，一个纵身跃入了波涛滚滚的大江，然后由西朝东游去。“扑通、扑通……”，五位少年游泳高手也应声跳入江中，跟随在他的身边，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这时江面上刮着六级大风，秋天的水温也低。而杨家套江面是个弯道，漩涡很多，激流翻滚。毛泽东刚游出约 20 米远时，江面的波浪突然增大，足有一米多高。在游泳的人中，成润英年龄最小，毛泽东时刻关心照顾着她，带着她游，并且问她：“这么大的风浪，你怕不怕？”

“不怕。”成润英很自信地回答。

毛泽东于是向前游去，时而跃上波峰，时而跌入浪谷。船上的人们焦急地注视着这罕见的场面，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可他若无其事，一会儿仰面击水，一会儿侧泳向前，神态悠闲，轻松自如。这场景，完全如他在诗词中所写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在船上的卫士调来了一只小木船，紧紧跟随在毛泽东等人的身边，以防不测。由于风浪很大，众人倒是弄得手忙脚乱的。毛泽东见着了，笑着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紧张，我们只会被冲上岸，不会被拖进长江回不来！”

毛泽东和游泳队员们在江水中随波逐浪，没任何的事，谁知护卫他们的那只小木船在风浪中却突然操舵失灵，“哗”地向毛泽东压了过去。船上的人大声惊叫起来，船上、江中慌乱一片。公安局局长朱汉雄大声呼叫：“保卫人员准备下水。”这时轮船上的人也乱成一团，恨不得有回天之力扼住那只木船。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急了，疾呼轮船上的卫士：“快！快下去！”话音没落，五六个小伙子“叭”、“叭”纵身跳入江中，飞速游到毛泽东身边。

结果，他们发现毛泽东等人已处在一个危险的三角浪中。“三角浪”前后左右都是浪峰，若落在浪窝中，无法游泳，只能踩水，就是常与长江打交道的人，也怕它三分。卫士们个个都是游泳高手，见势不妙，加速靠近毛泽东，并且喊道：“主席，您老人家快上船。”

“快救孩子们！”毛泽东喊着。

几名卫士游向五名少年游泳队员，一名卫士用左手紧紧拉住船舷，右臂搀扶着毛泽东，好不容易，终于将他送上了小木船。随即，孩子们也被其他人送了上来。

毛泽东一上船，还未站稳，倒兴致勃勃地对面色紧张的几名卫士说：“这次游水真痛快，碰到这么大风浪。”

此时小木船在巨浪中前后左右摇晃着。毛泽东双手叉腰，稳稳

地站在船甲板上，悠闲自得。木船艰难地向轮船划去，可风浪太大，无法靠拢轮船。轮船上的人急中生智，将一段约五米长、一米宽的龙头细白布抛向江中，护游人员接过长布，拉住小木船，这才将小木船靠上去，毛泽东等人上了轮船。

惊心动魄的一幕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红日当头，时间已近中午。毛泽东在船舱内更衣后，首先向陪同游泳的五位少年道谢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接着，他又对他们说，“今天请你们在这里吃顿饭，愿意吗？”

五位少年高兴地点头，表示同意。

吃饭时，由于是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五个孩子显得格外拘束。毛泽东见他们只顾“吃门前菜”，站起身，把远处的菜盘子进行调换，端到他们跟前。他一边给孩子们夹菜，一边问道：“这个菜你们喜欢吃吧？你们年轻，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应该多吃些肉。”又把盘子里的红烧排骨，逐一夹送到他们的碗里。结果，五位小客人见毛泽东既热情又随和，不客气地把他夹来的菜全吃光了。

饭罢，毛泽东和他们在船头合影留念，再次同他们握手，并且勉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勤奋苦练，争取明年在北京再见！”

几名少年们高兴地答应说：“争取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他们与毛泽东的难忘接触本来就此打住了。而年龄最小的成润英万万没有想到，9月底，她突然接到安徽省立医院的通知：“去检查身体。”

好端端，去检查什么身体呢？

到了省城，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书记亲自来看望她，告诉她说：“毛主席嘱咐我说，一定要把小鬼的病治好。”

成润英这才明白突然被叫来省城检查身体，是毛泽东的关照和吩咐。可在省城检查后，没找出什么原因，不久她又被带到北京，在

友谊医院由中外专家进行会诊，住了几个月院，才回到合肥。

这一切，只源自于在游泳时毛泽东发现她如此瘦弱，担心她的身体有病，因此吩咐一定要为她治好病。其实，她并没有什么病，只不过生下来就很单瘦而已。

区区一件小事，就可见毛泽东的爱民之心。所谓“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是编造的，是人民自发喊出来的；《东方红》歌曲，不是御用文人的谄媚之作，是人民自觉编唱出来的，而这些心声，完全是老百姓领略了毛泽东思想光辉以后的尊敬之情的自然流露。毛泽东和人民的这种鱼水感情，就连日本作家鹿地亘都说：“从局外人的角度看到他热爱人民又受到人民爱戴的82年生涯的日本人是不乏其人的。”^①

毛泽东去世若干年后，成润英已在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工作。她回忆往事由衷地说：“毛主席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只能说一句朴素但发自内心的话：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8. 教育：主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使社会进步

英国政治家爱德华·希思好几次见过毛泽东。他深有感慨地说：“对于中国国内的问题，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八亿人能有饭吃，不

^①《日报报道日本作家鹿地亘回忆在重庆会见毛主席〈可信赖的人格，重如泰山〉》，载1976年9月17日《参考消息》。

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①

1976年9月，日本《东京新闻》评价毛泽东一生时说：“阅读毛主席的大量著作和讲话，就可以了解到，他既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军事指挥员，又是哲学家、诗人、教育家和新闻记者。”^②此话不假。确实，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学师范出身，也不仅仅因为他教过书，而是因为他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教育理论。他对于中国人民能否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条件一直做着自己的工作，执政后，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乃至教育事业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大影响，使得新中国的教育深深地打上了“毛烙印”。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等人游泳之后在安庆港上岸，立即驱车去安庆市区。

车到市区，毛泽东既没去市委机关，也没去宾馆，而是径直去了安庆市第一中学。

毛泽东一生力主教育要革命，特别强调人的自立、全面、生动活泼地发展，反对死读书。他去安庆一中视察，就是要看看这里的教育情况，为党中央即将出台的教育改革文件做前期调研。

旧中国文盲成群，多数人大字不识。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深有体会，曾经办过夜校、识字班。建国时，他十

^①《不停顿的革命者》，爱德华·希思著，英国《每日电讯报》（1976年9月10日），载1976年9月12日《参考消息》。

^②《毛主席的逝世和影响》，日本《东京新闻》（1976年9月10日），载1976年9月25日《参考消息》。

分重视教育，亲自请老教育家马叙伦出任教育部部长。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特别规定教育方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为了贯彻这个方针，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要以“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为方向。1950年6月19日，在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就注意学生健康问题，亲自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随后，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努力下，全国逐步全面走上了规范办学的轨道，1952年小学入学率由民国时期的23%大大升至49.2%。

在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后，为了使教育适应大建设对人才的急需，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个方针下，各地学校除强调“三育”外开始创办校办工厂，强调学生学习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泽东大力支持“开门办学”，在办学权力放下后，全国青少年的入学率由1957年的61.7%大增至1958年的80.3%。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初，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8月，毛泽东审阅文件时，就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专门批示了两段长话，第一

段对教育的性质再次作了强调：“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这就要求教育要为工人阶级所领导，要有人民性，也就是说，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不是仅仅是“有钱人”和“精英们”的专利。

第二段话，他强调教育要使孩子们“全面发展”的原则：“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这里，他强调了“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要求人“全面发展”。

之后，毛泽东专门到南开、天津等大学进行考察，并且重点视察了那里的校办工厂。这次来到安徽来，他决定去中学看看。

汽车在安庆一中校门口停住，毛泽东便走下车了，缓步走进校园。校长鹿钟毓见状，急忙迎上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毛泽东面前，向他问好。毛泽东先伸出手，一面握住鹿钟毓的手，一面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多大年纪？由于一时太激动，鹿钟毓激动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怀着敬仰的心情不住地说：“谢谢主席的关怀。”

毛泽东含着慈祥的笑容朝他点了点头。陪同视察的安徽省省长黄岩赶紧对鹿钟毓说：“主席要看看你们的校办工厂，你在前面带路。”

此时学生们已站在右侧的路上列队欢迎，人多地窄。安庆市委书记方振华对毛泽东说：“请主席往左边走，先到校部去。”

毛泽东用手指向学生站队的方向：“不，我们还是走人多的地方吧。”说着，便朝学生们走去。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师生们一边跳，一边欢呼，鼓掌。毛泽东在队伍中走得很慢，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

在鹿钟毓的陪同下，众人来到一中学生的校办工厂。这里挂着两块学生办的黑板报。毛泽东停住脚步，认真地看了起来，当看到“要努力学习，热爱劳动，做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时十分高兴，立即称赞说：“这个黑板报办得不错。”

随后，一行人来到学校电机厂。车间主任王玉贵和女教师谭福琴站在门口迎接，齐声说：“毛主席您好！”毛泽东和她俩一一握手，并且问好，随后问道：“这里有没有教师？”

谭福琴回答说：“我俩都是教师。”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

车间里的学生正在紧张地劳动，突然看到毛泽东走了进来，立即欢呼起来。初三（1）班学生正在绕漆包线。毛泽东走到一名男学生跟前，一面抚摸着他的头，一面亲切地问道：“在做什么？”

由于过于紧张和激动，这位男生支支吾吾，嘴巴张了好几次都说不出话来，满脸涨得通红，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

“他在绕漆包线。”方振华急忙替他作了回答。

毛泽东点点头，再看了看，转身走出车间。从电机车间出来，他问鹿钟毓：“你们有半工半读的班吗？”

“有一个班。”

“半工半读班的同学的劳动怎样安排？”

“一个星期劳动一天半。”

听了他的回答，毛泽东转过身，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注意同学们的学习，要注意同学们的工作，也要注意同学们的休息。”

他强调教育要与劳动相结合，并不是只要学生去搞劳动，不要学习，而是要学习、劳动和休息结合三者都兼顾，要合理安排。这话既是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怀，同时又是对教育战线的同志的期望。

在锯木车间里，有十多个学生正在拉锯。毛泽东看了看，然后走到一位女学生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焦祥英。”

“是几年级的？”

“初三(1)班。”

“今年多大啦？”

“18岁。”

“你会锯吗？锯给我看看。”毛泽东兴致很高地鼓励她。

焦祥英和另外一位同学迅速握着锯把，“哗啦哗啦”地锯了起来。毛泽东亲切地笑着。一会儿，两位学生把木板锯开了，他伸手摸了摸锯开的木板，点头称赞道：“好，很好！”随后挥着手跟她告别。毛泽东慢慢地走着，看着，和很多学生亲切地握手，并连声说：“你们锯吧，你们锯吧。”

一圈快走完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催促毛泽东说：“时间不早了。”

毛泽东笑笑，先是看看自己的表，又侧过脸问鹿钟毓：“你的表什么时间？”

鹿钟毓告诉说：“2点10分。”

就在鹿钟毓回话时，迎面走来校团委书记。鹿钟毓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又问他：“你的表多少时间？”

“我还没有表。”团委书记如实地回答。

毛泽东笑了起来。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看？”毛泽东兴致不减，还想去看。

“还有些木器成品。”鹿钟毓回答。

“成品有看头，这是同学们劳动的成果。”同行的张治中带着笑容说。

“走，我们去看看。”毛泽东赞同张治中的意见。

他与张治中肩并肩地走着，到了存放木器成品的仓库，仔细地看了学生做的板凳、课桌和木床等成品。

“主席，现在是2点30分，走吧。”曾希圣再次催促。

毛泽东这才恋恋不舍走出校办工厂，走到学校门口又转过身，与送行的鹿钟毓握手告别。毛泽东要离开了，鹿钟毓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很好，做得不错嘛！”毛泽东赞扬说。

这当儿，全体师生又一起赶来校门外，并且列队欢送。毛泽东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慢慢上车后才离开。

当晚，毛泽东应曾希圣的请求，为安徽大学题写校名，写了四张，说请他们选用。

此时安徽省委正在为省会到底是设在芜湖还是合肥发生争论。毛泽东获知这个情况后，对曾希圣说：“合肥不错，为皖之中，是否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后来，安徽省会还真的

选择在“皖之中”——合肥。

这是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中的一个“花絮”。

毛泽东视察安庆一中，虽然时间不长，也没作特别的指示。其实，他是专门来了解学校情况，为即将出台的教育工作指示作最后论证。

毛泽东视察安庆一中没几日，9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的新观点，对于教育工作作出了诸多规定，尤其是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1）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2）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有关部门把两条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这是中央文件首次冠以“教育方针”字样对国家的教育方针进行表述。

在这个统一的教育目标和方针之下，指示还规定，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以达成几个“并举”——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也就是说，全国将据此形成三类主要学校：第一类是全日制的学校，第二类是半工半读的学校，第三类是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的学校。这成为至今中国还继续的教育形式。

这个指示还贯彻了毛泽东建设教育工作队伍的思想，指出：（1）办教育需要依靠专门的队伍，没有强大的专门队伍是不行的；（2）教育工作的专门的队伍必须与群众结合，办教育更必须依靠群众；（3）办教育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

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贯彻全党全民办学。

这个教育工作指示提出的一切的总的教育目标，则是“人的全面发展”，并且强调了教育的政治性——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要培养青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要保证教育不会变成“精英教育”，广大劳动者和子弟都能平等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不会像国民党时期那样多数人排除在学校之外。除教育的政治性外，毛泽东强调教育要与劳动相结合。

这并不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大跃进”思想的产物。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把“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作为抗日军政大学办学的基本原则，把是否做到两者相结合作为衡量青年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仍强调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天津视察时就阐述了它们的好处：“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并且，他还在一些会议上说，“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①他强调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目的就是要以此来打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分离的旧传统，以缩小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使得全社会的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一种“新的平等”。而事实上，教育与劳动结合，也是培养青年学生的需要。要反对读死书和空洞的理论灌输，就必须从实践和工作中

^①《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页。

学习、总结。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可以使受教育者参加并学会实践,提高实践能力,从而有知识也有实践能力,获得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思想也不独毛泽东提出,有趣的是,蒋介石在台湾也很强调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在提出的三个“教育宗旨”中“要重视劳动生产”排在第二;不同的是,他因为“立法委员”们的反对和学校采取应付态度而最终没有实现。^①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最后提出了教育发展的具体奋斗目标:

(1)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

(2)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 15 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 15 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 15 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这个目标是宏伟的,也是很有远见的。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沃土,也是转播文明的最佳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一片瓦砾和废墟上开始建设,只经过短短 40 年,就一跃而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秘密就是战前日本积累的知识和技能。本来,日本是一个地域狭小,人口密集的群岛国家,作为二战战败国遭受了巨大损失,据资料统计,日本国民财富 45%以上毁于战火,40%城市建筑成为瓦砾。战后初期,日本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以战前 1935 年工矿业生产水平 100%计算,1946 年下降到 28%,工业设备

^①《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陈诚著,东方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9 页。

90%被闲置，生产资料生产仅为10%，消费资料生产为30%，农产品1945年仅及1937年的一半左右。而日本1900年就开始实行免费教育，1908年实现六年免费教育。但日本虽然受到重创，还是从1949年起毅然宣布实行从小学到初中九个年级免费教育，政府用于教育支出在当年预算总支出20%以上。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英、美、法、德等国而居世界首位。中国如果说在战后蒋介石忙于内战，忽视了教育，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则就把入学率提高到如此之高，让原来那些脱离教育的穷人孩子走进校门，这已是很不容易的莫大成绩了。但是，毛泽东等人并不满足，提出了更宏大的计划，三年到五年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15年来普及大学教育。这是一个重点发展教育的计划 and 目标。

中国普及教育，起步比日本稍晚了一些，但也不算太迟。毛泽东等人对于教育发展的重视和规划，既是改变中国所有人被拒教育和文明门外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开始大规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举措。并且，这个“普及”，不是“特供”，完全破除以前教育只属于“精英”和“有钱人”的传统，强调了全体人民；而且，毛泽东等人不仅要普及小学教育，还要普及大学教育，更把普及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虽然这个目标的实现虽然是一个漫长过程，但对中国人来说，则向着这个目标开始了真正的迈步。

这次提出的发展教育的计划是振奋人心的，毛泽东对于教育人的目标更加完整——“人的全面发展”。半个世纪后，一位叫王宇明的学者在《人民论坛》总第302期发表《毛泽东关于人全面发展的思想概要》一文中感叹地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为我国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家和各学科的著名学者，为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学校教育只能解决人在某些方面的发展问题，而要

达到全面发展只能通过社会实践。”^①

毛泽东一生与教育有缘，一生重视教育。而他的教育思想不是教人如何“克己复礼”，也不是教人以“发财之道”去剥削人压迫人，而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受教者自我得到极大提高、也为他人服务，是个人和社会一起发展的“全面的人才”。

虽然“教育”一词表面上听来不带一点政治性，而其实是一个重要而尖锐的政治议题。教育政策对内涉及哪些人能获取重要的知识、技能，进而成为社会上层分子，进入权力机构；对外则涉及整体国力，是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对于教育目的、方针等的确定，既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需要，也建立国家长远竞争力的需要；而他的做法完全符合教育规律，保证“人的全面发展”，还强调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和谐。这既是他正确培养人才的教育智慧，也是治国的大政治智慧。因此，毛泽东既是教育大家，也是政治大家。

19.外出视察：不要大车队，也不要人撑伞

古代官员出行，鸣锣开道，官员坐在轿子里，威严的仪仗队前呼后拥，差役们边高喊军民人等闪开，边“噹——噹”地敲打大铜锣，在

^①《人民论坛》2010年9月（中）总第302期。

前面引路。封建王朝还严格规定：县级官员出巡敲七下，府级官员出巡敲九下，道级官员出巡敲11下，中央一级官员出巡敲13下，大张旗鼓地制造官威，吓唬老百姓。蒋介石时代，官员们出行，大多坐高级轿车，虽无仪仗队和差役们鸣锣开道，但也有开道车在前，往往是呼啸而过吓煞小民。

毛泽东下基层，则是轻车简从，没有这般如此的“排场”。

毛泽东这次到安徽视察，事先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发过电报，要求他保密，不要过早将自己的行程公之于众，曾希圣也保了密，但毛泽东视察安庆中学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全城。他们还没进城，城内的人们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拥上街头，交通警察手持喇叭筒不停地喊着：“不要上街！”但很少有人理睬，人们一边奔跑，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聚集在街头，踮起脚尖，引颈翘望毛泽东的到来。

没多久，安庆市街道上便聚集了五万多名群众。当毛泽东等人的车队驶入吴越街时，街道两旁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交织成巨大的声浪，直冲云天。

毛泽东坐在汽车中，听到阵阵的欢呼声，透过车窗看着外面。街道边到处是人，不少人还想抢前一步靠近，挤到了马路上面。他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不住地吩咐司机：“慢点开，不要太快。”

汽车徐徐行驶，毛泽东笑着向窗外群众频频招手致意，显得格外高兴，还不停地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结果，平时从安庆一中乘车到菱湖，只要几分钟的路程，这次车队却花了近半个小时。

汽车驶出城后，在安庆至合肥的公路上飞驶。毛泽东、曾希圣、李银桥坐一辆车，张治中、黄岩坐另一辆车，其他工作人员分乘另外几辆车。

按照惯例，走在最前面的是警卫车，便于观察瞭望，遇到紧急情况好作处理。谁知车队刚出城，毛泽东就让司机往前赶，超在警卫车前。他风趣地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的司机是当地人，路线比较熟悉，今天就让我来给你们开道吧。”

车上的人都笑了。

警卫人员却紧张了，万一出了事，咋交待！毛泽东不管这些。在此之前的成都会议上谈及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规章制度时，他就专门批评了警卫工作，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随后，他规定外出时只准两辆警卫车，不准车队随行，不准搞“大队伍”。此刻毛泽东坐的车跑在前头，警卫员们紧张归紧张，但也没办法。

从安庆去合肥，路线是经高河埠、桐城、舒城到合肥。沿途是碧绿葱郁的田野，掠过奔驰在公路上的轿车窗口，车内的人感到清新舒畅。毛泽东不顾路上的疲劳，同大家谈笑风生。谁知车到高河埠岔路口时，由于司机王宽禄首次给毛泽东开车，神情紧张，竟将汽车往潜山、岳西方向开去了。

起初，谁都没有发觉。当西斜的阳光从车头透过车窗照射到身上时，省长黄岩才发觉方向不对头，立即对张治中说：“走错了路啊！”

听说走错了路，毛泽东当即叫司机停车，并且从车上走了下来。随后，大家也急忙下了车。

因为出了差错，在场的人都紧张起来，感到十分内疚。尤其是司机小王，脸膛一下子涨得更红了。黄岩也感到不好意思，觉得工作没做好，赶忙上前对毛泽东说：“这次真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不要紧张嘛，犯了错误改了不就好了嘛！”毛泽东随即挥手指

向附近的一片树林说，“周围都是树，各人可以自行‘方便’，还可以乘凉休息。”

他说的“方便”就是解小手的意思，一句风趣的话便解了小王的围，并让大家立刻都轻松起来。

稍事休息，车队开回岔路口，又奔驰在合安公路上……

下午3时50分，车队到达了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曾希圣知道毛泽东很关心农村小企业的情况，于是问道：“我们是否下去看看？”

毛泽东点点头，欣然同意。

汽车“嘎”地在舒茶公社茶厂门前停下。毛泽东走下了车，当地县、社负责人带着敬意一起迎了过来。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这时轻风拂面，茶厂周围一片荞麦随风飘忽。毛泽东抬头望去，用手指着，面向随行的众人笑着说：“这是荞麦。”

毛泽东虽然少时候干过农活，但湖南农村是不长北方的荞麦的，荞麦是他后在工作中“认识”的。同为湖南人的曾希圣惊讶地说：“主席你咋认识荞麦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它哩！”

毛泽东笑了，没有回答他，而是往前走了。

在当地干部的引领下，毛泽东等人来到了茶厂休息室。休息室原是俱乐部，屋子中央放着两张乒乓球桌，桌子四周放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环视四周，在一张老式靠背椅上坐了下来。接待员潘忠惠随即递上洗脸毛巾，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毛巾，笑着对她说：“谢谢你，小同志。”

洗过脸，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支香烟点着，又站起来向南墙走去。墙上张贴着公社劳动竞赛进度图表和各种奖旗、奖状。他一边看着，一边自言自语：“舒茶人民公社。”

另一面墙上贴着“把鲜花献给劳动模范”的宣传画，他转身走到画前，看着这幅构思新颖的图画，连连点头赞赏说：“这很好，这很

好。”

回到座位时，身旁的县委书记史元生邀请他在舒茶就餐，并说已做了准备。毛泽东问道：“有没有稀饭？”

当他听说没准备稀饭时，便笑笑说：“没有就算了，时间还早，我们还是到合肥吃吧。”

坐了一会儿，毛泽东起身问道：“还有什么好看的？”

“有，这边有个展览室，里面有三年远景规划模型。”史元生介绍说。

展览室里摆放着用土法制造的各式农具、三年远景规划模型、工农业产品等。墙上的四周贴满了舒茶公社解放前后的基本情况介绍和各式图表。毛泽东仔细观看了打稻机、收割机、筛土机、双层犁、水车等 20 多种新式农具，对它们很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了每件新式农具的性能和作用。

“这是什么机子？”毛泽东指着一台机器问曾希圣。

“是割草机。”曾希圣接着推着割草机走了两步，做操作示范。

来到远景规划模型前，毛泽东用手指着模型，关切地问：“有没有水库？茶厂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畜牧场规划在哪里？社员住什么房子？”

讲解员逐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获知社员们住房情况时说：“社员有房住，有肉吃，然后有茶卖，生活就能一日一日好起来。”

从展览室出来，毛泽东精神极好，走在最前面。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排排白墙青瓦的厂房。来到制茶车间，他饶有兴趣地观看茶叶制作过程中的杀青、揉捻、炒茶等生产工序和机器设备，问道：“这是什么机器？”

“是揉捻机。”

毛泽东又转过身去，指着一口锅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炒茶用的。”

“炒一锅茶要多少时间？”

“要30多分钟。”

走出车间，毛泽东问身边的舒城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杜来春：“这个社有多少户？”

杜来春答道：“有8000户。”

“这个社在哪里开会？”

“在大礼堂，能容800多人。遇着大会，就在前面的河滩开，那里能容1万多人。”

在茶厂大院的一条小道上，毛泽东驻足眺望着前方的山峦，挥手指向茶厂后山上苍翠的丛林问：“那是不是茶树？”

“是茶树。”

毛泽东高兴地说：“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

夕阳西斜。此时原来天空中那一丛丛涌起的白云，不知什么时候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天色不早了。毛泽东在舒茶公社视察了将近一个小时，在回去的路上，他转身指着后面的史元生，向曾希圣问道：“他是什么人？”

“他是舒城县委第一书记，叫史元生。”

“什么‘史’？”

“历史的‘史’。”

他又指向杜来春，曾希圣介绍说：“他是县委书记处书记，叫杜来春。”

“什么‘杜’？”

“本土‘杜’。”

最后，他又指向徐自长，曾希圣介绍道：“他是公社书记。”

毛泽东一一问了名字后，朝茶厂大门走去，要上车离开了，在汽

车前，他又转过身和史元生、杜来春、徐自长一一握手告别。

离开了舒茶，汽车又奔驰在驶向合肥的公路上。毛泽东谈兴甚浓，与曾希圣等人交谈甚欢。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他一直认为人民群众不仅要解决吃饭难题，而且还要有充足的副食品和土产特产供应，满足各种生活需要，茶厂的兴旺让他看到了希望。

当晚霞映红天际之时，毛泽东一行人到达了合肥城内的稻香楼宾馆。

毛泽东被安排在西苑一幢平房内一间极普通的房间。稍事休息后，他让秘书请来了省、市负责人和宾馆接待人员，向他们“约法三章”说：“第一，别人不要请我们吃饭；第二，我也不请你们吃饭；第三，按伙食标准用餐，不喝酒。这三条，希望大家能监督我们。”

恭敬不如从命。于是乎，接待人员根据他的规定拟了一个简单的菜谱，一切从简。

开饭了。服务员端来一小盆小米稀饭，还有几个小馒头，一碟土豆烧肉块，一碟韭菜炒鸡蛋，一碟炒青菜，外加一小碟干炒辣椒。每道菜的分量也不多。菜刚上齐，曾希圣来到毛泽东的餐桌前，看了看桌上摆着几道以素为主的菜，歉意地说：“主席吃得太简单了。”

“吃得很够了，很舒服嘛。”毛泽东笑笑，用竹筷轻轻敲敲盘子说：“哪天全国农民都能吃上我们这样的饭菜那就不错了。”

毛泽东心忧天下，对生活最艰苦的农民有一种特殊深厚的感情，总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相比较，也总是保持着艰苦节俭的作风，生活简朴，不见奢华。

在合肥期间，毛泽东会见了省妇联干部，视察了安徽省博物馆、省委机关钢铁厂。9月19日下午，才离开合肥前往芜湖。

傍晚时分，众人抵达芜湖。毛泽东下榻在芜湖市铁山宾馆二楼。

要开晚饭了，服务员小王进来了，请毛泽东到特地为他准备的小房间用餐。毛泽东问道：“其他同志在什么地方吃饭？”

小王回答：“在楼下餐厅里。”

毛泽东听后，马上说：“我也到餐厅里去吃！”说罢，就起身朝门外走去。

门外下着雨，又是下坡路。小王赶忙撑起一把雨伞，跑步跟了出去。由于毛泽东身材魁梧，他踮起脚努力把伞撑高。毛泽东回头看见了，笑着说：“我自己来！”把伞接了过去，迈步朝餐厅走去。

餐厅里，就餐的人不少，但没一个人是要准备吃饭的样子——几位工作人员正叽叽喳喳谈论刚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其他工作人员则正叹息刚才错过见毛泽东的时刻。谁知正在这时，毛泽东健步走进来了，并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微笑着说：“你们想见见我，我这不是来了吗？”

顷刻间，整个餐厅沸腾了。

毛泽东在餐厅里走了一圈，便在一张餐桌旁随便坐下，随后招呼大家说：“开饭了，来，坐，坐，坐。”说完，站起拿起饭碗朝饭桶走去。

服务员小王、小周赶忙去拿他手中的饭碗，想替他打饭。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我自己来！”

谁知他要自己盛饭，却发现饭桶里没有饭勺。原来服务员只顾看他，竟忘了把饭勺放在饭桶里。这时大家有点着慌了。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走到餐桌边，抄起一把长柄汤匙，笑着说：“这个不能盛饭吗？”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服务员端来了一道炒青菜、一道肉片烧豆腐，外加一道辣椒，并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我们本地的辣椒，叫灯笼泡。”

毛泽东夹起一只辣椒，咬了一口，幽默地对同桌的人说：“凡事

不能看外表。这个辣椒从外表上看起来很大，其实中间是空的。别人以为它一定辣得厉害，可是实际上却一点不辣。我们湖南的辣椒虽小，却辣得很。”

然后，他与大家边吃边谈，欢声笑语。整个餐厅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这是在毛泽东视察安徽的一些细枝末节，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声势，但平凡之处见精神，历史上大小官员杜绝不了的鸣锣开道被他废除了，许多人做不到的轻车简从他落实了。他下到基层，没有架子，也不摆谱，反而处处体谅群众，他们想看自己就叫司机开慢车，司机跑错了路就以幽默、通俗的玩笑化解窘境。到了基层，他一不要人撑伞，二不吃小灶，三不要人盛饭，做一个普通而又随和的人。相比之下，如今一些干部年纪轻轻，架子很大，二十几岁一出门，就让人为之撑伞、盛饭，下乡用警车代替“鸣锣”，到处“清街”，“亲民”变成“扰民”，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两相比较，伟人与庸人的区别何其之大，毛泽东治国、执政，又是如何的有着大智慧。

20.“不怕路长，只怕心老”

在当代世界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振兴的问题？是靠自力更生为主，锤炼全民族的自我创新能力；还是以争取外援为主，轻视自我创新，甘愿成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外国商品的市场？这在党内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而毛泽东坚

决主张前者，反对后者。他在1945年1月10日就说过：“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但是，这种分歧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存在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该去买船还是造船之争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船舶是海洋运输的主要工具，然而制造一艘船舶耗资巨大。党内部分人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从微观经济学来说，这种思想很有道理，造船的成本很大，不划算，不如买船和租船便宜，又能实现运输的目的。作为跨越时代、站在高处的伟人，毛泽东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账算得更精细。针对这种买船租船的思想，他像一位账房先生算账式说：“造船再贵，货币并没有外流，无非是钱从左衣袋装进了右衣袋，肉烂在了锅里。买船再便宜，得付外国人钱，货币外流了，算总账就亏了！”

买船不过是权宜之计，账不合算外，最关键的是难以提升民族工业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认为，必须提高自己的设计制造能力，造船就是自己来学习、来创造。这是中国工业能否真正翻身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主张自力更生，在实践中自己去创造，自己造火车、造汽车、造船、造大飞机，建海上铁路，而不是在借和租的死胡同里打转儿，最后受制于人，无所作为。

正是在这种买船、租船与造船之争的氛围下，1958年9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来到了芜湖造船厂考察。

芜湖造船厂是于1954年新中国自己兴建的新型工厂，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艘军舰和水翼客艇，打破了中国历史上不能研制生产舰艇和远洋航船的记录。可以说，芜湖造船厂为证明中国人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作了一次精彩的展示。

毛泽东在船厂门口下车。船厂负责人立即迎上前去。握手后，毛泽东就着急地问道：“船在哪里做？”

曾希圣说：“去装配车间吧。”

很快，众人来到了装配车间。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查看着正在装配的鱼雷快艇，问副厂长张云璋：“这是什么艇？”

“远航鱼雷快艇。”

“是铁制的吗？”毛泽东问。

“是木制的，主要材料是红松、柏木和落叶松。”

毛泽东不满足于此，继续问道：“你们能不能造更大的船？”

“能造。”

毛泽东听说自己能造大船，脸上立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自豪地对身边的人大声地说：“我们有自己制造的军舰和快艇了。”

“这艇有多重？”他接着问道。

“标准排水量 62 吨。”张云璋回答。

“好，好。”他连连点头，对此很满意。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自己造船，靠自力更生能造大船，这自然是一件谁都盼望的事情。毛泽东忧国忧民，更加希望民族工业有飞跃式的发展。为此，他 6 月 28 日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还说：“海军发展值得研究……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报复，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造船，造大船一直是他的梦想，并且还在会上热切地问：“造船还要几年才行？”现在他获知芜湖造船厂能造大船，如何不高兴？！

众人走出装配车间，毛泽东又来到了金工车间，仔细地观看了

船舶推进器的生产情况，随后询问船厂负责人有多少职工，多少大学生，多少技术员，张云璋一一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到基层来，不是来走马观花看一路鲜花的，听了汇报后却要解决问题的，关切地问道：“有什么困难吗？”

“厂里缺少技术人员，有的技术问题一时解决不了。”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说：“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

从金工车间出来，他意犹未尽地问道：“还有什么可以看的？”

“请主席到码头看看水上的鱼雷快艇。”海军驻厂总代表王玉璋回答。

“好啊，我们可以坐坐快艇吗？”毛泽东笑着问。

“我们就是给主席准备的。”王玉璋高兴地说。

毛泽东乘车来到码头，下了车，便健步跨上了一艘快艇，站在驾驶台上。马达声响后，快艇像离弦的箭飞快地驶向辽阔的江面，刺破碧波，向前驶去。毛泽东站在驾驶台上，望着大浪滔滔的江面，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

快艇在水面上“飞”了约十分钟后，毛泽东还觉得不过瘾，兴致勃勃地问道：“能不能开快些？”

艇长回答：“能！”

于是，快艇在一瞬间就加到了每小时33海里的速度。可是毛泽东还不过瘾，一会儿又问：“能不能再开快些？”艇长把速度加到每小时35海里。顿时，快艇两舷激起几丈长的浪花长堤，艇尾汇合着汹涌的波涛，留下一条闪光的水带，水带扩大到远处江面上，泛起万顷波光。

电航工担心快艇这样高速行驶，会影响毛泽东的安全。可毛泽东还希望快艇开得再快些，风趣地说：“站在这儿，比坐在轿车里还

要稳哩。”

快艇“飞”到四褐山附近江面，开始施放烟幕弹。随着几声巨响，江面上浓烟冲天，烟幕升起，如同置身黄山云际。毛泽东高兴得开心地笑了，大声地说：“我们要自己造出大船来啊！”

豪情中更是期盼。

毛泽东在江面上试坐了半个小时，快艇才返航。停靠码头后，毛泽东走到后船舱甲板，俯下身来查看鱼雷艇发射管，并且问道：“鱼雷发射出去，能不能把敌舰打一个洞？”

“能打一个很大的洞。”王玉璋用手比划着说。

“好哇，那好得很。”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随后，他走上码头，笑逐颜开地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并对张云璋等人说：“要自力更生，我们需要自己的轮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我们一定努力。”众人一齐表示。

接着，毛泽东引用不久前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关于“二五”计划要点报告上所写批语中的一句话，叮嘱大家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然后，他深情望着远处的江面，甚至带着壮士断腕的悲怆，大声说：“老话说，不怕路长，只怕心老。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的！”

毛泽东对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殷切期望让在场的许多人都很感动，张云璋、王玉璋等人眼眶不自主地涌出了热泪。

他们含着泪水，挥手送别毛泽东。当车队在扬尘中消失时，眼眶里的热泪终于忍不住掉落下来了。

作为中国船舶业的工作者，他们也和自己的领袖们一样希望自己能够制造和拥有大船，在世界船舶业有中华民族的一席之地啊！当年慈禧太后把海军造船的经费挪去修建庆贺自己60大寿的生日礼物——颐和园，蒋介石为了家族赚取巨额回扣，只买船不造船，使得现有的江南造船厂在技术上一落千丈。毛泽东号召大炼钢铁，不是要去在国际上博取虚名，挣一口打肿脸充胖子的“气”，而是要去发展民族工业，去修铁路，去造大船，为此他说：“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他还说：“在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建设以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①

从发展民族创新能力的角度，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毛泽东对中国造船业如此关切，并且热切希望快艇再快些，工人们能造出大船，对船厂寄予了多大的希望！这成为了船厂干部群众前进的动力，也激励着他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奋发图强。

中国人一定要造出自己的大船，“不怕路长，只怕心老。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的”，毛泽东的话语何其悲壮，决心又何其之大！而这又是一个多么英明的策略。

^①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21.毛泽东下令：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离开安徽后，去了江苏南京。这次他巡视了长江流域几个省，正如他后来对新华社记者所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确实，“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各地群众热烈相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参加各项工作，投入到火热的劳动竞赛之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不分日夜地战斗在劳动工地，修水利，修公路，并且土法上马炼钢铁，力图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实现“改天换地”，在极短时间内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旧面貌。看到各地的群众干起来了，毛泽东认为必须要求各级干部大力参加劳动，和群众一起去奋斗。为此，他决定把“干部参加劳动”这项工作进一步的推进。

但是，做这项工作，他如同当年在济南战役前调解许世友和老战友王建安“不讲话”隔阂一样，选择了一个有趣的时机和方式，当事人，还是许世友。不过，此时许已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了。

9月21日下午，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礼堂内正在举行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毛主席马上要来接见会议代表！”

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大家屏息静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一会儿，毛泽东在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陪同下，缓步进入会场。在一片掌声中，毛泽东握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手，和蔼地说：“世友啊，现在地方上规定每个领导干部要有一段时间进工厂当工人，下

乡当农民，你们部队干部可不可以下连当兵？可不可以作个决议？”

许世友执行毛泽东指示一向坚决、果断，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完全可以，坚决照办！”

第二天上午，南京军区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落实毛主席指示。许世友目光炯炯，扫视着在座的将领们，大声地说：“同志们，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要雷厉风行地照办。他提出干部下连当兵，这是促进领导机关革命化的重要措施，是新生事物，我个人表示坚决拥护，我向常委报名，要求下连当兵！”

“我去！”“我去！”常委们争相报名，要求第一批下连当兵。

最后，军区常委研究决定，批准许世友上将，张才干、肖望东、林维先、饶子健中将，龙潜、段焕竞少将等军区机关、省军区、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共30位将军，首批下连当兵。

为什么许世友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办得如此之神速？

因为毛泽东对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之事看得太重，并且他是以此作为锻炼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近一年多来着力推动的一件工作。

在旧社会，各级官吏是爬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以欺压、剥削人民和牟取私利为能事。毛泽东的官吏观与此完全不一样。他认为干部是人民的服务员，是公仆。在战争年代，他就要求干部和群众一样，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而且还要以身作则。进入和平时期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各方面的条件变好了，干部的权力更大了，他更看重干群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是鱼水关系。干部如果以为做了“官”，就以“官老爷”自居，就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那就与以前的旧官吏没有二样。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干部和群众一起劳动。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更加强调这个工作了。

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

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其中说：“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他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危险倾向”的方法。

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因为，干部去参加体力劳动，一则表明自己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分子，可以磨练自我；二则群众也会因他们的劳动行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贴心人”，更为重要的是，干部参加了劳动，就不会“忘本”，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就不会丢掉艰苦朴素作风，且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在和社员一起劳动中，干部们脸上的灰尘、身上的脏东西，群众看得一清二楚，马上帮着擦洗，他们就能永远干净。干部不劳动，就会忘记过去的穷兄弟，就会在斗争中站不稳脚跟。因此，毛泽东不仅主张自己儿女们去参加劳动，也力倡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在参加体力劳动中，洗涤、磨练自我，成为时代的先锋。

4月23日，新华社发表了关于湖北省的一条消息，说目前农村中存在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1）农业合作社内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引起群众不满。（2）一些干部对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闹事。（3）在占用渔场、畜牧场、林场、茶场、小矿山及耕田等问题上，国家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纠纷。（4）地方干部与转业军人相处不好，发生纠纷。（5）城镇中学政治空气薄弱、校风校纪不正，引起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对政府和学校领导严重不满。有些学校领导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引起学生闹事。（6）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加深了人民群众与领导

者间的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于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和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在全国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公开讨论，开展整风运动，以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此把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列为了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党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通知时，毛泽东特地批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那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5月1日，毛泽东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批示也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毛泽东对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这项工作看得很重。在整风通知发出后，他要求党中央专门发一个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5月7日，他审阅这个指示初稿时，亲自作了不少文字修改，并批示：“伯达阅，小平同志办。政治局通过后，填上日子，在报上发表。”

5月10日，这个初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通过。它要求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并且将参加体力劳动人员的范围进一步

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不仅包括党政机关，而且企业、事业单位和解放军部队，都不能例外。毛泽东再次审阅后，批示：“可用。公开发表。”

5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个指示，就是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首先指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然后，它要求：“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再列出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多种办法，最后指示以一段很长的篇幅严肃地指出说：

党中央委员会唤起全党同志注意：我们的党在30多年中，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在1927至1936年的十年内战时

期,我们的党的干部和工农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有许多人都曾经用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曾经进行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许多主要干部有的参加了农业劳动,有的参加了手工业劳动。这种生产运动大大地改善了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劳动观念,促进了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并且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脱离生产,而在脱离生产以后即不愿意再回到生产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就原则上说来,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同时,党中央认为:在全国基层的生产单位、建设单位和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中,脱离生产人员的数目应当限制在真正需要的范围以内,凡是超过需要的,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有许多单位(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组织(例如某些中小企业的党、团和工会这类基层组织),应当力求逐步地、有准备地做到没有完全脱离生产的人员,而在这些单位中的一切不需要脱离生产、但是已经脱离生产的人员都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或者成为半脱离生产的人员,参加一部分可能的劳动。在基层以上的机关中的多余人员,能够回到生产中去,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暂时不能回到生产中去,也应当创造条件,在以后逐步回到生产中去。这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党同志是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这个由党中央发出的指示后来有人称之为“干部令”。而这个“干部令”不是待遇令，不是特权令，而是“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的劳动训令。这样的劳动训令是任何执政党从没有过的。它分配给浴血奋战才取得政权的当政者——干部们——的，不是福利，不是特权，而是一份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且回到群众中去的机会——而这个机会，不是去当群众的主人，也不是当群众的主宰，而是与群众一起去参加一样的劳动的“机会”。这是世界上任何政府和政党都不曾有过的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且是很罕见地贯之以“党中央委员会”的严肃、权威的名义。

毛泽东和党中央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是去为难或者戏弄他们，而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是以此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途径，认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可以大大增强党、政府、军队、人民团体以及企业、事业机关同劳动群众的联系，可以有效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尤其是纠正官僚主义，因此“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

“劳动训令”一下，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成为整风运动的一大景象，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党员和干部的积极响应。几个月内，河北、辽宁、江苏等18个省、自治区下放干部参加劳动，达18万人之多。9月22日，党中央批转河北省委《关于各级脱离生产的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将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化的做法。年底，全国下放干部总数超过100万人，已下放和

准备下放干部约300万。北京市先后下放两批干部，首批3600人，第二批7000多人，共1万多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有效地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也极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由此带来当年冬季火热的群众性大修水利、道路的劳动热潮。

1958年一开年，毛泽东决定继续推进这项工作。

2月28日，党中央发布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规定“干部下放的主要方向是农村”，指出干部进行体力劳动锻炼，首先的主要方向是上山下乡，参加农林业劳动；其次是参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其他劳动。对于有技术和专长的干部、大专学校毕业生，应考虑其技术和专长。但以下几种干部不应该下放参加劳动锻炼：（1）年龄在45岁以上的；（2）体弱多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3）孕妇、有哺乳婴儿和因子女拖累不能下去的女同志；（4）最近二三年内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华侨、留学生和科学工作者，一律暂不下放；（5）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目前也不要下放。此外，对于合乎退职、退休条件的干部和既不够干部条件又不适合参加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也应作适当的处理。

这个锻炼计划是宏大的，但也区别了干部的情况，指出了锻炼的方向，也对一些特殊人员作了照顾。毛泽东等人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经过几次轮换下放，使干部队伍在参加体力劳动中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改造。

5月20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干部参加劳动锻炼问题。他说：“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对此，他的结论是：“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接着，他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批评官气、官僚主义后，他告诉大家说，“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他把这上升到了“国际高度”，意味深长。

此时全国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工矿企业参加体力劳动，一个全国规模的上山、下乡实行劳动锻炼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

6月13日，农垦部部长王震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递送了一份报告，说农垦部三分之二的干部已于5月底分赴密山、佳木斯等垦区参加劳动，一律下场四个月，进行现场整风，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和帮助农场工作。他个人也拟待17日处理完下放任务后去垦区。6月15日，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立即批示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这好像是一个彻底的办法。请你想一下，并和一些同志谈一下，有些党、政、军部委，或者多数部委，都仿农垦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

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个月，似乎可以吧？究竟如何？请你酌定。”

他对干部参加劳动完全是“亲自抓”。

随后，北戴河会议通过37个文件，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也获得通过。会上，毛泽东还发出“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要求军队干部下基层当小兵。

这次来到南京，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深入开展，毛泽东点许世友的将，目的就是军队带地方，促进干部继续去参加劳动锻炼。

许世友司令员要下连队当兵的消息在南京军区不胫而走，像一颗炸弹爆炸，很快传遍了整个军区机关。上将司令员要下连队当兵，实在是太稀罕了。消息传出，苏军驻南京军区顾问格尼哥柯跑到了许世友办公室，耸耸肩，绷着脸说：“听说你要下连当兵？毛泽东同志花样真多，将军下连当兵，官兵混在一起，打打闹闹，像什么话？”

“顾问同志，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许世友回答。

然后，他郑重地对格尼哥柯说：“你不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我向你宣传宣传吧。我们这些白发将军下连当兵，确实是闻所未闻的事。毛主席在解放军初创时期，就提出官兵平等。军队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普通一员。在战争年代，我们官兵关系情同手足。红军过草地，干部帮助战士扛枪，抬担架。我们条件十分艰苦，就凭着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团结奋斗，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解放后，我们在大机关，脱离了战士，和他们感情疏远了，下连当兵，和他们联络感情，好处多得很啦！放下官架子，和他们同吃同住，学习他们的优点，了解他们的思想，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干部下连当兵，是恢复和发扬老传统的一着妙棋。”

格尼哥柯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转而又问：“你50多岁了，下连

当兵吃得消吗？”

许世友把胸脯拍得咚咚响：“你放心，我的身体结实得很呢！我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拜战士为师，当好普通一兵，锻炼和改造自己，冲击掉自己思想上的特权和等级观念，更好地密切联系群众。”

这下格尼哥柯服了，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说，“哈拉索！许将军，你平日吐言如金，今天却滔滔不绝说了这么多，我已经被你说服了。”

然后，他伸出右手，握着许世友的手说：“好，半个月后，我去看你！再见！”

在许世友准备出发时，9月24日，国务院第80次会议也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次日，党中央、国务院对外发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

决定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决定指出：1957年5月以来，全国有近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体力劳动，大大地增强了党、政府、军队、人民团体以及很多企业、事业机关同劳动群众的联系，有效地改进了干部的思想作风，进一步改善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提高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对干部的信任和爱戴。这是形成我国今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国家干部队伍有几百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几千万人，他们的思想、生活作风影响着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这个队伍完全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认为除了一部分干部已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进行劳动锻炼外，今后主要应当使全体在职干部每年都分出一定时间去参加工农业劳动生产。为此决定：

(1)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2)各单位对于所属工作人员怎样参加体力劳动和怎样保证作满至少一个月,应当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定出计划,作好安排,以便在不影响工作的条件下迅速执行上述决定。

(3)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在每年6月和12月分别对本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作两次全面的检查,以便保证这一决定的完满实施。

一个机关干部下基层的高潮在全国兴起。

毛泽东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提升为“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的事情,这是前所未有的。各级干部去参加体力劳动,是毛泽东训练干部、培养干部的一个创举。在毛泽东时代,干部作风出奇的好,与毛泽东把他们送到农村、工厂、矿山参加劳动,密切与群众的感情不无关系。

这种“大劳动”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也有着深刻的经济意义。对此,加拿大人后来评述毛泽东时说:“他要求他们公而忘私,自力更生,尊重人和人们的劳动,总的看来,这项呼吁是受到重视的。毛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涉及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思想改造。”^①

经济不和进步文化思想发生联系显然更不行。毛泽东手头并无多少资本可进行经济建设,他办的如水利建设等大事主要靠的是人海战术来完成的,修几万个水库靠经济核算要几万个亿人民币,毛泽东那时哪里有这么多的钱办事?可他却奇迹般地办到了。成千上万的人不给钱自愿参加劳动靠的就是进步文化和思想武装。这是政治

^①《改变世界的人》,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1976年9月9日),载1976年9月14日《参考消息》。

经济学最鲜活的教材，也是那些闭门造车的庸俗经济学家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这种“进步文化和思想武装”，自然也来自于广大干部们的以身作则和率先垂范。而这种“人海战术”的“大劳动”，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所说：“这是形成我国今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22.“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

1958年9月29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如“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应该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等，后来证明是很睿智的。遗憾的是被一些人忽略了。

此时炮击金门的隔海大战还在进行，持续一个多月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福建前线指挥员叶飞认为，顺理成章，下一步就是去登陆解放金门了，并且金门一解放，解放马祖也没啥问题，几乎是顺手牵羊了。确实，金门的海上补给线已断，守军粮食供应陷入了危机，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精心修筑的防御工事被大炮摧毁得差不多，可以说，守军到了弹尽粮绝之际。此时解放军如果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事情的发展出乎叶飞的意料，事情发生逆转。

这个逆转与美国人有关。

9月15日，美国宣布在波兰华沙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恢复会谈”是获得毛泽东同意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9月19日凌晨，毛泽东就中国代表团会谈中对美斗争问题给周恩来复信，说收到周恩来的来信，“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并且交代：“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毛泽东要实行“新方针”、“新策略”，还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叶飞等人更加难理解了，什么“新方针”、“新策略”有如此之妙？

他们还没弄清楚。10月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外公开宣称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军队驻在那里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意即美国“这些军队”驻在台湾海峡“那里”“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了，也就是说，他的诸多航空母舰要从“那里”脱身了。

次日，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与参加中国国庆的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团在中南海谈话。一开始，他就说：“祝同志们健康，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更大发展，为最后战胜帝国主义而奋斗。”

接着，他谈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说：“要不要战胜帝国主义呀？总有一天要战胜它吧！”说到这，他的语气变得幽默起来了，话头一转：“当然不一定是明天早上，明天晚上也可以，后天早上也可以，总要战胜它吧？帝国主义总是要战胜的。”

他的结论十分肯定。随即，谈起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办法：“打么，有两种打法：文打和武打。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的方法打它，但是我们也准备武打。这次有好几个军事代表团来，你们是准备文打还是武打的？我们有这么些军队，难道有军队我们不准备开枪的吗？当然是准备开枪的喽！这是我代表你们回答的。但这是我们最后的

手段，如果敌人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拿出这个手段来。”

睥视一切的豪情、幽默的话语让大家哈哈笑了起来。

他接着又风趣地说：“你们会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自相矛盾，既然这是最后才拿出来的手段，为什么还在金门打炮？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抛入一个窘境，很难回答。”

他故意设一个问题，道出了大家心中的疑问。停一下，他接着告诉说：“金门打炮，这是真打，但是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每天都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我们中国就没有跟你美国人开过战，就没有打枪，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

毛泽东一句话，把美国人撻开了，道出了台海之战的本质，也说明为什么和诸如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是文打。下面，他开始介绍蒋介石了，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总统’叫蒋介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跟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打了31年，1927年打起，还要打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可能还要打70年吧，合起来就是百年战争。”

谈起了老对手，毛泽东的话语更加生动了。他先问大家：“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接着又自己回答说：“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

请自己的老对手蒋介石来给中国人当教员，真是亘古奇闻。谁会这么做？毛泽东也故意用了个惊讶的语气，说：“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

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没有人能如此坦然、幽默地谈起自己几十年的老对手。毛泽东的话让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惊讶。随即，他推己及人地从蒋介石的“历史责任”说到全世界：“希特勒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在东方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把广大的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教育过来了。”谜底终于解开了，原来他说蒋介石当的是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这样逆历史潮流、干坏事的“反面教员”！

“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日本有些军国主义者也不存在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毛泽东又巧妙地把话题转回到了当前的现实。

“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他笑着说，“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当然第一个教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教员才是杜勒斯，还要加上蒋介石，他还活着。”

毛泽东的话让大家哄堂大笑。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人敢如此奚落、嘲笑过号称“世界宪兵”的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毛泽东是第一人，对他毫不留情，竭尽讥讽之能事，但显露出胜敌豪情，完全是大无畏，并且略带一种蔑视、奚落的口气。而这种蔑视和奚落，又不是低俗，那么地不失“品位”，透着无限智慧的光芒。

谈到杜勒斯，毛泽东似乎还有不少话要说，于是先告诉大家说：“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

门去呢？他总是拿朝鲜相比，说共产党又在搞朝鲜战争啦！人们说不像嘛，朝鲜是朝鲜嘛！金门是金门嘛！金门只有那么大，只有一个酒杯那么大。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毛泽东要轻易“饶他”，不让他“溜掉”，如此不放手，很坚决，气魄大，而话语又如此轻松，这让六国代表们听得津津有味。

接着，他谈起了美国插手的黎巴嫩事件，说：“在黎巴嫩，我也是不愿美国走得太快。美国走了，好！它又是爱好和平啦！这次在黎巴嫩逮住了美国，这个偷东西的贼从来没有被人逮住过。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我们逮住了英国、法国。那时美国装好人，它装成爱好和平的。这次在黎巴嫩，美国可被我们逮住了。我说它最好多待一点时间啊！我跟赫鲁晓夫同志商量过，他也赞成我这个意见。至于美国待多少时间，三年好不好？恐怕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们不同意，要它走得快一点。美国也可能不要好久就开走了，因为它混不下去了。”说到这里，他故意大有遗憾地叫道：“哎呀！我这个目的就达不到哇！想留它多住呀，它就要走了。”

毛泽东的话让大家笑得捧腹。

“不知道你们的观察如何。也许在几个月内它在黎巴嫩就可能开跑，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台湾海峡，我们可以使它多留。台湾海峡这件事，是一个对全世界的教育工具，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有相当大的教育啊！你们不相信哪？”毛泽东说完，认真起来了：“好！那么打起仗来怎么办哪？谁要打仗啊？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呀。这个叫打文仗，不叫打武仗。”

“文仗”、“武仗”是他的发明。最后，他肯定地告诉说：“我们是要

惩罚蒋介石。这个教员哪，我们又要感谢他又要惩罚他，也给他以批评嘛。学生也可以给先生以批评，就是用大炮批评他。”

毛泽东妙谈蒋介石，妙谈杜勒斯，妙谈金门，妙谈黎巴嫩，矛头却是对准了杜勒斯和美国“世界霸权”政策。他没有着重谈与蒋介石的炮战，颇有转移矛盾之嫌地谈起了杜勒斯，把矛头紧紧地对准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意思很明确，也很坦率：杜勒斯、美国霸权主义才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真正的敌人。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和插手别国内政的。对于蒋介石，他另有解决的妙法。

此时全世界可能都没几个人能懂得他的心思。在这样的场合，智慧的他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解决台海炮战的办法，但是仔细去分析却能看出一些端倪。

很快，毛泽东就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了行动。

10月5日，他给福建前线下达了一道“暂停炮击”的命令：“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

叶飞接到这个命令后，以为毛泽东“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暂停炮击意在战前休整，下一步就要实行登陆，解放金门马祖了。这也正是前线将士们很久以来的心愿。于是，指战员们一边停战一边焦急地“等待毛主席下解放金门的命令”。

谁知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一个令人惊讶的、给炮击区域——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的文告，也就是说，给敌方军民发出了文告。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

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13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

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30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在文告中，毛泽东呼吁蒋介石“谈判”。并且，在文告中，他没如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那样称台湾军民是“蒋匪帮”，起初声色俱厉历数炮击的起因，也没直接点“蒋介石”的名，而是用“你们领导人”代替，文告还用上了“贵我两方”，客气、友好。但针对美国人，他却毫不客气地点了“杜勒斯”的名，针对美国人喊停火的做法调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对美国人竭尽讥讽之能事。与台湾人民的喊话，多次使用“和平解决”、“谈判”字眼，强调“一个中国”，强调都是“中国人”，说“战火”可以通过谈判来和平解决。一正一反，一态度诚恳，情之切切，一鄙视呵斥，奚落嘲笑。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

这一文告发表后，几乎震惊了所有人。6日，西方通讯社纷纷以大量篇幅予以转发。美联社转播最早，时间为2时15分；其次是路透社香港分社，时间为2时18分；合众国际社稍迟，时间为2时22分。美联社与合众国际社转播时略有评述，合众国际社和路透社则刊发全文。3时18分，合众国际社东京分社转播时说：“共产党中国向沿海岛屿国民党人呼吁：把美国人赶出岛屿并建议说他们（共方）和国民党人谈判和平”。

这种情况也让蒋介石和台湾军民惊讶不已。毛泽东的命令下达后，解放军金门前线炮声沉寂。没了炮击，国民党守军上下反而慌了手脚，更加惊慌了。由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一贯敌对宣传，他们不相信

中共会走“和谈”之路，听到对岸广播文告时，有的跺脚说：“这是骗局！”

这一说法立即受到反驳：“这是发动新攻势前的喘息。”

胆小的则说：“这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

一些与美国人走得近的“美国通”则说：“这是离间中美合作关系。”

但是，炮击和登陆战并没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如期发生”。在台湾军民一片惊讶和叫嚷声中，10月13日凌晨1时，毛泽东又给福建前线部队起草了一项命令，以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命令说：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1000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6.5亿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

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6.5亿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至此，叶飞等人终于明白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与蒋介石停战，是为了对付力图分裂中国的美国人，是要拉住蒋介石不往美国人怀里投去，是为了民族大义。

在命令发出当日，毛泽东在住处会见为国共两党和谈牵过线的曹聚仁。周恩来、李济深、程潜、章士钊在座。毛泽东对曹聚仁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毛泽东召见曹聚仁、章士钊等人，就是希望他们继续向蒋介石

传达和平之意。他吸了一口烟后，对众人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开。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了。”

“我们全部供应。”毛泽东立即表态说，“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他对蒋介石的“要求”，比当年重庆谈判时蒋对中共的要求几乎“优待”千万倍，且还准许他在台湾“反共”。这是多么的宽容和大度。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台海炮战的“和”处理，是毛泽东对老对手蒋介石往民族大义道路上的“挽救”、召唤，如此的宽容和大度包含着极大的民族大义，也是正确处理两岸关系的政治智慧。在毛泽东去世后，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他的这个思路进行的。这是后话。

然而，10月19日晚，美舰又来为国民党军“护航”，前去金门运送粮弹。这个情况没逃过福建前线解放军的监视眼睛。次日中午，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了一份报告：“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12时半起广播，连续二次，中外文相同。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3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中外文语同时广播。”

毛泽东当即批复：“照办。”但在时间上却又作了缓和：“口头广

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他希望蒋介石等人听到广播警告后能够迷途知返。

下午3时，新华社发布国防部长彭德怀为恢复炮击给福建前线部队的命令。一个多小时后，美国军舰还在“护航”，“咚咚！”解放军再次给金门守军进行炮击，以示惩罚。

教训归教训，毛泽东对蒋介石还是没去“痛打”，而是继续拉。对于毛泽东的示好，美国人却害怕极了。21日，杜勒斯访问台湾，并与蒋介石多次面谈。双方各说各的，东扯葫芦西扯北，谈而不拢，反闹出不少矛盾，结果，不欢而散。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隔日打炮的决定，向蒋介石的爱国立场回以友好的支持态度。

10月25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对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喊话：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

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喊话之后，毛泽东兑现了自己的话语，解放军炮击金门变为单日打，双日不打。

10月31日，毛泽东再次准备南下巡视，在临行前给周恩来、陈毅和黄克诚写信，建议说：“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声明。待有必要，再考虑发一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在毛泽东的诱导下，解放军炮击连守军连战地都不打了，打竟成了象征性的“打”。杜勒斯见没好处可沾了，只好下令云集在海峡的航空母舰偷偷地开溜。蒋介石被毛泽东和中共的民族大义召唤，也松懈下来。很快，国共双方前线对阵部队渐渐达成一种“默契”：解放军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金门守军还击，同样也只打到海滩。

11月，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写下《三告台湾同胞书》，其中说：“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四种军事

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他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虽然这篇文告最后因故没有公开发表，但后来逢年过节，解放军都部分双单日一律停止三天炮击，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

炮击金门，是毛泽东“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一个重大决策。结果，他趁机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领海 12 海里的宽度，赶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拉住了蒋介石，还支援了中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利用这次炮击，他巧妙地 and 同根同种同血脉的蒋介石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毛泽东的军事才华在和平年代再次得到发挥。

这次炮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年后，他与张治中等人回顾此事时说：“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 12 艘航空母舰来了 6 艘，第七舰队是他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这个地方是美国军舰，这个地方是国民党军舰。就相隔这么一点，他这里铺起美国国旗也不动，他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们专打国民党。这个事情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后头转到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台湾同胞书这套东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即张治中），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

接着，他对张治中说：“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10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大家一阵笑声。

最后，他风趣地说：“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毛泽东看问题何其深刻，处理问题的办法何其理性，何其睿智。这是后话。

23.“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

有人把“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归结于毛泽东一个人的“大罪”。事实上，毛泽东应该说还是当时党内少有的“冷静派”。当出现浮夸风、

高指标时，他先是不相信；在被人们和各地的“事实”（甚至包括某些科学家稻麦每亩四万斤产量的“论证”）“说服”后，他还是没完全放下心来。在指挥台海炮战的紧张时期，他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频频约见河北省委、天津地委和一些县负责人进行面谈，掌握情况，并且还听取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跃进”的浮夸风、高指标引发的诸多问题逐渐开始显现出来。有了察觉后，毛泽东果断地决定进行调控，派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等人去河南、山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为此，他破例下令叶子龙为陈伯达调派了一架飞机。他还交代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就钢铁方面应立即动手解决的问题进行报告。王鹤寿列出三四个问题后，他要求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立即印发有关各单位负责人，并带至武昌准备发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到会者。他还要求煤炭、电力、石油、化学、森林工业、建筑材料、铁道、交通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写出一份报告，并且叮嘱：“文不要长，要是能看出问题的。”

作了种种安排后，10月31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南下。

当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地区视察，与干部们谈话。此时，他没有了前一段时间那么多的热情鼓励，而是更多的问问题和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指导。见着了干部们，他就说：“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还问他们：“今年的麦子种的怎么样？每亩下种多少斤？犁多深？今年丰产，有上帝帮忙，究竟不算。”他还说：“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两个事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

小孩带不好就影响后一代。”^① 这些话语少了热度，是冷静后的思想火花。

11月1日，他在邯郸地区停车进行调查，谈话之中也是不少的疑问和问题，语气都是给人泼冷水。

获悉当地农业大丰产了，他说：“今年大丰收，老百姓高兴吧？要求休息两天吧！看来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一个月休息两天，放了假啥也不作，一年才24天不算多，过了11月份后放假一个礼拜，好好休息一下。这算不算个问题，你们想一想。”

有人回答说：“钢铁这一关还没过去，还要再突击一个月。现在是准备几天，突击几天。”

“准备几天，突击几天，钢铁是这样，农业也这个样是否行？农业上的棉花啥时可以收完？”毛泽东问。

“现在桃还没有开。还要一个多月。”

“这时桃还没开，它就不准备开了吧，剩下这些活叫娃娃们去搞好了。现在紧张，要轮班休息，11月份叫他们休息两三天行不行？群众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一个是累，一个是吃不好，群众有些意见。”

“是啊！一个是吃冷饭，没有菜，一个是托儿所，一个是累，三件事。大人、小人要吃饭，吃了饭他们要干活。”他说罢问道，“你们这里收入多少？”

“平均80元。”

“最低的是多少？”

^①毛泽东：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1958年10月31日）。

“45 元。”

他说：“45 元吃了饭就没了吧？”

“45 吃了饭就没有工资。”

“你们有多少社开不了工资的？”他又问道，几乎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干部们如实回答说：“有六个社开不了工资。”

谈到经济作物时，他的疑问更多了，“你们种 500 万亩棉花、青麻，还有什么经济作物？青菜由哪里来种，你们这里食堂吃饭有菜吧？一个月吃两次肉行不行？你们要一个人一口猪，一口猪 100 斤，平均每天六两肉，那就每天可以吃肉了。”

“公社化后猪减少了些。”

“是死了还是卖了？猪也要改善一下生活么。”他说，“明年亩产千斤，亩产 800 斤也就好了，今年小麦亩产多少？”

有人告诉说：“202 斤。”

他的回答是：“明年 302 斤也就满意了。”

当日，他到达河南新乡地区，又与五个县委书记谈话。

他特地问起了他去过的“明星公社”：“七里营的棉花收多少？”

回答说：“全年平均每亩皮棉 200 多斤。”

“我去看的那一块呢？”

“还要多些。”

“你们种多少麦子？去年下种多少？”

“已经完成麦播计划，去年每亩地下种 10 斤左右，今年都在 30 斤以上。”

“多一半还多。”

“还有下种几百斤，1000 斤的。”

他说：“太多了，挤死出不来。”

有人告诉说：“分层种，像楼梯一样。”

“啊，麦子在楼梯上站着。”他说着，这才笑了一下。大家都跟着笑了。

问了生产，他又问群众生活怎么样，问食堂办的怎么样，油、盐如何，并且说：“不仅是饭，还要是菜，菜里还要有盐有油。猪肉一个礼拜吃一次行不行？”

有人回答说：“行。”

他又问：“鸡蛋呢？”

随后，他又问社员们的工资、津贴多少，有没有医生，食堂和食堂管理员等等情况，语气都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多是问话式的。如他问：“睡觉问题解决的如何？睡觉要当任务，每人每天能不能睡八小时？七小时？六小时总可以。”

“睡不到六小时。”

“要强迫命令，一定要睡六小时。”他的态度立即变得严肃起来，“紧张时也一定要睡六小时，睡五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在工地上疲劳的时候，叫他们睡半小时再起来干，睡觉是一大任务。”

有干部说：“现在炼钢铁，秋收秋种，过去这一紧张阶段就可以了。”

他还是坚持说：“你们研究出几条睡觉的宪法，规定小人、青壮年、老人的睡觉时间，睡不好将来要受损失。”

“七里营妇女摘棉花，上午两个小时可以摘60斤，下午四个小时只摘60斤，疲劳了劳动效率就不高。”有人终于承认说。

“不管你如何紧张，一定要睡六小时，少半个小时也不行。”他说，“要强迫命令。这个强迫命令老百姓欢迎，主要是干部，小人要睡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你们不是有营、连长吗？”

“有。”

“叫营长、连长下个命令，躺下来睡，叫农民睡个午觉，你们研究一下，这是大事。一个吃饭，一个睡觉，一个管好小孩子。”^①

这些对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此地的一些思想和看法。

11月2日，他到达河南郑州。下午，他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领导、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中央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

他针对“大而公”的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少的问题，讲商品交换，讲全民与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区别，对众高级干部们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苦战三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的时间多。”

11月7日下午，他第三次讲话中批评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徐水县，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他为什么表扬安国县？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的“大”的否定。

这与他8月在河北考察时的一段调查研究分不开。

8月5日，一路风尘的毛泽东居然出现在安国城北四五里的刘

^①以上对话均见《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话纪要》。

村地头上看庄稼。当时正是大暑季节，天气特别热。毛泽东兴致勃勃，走得衣裳都汗湿透了，在地里转。走到一个棉花地时，地里有社员们在为棉花整枝。一位老农民戴着大草帽，见毛泽东挺热的，立即摘下自己的草帽递给他。毛泽东高兴地接过草帽戴上，然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包增福。”

“好，”毛泽东大声地说，“你这个名字叫得好，增福增寿。”

这话让老农民特别高兴。

毛泽东继续往地里看，看多穗高粱、花生，边走边谈。因为天太热，有人又提议说：“让毛主席休息一会儿吧。”

不久，毛泽东发现一个窝棚，自己走过去，笑着说：“我在这休息休息。坐这呢。”然后，与大家一块谈话。

安国县县长焦家驹坐在他身边。毛泽东便问他：“你们现在这个农业社怎么样，有什么困难？”

焦家驹说：“我们这个社里原来小，后来大了。大了后来又变小了。”

毛泽东问道：“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

焦家驹说：“我看过。”

“头一句话是什么？”

焦家驹老实地回答说：“我不记得了。”

毛泽东告诉他说：“头一句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咱们这个农业社也是这样，由小到大，由大到小，也是一个发展，是个过程。”

他这次为什么表扬安国县？就是因为在人民公社一股风“一大二公”，动辄好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规模，而这位县长没有去跟风，没有一刀切，“农业社”（实为人民公社）的大小，按照当地实际情况

确定。而这不仅没让毛泽东不高兴，反而让他记住了安国。他现在表扬它，就是为对人民公社的“大”进行规模上的调整作思想动员。

11月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第五次发表讲话。谈到商品同商业、家长制问题时，针对各地出现的“浮夸风”，他对干部们不再是怀疑的语气，而是相当严厉的批评语气，且认为有人没达到夸口过的产量而进行“谎报”。为此，他语重心长地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今年的9000亿斤粮食，最多是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

他第一次用上“谎报”二字。接着，他又说：“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

并且，他还点名批评《人民日报》的“热”，说：“《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在批评之后，他表扬河南修武县县委书记张洋芹说：“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而这种“稳重”多少是出于“负面”的想法——对自己没信心，对国家也不放心——而毛泽东却表扬了他，为什么？因为他“不冒失”。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最后，毛泽东肯定地说，“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

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还是慢些好。”

在这次讲话中，他强调了要“实”，要“慢”，要商品经济。

次日，他在大会上发表第六次讲话。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话’，是不对的。诗有诂，字句确凿。”毛泽东开场白就说，“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

什么事情让他睡不着？

还是担心。他所担心的，还是有些人要取消商品交换，还是在人民公社上搞“大而公”。接着，他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观点谈起了“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和“不要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的问题。最后，他提出来：(1)过渡共产主义问题；(2)有计划按比例问题；(3)这次会议的任务；(4)划线问题；(5)消灭阶级问题；(6)经济理论问题，主要是究竟要不要商品的问题；(7)现在要减轻任务会不会泼冷水？(8)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这八个问题，还是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控。

在讲话中，他对高指标进行批评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我看，我们中国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整个说来，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并没有。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还是不能速。我不相信那个9000亿（指1958年预计粮食产量），搞到7500亿斤我就满意了。十年内需不需要4亿吨钢？心血来潮一想就搞了这么一个数目。”在讲话结尾，他道出了自己的心态说：“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3000万吨还是

2140万吨好？”

他的忧心可见一斑了。

当日，他与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进行了一次谈话。针对前一段时间一些报纸为浮夸风和高指标推波助澜的情况和如何做好今后的工作，他要求“记者头脑要冷静”。

他语重心长地说：“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他又说：“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谈到记者要善于比较时，他说：“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随后，他叮嘱吴冷西说：“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这种很有针对性的谈话，毛泽东是不是对前一段报纸漫无边际的吹法螺的无声批评？如果说“大跃进”的出现，除一些干部不恰当的“煽风点火”外，一些媒体不顾事实的“大肆宣传”也是责无可贷的。但毛泽东没有太多的批评指责，而是耐心地进行对相关人员教育，给予工作方法上的指导。

然而，毛泽东在谈话后，当晚左想右思，还是睡不着，开始思考降低原来那些计划指标的具体数字，且认为“勿务虚名而获实祸”，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

在这样的思想下，次日晚上的大会上，他开始说服“大诸侯”们——各省市地方干部，希望把一度一路飙升的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不料，各会议小组组长反过来说服他维持原指标，并且希望“打通”他的思想。

毛泽东“打不通”，还是认为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甚至30倍的计划，缺乏根据。为此，他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众人还没有“觉醒”的态度更加引起了他的忧虑。

1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再次讲话，他先就交待说：“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再谈了一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同志写报告的问题后，他就忍不住说：

谈一谈明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1959年）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那是讨论性的；这次要决定，钢2700万吨，我赞成，3000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

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 535 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1070 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 6000 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的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走路。北戴河会议后，两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 2700 万吨至 3000 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 2200 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 3000 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 1800 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 and 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 1800 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 1800 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要搞好钢 1800 万吨，今年 1100 万吨钢，只有 850 万吨好的。850 万吨翻一番，是 1700 万吨。1800 万吨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大跃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1800 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修改文章，要证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洗矿之关、破碎之关、选煤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 1 月 2

月或3月4月5月6月才能过关。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1500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1800万吨,再有把握2200万吨,再有把握2500万吨、3000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1800万吨,就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是350万吨左右,今年原定600万吨,完成500万吨。明年只准备搞715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800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500万吨,明年百万吨,增加了60%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60万吨,今年150万吨,明年打算400万吨,今年增加1.7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增加到400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22万吨。今年120万吨(加上坏钢是160万吨),明年400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17万吨,今年50万吨,明年200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300万吨,只要大家努力,(如果能)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20万吨,今年70万吨,明年200万吨,增加二倍。西北去年只有1.4万吨,比蒋介石(的钢铁产量)少一点,今年5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70万吨,增加了13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2000吨,今年6万吨,增加30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60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

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说这些数字，无非说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2130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1800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作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1500万吨好钢，另外有300万吨土钢，我也满意，如此，我的负担就解除了。完成不了，我有土钢。苏联《冶金报》很称赞我们“小土群”的办法，它说可能有些钢质量差，但很有用处，可作农具，这样一想，心里就开朗了。

第一本账，1800万吨；第二本账，2200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何应钦不发饷的办法。^①

毛泽东说：“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1800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明年增加到400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何应钦不发饷的办法”……这些话语，都是为了说服那些还没冷静下来的干部们，毛泽东甚至有些“固执”和不择手段了。

^①《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

接着，他专门谈起了作假问题，首先就指出说：“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

他要把决议改为指示，为什么？就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要以指示命令的方式就杜绝作假。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他似乎带着很大的不满情绪，接着举例说：“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

他谈起作假问题，话语滔滔不绝，并且情绪更加激烈：“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

怎么办？他指出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

要犯错误。”

接着，他又谈及了经济指标：“比如 1100 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种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刘少奇，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 9000 亿斤，究竟有没有？”

刘少奇回答说：“7500 亿斤到 8000 亿斤，差不多。”

又有人说：“说 9000 亿斤，已经打了七折。”

又有人说：“7500 亿斤是有的。”

毛泽东说：“去年 3700 亿斤，今年 7500 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①

从这些插话中可以看出还有一些干部迷恋高指标，但是，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武昌会议还是决定将 1959 年钢的生产指标降为 2000 万吨，对外公布为 1800 万吨。尽管如此，这个数字，实际上比毛泽东说的“1500 万吨也可以”还是高。可见，尽管毛泽东睡不着觉，一直在做工作，党内的狂热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退。好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国民经济具体指标暂不确定制成计划，等到 1959 年中期根据实际情况再确定。

^①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24. 倡导“种试验田”：要高产，去试验

在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不提名毛泽东同志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问题。此外，还要讨论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因为讨论问题很多，尤其涉及人民公社、经济指标等重大问题，会期较长，达到13天之久。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与各地干部进行座谈。一次在谈话中，他询问王任重湖北省工农业生产情况。当王任重说起红安县领导干部带头种试验田，连年获得“社社增产，样样丰收”的可喜成绩时，毛泽东很高兴，连声称赞：“种试验田的办法好！”

事实上，他一直关心着试验田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农业生产要夺取高产，就要讲科学，要去进行科学实验，不能靠作假、瞎吹去实现，要靠技术的提高。在去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谈到农业问题时就说：“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干部种试验田，是他推行农业科学实验的第一步。此后，湖北省委发现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典型，11月，向党中央呈报《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

这份报告，回顾了红安县各级干部动手种试验田的经过，认为

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看到后极其重视，赞扬说：“湖北省委关于种试验田的报告是个好报告，红安县干部带头种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为了推广红安县经验，1958年新年前后，他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都讲了种试验田问题，并且告诉说：“红安县种试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县领导干部种试验田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就是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就是红与专。”随后，在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提议“要普遍推广试验田”说：“我们要认真学习红安县的经验，要普遍搞种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要准备把注意力引向技术革命。农业搞试验田，就照红安县的方向。”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种试验田——又红又专的道路》社论。

种试验田，是毛泽东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举措。他希望农业高产量，但不是盲目瞎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名言不是他说的。他主张和认为要去讲科学，以科学技术的手段去实现高产量，而在现有科技条件下不能完全一举达成愿望，因此，他的方法是去“种试验田”，去摸索、去试验。

毛泽东的方法不能说不是从实际出发的，既正确，也符合方法论。

此刻听到王任重介绍红安县试验田，毛泽东立即想和那些干部见见面，于是说：“你们湖北过去黄麻起义很出名，近两年红安干部种试验田又很出名，我很想找几个有实践经验的干部交谈交谈。”

“这好办，”王任重马上回答说，“就请几个种试验田的干部代表到武昌来开个座谈会吧！”

“好，好！”毛泽东满意地说。

12月7日上午，红安、麻城县委办公室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紧

急通知，要求挑选五六名参加种过试验田的干部务必于晚饭前赶到武昌。下午，红安县委第一书记程鹏率领县委副书记张景田、宣传部长童杰、农工部部长库崇德和建苏、七里坪公社党委书记耿良瑜、王作中一行六人和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率领县长程化民、中驿公社党委书记魏杏华等六名干部急匆匆地赶到了省会武昌，随即被安排住进了省委招待所——洪山宾馆。

吃了晚饭后，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走进小会议室，满面春风地告诉大家说：“毛主席和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首长要来和你们见面了！”

众人没料到是毛泽东要接见他们，非常高兴。王延春说：“毛主席今晚主要是想和你们座谈试验田的新发展，人人要准备汇报发言。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把你们从试验田中采集的花生、棉花标本，献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看看。”

王延春走后，众人却由高兴转而紧张了，纷纷说：“该向毛主席、中央首长汇报些什么呢？”

谁也没吱声。

就在这时候，突然，不知是谁说了一声：“毛主席来了！中央首长来了！”大家立刻站了起来。毛泽东健步走进来了，身后跟着邓小平、彭真和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等人。十几人不知说什么好，只是问候说：“毛主席好！中央首长好！”

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王延春请他坐在南面的藤椅上，递给他一份参加座谈会干部代表的名单。他把名单放在桌上，脱掉大衣，环视着大家笑了一下，然后抬手指着桌上的糖果和香烟说：“你们吃呀，都吃呀！”

王任重见众人还是很紧张、拘束，站起来说：“今晚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大家，是想和你们座谈种试验田的情况，都不要紧张，有什

么讲什么，好不好？”

可众人端详着毛泽东，还是谁也没说话。毛泽东笑了，顺手把一盘蜜橘推过去，接着自己也拿了一个，连声说：“我也吃嘛，大家都吃呀，吃呀！”

这一举止让众人立即感到一股亲切感。毛泽东吃了蜜橘，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就按着名单念道：“哪一个是程鹏呀？”

王任重指着程鹏介绍说：“他就是红安县带头种试验田的县委书记、黄冈地委委员程鹏。”

“哦！”毛泽东伸出手，和他握手，接着念第二个人的名字：“吴德简。”

王任重又作了介绍。他又和吴德简握了握手。顷刻间，其余干部的名字被一一念道，毛泽东和他们都一一握手。毛泽东念完张景田的名字后，停了一下，似乎有所思。王任重赶紧说：“他就是红安县委副书记，是自己买锄头扛着下乡，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张景田。”

毛泽东风趣地说：“难怪红安县的干部会种试验田，你的名字有个田字嘛。”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他见众人笑了，便提议说：“好吧，你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现在就言归正传，大家谈谈种试验田的情况吧。”

于是，程鹏、吴德简首先分别作了简短的汇报。他们汇报时，两县在座的其他干部不时补充、插话，发言积极，气氛很快就热烈起来了。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赞扬说：“为革命科学种田，这个办法好得很。”接着便站了起来，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这个办法好极了！”

接着，程鹏和吴德简又作了一些补充汇报，谈了为种试验田力争农业高产、稳产，必须大力兴修水利，以确保自流灌溉等问题。毛泽东听说“群众日夜挑灯夜战，始终保持‘哦呵喧天’的革命干劲”时，急忙插话说：“你们可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一定要让群众晚上

睡好觉。否则，群众是会坐在那里打‘哦呵，哦呵’。”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群众大干苦干，甚至日夜紧张持续“苦战”，不休息。毛泽东多次批评过。在3月成都会议上，就很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说：“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并且举湖北一个县委书记腊月二十九还让修水库的例子。在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破除迷信时也讲了这个问题，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72次，一天跳10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又获知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严重的死人情况，触动非常大，认为是“一个教训”。针对一些干部不关心群众生活的情况，他尖锐地提出：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么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他还说：“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相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了这个教训后没有丢下不管，而是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且提出了解决的两个办法：“（1）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2）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这次湖北的基层干部又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再次提出要睡好觉、要休息的问题。这与他之前强调的要采取“下命令”的方式去保证睡觉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他苦口婆心的话语，引起了这些来自基层的农村干部们的深思。有人插话说：“开夜工在一般情况下不要搞。我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为群众着想，都要顾及群众的冷暖安危。”

“好，好！”毛泽东马上接话肯定。

程鹏、吴德简向毛泽东表态说：“今后，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这时王延春提醒大家说：“你们带来的花生、棉花标本呢？拿出来献给毛主席看看嘛。”

“对呀！”程鹏忙把自己从试验地采集的一株花生标本呈到毛泽东面前说，“请毛主席验收。”

毛泽东看了又看，连声说：“红安的花生不错，红安的花生不错。”

彭真数了数花生颗数，问道：“你们所有的花生试验地是不是都长得这么好，大面积平均亩产花生多少斤？”

程鹏如实地作了回答。

“毛主席，这是我们公社的一棵棉花王。”中驿公社党委书记魏杏华也把自己带来的棉花标本呈了上来。毛泽东问：“你姓魏叫杏华吧？你会种棉花，巾帼不让须眉嘛，就叫兴花吧。”

大家满堂大笑。

邓小平这时问毛泽东道：“座谈是不是到此结束？”

“好！”毛泽东旋即宣布，“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今晚有戏慰劳你们，座谈结束了，你们都去看戏吧。”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他第三次和两个县的十几名基层干部一

一握手。

12月9日，毛泽东主持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并发表讲话。针对“大跃进”的急躁病，他再次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

然后，他再次强调说：“一个事物中间总是有两种对立的東西。现在我们看一下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这些东西会不会巩固？看来是会巩固的。但是，要料到，有些东西要垮掉。”并且提出了“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重大政策界限作出了明确规定。会议对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高指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全会接受了他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提议。

第二日，八届六中全会闭幕。毛泽东继续留在武汉，准备全会精神做一些落实。12月12日，他出席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发表了讲话，不仅再次总结了以往的教训，还作自我检讨说：“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1070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是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12月26日上午，他在东湖宾馆召开湖北省委和地委书记座谈会。

座谈会开始后，王任重说：“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泽东说：“还是请地委的同志们讲讲，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发言中，地委书记们普遍反映今年农业生产形势好，庄稼长势喜人，群众生产积极性高。也有的人说：“下面估产高，落实下来并没有那么多。”

毛泽东笑着说：“粮食产量落实以后，你们思想都通了？”

有人说：“秋收大忙时，许多地方调了大批劳动力去办钢铁，耽误了抢收，今年又是秋雨连绵，粮食发霉，棉花烂桃，造成增产不增收。”

毛泽东听罢，心情沉重了，说：“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收不回来，实在可惜。现在一定要把劲使在细收细打上面，尽量减少损失。”

有人又说：“武昌县委反映，下面大搞水利建设，群众干劲很大，纷纷表示不回家过年，要战斗在工地上。”

“还是要劳逸结合。农民不回家过年，是不是真心话，也可能是一些积极分子的想法。”毛泽东立即插话说，“农历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工地要放假，让农民回家团圆，过个好年，再来上工，干劲会更大。”

接着，他耐心地告诫大家说：“你们要对下面的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哪些反映是真实的，哪些事有虚假，哪些是群众的真实要求，要保护群众的热情。你们要下功夫进行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执行党的政策要从实际出发，这才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领导方法。”他强调在大跃进当中，一定要鼓实劲，反对“浮夸”，农业生产要搞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人民公社还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搞商品生产。这让大家进一步体会到了中央的精神。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请大家不要走，在

这里一起吃饭。”

虽然说是过生日，但饭菜和平时没二样，米饭里还掺着杂粮——玉米糝。尽管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保健医生只给了他两块。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吃肉也有人管。”

吃饭过程中，众人向毛泽东敬酒，祝愿他生日快乐。他表示感谢，并且说：“我只喝一杯酒。”

虽然是粗茶淡饭，这一天所有的人心情都格外高兴。

经过毛泽东一系列的调控和带头落实，“大跃进”疾驶的快车开始了刹车，各地农村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始整顿人民公社，战天斗地的“劳动节奏”也缓和下来了。

25.将军下连队，当兵一个月

过了生日，奔波了一年的毛泽东又前往了广州。

这时全军干部下基层正值火热之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

武汉军区是落实毛泽东关于将军下连队指示最早的军区之一。年初，到武汉视察工作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谭政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就作了关于军队干部每年要下连当兵一个月的指示。随后，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会议，传达干部到基层劳动的指示。陈再道说：“毛主席作了军队干部每年要下连当兵一个月的重要指示，还提出要求：一定要当满一个月；要真正当一个兵，一个兵每天要做的事都要去做，不得暴露身份，就是普通一兵；兵在想些什么，

有些什么要求，等等，都应有自己的体验。”

常委们听了传达，都很振奋，跃跃欲试。

为迅速贯彻落实毛泽东下基层的指示，军区又召开党代表大会，当即有18名将军带头申请下连当兵。不久，传来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正式提出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军队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号召。9月2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通知，把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定为制度。各军区纷纷响应，将军们纷纷脱下军装，下到连队当兵，成了上士、中士。

10月初，按照总政治部通知的规定，陈再道上将和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中将等率部分机关干部，换上普通的士兵服装，戴上船形帽，佩戴列兵军衔，背着背包，下到连队的班排当兵。

陈再道和政治部主任叶明分配到了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英雄部队——黄继光连一排。

初来乍到，连队干部战士又是铺床，又是端水，非常热情。但是，将军们到基层，每个人的身份都保密。战士们对连里突然来了几个老兵，还是有不少的惊奇，纷纷猜测他们是犯了错误，下放来改造思想；还是作家诗人下连队体验生活？可看来看去，却像又不像。而陈再道等人严格遵守不得暴露身份的要求，为了消除战士们疑惑，还主动地“解释”说：“我们的确是个老兵，到英雄的连队来学习，希望班、排长大胆领导，严格要求，同志们互相帮助。”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基层生活。

但是，他们在基层并不是做做样子。到了基层，完全是士兵生活。他们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操课，一起摸爬滚打，每天都很紧张，“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累得腰酸背痛。开始“老兵们”有些不习惯，但终究是革命战争年代磨练出来的“老战士”，很快便适应了，一个

个不仅精神特别充实愉快，而且还知道了不少连队新鲜事。当兵一个月，陈再道和叶明两人体重下降了好几斤，但都感到年轻了许多。叶明还由衷地说：“不当兵，我是不会承认自己身上也在滋长着官气；不当兵，我也不会积极采取措施克服连队忙乱现象。当兵一个月，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看到了自己与基层干部战士的差距，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军队干部每年要下连当兵一个月指示的深远战略意义。”

当兵结束后，叶明接到总政治部通知，赴广州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毛泽东这次到广州，主要是休息一下，但还是抽空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发表了讲话。在部队的同志面前，他风趣地谈了金门炮战，问道：“金门打炮对部队士气有没有影响？还是不要打？”

大家回答：“部队情绪高。”

“闹个人主义的时候再打他一下。”他笑了，接着说：“我们对台湾海峡地区的这个政策，大家赞成不赞成？是不是很得人心？要就都拿过来，要不一个也不要。单是金门我们就不拿。杜勒斯说，中国人不好谈，对金马无兴趣。假如杜勒斯丢下金马走了，我们怎么办？请你们想一想，你们都是政治家，一个办法是去占，我们可以控制台湾海峡一半。便于南北的海运，一个是不去，搞个无人地带，以表示我们兴趣不在这里，而在台湾。这时一定会有很多舆论，舍不得。我们不去，很可能蒋介石又来占领，这更好。我们不要他走。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理由不走。他会说，你看，共产党还打着炮，我们在炮火下撤退。你美国人多没面子啊！”

将军们忍不住哈哈大笑。

“现在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称贵我双方？为什么不打敌人司令部，为什么还答应在对方请求的时候供给他们‘以固

守’？同志们可以议一议。”毛泽东继续说，“如果金门的敌人真叫我们供给，那倒是好事，那一点兵我们养得起。”

他讲了国际形势，讲了部队建设，说：“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托儿所如此，敬老院如此，公社如此，甚至省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如此。彻底崩溃是不会的，我们总还可以打游击，还有民兵在手里。回到延安，到四川去，到云南去。我与民主人士讲过，他们都笑笑而已。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还是留在北京搞维持会呢，还是和我们一起去打游击呢？这样好像与美帝是纸老虎不符合了。所谓纸老虎，并不是他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武王不伐纣，纣王不会倒。帝国主义还活着。经过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风浪。”

“你们对我所讲的这些可能性有没有准备？河南有一个地委书记，听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他的面色发白。如果大家都不警惕都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当美国的国务秘书，就好办了。我们把杜勒斯的职务翻译成‘国务卿’不对，实际上是国务秘书。不在乎名称如何，实际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委，是艾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很有益。他不从黎巴嫩登陆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们一打炮，他从各处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舰队’，这是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说的。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门一打炮，全世界这么动。”

生动有趣的话语，大无畏的藐视敌人的气概，让将军们仿佛回到了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战争年代。最后，毛泽东说：“朝鲜打仗，研究时有时觉得主意也不多。在三八线有一个师不是被吃掉了一些？那不是活老虎？会吃人的。战术上，具体工作上绝对不要轻视敌

人，一点也不能放松。”

这次讲话算是毛泽东对1958年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和台海炮战的一个精彩总结。

讲话结束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这些将军们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毛泽东和他们都十分熟悉。留影之后，他笑容满面站着。此时，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中将正好站在他面前，他便亲切地询问道：“你下连当兵没有？”

“当了。”文年生回答。

毛泽东又问：“当满一个月没有？”

“还差六天。”

这时站在旁边的广州军区代司令员李天佑上将连忙解释说：“军区要开后勤工作会议，是我们通知他提前回来的。”

然而，毛泽东有些不悦了，说：“六天都等不得吗？”

结果，接见一结束，文年生中将就立即换上了战士装，下连队去补当这六天的兵了。

将军下连队，是改正部队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由于高级干部带头，做出了榜样，全军上下的各级军队干部下连队当兵运动轰轰烈烈。除武汉军区、南京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许世友上将外，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和其他军区的将军们也纷纷下连队当兵，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据统计，自1958年8月至1962年底，全军下连队当兵的干部共计77万人次，其中有将军250人。

12月30日，毛泽东带着一年马不停蹄的疲倦，从广州返回了北京，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本章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毛泽东文集》(第五至第八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3.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4.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5. 《缅怀毛泽东》(上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6.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 《毛泽东外交风云录》,宫力著,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8.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9. 《毛泽东在河南》,林英海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0.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1. 《毛泽东与河北》(上下),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12. 《毛泽东在湖北》,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共

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13.《忠心耿耿为人民——纪念覃应机同志》，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14.《毛泽东在江苏》，中共江苏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15.《毛泽东与广西》，中共广西区党委宣传部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6.《毛泽东与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17.《毛泽东与青年》，冯文彬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18.《毛泽东与中国农业》，郭书田主编，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

19.《七十年奋斗与思考》，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20.《袁宝华访谈录》，鲍光前、郭靖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1.《农业血防五十年》，李长友、林娇娇主编，中国农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22.《段君毅纪念文集》(上下)，中共北京市委《段君毅纪念文集》编辑组编，北京出版社 2009 年版。

23.《叶飞纪念文集》，戴尔济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24.《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赵胜、苏智良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25.《毛泽东主席视察棠下村》，钟叙本、梁富、潘湛等回忆，黄润坤记录整理，载《广州文史》第五十四辑。

26.《我陪库尔班大叔去见毛主席》，武城著，载《开心老年》2009 年第 11 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治国录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2=THE LEADING OF A
NATION:MAO SEDONG AND POST-1949 CHINA

作者=陈冠任编著

页数=690

SS号=13453846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ISBN号=978-7-5098-2430-6

中图法分类号=A752

原书定价=198.00

参考文献格式=陈冠任编著.治国录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北京：中
共党史出版社,2014.01.

内容提要=本书约120万字，分八个篇章，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治国
理政的一些决策和实践，偏重于他在国家建设、经济、外交、文化、科技
、教育等方面的一些片段。歌颂了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以
及他崇高的革命品质。